

沙尔·拉波波尔著

饶勒斯传



Puis-je avec la Courcelles
Et le Comte de Crémieux
Cherché si le Bachelier
à sujet: - Je
... l'ai
celi de M

Seville a
Machement et
est-vaire élevé suie

目 录

法朗士给拉波波尔的信	1
作者的话	2
饶勒斯给拉波波尔的一封信	4
第三版序言	6
第一部 饶勒斯的为人	8
第一章 饶勒斯的一生	8
第二章 饶勒斯的议会活动	26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	44
第四章 饶勒斯和工人阶级	63
第五章 饶勒斯——和平的捍卫者	80
第六章 饶勒斯之死	103
第二部 思想家	116
第一章 饶勒斯的哲学	116
第二章 饶勒斯和教育	131
第三章 历史学家饶勒斯	164
第三部 社会主义者	223
第一章 行动的统一	223
第二章 饶勒斯的总政策	253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国际政策	282

第四章	组织全民武装	306
第五章	饶勒斯和茹尔·盖得或改良的社会主义价值	366
第六章	社会党人参加政权的问题	387
第七章	饶勒斯的社会主义观	409
结束语	441
译后记	445

法朗士给拉波波爾的信

亲爱的朋友：

我刚刚读完你的关于饶勒斯的大作。全书从头至尾我都很欣赏、赞成。只有你能够这样全面地介绍这位广博的天才。还在你刚为这本书拟就腹稿的时候，我就答应过给你写一篇序言。现在，这本书情文并茂，完全超出了我的料想，我岂有食言之理！因此我将根据你的想法，给你写一篇序言，表示我对当代这位最伟大的天才的敬意。不过，当此战争期间，这篇东西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一俟和谈开始，我将尽力写一篇与阁下的大作相称的文章交给你。战后，你努力使之再现的饶勒斯的智慧和业绩将给我们以指导和启示。

亲切地握你的手

阿纳托尔·法朗士

1915年4月18日

作者的话

我想简单写几个字，请读者原谅我的自不量力。

我没有多大的奢望，只想把饶勒斯的思想及其时代背景记录下来。确实，我这本书本来可以叫做：饶勒斯自述。最能使人了解饶勒斯，喜爱饶勒斯的，还是饶勒斯本人。

此外，在叙述他的主要经历和业绩的时候，我曾努力找出其基本思想和指导原则。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终于发现他的全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同他的不为世人所知、因而特别被人忽略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拙作倘若果能“再现”饶勒斯的业绩，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我也就为服丧中的法国和人类作了一件好事。

同时我也尽了一点义务。

因为，饶勒斯这位心地善良、捍卫真理的伟大天才过早地离开人间，给法国和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现在我们特别需要具有他的这种品格——，为了至少部分地弥补这一损失，我们必须对他的业绩加紧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随着他的光荣牺牲，他的业绩将会永远放射出无比灿烂的光芒。我们社会党人就是主张用这种办法来为这位伟大的死者报仇雪恨。

血肉横飞的世界目前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此时此刻他那高超的话语对我们正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力量。同时，不论在今天还是在将来，他的话都能给人们以很大的教益。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解放者合作社”那些英勇无畏的无产

者们,他们不顾一切风险,勇敢地主动承担了本书的出版工作。

饶勒斯的朋友们将会满意地看到,这第一部研究这位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不朽捍卫者的书所以能问世,完全是由于一个工人合作社热心努力的结果,而对于这种合作社,饶勒斯在其光荣的一生中一直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

沙尔·拉波波尔

1915年“五一节”,巴黎

饶勒斯给拉波波尔的一封信

饶勒斯的这封信有几处对于研究他的生平很有用。此信是他在1901年8月26日从阿尔托附近的贝苏来寄给我的。信中提到的那本小册子是他关于埃米尔·左拉的小说《劳动》的一篇讲稿，该讲稿是由我在我的朋友卡西米尔博士创办的《工人和社会党人丛书》上发表的。

这封信还谈到了他的《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中的《国民公会》那一卷和我在1901年发表的一本小册子：《皮埃尔·拉甫罗夫的哲学》以及我于那一年在居斯达夫·卢阿纳主办的《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沙·拉·

亲爱的朋友：

需要改动的地方，完全拜托你了。我原来以为不必要再作任何改动，所以没有把校样留下来。不过你的法文文笔很好，完全可以作一些小的、有益的改动。

我有一种怪癖：不愿意再看过去的东西。

请不要过分责备我。你想想我每天琐事繁多，忙碌不堪，此外，还要写《国民公会》，这样大的题目，如果草率从事，等于给自己脸上抹黑。告诉你，我同你的友情是牢固的，真挚的；你喜爱我，并有着崇高的理由，我对此深为感动。如果你在8月28日，星期三，五点钟到《小共和国报》来，我将很高兴能见到你，我刚刚到巴黎两天。假期当中我没有收到《社会主义评论》。离开巴黎时

我想带上一份，看看你那几篇文章。我觉得你的拉甫罗夫很有意思，很重要。

忠于你的

饶勒斯

8月26日，星期一

第三版序言

本书于 1916 年问世以后，前两版在几个月内便销售一空，这次出第三版没有改动。

这一本关于饶勒斯的书，虽然是我在他死后几乎立刻就写出来的，但现在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删除。本书在结构上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因为我在叙述饶勒斯的生平和思想的时候，总是尽量把自己隐去。我是想对饶勒斯的思想作一全面介绍并阐明其历史意义和完整的统一。

我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家了解饶勒斯，而不是为了反对他。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和各方面对本书的评价——比如卢阿纳和瓦扬的评价，他们既是饶勒斯的好友又是饶勒斯主义反对者托洛茨基的好友——都说明我这样做是有益的。

没有比了解和真正理解饶勒斯更为艰难了，因为他的著作卷帙浩繁，又很零散，广大读者难以得到。需要经过多年的劳动和无穷尽的研究方可搜集到必要的材料，写成综合性的东西。各方面的人士都对我说，我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因此没有理由再更改本书的写作原则。

不过，我本来还想对本书补充下列几章：

一、饶勒斯的思想发展过程

通过对饶勒斯的著作的初步研究，我确信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时期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用一些材料和语录来说明这一点应当是很有意思的。

二、根据大战期间和大战之后的形势分析饶勒斯的思想

国防问题除外，饶勒斯所遵循的政策同他死后至今在各国相继成立的内阁中占上风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用材料证明这一点在我是十分容易的。仅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饶勒斯从来就没有同意过这样一种观点：在其它国家没有裁军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可以先行裁军。他一直认为单方面的裁军经常会引起战争。

此外，还可以根据这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来批评他的民主主义信仰和乐观的改良主义。饶勒斯如果能活着看到这次战争的话，他那向来敏锐的思想定可从中得到不少裨益。

如果把世界战争排除在外去评价民主和改良，那就完全失去了批评的意义。

三、饶勒斯和饶勒斯主义

饶勒斯遇到了卡尔·马克思和蒲鲁东遇到过的情况。蒲鲁东曾经不承认“蒲鲁东派”。马克思在谈到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时也曾说过：“仅就我所知道的来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饶勒斯可能也对他的信徒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是一个饶勒斯主义者。”

我本来还应当对纯粹同生平有关的部分作一些补充。饶勒斯的弟弟——海军中将，巴黎议员——在这方面给我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对此我表示感谢。

这本书的篇幅已经相当可观，如果这样补充起来，那就显得太长了。所以这些问题只好留待今后有机会时再谈。

沙尔·拉波波尔

1924年10月24日

第一部

饶勒斯的为人

第一章

饶勒斯的一生

让·饶勒斯1859年9月3日生于卡斯特尔，他天赋卓绝，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是法国一个风景如画、名叫朗格道克地区的人。这地方多坚硬的石英岩，山脉的走向很有规则，十分整齐，火山岩形成的岗峦气派雄伟。法国南部这个古老的省份，有着漫长而平坦的海滩，海滩向内弯曲，形成“一条很大的内曲线”（埃利塞·勒克律），海滩上面几乎全是罗纳河和塞纹尼的河流从石英岩上冲刷下来的石英沙。海底也很整齐、匀称：同样高度的水下山脉从这里一起伸向贝尔海峡和古罗尼海峡之间的外海。朗格道克海岸的景致十分迷人。

这个地区为法国和人类哺育出了不少热情洋溢、注重实际的伟大人物，其中有：基佐、奥古斯特·孔德、拉法耶特、拉贝胡斯、里瓦罗尔、安格尔等等。

几个生育力很强的勤劳的民族在这儿居住过，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他们是：许多人认为是巴斯克人祖先的伊贝尔人、可

能是印欧人后裔的利居尔人以及高卢人。塞尔特人则在历史开始记载他们的事迹的时候，便是朗格道克的主人了。除了这些来自北方的人外，还有一些人是从海上来的，他们是菲力基人和希腊人。这些不同种族的人互相通婚的结果使得这里的居民变得更加富有生气，更加勤劳和特别聪慧了。

朗格道克的历史极为曲折，充满了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前赴后继的斗争。我们不要忘记，饶勒斯的故乡也是为宣扬自由思想和提出“异端邪说”而牺牲的人的故乡。他们是阿尔比人，瓦尼尼和卡拉斯。

人是自然环境和历史的产物，归根结蒂是他那个时代的物质、精神和道德环境的产物。我们先来简略谈一谈饶勒斯故乡的历史。

和法国的北部如诺曼底不同，饶勒斯故乡的封建制度没有经历什么发展。构成封建社会特点的那种人和土地的巧妙等级关系，在这儿是不存在的。许多小地主的独立性很强，他们独自占有的土地数量相当大。在农村，主要是在图卢兹和教会的土地上，虽然还有农奴存在，但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那时大部分都取得了人身自由。同样，城市居民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改善。首先，已经出现了一些同意大利的某些城市一样自由、一样强大的城市。图卢兹、蒙彼利埃、尼姆、贝齐埃尔和纳尔旁当时已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些城市虽然在物质上和道义上还需要前领主的帮助，但它们同这些领主是平起平坐的；如果对方对它们的权利稍有侵犯之意，它们就毫不犹豫地以战争来回敬。纳尔旁的执政官同意大利的城市订立了政治和商业同盟；蒙彼利埃的执政官走得更远，他们用整束的现钞从领主那儿赎回自己的最高权利。在其它城市，如图卢兹和尼姆，人们通过组织得很好的起义，迫使领主放弃在这些城市享有的司法权。图卢兹的执政官有自己的旗帜，自己的军队，他们把软弱无能的领主撇在一边，强令附近的小豪绅取消妨碍大

城市商业活动的过境税。规模小一点的城市享有的自由表面上要少一些,但他们也迫使领主减少了税赋,并把贡俸和诉讼费固定了下来。几乎在朗格道克全境,刑事案件皆由各城市自己的法庭裁决,案子的受理和罚款的多寡也由他们自己决定。到后来,不愿再受领主虐待的农奴纷纷建起了一个个新的城市,作为自己的避难所。在那里,任何人只要把他家世代为领主耕种的土地交还领主,便肯定会找到工作,享受城市居民的自由权利。

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南方和南方人起着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有人感到不解,也有人感到忿懑。确实,第三共和中最有名望、最有影响的政治家都是一些南方人。这种情况不是人为的,而是这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造成的。当代政治的特点是争取实现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制,实现政教分离,可是这场斗争正是从法国南方,特别是从饶勒斯的那个小小的故乡——朗格道克开始的。

南方的教会势力不大,几乎从来没有占过优势。十三世纪以前,南方没有出过一个大神学家。这里的信教热诚较为淡薄。除了几个主教,谁也没有想到为一个宗教问题而去迫害他人。教会的财产和收入常被领主和王侯霸占。教士的特权无人尊重。什一税和教堂被俗人占用,领地被侵占,这种情况后来成为教会讨伐阿尔比人的一个原因。南方对于神学研究没有多少热情,但文学作品却很出色。在欧洲,最先用华丽的文学形式来表达细腻的感情,正是法国南方的诗人。但是南方的社会组织没有北方严密。久经沙场的西蒙·德蒙福尔的骑士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南方的乌合之众。不过十三世纪那次讨伐阿尔比人的战争却更加加深了人们对教会的仇恨。十四世纪,图卢兹的执政官建立了闻名全国的“骑士诗歌”学院,但由于构思奇特,执行不了而中途夭折。至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在朗格道克取得了哪些成功,那是大家都

知道的。1540年基督教徒占领了朗格道克的大部和蒙托邦全境。在弗瓦、维瓦雷、弗拉伊、热沃当和阿尔比，他们的人数也很多。因此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南方的宗教斗争连绵不断。互相残杀的事到处都有，混乱不堪。^①

至于瓦尼尼（1619年被处以火刑）和卡拉斯（1762年被车轮碾死），上文已经提到，不再赘述了。

饶勒斯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这种家庭经济并不富裕，仍然需要常常为生计奔忙，因而同广大人民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让·饶勒斯是海军上将、共和党参议员贡斯当·饶勒斯的亲戚。此人曾做过住马德里和圣·彼得堡的大使，1889年任海军部长（他于1889年去世，早已当上议员的饶勒斯当时已是三十岁）。

饶勒斯身体结实，举止纯朴，他热爱工作，能力很强，很象一个有教养的农民。他自己就常说：“我同老乡一样固执。”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紧密地与大地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实在就是一位天赋不凡的农民。

饶勒斯家境清寒，多亏一位名叫费利克斯·戴尔图尔的恩人的帮助，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学业。他的用法文写的哲学论文就是献给他的。

关于这位“恩人”，我们从他的朋友居斯达夫·德里那里知道了一点确切的、很有意思的情况。

居斯达夫·德里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教育部的巡视员。在居斯达夫·德里的笔下，他是这样一个人：

应当说，那个时候，费利克斯·戴尔图尔为巴黎大学神学院招收学员是非常卖劲的。他在各省到处奔走，搜寻成绩优秀和“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其劲头不亚于居潘龙的那些秘密

^① 参见阿·莫利尼的出色研究文章。——作者注

使者，这些人曾于四十年代末到各地把年青的教士找到巴黎来进查尔道纳的圣一尼古拉神学院。巡视员费利克斯·戴尔图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卡斯特尔中学的小饶勒斯的……不过，这件事他后来一直感到非常后悔。

因为费利克斯·戴尔图尔是个死硬的反动分子。他是教权主义者，经常带着狂妄的神情给人家行洗礼，不过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想把奥尔良家族的某个成员重新扶上法兰西王位。可是他仍然是我在认识饶勒斯之前所见到的最好的一个人。不过既然他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又怎么能理解饶勒斯呢？命运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弄到一起是多么大的嘲弄！

好心的戴尔图尔把小饶勒斯送进圣一巴尔贝中学读书，每个星期天都把他接出来，对他关怀备至，简直成了他的养子。饶勒斯后来在中学会考中样样名列第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学士考试和教授考试中也都名列前茅，戴尔图尔的高兴心情简直无法形容。^①

饶勒斯的青年时代是在求学中度过的。他在学校里已经显露出非凡的演说才能，使同学们大为惊异。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能在即席发言中大段大段地引用古代和现代的名家作品，而且用得恰到好处。

饶勒斯在1876年入路易十四中学读书，1878年十九岁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1年在该校毕业，与法国大哲学家柏格森一起通过教授考试。

1881年至1883年，他在阿尔比(塔尔纳)中学任哲学教员，随后去图卢兹大学任讲师，直到1885年。这一年他第一次被选为议

① 1901年里昂代表大会期间，有一次饶勒斯同维维安尼、费鲁和我在一起用餐，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他的恩人陪他去参加一次考试时，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其激动的心情简直象是看中了一匹很有希望的赛马一样。——作者注

员,当时只有二十六岁。由于年龄的关系,议会开会那天他被指定为议会秘书处成员。

他在议会度过了半辈子,约有二十五年左右。在介绍他的议会活动之前,我们先谈一下他于1891年在巴黎举行的,由唯灵主义哲学家保尔·查纳主持的答辩会上通过的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用拉丁文写的,另一篇是用法文写的。法文论文的题目是:《论感觉世界的真实性》。饶勒斯在这篇论文中出色而雄辩地阐明了他的哲学思想^①。这篇文章我们将在《饶勒斯的哲学》一章中加以研究。

他的拉丁文论文是:《论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

他认为德国社会主义同“黑格尔极左派的唯物主义”无关,而是受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这些唯心主义者影响的结果。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曾经是德国哲学的真正信徒,是德意志智慧的一部分。”

首先,这就更加清楚地说明,事件来源于思想,历史学依赖哲学。乍一看来,人们可能会认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得特别好,因为,以金钱为根本基础的新的经济秩序主要在英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确实,英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是谁发现了英国的经济发展并把它描述出来的呢?卡尔·马克思。此人不是英国的哲学家,而是一个住在英国的德国人。如果马克思没有牢牢记住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就不会把英国的全部经济活动同这个社会主义的辩证法联系起来。英国提供了事实,但解释这些事实的却是德国的哲学。

在大工业获得畸形发展和经济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出现之前

^① 我的亡友、卡尔·马克思的女婿沙尔·龙格曾告诉我,唯灵主义者查纳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教授哲学已经三十年了,第一次看到象饶勒斯这样的天真汉真的以为感觉世界是存在的。”——作者注

很久，社会主义就在德国人的思想中诞生了。

接着，他写道：

总之，要理解当代德国的社会主义，单单研究倍倍尔等人赋予它的特殊的、过渡的形式是很不够的，必须探本求源，就是说必须研究认识和意识的全部来源。所以我研究了路德的基督社会主义，研究了伦理社会主义。

1891年饶勒斯还未参加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是通过书本，通过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性研究才得到的。因此他当时的研究还很不全面。他对德国社会主义发生兴趣，是由于其伦理方面和哲学方面吸引了他。他这篇论文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其实都知道，德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门纯粹的、静思的哲学，它在为铲除现今平民社会的基础而斗争。它不仅是一门学说，而且是国家中的一个政党。因此，哲学本身往往披着盔甲，它跃跃欲试，干预政治斗争。它不仅要过问天上的事，也要过问地上的事。如果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了下来，那么社会主义则把正义从天上带了下来，就是说社会主义要在“思想”的领域内寻求实际的观点来安排地球上的生活。费希特、拉萨尔、马克思、萨埃弗尔既是先驱也是大师。

在深入研究德国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中包含着 一门哲学。这门哲学认为在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某种改变事物的形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辩证法。它认为自由不是在对立面之间进行选择的抽象的能力，不是单个的公民的假想的独立性，而是人类平等和互相结合的真正基础。

……因此，从德国的社会主义中可以看出 一门关于宇宙的发展，人类的自由，关于自然界和上帝的扎扎实实的辩证学

说。

饶勒斯后来在议会中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1886年，他作了一个关于教育的演说，不显眼地开始了他的议会生涯。当代这位最伟大的演说家发表的这篇英国人所谓的Maiden Speech^①，在当时给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印象，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是饶有兴味的。

《费加罗报》的议会专栏作家写的文章，对这位初出茅庐的后生是不太有利的。他写道：

我们听了一个人们期待已久而且早就准备好的年轻议员的初次登台演说。最近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塔尔纳议员饶勒斯第一次试了试他那年青的口才，昨天还有人认为他说得非常之好。在右翼席上和左翼席上，人人都对他作了一番鼓励，说了一些在类似场合常说的老生常谈的话。全体议员都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饶勒斯要求除国立学校外市镇也有权办一些自己的学校，教授适合本地情况的教材。

这倒有点象空洞无物、调门很高的巴黎大学的文风，共和党寄予最大希望的这位年青演说家的作风由此可见一斑。（《费加罗报》1886年10月22日）

《法兰西共和报》（甘必大创办）要公平一些。它认为饶勒斯的演说“用语高尚、明确”。《正义报》（克列孟梭主办）说这个演说“很好”，并希望议会能多有“一些象饶勒斯所作的内容丰富、很有说服力的演说”。

从1885年到他去世（1914年7月31日）为止，饶勒斯一直在为法国的共和制和社会主义而斗争。他最终加入社会主义运动是在1893年，从那以后，他就一直站在为争取实现世俗的和社会的

① 英文：指议员的“处女演说”。——译者注

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他是这场斗争中最光荣、同时也是敌人恨之入骨的领袖。如果离开整个一个时期的历史，只谈一些生活琐事是不可能把他的一生说清楚的。饶勒斯是第三共和的伟大缔造者之一，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伟大的推动者，是近二十年来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最积极的宣传员。他将作为理想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并随着他的光荣牺牲，作为为了人类和平和世界和平而遇难的烈士载入史册。

有少数人错误地认为饶勒斯是共和的独裁者，他从来不是这种人。他有着高尚的情操，性格善良、纯朴，对这种事嗤之以鼻。不过他所享有的威望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的一个敌人有一天在议会向他叫道：“你一个人就是多数”。这表明，由于他才华横溢，知识渊博，对几乎所有引起争论的问题都能发表精辟的见解，对别人的思想影响很大，所以在议会中起着最为突出的作用。

他的一些政敌常常喜欢把他说成是家产万贯的绅士。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天才的讽刺小品文作家居斯达夫·德里是怎么说的吧！居斯达夫·德里对于政治家不但生来不会阿谀奉承，而且有一种过分的恶感和不信任的情绪。下面是他对饶勒斯的住所内部陈设的描述：

那一天，我看到一家教会的报纸说，饶勒斯的工作间——同贝苏来城堡相连——陈设极为豪华，“墙上挂着柔软的丝绸”。我想，饶勒斯的工作间是在奥特伊尔的鸽楼上，所以看到这种“挂着柔软丝绸”的说法不禁叫我笑破肚皮。一间十平方尺的“高高突出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书桌，此外就是坐下来办公所必备的用品，图书放在书架上或堆放在地上。我所见到的仅此而已，根本没有名作家“书房”的味儿，如同我们在大街上的橱窗里见到的那些溜须拍马之徒故意弄出来的照片所显示的那样。那儿其实没有一件艺术品，没有一束鲜花，

甚至连斯宾诺莎那样的烟斗也没有，总之没有摆设任何可以使人在劳累之余赏心悦目，得到片刻休息的东西。饶勒斯就是在这一间清冷、简陋的“鸽楼”里准备他的参加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考试的论文的。

居斯达夫·德里还以辛辣的笔调奚落了资产阶级各大报是如何利用社会党人的分裂来诋毁这位伟大的演说家的。他写道：

你们尤其不要对我说饶勒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很可能的，不过这同我无关。我只是对他现在所做的颇感兴趣，并且觉得很好。如果象我们的博士先生们所说的那样，他干的那些事不是社会主义的，那我为社会主义，也为博士先生们感到遗憾。不过，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博士先生们错了。证据不是从马克思那儿，更不是从洛贝尔图斯那儿找来的，而是从自吹看问题全面的资产阶级报刊上找来的。《时代报》和《费加罗报》的热心卫护者们把饶勒斯同盖得正统派加以比较，教训饶勒斯什么是社会主义。听到他们那些奇谈怪论真不知叫我有高兴。“啊！”他们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叫道，“你们还是同我们说说盖得吧！此人至少是言行一致的。他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整体，主张全面地搞，马上就搞。不同资产阶级妥协，对资本家决不留情！好！说得好！同这样一个对手打交道，你马上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一切资产阶级分子都不放过……说得多么坦率！多么光明正大！同饶勒斯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丑比较起来，你们这种高尚的坦率，纯洁的意图以及理论上的毫不妥协给你们增添了多少光彩！啊！还是同我们谈谈盖得吧，他是一个何等诚实的革命者！无怪乎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支持他……”

攻击和诽谤饶勒斯的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单单法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时代报》每天都要发表一篇——有时是两篇——攻击

他的文章。可是他的私人生活无可指责。饶勒斯死的时候一贫如洗，然而他从来不装出一副穷酸相。各党派，包括最反对他的人，最后都对他表示赞扬。象《时代报》所说的那样，承认他“思想极端敏锐”，“为人无比廉洁正直”。（《时代报》1914年8月2日）

他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在他加入社会党之后，真是一场道道地地的战斗。饶勒斯很少谈到他自己，但在1908年图卢兹代表大会上，他谈了他在卡尔莫选区受到了怎样的攻击。

饶勒斯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发现资产阶级各个政党是有区别的，他说：

要是说，我们在事实上平常对其它党派，不管是哪一个，都不做任何区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假话，这是不真实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斗争环境，我要说事实并非如此。你们一定以为我这个议员成天想着再度当选。我想我已经向党表明了我的态度。当我面前多次出现比较顺利的——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斗争环境时，我仍然坚守在一个选区，那里的各派力量明显地势均力敌，靠着我的同志们和我自己的英勇顽强的努力，我才和我的那一批卡尔莫矿工保持住社会主义的旗帜；我想我已经向党表明，我对于眼前的、纯属个人的成功没有什么无聊的考虑。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在竞选当中，支持我的只是为数很少的矿工。我到乡村里去，到塞纹尼的农村去宣传社会主义观点——啊！直截了当地说，我从来不是那种把旗帜哪怕只是略微卷起一点来的人。我到那儿去，到塞纹尼的崇山峻岭去，那儿的矿主在农村拥有大片森林，他同教会的势力，巫师的势力，同唯我独尊的天主教培训出来的愚昧的山民勾结在一起，其权力大得无边；我走在路上，遭到了袭击，那是实实在在的袭击，不是嘘声，而是木棒和石块。四周的篱笆和灌木丛后面埋伏着人，从那儿突然露

出了狰狞的面孔，矿上的打手，矿主的仆从，教会的牧师全都在等着我，可是正当我要落入他们的埋伏的时候，那些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不受任何公式束缚的自发阶级斗争的激进派、无名的乡村医生、小土地所有者和民主主义者把我救了出来。他们把我救出险境以后又帮助卡尔莫的工人坚定其争取自身解放的决心，同矿主、资本家、教会展开斗争……在这次斗争之后，我不会说，我对那些给我设圈套的人和那些帮助我摆脱险境的、有民主思想的人不作任何区分。”（《1908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图卢兹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巴黎版，第363—364页）

饶勒斯是弱者和贫苦大众的坚强不屈的捍卫者，地方当局和企业主想用武力征服他，但根本办不到。政府当局于是站到反动企业主一边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得这位卡尔莫议员向选民的汇报演说多次成为名副其实的械斗。因此，饶勒斯在1895年向他的选民发出了呼吁：

卡尔莫的公民们：

四个月来，我这是第三次向你们汇报你们委托给我的使命，可是我第三次被暴力所阻。

我昨天获悉，敌人组织了一群暴徒在火车到达的地方等着我，一场械斗很可能会发生，于是我改了道，换了时间来了，以免发生任何刺激人心的事件。

我们现在是第三次面临着真正的阴谋活动。敌人想干什么？他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我们全都一清二楚。他们知道，引诱和恐吓无法让我们放弃社会主义的信仰，于是想用饥饿来征服我们。警察局、玻璃厂和矿上已经商量好，只要我一向你们汇报工作，他们就乘机挑起武斗，警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他们将逮捕、诬陷我们的人，把他们一批一批送交法庭审

判,然后从矿山开除出去。他们指望,我们的人由于失去工作和面包,最后只能挣扎在饥饿线上,这样,那些打着如意算盘的可耻的胆小鬼们将可以把他们制造的贫困推到社会主义身上。

因此,我们不能中他们的奸计,直到新的命令下达之前,一切游行示威,一切公共集会都要停止举行。为了制服我们,警察对我们虎视眈眈,老板想把我们饿死,他们别想我会中他们的圈套。

我们不能做一些徒劳无益的事情去对付当局的无耻行径。政府已经告诉你们:人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一条出路,那就是武力。

当局既然动用暴力,那么人民也可以使用暴力。这些家伙头脑发昏,他们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一切善良的人们对他们的愤怒和蔑视,后果将由他们自己来承担!

革命的一天必然会到来,你们放心地等着吧!告诉你们,我现在虽然不让你们去经受无谓的痛苦,受他们策划已久的迫害,但是到那时,我将出现在你们队伍的最前列,同你们一起参加那重大的决定性的战斗。

饶勒斯尽管是个雄辩的演说家,他的声音响彻各个文明国家,可是往往只要损失几百张选票,他就一句话也没法讲了。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饶勒斯由此断定,这种乱糟糟的区域选举制只是为某些小集团和个人扼杀全民族的代表提供了方便。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为建立一个按一定比例进行的、简称为R.P.的选举制进行了艰巨的斗争。

饶勒斯的敌人并不满足于在政治上用一切办法攻击他,他们还把他家中的私事翻出来加以利用。1901年,他们抓住玛德莱妮·饶勒斯小姐的第一次圣餐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虽然饶勒斯一

向不愿谈及个人的私事，现在却不得不再度把他的私事公诸于众，以便消除他和一部分社会党人之间正在形成的某种误解。他在《小共和国报》上——1893年以来，他一直为它写稿——发表了他的《理由》，这件事做得非常漂亮，表现了很大的自重和尊严。这篇文章对于研究他的生平颇有价值，下面是该文的主要部分。

三个月来，教会的报纸经过精心的策划，发表了一系列奇文，说我让我的女儿进行了她的第一次圣餐式。有些人喜不自禁，对我竭尽污辱和嘲笑之能事，有些人则困惑不解，十分痛苦。我们的敌人不顾事情的真相，作了许多想当然的解释，造了许多无耻的谣言。他们说这个宗教仪式体现了我本人的意愿，我本人的信仰，还说我在党内玩弄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两面手法。

这是造谣。

我从小时候起就不信仰任何宗教，任何信条。维尔弗朗什-达尔比热瓦的神父违反正常做法，在修道院的一所房子里开设了一个面向全教区儿童的教理讲习班，这件事我曾向大学稽查处反映过。我们的敌人对此大肆歪曲，说我让教友会负责我女儿的教育。

可是，我要再说一遍，我女儿的教师一直是世俗教师，她一直在世俗学校——塞维尼中学和莫里哀中学——读书，现在还在莫里哀中学。

图卢兹的一名前小学教员拉莫来尔曾要求从该城的预算中拨出一部分钱来为他那庞大的计划提供资金，我作为公共教育部的督学拒绝了他，教会的报纸利用他对我的怨恨，竟然造了那许多谣言，如此恶劣地歪曲事实！

不过，说实在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同这件事有关的不仅是我一个人，而且是绝大部分党员。那么问题何在

呢？

大部分共和派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家中的女孩子既不是教权派，也不是不信教的人。她们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后，不愿意整天过着刻板陈规的清教徒生活。她们对顽固狭隘、不容异端的思想深恶痛绝。做丈夫的和做父亲的不信宗教，也不参加宗教活动，她们对此并不介意。她们或者不关心政治，或是即使关心，也不愿意教会干预政治，不愿意牧师干预家庭生活。她们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死板的、令人窒息的教育；她们希望他们同整个现代生活一直保持着联系。因此，她们不是教权派。

但是，除极少数外，几乎所有工人和资产阶级家中的妇女至少在思想上和心灵中仍旧部分地信仰天主教和天主教传统。她们没有表示过不信教。他们在认识上和哲学上没有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不同于天主教的世界观。假如没有天主教，她们便失去了精神生活的全部支柱。

此外，她们还把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结婚、生孩子、死人——同宗教传统联系在一起，不过她们不愿意宗教传统具有独一无二性和排他性。而且，她们不认为自己有权利让孩子们同宗教传统断绝关系，因为她们自己就没有断绝这种关系。让他们同信仰其它宗教或是不信教的儿童一起自由自在地成长吧！老师会教导他们怎样思考，怎样想问题，绝不会向他们隐瞒任何人类思想的成果以及科学上的成就和假说。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生活和自由这两个伟大的教育家。等孩子们逐渐学会在思想上自己照管自己之后，他们是继续遵循还是放弃宗教传统，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但她们认为自己没有权利贸然进行干预。

法国绝大多数天主教妇女都是这样想的。她们不受教会

决定的摆布,但也没有摆脱宗教信仰。

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位资产者在十年前、十五年前或是二十年前娶了一位在这种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姑娘,假如他在结婚的时候还未参加社会政治斗争,或者只是参加了一个温和而稳健的、愿意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实行妥协的政党,虽然他本人是不信教的,但他对于在教堂举行婚礼并没有顾忌,同意举行宗教仪式来建立他的小家庭。但如果他本人后来对于社会、世界、生活逐渐有了比较大胆、比较革命的看法,对非正义的事情嫉恶如仇,并通过学习和孜孜不倦的探求真理而走上了主张社会革命的道路,如果此后他又在国家生活的重大危机中同教会发生了更加激烈、更加直接的冲突,那么他可以用武力强迫他的亲人跟着他走吗?在共同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他可以把那些他在结婚时所迁就的宗教礼俗撇在一边吗?构成他的家庭的共同基础是妥协,他可以凭借个人意志,也就是凭借暴力把这种妥协砸烂吗?

这就是生活不仅向我,也向十分之九的党员提出的问题。我知道,事实上,大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作法同我一样。

不过,有些人被这个问题苦恼得慌了神,只是一味寻找机会污辱一个对手或是贬低一个战友,我为他们感到痛心。我按照自己的良心进行了回击,如果这些早已料到的、公开的、有组织的攻击竟然会使我后退或是彷徨无主,那我简直是一个可耻的懦夫。

我从来没有说过(教会玩弄诡计和进行无耻造谣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必须以暴力废除家庭里和国家中的旧的宗教信仰,我从来没有说过社会党人应当使用暴力反对妻子和母亲的思想意识而不能有任何苟同。我从来没有说过社会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应当在国家机器中使用暴力废除传统的迷信。我

历来主张逐步摆脱宗教迷信和束缚，发挥知识和理性的内在力量。

我不仅从来不主张以暴力反对任何宗教信仰，而且从来没有使用过那种叫做辱骂的暴力形式来对待宗教信仰。我不认为我们靠拳打脚踢可以解决宗教问题。

其它的社会主义者，其它的党员有别的作法，我无权指责他们。教会加在各民族身上的桎梏做得那样巧妙，变本加厉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以致于可能有许多人竟然需要采用污辱他人的办法方可确信自己不再信教了，我倒希望我们大家都采用别的途径来摆脱宗教的束缚。加尔马寥尔的粗俗的歌词：

把基督送到牲口圈里，
把圣母送到臭粪堆上。

每次听到我都觉得十分刺耳，其原因不仅是由于歌词粗鄙不堪，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与其说是反映了思想的自由，不如说是反映了一种软弱无力的、神经质的反抗。

对于饶勒斯的这些理由，如果再作多余的评论，只会显得画蛇添足。不过我们还是要指出一点，他个人生活中出现的这个风波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社会主义者应当怎样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同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协调起来。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是一个不得不生活在他所谴责、所痛恨——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旧社会中的新人。由此而产生了許多苦闷，许多非常痛苦的斗争。他往往需要有极其坚强的毅力和理性，以及外界有利条件的配合，方可或多或少地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只有那些思想意识和社会主义信仰在这场斗争中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人才有资格责备那些没有完全处理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生活同自己未来社会的世界观的关系的人。可是我们越是接近于实现

我们的理想，则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越不仅是令人向往，而且是可能的。

饶勒斯的整个一生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一生，是为寻求权利、正义和真理而不间断地英勇奋斗的一生。对于仇恨他的人，他总是客客气气地以礼相待，总是设法通过说理，通过斗争，极为耐心地说服对方。他常常把日常斗争的纷扰和低级无聊的争论撇在一边，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高深的问题，埋头工作。对他说来，工作是一帖医治百病，清除身上庸俗的东西的良方。从这一方面看，他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人人工作，人人参加创造性的劳动，而饶勒斯一直是积极地在他所接触的一切问题上努力作出建树的。

饶勒斯的议会活动

1885年至1889年期间，饶勒斯的议会发言不多，重要性也不太大。但这些发言表明，他的思想正在越来越快地向社会主义发展。1886年10月21日，他发表了进入议会后的第一篇重要演说——关于小学教育的问题。他在这篇演说中虽然谈的是市镇在小学教育上应当享有的权利，但我们从中已可看出某些后来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占居主导地位的思想。他说：“法国社会的基础已不再是代代相传、争议很大的宗教思想，而是自然的、人人都接受的正义思想了。”他认为学校是进行高等社会教育的工具，目的在于帮助孩子们为进入“社会生活”作好准备。

1887年3月8日，他就保护贸易主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好友居斯达夫·卢阿纳在《社会主义评论》(1887年4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他这篇演说作了比任何人都更为恰当的评价。该文有这样一段话：

在这场辩论中，饶勒斯表面上坐在戴沙奈尔旁边，实际上比他高明得多。饶勒斯也是一位青年，坐在中间或者说中间靠左的席位上，但他在社会经济学方面的观点肯定超过不止一个因为要求经济自由而自认为很先进的极左分子。

因为饶勒斯提出的一项建议，内容与我们的朋友鲍埃在

他之后提出来的建议相同。他要求政府研究一下，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把从新的税收中得到的收益用来资助“佃农和农业工人”。他在这项建议前面写的唯一的一条理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考虑到在民主制度中，保护政策只有对劳动者有益方可执行……”

好极了！先生。这是一项很好、很健康的经济政策。不过你可知道？你已大大地接近于社会主义，如果再向前一步，你就会越过极左派，双脚跳进社会党里，同我们的朋友鲍埃、加美利纳、普朗多、巴斯利、吉利、米勒兰、米舍兰坐在一起了。请读者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吧！你在那篇演说中说：“我声明不反对保护贸易政策。我不仅赞成许多议员的观点，认为还是不要搞自由交换为好，而且我坚信，以一定方式理解的保护政策是符合民主思想的要求的。不过这种保护政策应当附加一些预防性措施，应当附加一些社会正义的措施。”你这样说是不是为了那些过去被坑害人的法律弄得倾家荡产的劳动者？如果是的话，先生，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如果你的那些“社会正义的措施”就是为了至今仍受剥削的劳动者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那末，不管你坐在哪一派席位上，我们都欢迎你到埃尔斯诺来！你是我们的人。

为人宽厚、观察敏锐的卢阿纳终身一直是饶勒斯的莫逆之交，他的这些话非常有预见性，用不着我们再说什么了。

饶勒斯在这次演说中还揭露了大地主以小土地所有者为掩护的“一贯伎俩”。他以卢瓦雷省为例——那儿35%的土地被拥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地主占有着——证明大地主的存在使得保护政策十分必要。

关于工人阶级，饶勒斯是这样说的：“一个工人，当他有一小笔积蓄因而不必为失业担忧的时候，他才会去争工资，维护自己的利

益；可是一旦饥饿降临到家中，他就无力自卫，而是听从老板的摆布了。”

可见，处于“中左”的饶勒斯在1887年说的话，就已经是只有有见识的社会主义者才能说得出来的。

这一年的6月17日、24日和7月8日，饶勒斯谈了矿工代表问题。这几次讲话表明饶勒斯已十分明瞭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说：“我不想说，也不能说我们已经触及到社会问题的实质。不，我们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只要社会还没有解决无产阶级参加经济管理的问题，只要各公司还让无产阶级继续处于与公司无关的、任人摆布的地位，只要无产阶级还不能参与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分配从而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只要经济上的关系还是靠听天由命或是武力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让自由、团结的工人组成的强大工人联合会说话，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只要资本的原始力量还象一种自然力量一样在各公司泛滥而不受劳动、科学和法律的约束，那么援助和救济的法律我们即使搞得再多也无济于事，我们仍然没有触及到社会问题的实质。”

值得注意的是，饶勒斯在1887年就已经谈到“强大的工人联合会”了。后来，他的这种思想又进一步明确，承认工会是社会主义的组织。

我们还应当指出，在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刚刚形成、还有点模糊不清的时候，饶勒斯就已经清楚地看到“共和自由”和“社会组织各种高级形式”之间的关系。他激动地说：“如果马上就把未来的种子播种在过去受奴役的田垅里，那是发疯，也可能是背叛。”他认为“要为生产者的解放准备条件，首先必须通过教育，通过自由的实践来解放国民”。因此，饶勒斯从自己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提出了社会主义行动的三种基本形式，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三种基本形式是：世俗的行动，共和的行动和社会的行动。饶勒斯一生

的全部纲领就在于此。

1889年2月11日饶勒斯在议会向议员们发表了下面的讲话：

“你们想作为诚实的资产阶级重新恢复老一套的选举制。”他的话击中了要害。当时正是选举前夕，每一个议员都自然而然地想到他在争取连选。《公报》说“这是不同的倾向”，好心的卡米尔·柏勒当则认为他说得“好极了！”

饶勒斯一直密切注视着人们的思想动态，他警告那些主张区域选举制的人们说，不满的情绪正在群众中蔓延，一些基层人士更喜欢“瓦扬而不是饶弗兰”，就是说人们同情不妥协派。他指出大量发行的报刊起了很大作用，这些报刊“象蒸气机带动的犁头一样”在国内犁来犁去，“把地方上的旧势力连根铲除了”，“并在四面八方开挖了许多新的田垅，更加广阔的新思想已在这些田垅里发芽”。

饶勒斯把自己参加竞选的纷扰和考虑完全放在一边，要求采取“进攻性”的共和政策。他对共和党说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难道法国大革命的智慧已经枯竭了吗？难道你们在大革命的思想中找不到一点办法来对付那些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问题？难道大革命没有留下一点后世永远可以利用的好处，使我们可以对付目前面临的各种变化不定的困难？”

议会对饶勒斯的话一句也听不进去。它取消名单投票，采取了饶勒斯所反对的“选举办法”。它满心以为这样可以挽救共和，实际上却主要是挽救了区域选举制。饶勒斯后来对这种选举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极力主张采用“比例代表制”。

在1889年的选举中，他参加了卡斯特尔第一选区的竞选，结果以8,777票对9,619票败给了一个保皇党分子。

在卡尔莫罢工风潮之后，阿尔比第二选区的反动议员德梭拉

热辞职了。1893年1月20日，饶勒斯在第二轮选举中以5,317票对4,843票战胜共和派的埃拉尔，因而由他接替德梭拉热。

1893年2月8日，为了从巴拿马事件中吸取一些社会方面的教训，饶勒斯这位社会党人演说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在今天的社会上，由于各个企业和商号采取了一套新的经营手法，已经根本不可能很有把握地把规规矩矩的老实经营同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区别开来了。”1894年7月24日在议会讨论通过反无政府主义者法的时候，他又重提这件丑闻，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当那个道德败坏的政客和那个杀人不见血的无政府主义者坐在同一条船上被带往炎热的流放地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攀谈起来，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正反映了同一个社会问题的两个互相补充的侧面。”

在1893年至1898年的那一届议会任期期间，饶勒斯的所有重要发言都围绕着土地问题，他讲得十分全面、透彻。在2月17日和20日，他谈了农业危机。他认为农业危机是由于“关税政策和保护政策的软弱无力”以及投机商的猖獗造成的。

但饶勒斯认为首先要对这场农业危机负责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大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的私人占有制”，是“生产者之间的广泛竞争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斗争”。（“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德尔加赛打断他的话。）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一样，保护政策和自由交换是一种相对的暂时现象。饶勒斯建议由国家垄断小麦的经营。几个记者马上指责他想把约瑟夫在埃及为法老王搞的那一套搬过来……饶勒斯反过来嘲笑他们说：“没有想到在我们这个信仰早期基督教的社会里，圣经的力量居然已衰败到这种地步。”约瑟夫已不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臣民，他已逐渐爬到超乎国家之上的位置上去了。他在国际市场上做小麦生意并不是为了他的主人，而是为了他自己。“他把他的十二个兄弟从一所东方宫廷里释放出来，把他们派往世界各国，让他们做大商人、大银行家、投机

商，而且一有可能还让他们做了大臣。”

饶勒斯对茹尔·罗舍之流的资产阶级道德家毫不客气地说道：“仅仅向这个社会宣传人类之爱和道德观是不够的，还必须使这个社会本身同它的官方代表所鼓吹的道德信条不发生激烈的矛盾。”饶勒斯认为在他的这项提案(在上面签名的有瓦扬、桑巴、米勒兰、维维安尼等)之后，“将会有许许多多的提案(在议会)陆续提出来”，社会党人“通过这些提案必将把操纵我们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寡头弄得名誉扫地”。

这样，从米勒兰到茹尔·盖得，到饶勒斯这些社会党议员，虽然在观点上未必一致，但在行动中共同战斗，他们每天都在议会展开伟大的社会主义斗争。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只有四十来人；但通过这场为实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不断斗争，他们的队伍发展特别迅猛。这表明在议会进行社会主义斗争，只要人们愿意，是完全可能的。这些议会斗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社会党现在只要继续前进就行了。

它于是巍然挺立，既从政治上也从经济上同反动派展开斗争，弄得梅利纳、巴尔杜和杜毕伊之流焦头烂额。1893年11月21日饶勒斯向沙尔·杜毕伊内阁叫道：“政府的一切言行都意味着向我们宣战。”接着，他向资产阶级多数派声明，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幽灵”，它是由当代世界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社会状况产生的，它并且整个地同事物的核心及无产阶级的核心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如果在一处被征服，它会在另一处站起来。要让它暂时沉默下来是可能的，但要让它屈服则根本办不到。

在1893年到1898年期间，饶勒斯利用议会的讲坛向全国宣传了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这些演说中，有一次演说实在是一份名副其实的文献。这就是他在1893年12月21日发表的那次演说，其中有一句名言经常被人引用，说的是关于打断一首“让人

们忘记贫困的古老歌曲”。不过在这次演说中，除了这句名言外，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观点的精辟论述。因为当时有人说，社会主义运动是几个野心勃勃的为首分子人为地搞起来的，饶勒斯这位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在这篇演说中开门见山，对这种奇谈怪论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整篇演说可以使人看到很多问题，现在全文抄录如下：

说真的，你们这些人的思想状况实在奇怪。（中间派的席位上发出惊叫声）你们一厢情愿地要给人民制定几项教育法，并通过自由的报刊、学校和自由的集会，反复地激发人民的热情，让他们觉醒起来。你们大概没有想到，无产阶级的全体成员都在同一程度上被你们自己要搞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把情绪激发起来了。少数几个人比较活跃，声调特别高，这是难免的。他们不脱离人民，相反，他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同人民患难与共，并肩战斗，他们不去向心怀叵测的资本家乞求同情，而是同人民一起准备整个阶级——他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的全面解放，你们竟然异想天开，以为通过几项法律的把戏就可以使他们威信扫地，把他们一网打尽！

你们知道为首分子和煽动分子在哪里吗？他们既不在组织工会——你们正在施展阴谋要把这些工会解散掉——的工人里面，也不在社会党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当中。不，主要的为首分子，主要的煽动分子，首先在资本家当中，在政府的多数派当中。（极左派热烈鼓掌，中间派抗议）

啊！先生们，你们怎么发昏到这种程度，竟然把各地的发展说成是少数几个人搞起来的。你们是不是被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发展吓破了胆？这个运动在世界各国同时爆发了。十年来，你们再也不能离开社会党的历史来谈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也是这样，甚

至被你们看成是个人主义避难所的英国也是如此。英国的工联已经参加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他们已不再单纯地闹点工潮，而是参加到政治斗争中来了。他们摆脱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参加了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他们不愿意再做工人贵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为个人谋点私利。他们已经向各个行业开门，向最下层的、即所谓最卑贱的人们开门。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这个所谓个人主义的国家站住脚。英国工联最近在毕尔法斯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甚至通过了社会主义的提案。自由党政府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压力下不得不提出了社会法。这个政府也干预劳资纠纷，不过不象法兰西共和国的那些部长们借此镇压工人……（大厅极左边的某些席位和极右边的席位热烈鼓掌），而是让纠纷体面地停息下来，这样至少可以暂时缓和一下对立情绪的发展。

当前，世界各国的人民，不论他们的自然环境和政治制度如何，也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他们都被这个世界范围的运动卷了进去，你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侈谈什么个别人煽动的问题的。因此，总理先生，你们这样指责他们，给予他们的荣誉未免太大了。你们说他们是为首分子，把他们说得也太神通广大了。掀起这样一个大的运动，不是他们所能做到的，少数几个人吹出的气，软弱得很，根本不会掀起世界无产阶级的狂涛巨澜。（上述席位热烈鼓掌）

不，先生们，事实是，这场运动是从事物的深部发展起来的，是人们不堪忍受无数痛苦的总爆发；在此之前，这些人并没有商量过，后来才在自由这个提法中找到了团结起来的共同点。事实是，在我们的共和制法国，这场社会主义运动是从你们建立的共和制和有着半个世纪历史的经济制度中产生出来的。

你们建立了共和制，这是你们的光荣；你们使得它无懈可击，坚不可摧，但你们也因而在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制造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矛盾。

勒内·戈柏来：说得好！

饶勒斯：在这个政治制度中，人民已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粉碎了过去各个寡头的统治，但在经济上他们今天还依然受着这类寡头们的统治。附带说一句，总理先生，仅仅对议会说法兰西银行的问题将向议会提出来是不够的，这件事你不说议会也知道；你们应当告诉议会，政府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大厅的极左边和极右边热烈鼓掌）

是的，你们让包括雇佣劳动者在内的一切公民通过普选，通过行使国家主权（共和制就是行使国家主权的最终的必然形式），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法律和政府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意志来产生；他们可以罢免和撤换特使、立法议员和部长。可是就在这些雇佣劳动者们在政治上享有最高权力的时候，他们在经济上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是的！就在他们可以把部长赶出内阁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却毫无保障，被人家从工厂赶了出来。他们的劳动不过是手中握着资本的人爱要就要，爱不要就不要的一种商品罢了。

工厂的规章制度越来越苛刻，越来越没有道理，是专门用来同他们作对、在他们无权过问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他们由于不理睬这些规章制度，随时都遭到被解雇的威胁。

他们完全是听天由命、任人驱使，虽然在政治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随时有可能被踢出工厂大门之外。如果他们想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大的矿业公司联盟随时会将他们解雇，停发他们的工资，断绝他们的生路。工人们虽然从政治制度上说已不必再向已经被你们推翻的国

王付给几百万法郎的俸银，但却不得不从自己的劳动中提取几十亿法郎送给不劳而获的寡头们——主宰全国劳动者的国王。（大厅极左边和极右边的好几排席位长时间热烈鼓掌）

看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现今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因为社会主义主张政治共和必须发展到社会共和；因为它主张不但议会需要共和，工厂也需要共和；因为它主张人民不但在政治上享有最高权力，而且在经济上也享有最高权力，以便铲除不劳而获的资本主义特权；就是由于这些原因，社会主义便从共和运动中产生出来了。因此，共和是最大的煽动分子，共和是最大的为首分子。让你们的宪兵把它带到法庭去接受审判吧！（上述席位又是一阵热烈鼓掌）

其次，你们制定了教育法。既然你们为劳动者在思想上的解放准备了条件，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你们为什么不愿劳动者在政治上获得解放之后再获得社会上的解放呢？因为你们不仅想实行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还想使教育世俗化，你们做得很好。（许多席位上的人点头同意，中间派发出喧闹声）

阿道尔夫·都来尔：勒米尔神父刚才为你鼓了掌，不过你一说到“世俗化”，他就不鼓掌了。（闹声）

路易·朱尔当：不管怎么说，他做了一个榜样，可惜学他的人并不多。应当象他那样多看一看。（闹声）

饶勒斯：坚决反对你们的人常常指责你们毁灭了基督教信仰，但你们并没有毁灭基督教信仰，这也不是你们的目标。你们只是想在学校里建立理性教育罢了。过去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你们毁掉的，而是在你们很久之前被下列因素毁掉的：批判的展开，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以及随着人类知识的扩大，对于其它文化和宗教的了解和接受。基督教同现代思想的生动活泼的关系也不是你们破坏的，而是在你们

之前就破坏了。不过你们在建立纯理性的教育制度时，你们所做的，所宣称的，就是只有理性足以指导每个人的生活。

(大厅极左边的某些席位和极右边的席位热烈鼓掌)

勒米尔：说得好！说得好！

费尔迪南·拉梅尔：你忘了，饶勒斯先生，由于把教育世俗化，你已经侵犯了你刚才说的自由。

饶勒斯：可是正是这样做的结果，你们使人民的教育同现代思想的成果协调起来了，使人民摆脱了教会和教条的束缚，你们没有破坏我刚才说的那个生动活泼的关系，而是把仅存的那种消极的、习惯的、传统的、老一套的关系破坏了。

你们因此而做了什么呢？啊！我可知道，当时在许多人头脑里存在的东西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一种习惯势力，而且这种习惯势力对某些人来说简直是一帖镇静剂，一种安慰。可是呢！你们把这首让人们忘记贫困的古老歌曲打断了……(上述席位热烈鼓掌)于是贫困被叫嚷声吵醒，它站立在你们面前，要求你们在自然界的阳光下——这是你们唯一没有玷污的地方——给予它足够的位置。

正如地球上白天积蓄的热量夜间要散去一部分一样，人民的力量过去也有一部分是被宗教扩散到广阔无垠的空间去的。

可是你们把这条宗教扩散的渠道堵死了，这样你们也就把人民的热烈愿望和思想都集中到当前社会方面的要求上来了，是你们自己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提高了。你们现在惊慌失措，这是你们自己造成的！(极左派和极右派热烈鼓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饶勒斯在议会的作风和他成功的秘诀。他先提出大部分听众都能接受的前提，然后以严密的逻辑和措辞确切、热情洋溢、层次分明、想象丰富的语言推导出全部的结论。他

直接向民主主义者，共和派和不信教的人说，你们建立了民主制、共和制和世俗制，请你们有始有终，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到底，那样的话，你们一定会成为社会主义者。听众一个个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好暂时承认他是对的，虽然过后又受本阶级利益的驱使而依然故我。

饶勒斯是世上少有的演说家，他的演说在印成文字以后仍然不失其魅力。世界上有三种演说家。一种人注重感情，遣词造句意在从感情上打动你。一种人试图通过雄辩的说理，通过数字和事实来说服你。还有一种人则以层次分明的结构和悦耳动听、美不胜收的言辞来征服你。饶勒斯集这些优点之大成，他是一个十全十美、无与伦比的演说家。即使是即席发言，他也只是说一些自己深入研究过的问题。他的讲演，说理、感情和动听三者兼有。他不但是一个长于口才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个学者，一个政治家。他演说的时候情绪激动，充满活力，但完全能控制住自己。他只说一些他愿意说的和应该说的话。他的思想连贯，通篇演说是一个十分和谐的整体。他不象甘必大那样老是停顿。约瑟夫·雷纳克在他写的《演说家甘必大》一书中对甘必大的演说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认为其中“插入性的解释”太多，饶勒斯则真不愧为讲坛上的一位“名将”，他声若洪钟，嬉笑怒骂酣畅淋漓，紧紧地扣住听众的心弦，同时又不停地对听众加以开导和教育。连大学教授和宣传家们听了也甘心拜服。虽然他嗓音单调，没有什么动人之处，但他说起来有一种自然的魅力，吸引人们的注意。他的演说真诚坦率，推理严谨，不擅虚辞，尽管在形式上花样不多，不尚雕琢，但演说的内容却在不断地变化，鲜明而细微的思想和绚丽多彩的形象互相交织在一起。一连串意趣横生的例子被他信手拈来发挥他的思想，而他说话时感情又是那样热烈、奔放，听众不由地被深深地感染而达到高尚的境界。

当他慷慨激昂但仍然井井有条的时候，他的演说往往会象暴风雨中划破长空的闪电一样，突然出现一些富有幽默感和明快感的语句，令人再三玩味，不胜神往。他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他那实实在在的善良的天性和温和的性情，使人感到温暖如春。他的思想有时象高山流水，有时又象一束强烈的光束，使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顿然迎刃而解。每一个听众的心都随着他那热情奔放、意义明晰、抑扬顿挫的话语而一起跳动，因为大家都被他征服了，感化了，迷住了。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要赞美、颂扬这位情操高洁、为民请命的伟大演说家。大家都感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位天性不凡、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为人善良、胸怀坦荡，用保尔·拉法格的话来说，他是一位“怪人”。因此，在演说家和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友情。人们在听了他那铿锵有力、明确透彻、滔滔不绝的演说而走出大厅的时候，都感到自己的心胸倏忽变得更加宽广，更加开阔了，从而愿意做每一个同胞、每一个弱者的朋友和兄弟。听了他的演说大家都好似到一个无比美好、无比公正的理想之国去作了一番旅行一样。有些词儿由于经常使用或过于滥用而成了俗套，但只要一经这位大演说家的金玉之口，便又恢复了其高雅的、充实的含意……

饶勒斯不但懂得爱，也懂得恨。这不是没有缘故的，因为对“恶”的憎恨正是对“善”的热爱的必然结果。

他的朋友吉罗尔特—理查由于写了一篇讽刺卡西米尔—柏里的文章而遭到控告，这件事便发生在议会斗争的这一时期，也是议会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件公案使我们看到饶勒斯伸张正义，对那些妄自尊大、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特权人物及其不明不白、伤天害理的家世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揭露。这个案件是法国社会史上和政治史上的一个有趣的插曲，所以我们决定尽量在这里全面介绍一下。

吉罗尔特—理查于 1894 年被传到塞纳省刑事法院受审，原因是他在《桑巴尔报》上发表了一篇冒犯共和国总统卡西米尔—柏里的尊严的文章。这篇文章笔锋犀利、泼辣，下面是其中最温和的几段：

打倒卡西米尔！

卡西米尔仇恨人民是恨得对的。他把宝押在这上面能取得这样大的好处实在是千载难逢，因为人民也以百倍的仇恨来回敬他了。

这只能使他从放高利贷的爷爷那儿继承来的家传本性更加膨胀起来。

他对于自己的不得人心十分了然，所以每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必是戒备森严、刀枪林立、黑压压的密探前呼后拥才敢成行。

他坐在专用车上，笑容可掬地向行人招手致意，但遇到的却是一张张死气沉沉、怀有恶感的脸，谁也不答理他。

从基佐以来还没有一位政治家能够经受得了人们这样大的反感。他比那位不择手段地发迹的家伙还要略胜一筹，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这种待遇。

他一当上总统，马上就感到了研究爱情的心理学家所说的“一见钟情”的反面——一看就令人讨厌。他的照片印了一张又一张，挂满大街小巷，过往行人偶尔瞟上一眼，必然大声骂道：“呵！无耻的畜生！”

连顽皮的小孩也一边吹着口哨，一边骂道：“猪猡！”，警察听了大为动怒。

卡西米尔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想用武力来博取人家对他的爱戴。他为自己的一表堂堂而得意洋洋，谁敢对此有任

何怀疑就让他尝尝铁窗风味，把他投进拘留所关上几个小时，狠狠揍一顿，这当然不能使人对他发生好感。

关于促使饶勒斯替吉罗尔特一理查辩护的理由，饶勒斯在法庭上向法官们作了下列说明：

当然我在决定担任他的辩护律师以前，曾经有过一点犹豫，这一点你们是不难理解的，不过犹豫的时间很短。我之所以要出来为他辩护，是因为有人对这场激烈的、正确的必要辩论极力进行攻击和非难——这当然是徒劳无益的——，因此，我要在你们面前从道义上把这场辩论的责任担当起来。这样，我便毫无畏惧地到这儿来了。

至于我到这儿来是否有什么法律上的困难或不便解释的地方，那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没有穿律师服，你们也没有穿法官服；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大家都是自由的公民，只要我们能够运用共和法律的活的灵魂——自由，而不要象大法官先生那样听命于他人，死抱住僵死的教条就行了。

你们说，“打倒卡西米尔^①！”这个题目本身就构成污辱罪。何以见得？难道这样一个亲切的称呼有损于总统的尊严吗？至于总统在大街上经过时，公民们为什么缄默不语，各个半官方的和友好的报纸都认为这是因为总统的名字太长、不便启口，这一点你们是知道的。这些报纸说，老百姓不好贸然地叫那些长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名字，他们由于害怕叫的时候接不上气来，只好把自己的热情压下去，干脆不叫。吉罗尔特一理查的胆量要比别人大一点，他倒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去叫了。不过，由于接不上来气而不得不中途停住，这总不能说是

① “卡西米尔”：原文为Casimir。Casimir在法语中是指一种薄而轻的斜纹布，与卡西米尔一柏里总统的名字前半部同音。——译者注

罪过。况且你们也知道人们对于国王也是直接以名字称呼的。我还要提醒你们：“卡西米尔”这个名字如今已不再是名字，两代人以来它已怀着一片虔诚同姓合为一体了，使得祖上那种独断专行、贪得无厌、唯利是图和带着血腥味的奥尔良主义从此成为柏里家族用之不尽的遗产。

难道在这个名字或姓前面写了“打倒”两个字，这篇文章的题目便构成污辱罪吗？

当然，严格说来，如果在总统经过的时候，他在街上喊这样的口号，聚众对总统表示敌意或瞎起哄，那他受到刑事追究，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从吉罗尔特—理查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内容和政治含义去理解，当他在最后写道：“打倒卡西米尔！也就是劳动者共和国万岁！”时，这句口号的含义显然只能是：我国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共和派都希望并准备把柏里总统赶下台。这是他们的权利。

当时正是无政府主义者投扔炸弹和国家颁布反无政府主义者法时期。采取这些法律来对付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行动，说明政府当局正处于一团混乱的状态。饶勒斯接着精辟地分析了卡西米尔—柏里在政治上发迹的真正原因。

当一些共和党人背叛了自己的过去，想抵消自己曾举手通过的共和法律时，当特权阶级为工人民主运动和农民民主运动的发展而大伤脑筋，坐卧不宁时，当大资本感到社会的要求日益对它形成严重威胁，而内部又丑闻百出，象腐烂的肌体一样遭到人们的唾弃时，他们便想在自己的周围找一些能够战斗和抵抗的人。可是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人不是老朽无能，便是满身污垢、名声很臭，只有一个人的名声还没有怎么样，此人在资产阶级王朝时期担任过部长，靠着剥削贫苦劳动者而发了横财，他曾对要求增加工资的工人进行血腥的镇压，

把 1830 年共和中的共和精神践踏无遗。这位部长同时 还是一位做过走私、股票交易等投机生意的大银行家，这些事虽然很丑恶，但他们认为大家已把它忘记了，因为“遗忘”是根治百病的一帖良方。这样，为了捍卫他们这一帮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动派的事业，为了尽快地拯救他们那些面临严重威胁的无耻勾当，此人的名声将可借来一用，因为同刚刚被种种丑闻弄得臭名远扬的人比较起来，他的名声总要好一些。

于是，他们便去找这个人的孙子，并对他说：你祖父曾做过法国商界的头领，你也象他一样，来为我们效劳，听我们使唤吧！同时，若干年来，此人也正在为扮演这一角色而积极准备，努力按照祖父的形象造就自己。

饶勒斯在分析了卡西米尔—柏里总统在政治上如何发迹之后，又分析了他的一家是如何成为巨富的。他抓住法庭庭长说的一句愚不可及的话，对此进行了无比尖锐的剖析。

卡西米尔—柏里在进入七月王朝当上路易—菲力普的一名部长之前，曾经在查理十世的宫廷中鬼混过。同共和国现任总统后来在侯爵夫人和伯爵夫人之间进行周旋以便谋取总统职位一样，克罗德—柏里也曾在格勒诺布尔的宫廷中买了一个承袭顾问职位的资格，以便取得贵族头衔。可是由于前任迟迟不死，空缺一时不能补上，脚下的大地却开始抖动了，克罗德—柏里便又把自己私邸的一间客厅提供给开创资产阶级革命的多菲内省三级会议的代表使用。这个世代为商的家族并不以拥护新的政权为荣耀，他们所以要参加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来，乃是由于旧的贵族制度未能使他们过去的发迹增添什么光彩！

为了揭露柏里家族的某些隐私，饶勒斯使用了非常激烈的语言。法庭庭长打断他的话说：饶勒斯先生，你扯得太远了，你一直

是在攻击柏里家族，你刚才这些话说得太过份，简直是在把总统的一家同一个道德败坏的家庭相提并论。

饶勒斯：我不是把他们相提并论，我是说他的一家比一个道德败坏的家庭还要坏。

里昂有些工人一天要劳动 18 个小时，可是才挣 18 个苏的工资。后来在一次由军事长官和省长主持的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的会议上，工人和老板共同拟定了一个工资额。然而卡西米尔—柏里不同意让工人在确定工资的问题上发表意见，从而降低股票的利息。他于是给军事长官和省长发去一道命令，要求取消已经达成协议的工资额。这样一来，就在里昂引起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后来被血腥镇压下去。当他让人们向里昂工人开枪时，他知道他这是在向自己的工人开枪，这是在扼杀无产阶级的权利和希望。

吉罗尔特—理查后来被判处极刑，但结果却使他在巴黎的选举中获得轰动性的成功。几天之后，卡西米尔—柏里辞职，这是社会党的胜利。饶勒斯为民众辩护的名声从此获得稳固的基础。

1898 年饶勒斯落选。1902 年他又重新回到议会，直到去世为止。

这个时期是第三共和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饶勒斯一直在为正义、民主、世俗化和社会改革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因篇幅有限，我们只能对这个充满曲折和光荣斗争的决定性时期作一不全面的介绍。

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事件是一首道德的史诗，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政治的悲剧；同时，从某些方面说来，它又是一出惩恶扬善的民间剧。几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柏尔迪戎、绰号叫做“带着面纱的女人”的居巴迪·德克兰以及Q·德波贝尔）曾经扬言要把这个事件变成一个悲喜兼备的滑稽剧。可是，由于无辜的受害者受到的无边的痛苦以及这个事件所引起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风波，这个事件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着其严肃性。它把具有各种不同思想、兴趣和利益的人都卷了进去。各个党派，各个家庭乃至整个法国都被分为两派：修改判决派和反修改判决派，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没有经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的历史学家是无法理解这些称呼的确切含义的。

我们说德雷福斯事件是一首道德的史诗。这句话的实在含义只有在那个时期生活过的人才能体会到。许多思想脆弱的杰出人士，经过严峻的思想斗争才终于下定决心象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解放他们的思想”。加布里埃尔·隋阿约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给左拉一案写的证词就生动地说明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这种思想状况。

我是怎样在抗议书上签名的呢？情况是这样的：我刚刚

给人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我对那些年轻人说了一些我相信你们大家也都会说的话：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不是一个任人驱使的奴仆……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个同学给我送来一份请愿书，我便签了名。如果我们不把自己讲的话付诸行动，那么我们教育别人的言辞就会毫无威信。（约·雷纳克：《历史》，第三卷，第406页。）

德雷福斯事件——简称为事件——直接牵涉到军队。许多高级将领把自己的荣誉和军队的荣誉当作儿戏，支持了一个错误的案件，因为该案件所依据的材料全是伪造。六、七任国防部长都公开申言德雷福斯有罪，从而使一个刑事案件变成了一个民族悲剧。这些民族主义者装模作样地认定，并且要全国都相信，德雷福斯事件将导致对外关系的复杂化，给国家带来灾难。

德雷福斯事件是一个政治悲剧，因为它把那些孤注一掷、支持一起冤案的各个反动政党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弄得名誉扫地。德雷福斯事件的直接结果是：在法国最民主的几届内阁——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内阁和孔勃内阁——的任职期间，加速了法国的世俗化和民主化的进程。

德雷福斯事件极为复杂，本书不可能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全面的介绍。我们只想介绍几个关键性的文件，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饶勒斯所起的作用。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演说家和舆论鼓动家的优秀品质，特别是他那善良的天性和正义感在这次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在贝尔纳·拉扎尔首先发动一场进攻之后，左拉于1898年1月13日在《震旦报》上发表了他那封题为《我控诉》的著名信件，立刻在世界各地广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信是写给共和国总统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

我控诉陆军中校居巴迪·德克兰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

冤案；我愿意相信，他当时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但是三年来，他一直在用一些荒谬透顶、罪恶昭彰的欺骗伎俩为自己损害他人的行为辩护。

我控诉梅西尔将军参与了本世纪最大的一起冤案，他这样做至少是意志薄弱。

我控诉毕约将军，他手中明明掌握着证明德雷福斯无罪的确实证据，但他一声不吭；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和为了替卷进事件的参谋部开脱罪责而公然侵犯人权，亵渎法律。

我控诉此案的同谋波瓦戴弗尔将军和贡斯将军，波瓦戴弗尔参与这一罪行无疑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贡斯则可能是由于一种小集团的思想作祟，想把国防部的各个机构变成谁也碰不得的禁区。

我控诉德帕利欧将军和拉瓦里侦察长搞了一个伤天害理的调查，我指的是他们的调查偏袒一方，令人发指，其证明是：拉瓦里的报告中，妄加断言之处不胜枚举。

我控诉三位字迹鉴定专家：贝劳姆，瓦里昂和古阿尔。他们的报告无中生有，欺世盗名，如果医生能证明他们患有眼疾或思维混乱，那自当别论。

我控诉国防部的各个机构无耻地在报刊上，特别是在《闪电报》和《巴黎回声报》上，大肆造谣惑众，掩盖其错误言行。

最后，我控诉第一军法处侵犯人权，不将定案材料向被告披露便将他判罪；我控诉第二军法处根据上面的命令袒护这一非法行为，他们亵渎法律，居然宣判一个罪犯无罪。

报刊上发表了德雷福斯的信件，这些信件在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德雷福斯给他妻子的信，凄楚之处感人至深，以致当局“由于害怕狱卒对犯人的看守有所懈怠”而不得不禁止他们阅读（因为德

雷福斯将这些信交给他们时并未加封)。

自从我碰到这件倒霉的事情以来，我所经历的痛苦唯有我自己知道……我的苦情世所罕见；我无时无刻不在痛苦中呻吟；我已心衰力竭，唯有死对我是最好的解脱……我被判刑的第二天，居巴迪·德克兰长官代表国防部长来看我，问我对此判决有何看法，我对他说，我不但认为自己无罪，而且要求把全部案情弄个水落石出，我还当即请求他们采取各种常用的办法进行调查，或是通过军事参赞，或是通过政府掌握的其它途径。他告诉我由于国家利益的关系，不能采取上述办法，但调查将继续进行。可是三年过去了，我仍在人们所能想象的悲惨境遇中期待着，但调查依然不见分晓！……我的处境越来越难以忍受，新的打击不断地接踵而来……我的身体已经被这种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我忧心如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天胡思乱想……我刚刚收到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来信，这件事让这么多人跟着受苦，我再一次请求你们尽快结束它……我的体力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在我在世之日，我只有一点希求：我的孩子因我而蒙受的耻辱能够洗刷干净，从而使我毫无牵挂地进到坟墓里去^①。

这个震动全国的案件，开始似乎只是特权阶级内部的事情，社会党犹豫很久才决定干预。茹尔·盖得^②是社会党人中最早的“德雷福斯派”。关于这一点，我手头掌握的加布里埃尔·德维尔在《小共和国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直接了当地、雄辩地加以说明。

在社会党人最先发表的文章和议会声明中，德雷福斯事件不

① 这最后几行字看来不是德雷福斯写给他的亲人的。——译者注

② 疑为让·饶勒斯之误。——译者注

过是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梅利纳反动当局”(梅利纳当时正在台上)的又一例证。饶勒斯当时这样写道：

通过德雷福斯——埃斯戴哈兹事件的波折及其几起几落，社会党人象专心致志的外科大夫一样，看清了那些腐朽势力的互相倾轧。

坚决反对世界金融势力，反对军国主义势力和教会势力的社会党人指出，这是整个社会肌体的全身性痉挛。我们满怀希望地注视着另一股巨大的、健康的势力——工人阶级势力，这股势力正在日益壮大，明天将主宰一切。

政府威胁要限制报刊自由，饶勒斯就此写道：

政府在给哈瓦斯通讯社的函件中所附加的威胁之辞，它还没有执行。它还没有提出限制报刊自由的法律草案。它会不会提出呢？那是很需要有一点异乎寻常的勇敢的。它一定会说，德雷福斯事件所引起的辩论将损害我国的对外关系，政府应当拥有某种合法手段加以制止。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现在不想谈论。但是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来后，社会党将可再次揭露欧洲军国主义正在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危险。有些国家表面上彼此相安无事，实际上磨刀霍霍。不仅如此，它们还在不断地采取最卑劣的手法窃取情报。它们互相贿赂对方的军官，使之背叛本国的利益，它们互相利用狡诈的手段窃取对方的机密；各国军方的“头面人物”都在干着警察的勾当。因此，建立间谍组织和反间谍组织、收买正直的人、偷窃文件，欧洲的现行制度正在用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教育着各国的人民。那一天，当参谋部的军官穿着警察的服装到人家去查抄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改装，他们穿的是道道地地的现代军队的制服。欧洲的文明将来摆脱这种制度的时候，它一定会为自己这样长时间地忍受这种羞辱而感到十分惊讶。

埃米尔·左拉因为写了《我控诉》那封信而被传到刑事法院受审，饶勒斯为左拉一案写了一份证词，他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彻底投入这个事件中来。下面是该证词的主要部分：

现在，为什么象左拉这样的公民以及其他许多与他持同样观点的人，参加到这场斗争中来了？他们为什么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什么要大声疾呼，忿忿不平？就是因为有关当局软弱无能，对这种事毫无反应，一声也不吭。早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有人把一份秘密材料送给刑事法院的法官看了，但却没有让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看。从那时以来，立法人员和政府当局的首要职责难道不应当是赶紧对这一侵犯法律和人权的事加以追究，看它是否属实吗？

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追究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曾试图让政府当局向全国作一说明，他们也本应这样做。因为有一次有人在众议院的讲坛上把这个问题明确提了出来，我直截了当地问政府总理：有一份可能同被告有关，能够对他定罪或者使他的罪行得到确认的文件，据说有人把它给法官看了，但却没有让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看，这种事究竟有没有？我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答复。人们总是用法律上没有问题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来搪塞……是啊！一个人按照一定的法律手续被判刑后他就成了罪人，这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当这个人的上诉遭到否决并按照一定的法律手续被判刑后，他仍是一个罪人，这在法律上似乎也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准备上诉的时候，是否有人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把一个秘密文件泄露了出去。

议员是对国家负责的，他们向政府当局提出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一直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我弄错了，政府总

理梅利纳曾对我说过：“我要答复你的话就一定会中你的圈套……”原来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权宣言发源地的国家里，申明不能根据秘密文件给人判罪是一种“圈套”！

“我将在别的场合答复你……”他对我说，而且这句话就登在《公报》上。别的场合！……我想那一定是在刑事法院。确实有人对我说过，在那里，真相终于在突然之间冲破重重阻力而显露出来了，但我敢肯定，当局的负责人既不会到议会来，也不会到那儿去回答全国人民有权提出的问题。在一个自称享有自由的国家里，无论是制定法律的地方还是执行法律的地方，都无法知道法律是否被人遵守，这真是咄咄怪事。

饶勒斯一经投入斗争，就日夜奋战。他不顾一切危险，把各种次要的考虑都放在一边。他象甘必大一样，喜欢重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常说的一句话：Ago quod ago。我要一往无前，把我的事业进行到底。

他在各条战线进行战斗。同他并肩战斗的雷纳克对他在议会的首次演说作了一番如实的描述：

一股反抗的烈火很久以来就在他的胸中燃烧着。很久以来，他一直在克制着内心的愤怒，强迫自己随波逐流，同他那一派的人一起搞一些平庸的竞选活动。前些时候，当他第一次与卡芬雅克答辩时，为了满足朋友们的要求，他只是泛泛地谈了一些大道理。就在刚才，党内的政治家们还在恳求他小心谨慎，爱惜自己，不要把他們牵连进去。现在，他们自己也已经看到，原来以为早已成为往事的军事教会国家又死灰复燃了，而且这不是什么遥远的事，而是近在眼前了。这个十字架和剑的同盟一旦得逞，不仅共和国世俗化的改革而且革命的主要成果都会付诸东流。不过它现在打着一种新的爱国旗号，一口咬定两个军法处绝无错误。这个观点是这个庞大

的同盟赖以存在的基石。显然，要砍倒一棵大树，必需从它的主干下手，从它的根部下手。这样，就要宣布德雷福斯无罪！宣布肖来尔、左拉和我本人做得完全对！

饶勒斯再也忍耐不住了。他首先揭露梅利纳转移视线，攻击社会党人作家。他说：未来的民族罪人，“不是那些现在及时指出错误的人”，而是那些正在犯错误的人，他们过去是帝国保护下的宫廷将领，今天是共和国保护下的耶稣会将领。

他的讲话引起了一片喧闹，待闹声平息之后，布里松警告他要“说话留神”，但是饶勒斯根本不把他的警告放在眼内，他紧紧抓住梅利纳不放，叫他睁开眼睛向四周看一看。他说：“首先起来反对两个军法处决定的”难道是社会党人吗？“在公众集会和大街上煽动派别仇恨和宗教情绪的”，难道也是社会党人吗？“因此，政府现在正处于十分微妙的境地，一说话就不能不伤害、得罪一部分人，而政府正是靠着他们的支持才能存在下去的。”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在这些情况呢？“因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这个问题，不是制造几个事端或者搞几场辩论所能解决得了的。”

然后，他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这些想法也正是长时间来许多人向正义所发出的呼声。他说：“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大家所不堪忍受的究竟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把它说出来，后果由我自己负责。自从这个事件公开化以来，我们大家所不能忍受的是谨小慎微，左顾右盼，含糊其辞，谎话连篇，懦弱无能！我再说一遍，是含糊其辞，谎话连篇，懦弱无能！”

他已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叫喊了。他满脸紫涨，手臂指向那些大声发出抗议的部长们和嚎叫的右派们。可是喧哗声

越是激烈，他的嗓子也越加高昂，听来恰如暴风雨中海鸟的尖叫声一般。他说：“你们对左拉的拙劣指控，首先暴露出来的是谎话连篇、懦弱无能。”（布里松这时叫他不要太放肆。）他答道：“秘密审判的弊病至少需要有外界的批评来加以克服。”（喧闹声变得更为激烈了。）“而且，既然你们把左拉这封信交给陪审团裁决，你们有什么权利对该信作一些删节？”

在他这次讲话的过程中，爆发了一些无比激烈的场面。一名右派粗暴地辱骂这位社会党人演说家，结果在这间堂堂的议会大厦发生了一场搏斗。

饶勒斯开始在《小共和国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提供大量关于德雷福斯无罪的确凿证据。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册出版，书名为《证据》。

关于他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他是这样说的：

我在仔细研究了有关事实、文件和旁证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1) 德雷福斯被判罪纯属非法，被告的各项基本权利全遭践踏。

2) 德雷福斯一案纯属错案。无辜者受尽折磨，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今天，那些以撒谎为职业的各个反动势力所以纠集到一起，就是要继续折磨一个清白无辜的人。

由于在社会党内部开始有人强烈反对过多地、直接地介入德雷福斯事件，饶勒斯在这本书中特别补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话，阐明介入德雷福斯事件为什么是社会党的利益所要求的。饶勒斯后来同非介入派茹尔·盖得、瓦扬及其朋友们产生了分歧，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把这段话全部抄录出来。这段话还可以使我们对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个了解。

到那一天，我们这些社会党人便可以起来对那些多年来

一直凭着法国革命的原则对我们横加指责的统治者们一一给予抨击。

我们将责问他们：你们是怎样对待人权宣言和个人自由的？你们根本就不把这些东西放在眼内，而是任凭军事当局践踏。你们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啊！我完全知道！而且我也已经听到我们的敌人是怎样进行诡辩的。《自由言论报》就阴阳怪气地说：“什么！这些社会党人和革命者，居然也关心法制！”

对于这种论调，我只想谈一句话来回答他们：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法制有两个不同的方面。有些法律旨在维护当代这个社会的最不合理的方面，旨在使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特权，即有产者对雇佣者的剥削永久化。我们要把这些法律通通砸烂，而且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通过革命的手段来铲除这种资本主义的法制，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但是，除了这些由一个阶级为着其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维护特权和掠夺他人的法律外，还有一些法律是人类可怜进步的结晶，是人类经过许多世纪的长期努力和接连不断的革命所逐渐争取到的一点点基本权利。

不管对任何人，不把案情告诉本人，就不允许判罪恐怕是这些法律中最根本的一条，可是民族主义者却要把资产阶级法制中那些维护资本的东西保存下来，至于保护人的那些部分则任由军人去糟蹋。我们这些革命的社会党人与他们不同，我们主张把今天的法制中的资本主义部分铲除掉，把有关人的部分拯救出来。我们坚决捍卫合法权利，反对军事法官践踏它，这就同假如需要的话，我们也会起来捍卫共和法制反对军人政变一样。

啊！我也知道，而且这儿就有一些朋友在说：“德雷福斯

又不是一个无产者，资产阶级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管吧。”其中一位还说了一句叫我十分痛心的话：“如果他是一个工人，人们早就不管他了。”

我要说，假如德雷福斯一案确系冤狱，假如他果真无罪——我将很快证明这一点——，他就不再是一个军官，也不再是一个资产者了；由于他经受了过分的不幸，他已经失去任何的阶级性，而只是一个经受着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的痛苦和失望的人了。

假如把他定罪确实违反了任何法律，假如他的案件确是一桩错案，那么还把他列为特权阶级的一员是多么可笑之至啊！不，他已不再是军队的一员，因为军队犯了一个罪恶的错误把他开除了。他也不再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因为那些统治阶级利令智昏，胆小如鼠，一直不敢为他恢复法制，澄清真相。他只不过是人类所经历的最大痛苦的一个例子。他是军界造谣中伤，政界懦弱无能和当局罪恶累累的活生生的见证。

是的，我们完全可以在不违反我们的原则和不忽略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倾听受害者的呼声；我们可以在革命斗争中保持人的感情；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社会主义而逃避人性。

我们所反对的这个社会，罪恶地给德雷福斯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因此，不管德雷福斯属于哪一个阶级，也不管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本人就是对当代社会秩序的一个严重抗议。由于社会错误地坚持对他造谣中伤，残酷迫害，横加罪名，他也就成了革命的一分子。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不过我还要补充一句，社会党人要把这个事件中最罪恶的、最不可告人的东西彻底搞清，他们虽然没有对某一个工人表示关心，但他们所关心的是整个工人阶级。

因为，将军们的独断专行和越来越被人吹捧的军事镇压今天最严重地威胁着谁呢？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军事法庭的胡作非为和暴虐被人们当作一种习惯而广泛接受之前铲除它，挫败它。反动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不久就要向无产阶级扑来了，因此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他们搞臭，加速他们的灭亡。

这些高级将领被内部的派系斗争弄得晕头转向，这一次向资产阶级的一员滥施淫威，造谣中伤，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受到较深的触动而发生动摇，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把没落的参谋部的气焰和威风打下去，因为它们正直接威胁着无产阶级。

德雷福斯案件中的非法行为现在证明确实有之，而阿尔封斯·恩贝尔却还在扬言要把军队的这一罪行永远掩盖在针插不进的秘密审判庭内，因此我们现在这样抗议他们的非法行为和恩贝尔的狂妄态度，将不仅造福人类而且直接对工人阶级有益。

茹尔·盖得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利和法律不过是一些“空洞的言辞”，保尔·拉法格也按照他的风格嘲笑过资产阶级道德家，对他们说过这样一句很有份量的话：道德观念是“形而上学的媒介物”，因此饶勒斯这一席话便是对他们的直接答复。

饶勒斯是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问题的。他知道资产阶级道德同社会主义道德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坚持历史延续性的思想，努力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行动同各个革命民主力量联系起来。他认真地对待资产阶级道德家，要求实践他们的诺言，同时又把这些诺言加以发展。饶勒斯对任何过分夸大的说法都深恶痛绝，这种半真半假的言辞往往比彻头彻尾的谎言具有更坏的恶果。因为这种谎言披着一件符合真实情况的外衣而把真实情况拉来当自己的同

谋。不过对一个宣传家、鼓动家说来，特别是对一个不但要进行说理分析，而且要照顾听众情绪的演说家说来，要摆正这二者的关系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的演说在征服听众的时候，既要求公允，符合实际，又要求感人。

饶勒斯在这一方面几乎总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对事物的复杂性有深刻的了解，又兼天资聪慧。在充分肯定对方观点的同时，饶勒斯极为成功地大量引用一些具体事实来充实自己的观点，因此他的观点丝毫不会因为向对方作出所谓的“让步”而有所减弱。他的朋友们就不如他洞察敏锐，尤其不如他宽宏大量。他们常常为他向与自己争论的对手甚至敌人作这一类的宽容而指责他。他没有听他们的话，因为他知道，那些完全违反事实的真真假假的言辞，虽然要混进事实中来并欲取而代之，但只要不作任何保留，把事实和盘托出，与之比较，那末事实就会赢得说服力。

“是的”，他向他的对手说道，“资产阶级的法制常常是指向工人阶级的。但在资产阶级的法制中，除了那些不合理的法律外，还有一些法律‘是人类可怜进步的结晶’”。这样，他抓住人类的这一成果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饶勒斯把真理变成了一种高尚的东西，而绝没有把它变成一种令人生厌、自私自利的东西。

他这种天生的宽阔胸怀再加上他对人和事物的深入了解使他成为——不管他愿意与否，也不管他的心地如何纯朴，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挖苦他的敌人的可怕能手，只要他想挖苦他们。

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他是用怎样的笔墨来描绘少数几个反动文人的，这几个自愿投入德雷福斯事件的文人，都是“反修改判决派”和反德雷福斯派。

柏卢尼梯尔先生曾试图在文学史上搞出一点自成体系的东西，但因问题很多，站不住脚而未能如愿，最后只好跑到上面有着显赫靠山的教会中去寻求栖身之所，希望以宣布科

学和自由的总崩溃来挽救他个人的垮台。他搜尽枯肠，想从自己的脑海中寻出一点类似思想体系的东西，但又未能如愿，于是便对当局歌功颂德起来，其卑躬屈膝简直无以复加。他那不顶用的归纳法曾骗过一些年青人，如今他在年轻的一代面前既已名誉扫地，于是必欲扼杀自己所未能控制住的自由思想而后快了。

巴雷斯先生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失去了一个标榜“个性”的难得的机会，这一点他是不能原谅自己的，所以现在便同科学院的“那些野蛮人”混在一起了。

布尔热先生感到自己的作品和名望已经未老先衰；他责备出版商无能，不会“推销”他的著作，但这是白费劲儿；他向批评界应战，在“脸色发青的公爵夫人”那儿也嘲笑起用一整套哲学概念解释男女私情的分析家们来了，但这也是白费劲儿；因为他在自己那面成功的镜子中所看到的是一张已经凋谢，愁眉不展的面容。左拉大胆而有力的行动对各界是很大的震动，同时也触伤了作家们的可怜的自尊心。布尔热还能做些什么呢？站到埃斯戴哈兹一边。因此，在吹捧了沙龙中复杂的男女私情之后，现在需要吹捧的便是沙龙中反动的和军国主义的歇斯底里了。因为要是没有不受人议论的高级将领保护布尔热先生的顾客，人们怎么会玩得起来，怎么能够搞三角、四角幽会，或者用华丽的时髦装饰来掩饰最无耻的奸情？因此，作家们，请签名吧，这一次是正正经经的，这是国防部要留作纪念的。

在这项动员反动文人的工作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今天的社会尽管腐朽透顶，罪恶累累，却不愿意就此呜乎哀哉，它千方百计要恢复自己的威信。因此要求职业“思想家们”自己作出榜样来，打出放弃思想的信号。只有当学者们把

科学否定掉，当批评家们把批判精神否定掉，当思想卖身投靠，任从武力蹂躏的时候，这个社会才会完全放下心来。

饶勒斯对“法兰西祖国同盟”的主席茹尔·勒迈特尔也有一番维妙维肖的描绘，他写道：

茹尔·勒迈特尔至少有什么都能明白的天赋。对于勒南的作品，那么多麻木不仁的人都装作只看到它是一种消遣的读物，他却看到了崇高的、饱含激情的思想和理想。他为这位大师写过几页不朽的篇章，此后他又以追随似乎比较古怪而且零散的韦莱纳作品中的逻辑和思想线索为乐了。有的时候，他还为一般读者对斯德法尼·马拉美的晦涩的诗歌作一些浅析工作，嘴角挂着一丝乐于助人的微笑。

可是到后来，他的笔调却变得越来越冷嘲热讽而近乎尖刻起来，好象他要嘲笑自己以及他那颇有见地的注释工作。

事实上，他这时突然经历着一场危机：如同圣·奥古斯汀抛弃人间虚荣和骗人的享乐一样，茹尔·勒迈特尔看不到他那游移不定、追求乐趣的爱好有什么价值了。他看着自己写的那一篇篇专栏文章和一本本书籍不禁害怕起来，突然自言自语地问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做过什么有益的工作？我对于殖民地的移民开发有过什么贡献？我有没有把唯一能使人们在竞争的世界上大显身手的活的语言教给法国的青年呢？我是否为增进当代人们的健康和体育知识做过什么呢？太可怕了！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一个注释家，一个学者罢了！

于是，这个在四十五岁左右被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神威弄得神魂颠倒的茹尔·勒迈特尔，便在转瞬之间变得特别积极而坚定起来。好象社交界的人逃进修道院或沙漠中一样，他也一下子跳到自己的生活 and 思想的另一个极端。他现在所看得上的人倒是那些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天天做着体

操，或是向着刚果河上游跋涉的人了。

他对那支职业军一片虔诚，他觉得自己过去长期异想天开，消磨意志，如今军队的纪律和统一行动可以帮助他悔改和补赎前愆。

由于过去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对什么都要嘲弄一番，他现在对军法处骇人听闻的判决决心不说一句批评的话。为了惩罚自己，他对自己的约束特别严格，他躲在军队的“岗亭”里追悔过去。妙极了！我们对他这种忏悔的狂热劲儿只有佩服。不幸的是，他的忏悔不仅是为了他自己，而且是为了我们大家。好象翻然悔悟的风流娘儿们突然教训起别人来一样，他劲头很大，并要我们都接受一种不加思索的思想纪律和浓厚的沙文主义。为一点小事，他都不让我们有分寸地、适当地使用他可能滥用过的思维能力。精神也同人体一样，对于回过头来的东西的爱好，往往具有不可动摇的坚定性。

饶勒斯投入这场争论激烈的德雷福斯事件后，引起反动势力对他的极端仇视。在布里松内阁期间，人们在费利克斯·福尔去世(1899)之前就打算采取重大行动：逮捕修改判决派的首领。

8月11日，在政府总理布里松为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福尔举行的晚宴上，当时的国防部长卡芬雅克非正式地给全体在座的部长们提供了一份打算送交最高法院审判的德雷福斯派名单，让他们审阅。

名单上有：肖来尔和特拉里欧，勒布瓦和毕卡尔，以及克里斯蒂安，此外还有作家，他们是：《震旦报》的汪霍安，克列孟梭和于尔班·戈埃；《激进报》的兰克和维克多·西蒙；《小共和国报》的饶勒斯和吉罗尔德-理查，《世纪报》的伊夫·居约和雷纳克；左拉以及当然还有麦蒂欧·德雷福斯和贝尔纳·拉扎尔。

大家都知道饶勒斯在亨利制造的假材料正式公开之前几天是

如何揭露他的了。当议会中所有的共和派和几乎所有的社会党人都赞成公布这份假材料，以及象米勒兰这样的人请求饶勒斯放弃斗争的时候，饶勒斯坚决不同意，他重新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反对“制造假材料”的斗争。这简直象是真理之神和撒谎的魔鬼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饶勒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美，这样伟大，这样勇敢。在他看来，一切都集中反映在这个事件上。他认为这个事件是反对教会捏造谎言，反对保皇派反动势力滥施淫威，反对大多数议员懦弱无能，反对种族仇恨，反对军队胡作非为，反对道貌岸然的反动高级将领，反对下级法官的奴颜婢膝，反对可笑之至的字迹鉴定专家的想当然的判断和反对反犹主义的职业诽谤家们的斗争的总的概括。德雷福斯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道道地地的整个人类的事件，捍卫真理的事件。事件吸引了以阿纳托尔·法朗士为首的法国各界著名人士的注意。甚至《费加罗报》的反动派，《时代报》中以约瑟夫·雷纳克为首的温和派和克列孟梭那样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者，以及一些坦率正直的天主教徒也都在为正义而斗争。一大批杰出的新闻记者，如高尔纳利、戈埃、特里等人，在这个事件中成了知名人物。

军法处在雷恩作出判决之后，饶勒斯知道需要暂停一个时期；尽管克列孟梭反对，他仍同意接受先行释放德雷福斯。可是他并没有解除武装。1903年，在共和党的协助下，他又掀起了要求修改第二次判决的斗争。在巴黎召开的一次由他的最忠实的朋友居斯达夫·卢阿纳主持的会议上，他利用那封嫁祸于威廉二世的假信，阐明了他的态度。

人们围绕威廉二世的信件，即他那个假的批件为中心所施展的阴谋，其严重性也就在这里。亨利制造的这份假材料是受到他的上司的庇护和怂恿才制造出来的，这一点现在既已确实无疑，那么这个材料也可能被认为只是一个小集团干

的。不过请注意,在亨利的思想上,这个假材料是永远不会泄露出去的,让他这样一个下级军官搞这种偷天换日的把戏,主要是为了替部长和将军们开脱。法国公众真是不胜荣幸,因为他给他们制造了一份关于德皇的假材料,而他给上司制造的假材料,级别就要低一些。

因此,亨利的假材料可能被人认为只是一个小集团所为,目的旨在进行一个秘密的、谁也发现不了的勾当;但事实恰恰相反,人们所以要制造这封德皇的假信,这个假的批件,并把它泄露出去,任其在外面流传,就是为了欺骗全国的舆论,为了恫吓共和国总统并替民族主义者和教会办的刊物提供炮弹。我敢说,这种事在历史上绝无仅有,我不认为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大的暗杀和谋杀案件过去确实有过,但都是在某一天或某一个晚上进行的。制造假材料过去也不是没有过,但都是个别人在特定情况下所为,而且往往是为了影响革命法庭的判决,这种法庭总是上午宣判,下午就处以绞刑。……因此这种假材料带有一定的公开性,持续的时间不过是一个小时或者半天而已。

这次事件实在令人怵目惊心,史无前例,它表明国家已处于系统的、广泛的、有组织的、以造谣中伤为职业的势力控制之下,因为人们能够在好几年中长期地、集体地、公开地制造假的材料,能够把秘密性——这似乎是制造假材料的主要特征——同公开性结合起来。

许多老的“德雷福斯派”利用这次事件在政府中爬上了高位,但饶勒斯却利用这次事件为争取国家今后的民主化、世俗化和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而斗争。他好象是在国内进行着清除场地、净化空气的工作,以便建立一个新的“人民之家”,即以正义和真理为指导的全面的共和制。他并不认为这只是一些“空洞的言辞”,因

为他想通过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现代社会主义来实现之。所以他说道：

今后只有一个阶级能够给思想提供一种社会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它不享有任何特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失去的只是锁链。它不害怕任何真理，因为一切真理都为它服务。一切把陈腐的错误观点驳得体无完肤的自由批评，都为它登上舞台准备条件。

因此，工人阶级追求真理的发自内心的理想主义要求，同它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当然在无产阶级内部也有不少人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头脑里充斥着资产阶级的成见，而且在无产阶级外部，也有不少英勇不屈、誓死捍卫真理的思想家；但总的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是同真理完全协调的。真正有知识的阶级是工人阶级，虽然它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它永远不需要撒谎。

饶勒斯和工人阶级

饶勒斯在经过共和制和民主制的斗争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是民主制和共和制发展的最后终结。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最好定义就是实现全部的权利，全部的正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饶勒斯主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是他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他深入研究现代社会主义，经常接触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并在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各个社会党组织内外开展生动活泼的斗争，这使他的理想主义具有具体的形式，并使他成为有组织有觉悟的工人阶级的首领。卢阿纳、维维安尼和米勒兰曾经参加过的、他自己的那个独立的社会党人组织只存在过一个短暂的时期。

他的社会主义行动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他努力实现社会党的统一。第二阶段，他在党的统一所许可的范围内发挥他自己的思想：以全部的社会主义理想为最高指导，通过系统的改良活动实现民主的、共和的和世俗的社会主义。

饶勒斯十分清楚，使社会党在国内和国际成为一支伟大的政治力量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党内集团和派别的大量存在是社会党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对社会党人说得好：先把你们自己组织起来，然后再去改造世界吧！

于是，饶勒斯开始积极开展活动，争取实现社会党的统一。对他说来，党的统一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是发自内心的要求。早在1897年，他就发出了关于统一的呼吁，理由十分充足。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首先准备条件，实现法国社会党的统一。但这种统一不是专制性的、僵死的统一：党的各个组织可以而且应当继续存在，他们应当始终可以在诚挚的气氛中进行协商和讨论，采取共同的行动。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比我们的敌人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因为无论是集体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社会理想。诚然，在策略上和斗争方式上分歧是存在的，但这些分歧不是不可克服的，况且前不久，比利时社会党在同民主激进派建立竞选联盟的问题上，内部就存在着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反对的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他们最后所取得的一致和亲密的合作精神难道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令人鼓舞的榜样吗？同样，我们的人当中也有些人更多地相信普选，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采取革命行动，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我们当中并没有任何人拒绝参加竞选斗争，也没有任何人想阻挡历史的意外发展，而把社会党的活动局限在依靠选举的范围内。用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一场无比深刻的经济革命，它会引起许许多多截然不同的看法，使许多人产生希望和担心，因此不可能由谁事先准确无误地规定无产阶级应当走哪一条路。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决心利用能够为建立新制度准备条件的各种政治力量。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不满足于自己的行动而拒绝与他人合作。相反，不管他是从事经济组织的建设也好，还是负责建立、管理和发展工会或者合作社也好，也不管他是响应劳动人民的斗争号召而参加战斗的也好，还是设法从资

本家的手中夺取一部分市政府的权力或立法权的也好，再或是在议会斗争中举着红旗在敌人制造武器的地方——议会——进行斗争的也好，大家都是进行共同战斗的同一支部队的战友，都是怀着同一个理想的兄弟。因此，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敌人的联合，以及资本主义对各个政党和各个经济组织，对南方工人玻璃工厂和北方卢贝市无产阶级的疯狂迫害，这一切都将逐渐地迫使我们实现社会党的统一，因为只有统一才能使我们党的力量得到成十倍的加强。

饶勒斯从来不主张建立机械的、盲目的统一。他反对任何“专制性的、僵死的统一”。他希望建立一个生动活泼的统一，在这个统一组织中各个老的组织将在物质上、思想上和精神上做出自己的贡献。饶勒斯从来不是狭意上的“党的领袖”，或是什么“发号施令的人”。他只是一个大家都认为享有很高威望和思想影响的普通同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大家在他面前从来不感到拘束或不知所措。他那副样子与其说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强加于同他接近的人，不如说是向他们求教。他相貌慈祥、和蔼，不使任何人感到望而生畏。以《时代报》为首的一些温和的报刊常常出于辩论的目的把他说成是独裁者，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符合事实了。要说独裁的话，饶勒斯只搞一种“独裁”，那就是智慧、判断力和感情的独裁。饶勒斯是个理想主义者，甚至有点天真，这是因为他有着崇高的情操和高尚的品质的缘故，不过虽然如此，他的头脑十分精明，所以在一个对他抱怀疑态度的人看来，他简直是“一个狡猾的农民”。

由于他胸怀宽广，思想开阔，他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是一个在各派之间进行调解的理想人物。人们通常都让他起草决议，而他也几乎每次都能找到一个使大家不管愿意与否都能接受的方案。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外交艺术，但这种外交是很自然的，

坦率的，是根据具体情况的特点和维护整体利益的需要而展开的。

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他决不说任何过头话，使得事情不可收拾。为了团结，他把什么都牺牲了。

对他说来，他的政治生涯中最痛苦的时期是米勒兰进入瓦尔德克-卢梭—加利费内阁后造成1899年社会党分裂的那一段时期。

老的组织发表了一篇声明，指责主张参加政府的人“离经叛道”。该声明写道：

社会党作为一个阶级的党，不应该参加内阁，否则便是自杀。它不应该同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因为在资产阶级手中，国家只能是社会保守势力和压迫势力的工具。党的使命是把国家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使之为社会解放和社会革命服务。

我们是反对党。作为一个反对党，我们应当继续反对敌对阶级及其各个政治代表机构。同时只能以敌对身份把我们的人派到议会和其它选举产生的机构中去。

饶勒斯在1893年以来就一直在主张统一的《小共和国报》上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这个运动有两个目的：反对“盖得派”和“布朗基派”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使大家认识到绝对必要把党统一起来。

饶勒斯写道：

阶级斗争是我们党的原则、基础和准则。不承认阶级斗争的人可能是共和派、民主派、激进派，说得更确切一点可能是社会主义激进派，而不是社会主义者。承认阶级斗争，就是承认在今天的社会中两个阶级：资本资产阶级^①和无产阶

^① 资本资产阶级，原文为la bourgeoisie capitaliste。——译者注

级。它们处在这样的关系中：一个阶级的全面发展必须以另一个阶级的消亡为前提。

饶勒斯反对社会党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采取中立的态度，他对自己采取的这种立场作了下列说明：

盖得常对我们说：“让我们看着他们混战吧，我们应当在一旁留心观察，然后利用他们揭露出来的真实情况来反对他们双方”。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归根结蒂是创造真正的人。当诡计多端的刽子手们对一个人滥施淫威，人们因而围绕他的问题展开一场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不应当袖手旁观，而应当投入战斗。

我们是要消灭一切寄生现象的，我们不愿意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为了无产阶级的荣誉及其革命力量，我们希望无产阶级能通过其成员来发现和揭露参谋部的谎言和军队高级将领的罪行；我们希望它能在这场没完没了的悲剧中发挥自己的思想和宽阔胸怀的影响。我们希望资产阶级能自己承认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是无法为他们自己的人伸张正义的。因为消灭一个阶级最重要的办法就是代替这个阶级，帮助它去执行它已经不会也不能执行的高级职能。

盖得和瓦扬对于这一点是清楚的：所以他们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们，而只是使用一些谩骂的、空泛的言辞说我们“很久以来”就在逃避“阶级斗争”。他们还说我们想欺骗无产阶级和社会党，这是他们对一个党员，对一个人所进行的最伤人的诬蔑。他们说“我们上当受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概是为了便于人们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名，他们把对我们的指责说得十分含糊其辞，但他们用不着这样做，因为签名的人同我们一样不可能看不出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对我们所能提出的指责不过是参加内阁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加以说明。

他们说，我们“很久以来”就执行了一项“离经叛道，妥协退让，欺骗大家”的政策。这些话要么根本没有意义，要么是盖得和瓦扬的意思，他们想以此说明，十五个月来，我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同参谋部和僧侣的斗争使社会党背离了原来的方向，我们欺骗了党。既然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本应该把话说明白。不过，我要再说一遍，在他们三人之后在声明上签名的那些人不会看不出其中的内幕，因为他们同盖得和瓦扬一样反对我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采取的立场。

这样，我不禁要问：我们究竟欺骗了谁？我们现在遇到了一场真正的思想危机：各个组织中的狭隘的、僵死的门户之见使得我们想建立的生动活泼的、自由的统一无法进行，它不仅搅乱了一切同志友情，而且搅乱了一切道德观念。

这些优秀党员目前正处在怎样奇怪的死胡同呢？我们的勇敢的朋友麦克桑斯·罗尔德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最早站出来的一名党员。作为同布里松争夺议员席位的社会党候选人，他明确地表示必须修改判决。他谴责布里松胆小如鼠，态度圆滑。他的胸怀广阔、铿锵有力的话语充满社会主义的观点和革命的激情，一度曾使他的选区大为震动。他曾以同样强有力的思想和斗争帮助二十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勒克勒佐和蒙索莱明的工人恢复了生气。我们同他在思想上过去完全一致，今天也完全一致，可是他却在这份不仅反对我们，而且对我们大肆诬蔑的声明上签了名。我们现在把他的名字公布出来。

四天之前，吉罗尔特—理查和我应让蒂利党员的要求在那里开了一个会。我问这些同志，我们是否歪曲了社会主义思想，我们有没有满腔热情地在他们面前畅谈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当他们在晚上唱着革命歌曲送我们回来的时候，我

问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同两年来一直“欺骗”党的人走在一起。

总负责人托马在会上讲了话。他提醒大家社会党的力量在不断地增长，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危急时刻不得不呼吁它发挥自己的力量。他当时颇有见地对我说，内阁一成立，他就把党员召集到一起叫他们切勿轻举妄动。可是他自己也被这一问题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弄得晕头转向了。

会议主席古当在结束他的讲话时大声说道：“现在我要讲一件事，我要请饶勒斯回忆一件往事。一年以前我曾经在圣一日尔曼大街遇到他，他同我谈了德雷福斯事件。他告诉我，德雷福斯清白无罪，一旦全国得知参谋部的罪行，军阀集团很快就会声名狼藉。他的这些话我当时不相信，今天我相信了。是的，德雷福斯没有罪，参谋部的罪行必然会使整个军阀集团身败名裂。”古当的讲话当时博得了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欢呼。我们现在公布了托马和古当的名字，他们签署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谴责我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态度，不仅反对我们，还竭力诋毁我们。

那末，在那些集团的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神秘的事情，使得我们这个一向襟怀坦白、充满激情、无比刚直的党似乎是在做一些不怎么光明正大的事情呢？这都是社会党内可恶的四分五裂的状况造成的，它妨碍人们交换意见，树立独到的看法。

* * *

但是，不管他们有过多大的贡献，也不管他们享有多高的威信，盖得和瓦扬现在都不再能随心所欲地擅自把别人从社会党的行动中开除出去了。经过他们自己的长期努力，社会党如今已成为一个特别庞大的组织，他们想在党内称王称霸，

进行家长式的统治是根本不可能了。正如个人所有制和行会所有制要改变成社会所有制一样，社会党将不再是某些集团首领的个人财产或那些集团本身共有的财产了。它将是全党、全体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公共财产。社会党必须先将自己社会化，然后才去将其它一切社会化。

1899年，饶勒斯在雅皮大厅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成功地使大会宣布实行统一。但这第一次统一没有存在多久。米勒兰参加政府在各个组织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饶勒斯当时所关心的主要是解决共和制的危机，打击教会的反动势力，可是那些老的组织或是为了竞选的目的，或是出于原则上和理论上的考虑，却把社会党的宣传和组织问题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导致分裂。1900年产生了“法国工人党”（“盖得派”），1901年又在里昂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他们的盟友——“革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派”）。

这样，法国就有了两个社会党：主要由法国工人党和爱·瓦扬的那些朋友——“革命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法兰西社会党（即革命联盟）和饶勒斯、卢阿纳、布里安、维维安尼、列诺得尔和雷弗兰等人领导的法国社会党。

1901年至1904年期间，各组织之间的斗争接连不断。饶勒斯和他的朋友们当时在反对反动派，争取建立民主的和世俗的共和制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党经常有代表参加“左派代表团”，也就是共和派“联盟”。饶勒斯是共和联盟的真正的精神领袖，该联盟在孔勃部长的参加下，对由保皇党人，教士和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反动同盟的打击，虽然说不上是致命的，但十分沉重。

根据1904年法兰西社会党在兰斯代表大会所做的决定，法国的争论被提交到1904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

饶勒斯的朋友们常常指责他“软弱”，理由有二：1) 饶勒斯对于他过去在社会党内的对手如茹尔·盖得和瓦扬的朋友们让步太多；2) 饶勒斯向法国总工会的革命工团主义者投降。

他们指责饶勒斯的这两点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埋怨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是因为对他的为人缺乏真正的了解。饶勒斯虽然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但也是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以产业无产阶级为行动基础的现代社会主义认识十分深刻。他什么都决心去干，就是不愿意同组织起来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决裂。他正确地认为任何离开这个基础的行动将会一事无成，或半途而废。甚至对于他自己那个他从未背弃过的民主改良事业，他也认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的思想中，他从来没有为了社会主义而牺牲民主，也没有为了民主而牺牲社会主义，而是努力使二者协调起来。

饶勒斯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他在行动上的英勇顽强是这种精神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点，他已在德雷福斯事件和“入阁事件”时期有了充分的表现，他猛烈地批评了自己的朋友，批评了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者所推行的不妥协政策和布里安搞的总罢工。尽管他面临确实的危险，尽管人们对他进行恫吓、诽谤和污辱，他仍然不遗余力地抵抗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对他的野蛮攻击，最后被这些无耻之徒杀害。

饶勒斯虽然对社会党和法国总工会作了一些让步，但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不同观点。无论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以前还是以后，他都在统一的社会党内努力实现他那完整的改良思想。他一方面注意到法国总工会是工人阶级行会经济组织的唯一代表这一既定事实，一方面又不断地表明自己在哪些方面不同于那些赞成法国总工会做法的人。

诚然，他是一个在党已经成熟时才加入党的领导人，同时在那

些老的革命组织内他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党内的这种特殊情况常常要求他处处留心，事事提防，甚至“妥协退让”。他不得不根据不同的政治场合压低自己对别人的批评，不把某些分歧说得十分严重。但他决不让人们对他的主张和看法有任何怀疑。要是为了整个运动的利益他必须对多数人作出让步的话，他一定要在对自己的意见经过多方说明之后才作出让步。一个党的领袖永远也没有完全自由的时候，他往往要跟着他的部下走，否则就会眼看着他们四散而去。

可是饶勒斯缺乏一种勇气：作为一个善于深谋远虑和比较理智的人，他不敢违反真理和现实。他害怕自己会弄错了。思想平庸的人的一些坚定的看法常常使他不敢举步，不得不犹豫很久才作出决定。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是比较软弱的。他看到而且知道事物和人是无比复杂的，所以常常在某些方面不如——这种弱点倒是有益于他人并合乎情理的——一些脑筋死板、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或固定的想法而一个劲往前奔的人。饶勒斯之所以犹豫就是因为他通晓事理，饶勒斯之所以犹豫，就是因为他明白……

造成饶勒斯软弱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心地善良，怀抱理想主义，因而在观察人和事物的时候不易看到其庸俗的和低级的方面。他以为现实生活也象他的内心一样明朗、热烈。他把现实理想化了。所以在生活中很少遇到意想不到的乐事，有时还不得不同一些低级无聊的人打交道。

1904年，为争取参加政府和建立民主主义者“联盟”，他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单枪匹马同全体国际的代表进行了斗争。

他毫不留情地向得到法国社会党老的组织支持的、控制着代表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斥责他们软弱无能。下面是他对该党的批评。

我曾经说过，德累斯登提案的主要缺点我们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同志们没有看出来。这个提案试图提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的行动准则，更确切地说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它目前不应当遵循的行动准则。而我说过，德国无产阶级现在还不具备向政界和社会施加影响的两个条件。首先，你们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德国无产阶级有过不少杰出的忠诚战士，但它过去并没有革命的传统。普选权并不是它以革命的手段争取到的，而是从上面接受来的。虽然人们不会想到从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争取到普选权的人手中把它夺走，因为他们可能很容易再把它夺回去，可是人们却会想到把上面交给的东西收回去。你们曾经眼看着你们的萨克森红色王国——“社会主义王国”——没有进行抵抗便让人家把普选权取消了，因此你们不能担保……

当倍倍尔就克鲁普事件在国会慷慨激昂、大胆陈词，发表反对德皇的讲话——这些讲话我们已经翻译和散发——的时候，你们对于德国老板强迫本厂的社会党工人在给德皇歌功颂德的祝贺信上签名，也就是强迫你们自己污辱自己一事，却毫无办法，竟然在你们党的机关报和成天骂我严重腐蚀无产阶级(den grossen Verderber)的杂志上建议他们不要拒绝签名！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本来就因为缺少革命的传统而特别单薄，可你们今天却还在消磨它的意志，模糊它的视线，削弱它的力量。

你们因为自己没有这种革命传统，就对别国人民发挥革命传统的作法看不顺眼。对于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争取普选权的比利时同志，你们一味进行污辱和谩骂，你们的理论家则更是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热烈鼓掌)。

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不但没有什么办法采取革命的行动，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所赋予的那种力量，而且在国会

中也没有什么力量。即使你们今后在国会中占据多数，你们仍旧不是主人，社会主义在占了多数时还不能做主人的国家你们是唯一的一个。因为你们的国会只不过是一个虚设的、徒有其名的国会，它手中没有执行权，没有行政权，它的决定不过是表达一些愿望，这些愿望随时会遭到帝国当局的否决。因此，你们已经知道，已经感到你们的情况很是困难。你们在寻找出路。我认为你们会找到的。命运的道路是谁也不会来阻挡的，而你们德国的无产阶级就是德国的命运，德国的希望！人们不会来阻挡你们前进的道路。不过你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实践中究竟应当走哪一条路好，是做革命者还是做议会派，以及怎样在你们的国家建立民主制度。

在取得三百万张选票的胜利之后举行的德累斯登代表大会上，人们当时期待你们，全人类都期待你们把政策定下来。你们那时在报纸上高呼：“帝国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Unser das Reich! Unser die Welt!)不！帝国现在还不是你们的，因为你们甚至连能否在本国的首都给各国社会党提供友好的接待都没有把握。(鼓掌)

因此，你们不知道应当走哪一条路。在那次伟大的胜利之后，人们就在期待着你们提出口号，拿出行动纲领和策略来。你们对形势进行了调查、探测和了解，发现人们的思想还不成熟。于是你们就死死抱住你们杰出的考茨基同志不遗余力向你们提供的理论公式，向本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掩饰你们在行动上的软弱。(鼓掌和笑声)

因此，在这次国际代表大会上通过德累斯登决议就意味着各国社会党及其每一个成员，每一种力量都要对德国民主党目前这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软弱状态和暂时的迫不得已的按兵不动表示赞同。

随后，他有力地回击了倍倍尔对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批评。他说：

啊！我知道共和制基本上并不包含社会正义。我希望倍倍尔和我在这一点上彼此没有误会。我并不迷信政体。我不认为共和制只是因为它是共和制才是进步的，而且民主，即使是共和制的民主，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行动对它不断地发出警告和推动，仍然会停滞不前。因此，为了推动进步，单靠共和制是不行的，况且没有共和制，经济和社会也会照样发展。我的意思是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它们认为，利用君主制制度下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行动为基础的初步的立宪制和民主制所提供的行动办法更为有益。我就是这个意思。但请注意！虽然共和制目前在各国不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但法国的共和制从一开始产生的时候起就经历了一系列革命事件，如1791年的马尔斯广场上书，1792年的人民进入土伊勒利宫，1793年1月的路易十六在协和广场被处死，以及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事件，所以法国的共和制是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没有这个革命运动就没有今日的法国。这个革命运动本身并不很清楚要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制，是无产阶级给它提供了共和制这种最高的、必然的形式，无产阶级把共和制当作一种象征来寄托自己的希望。因此法国的共和制在历史上就意味着进步和自由，而别的国家的共和制就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含义。因此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捍卫共和制和共和自由的时候，正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悠久传统，忠于巴贝夫，邦纳罗蒂和布朗基的表现。

其次，倍倍尔，还是这个问题。你说当前各国并不都在同

样的程度上需要共和制。请注意！共和是民主制的必然的、最高的形式。如果以共和制为必然形式的民主制在法国遭到破坏，那么欧洲各国的民主制也必然会随着遭到损失。因此，象你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在共和制——即便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制——的得失之间进行权衡是轻率的。社会君主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超越各个阶级之上——不过这只是为了君主的个人私利而不是出于对人民的爱护——，而且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可能进行的突然袭击，它可以对无产阶级作出让步，进行某些改革，但请注意，这种作法虽然在实际上会产生一些结果，但却不如自由的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意志，进行勇敢的直接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为好。欧洲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不仅无产阶级在大步迈向社会主义，而且几乎各国人民，包括你们德国的各个邦在内，也都在开展工作，要求建立民主制，此外，在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人们也已开始争取普选权。请注意，所有这些正在争取政治自由的人以及象我们的杰出的朋友普列汉诺夫那样的俄国革命家是不能担保对专制制度不满的资产阶级共和分子和自由分子不混入工人运动中来的，你们让他们相信共和制不会带来无产阶级所期望的全部好处，这种言论是十分轻率的。因为照你们的说法，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会被资产阶级夺去，民主制的这一胜利只会使资产阶级的自由个人主义代替君主的明智个人主义。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在法国阻止教会和军阀集团破坏民主制的必然产物——共和制，不仅是为了法国的民主制，而且也是为了全欧洲的民主制。

饶勒斯好象有深刻的预见，早就批判了他后来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1909年)上称之为“思想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集团。

他对他当时最大的理论上的对手考茨基说道：

我现在不想提出我们在目前形势下所不再面临的问题，可是由于我听到考茨基一再地说他赞成社会党人在国家遇到民族危亡的时候可以参加中央政府，赞成布朗基那样的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抵御外敌入侵的时候参加政府，我不明白参加政府是否一定要加上民族主义的内容才能成为一种正統的理论，我不明白一个无产者是否一定要牺牲阶级斗争而去保卫那个被资产阶级统治，特别是被资产阶级剥削的祖国。我不明白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争取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性，对每一个无产者说来是否同今天的祖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我感到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自始至终地赞同考茨基同志这种民族主义的参加政府的观点。

饶勒斯在阿姆斯特丹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斗争，埋怨社会党和工人阶级，或是独自去参加政府，相反，不久之后，即1905年，他参加了最终统一的社会党。他终身是革命的社会党人。

他毫无私心地、真诚地赞成统一的协议，但他仍用明确而坚定的语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根本不接受“机会主义集团”或是“不妥协集团”的意见。他认为统一是反对“任何宗派政策”的可靠保证。他要求执行“阶级的政策”，革命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并不排除向“民主制”的进化。（饶勒斯在这里显然指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他用极为明确的语言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

我知道，已经签字的这个文件不能使我们一切通常的看法都得到完全的满意，而且其中有些提法不是有点狭隘，就是有点过时。我同意这种说法：如果人们在执行文件的时候抱着某种偏见或宗派情绪，态度过于偏激，因而不能不折不扣地执行的话，有时就会妨碍社会党在民主气氛中进行必要的发展和发挥它的生命力。然而哪里能在存在着各种倾向的情况下，规定一个只适合这些人或那些人的想法的统一的协议呢？

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都不愿意眼看着生动活泼的共产主义思想蜕化为一种停留在口头上的、纯理论的、毫无作用的僵硬立场和成为民主激进派的变种，我们已经统一起来，并真心诚意地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不管人们在这样那样的提法上存在着一些枝节性的保留性意见，广泛建立起来并加以贯彻的社会党的统一给每个人带来的决定性的好处也就在此。无论我们是“革命派”还是“议会派”，党的统一都将使我们摆脱派性——机会主义或不妥协集团的派性——的诱惑和危险，使我们摆脱一切派性政策，建立一个革命的，向民主发展的阶级政策。无产阶级对当前的斗争和今后的改革措施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他们十分重视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重视劳保法和社会保险法，同时他们也知道，只有进行深刻的所有制革命，完全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他们才能在思想上和劳动上获得彻底的解放。因此，党的统一将使我们的行动和无产阶级的全部思想协调起来。

饶勒斯从阿姆斯特丹回来后便退出了早已名存实亡的议会联盟。激进党曾经支持过他为争取共和制、民主制和世俗化而进行的斗争，甚至提议他担任众议院副议长，但他们没有勇气走到底。有些激进党人埋怨饶勒斯“独裁”，对于那些受他保护的社会党人照顾过多。另一些人则从阶级利益出发，担心在向社会党让步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此外，还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对于“小老头”孔勃长期占据的职位耿耿于怀，认为这个职位由他们来担任要更为适当……

孔勃是个正直的，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遇事冷静，有条不紊。他曾告诉饶勒斯，如果他这位社会党领袖退出议会联盟，那么他孔勃也就离开政府。现在饶勒斯根据党的意见退出了议会联盟，孔勃也跟着离开了政府，但他一定要接替他的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

这样，他的政策也就达到了必然的结果：使教会同国家分离。

1904年5月19日，饶勒斯公布了一封罗马教皇以相当激烈的言辞反对共和国总统罗马之行的信件。这封信发表在他于1904年4月17日与布里安及其他朋友创办的《人道报》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共和国和梵蒂冈断绝了关系。

1905年达成统一以后，饶勒斯便和社会党一起行动了。他是社会党名副其实的思想领袖和精神领袖。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议会、在国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宣传家——和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施展了非凡的才能。1905年到1914年召开的社会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决议都是出自他的手笔，都带着他那胸怀广阔、不知疲倦的调解人的思想烙印。而且，他常常肯定茹尔·盖得的朋友们对他的批评，这是为抵销改良主义的夸大做法所必不可少的。

他同他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瓦扬、列诺得尔一道，阻止了党同法国总工会的决裂，而且为了维护党的统一，阻止了党把两个“难于合作的家伙”——爱尔威和布列东开除出去。（布列东后来还是设法离开了党。）

他以出众的才华领导了社会党的议会行动，在世界舆论面前赢得了尊敬。

同托尔斯泰和罗斯金等伟大人物一样，他也是人类思想的领路人。当一场大规模的、罪恶的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反动派的罪恶之手无耻地把欧洲这盏明灯熄灭了，因为他们只有在黑暗中才能进行罪恶的活动。

第五章

饶勒斯——和平的捍卫者

饶勒斯的全部高尚的品质、他的全部哲学、全部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简直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反对人们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战争这种暴力行动的。这位具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伟大政治家终身几乎一直在同战争进行不间断的斗争。他这种斗争是在各个方面进行的：议会、报刊、公共集会、全国和国际代表大会，以及法国国内和国外。

他在被人杀害、结束他光荣的一生以前之所以抱着很大的兴趣研究战争，也还是为了更好地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的轻率行动，因为他憎恨战争，诅咒战争，希望能使它永远不会发生。

为此目的，1905年7月，他准备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邀请，到柏林这个最大的好战堡垒去反对战争狂热。德国政府怕得要命，不想让饶勒斯去举行演讲会。于是通过其驻巴黎大使拉多林向这位知名演说家苦苦哀求，拉多林并亲自登门拜访饶勒斯，象对待一个大国一样，告诉他德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但他们并未达到目的，讲演会的消息已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并由该党的一位领袖理查·费舍在一次大型集会上宣布。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饶勒斯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讲的那样广泛——我们在下面对他这次演讲作了详细摘要。饶勒斯对世界

上一一直很关心的对外政策问题发表的看法使人茅塞顿开。因此，当人类命运面临最大灾难的时刻，他会提出什么样的解决办法，人们是很容易得出结论来的。

据说两国的外交代表曾经互相试探，想看一看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压倒对方。在这次冲突中，这种炫耀本事的的游戏究竟有没有起作用，我不得而知。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游戏。当两个火车司机把各自的列车在同一条线路上对开过去，而且谁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必说他们这样做只是想看一看对方的神经能够经受多大程度的考验。因为后果如何，谁也无法知道。很可能是至少有一个人的理智会失去控制。很可能是这两名火车司机都被逞强的心理所驱使，把火车开得过猛，等到后来想刹车也来不及了，以致造成撞车事故。如果他们这样做是闹着玩的，旅客们倒是宁愿他们去玩点别的。这一次，撞车总算避免了，两位司机正在互相寒暄。人们甚至打算把两个火车头用鲜花装饰一番，并给他们挂上一列无比长的车厢——国际会议。这当然很好，不过这一场可怕的虚惊在一片安宁和太平的气氛中突然发生，使人民和无产阶级感到和平在今天的社会中是多么地脆弱和不稳定。这场虚惊还使欧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认识到必须在国际上联合起来，警惕国际局势。国际无产阶级不应当是一个漂亮的、不起作用的名词，不应当是一种时隐时现、徒有其名的力量，每隔一定时间才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或发一份社会国际局的通告。它应当成为一种经常能发挥作用的力量，始终对形势了如指掌，保持警觉，情况一有露头，会导致战争的小规模冲突一旦发生，便立即加以控制。

饶勒斯清楚地看到一场灾难正在威胁着世界。那两个“把各

自的列车在同一条线路上对开过去的火车司机”就是三个协约国和三个同盟国。他认为阻止这场灾难性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开展无产阶级的同时的国际行动。

在那些被没完没了的战争传闻闹得惶惶不安的国家，无产阶级开始说话了，他们的声音虽然洪亮，但席勒的《钟声》里的两句话他们却不能全说。他们可以说：*Vivos voco, mortuos plango*，我呼唤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哀悼。但还不能说：*Fulgura frango*，我要把灾祸消灭干净。我们还有大量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要做。但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们可以怀抱希望，可以行动起来了。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悲观失望。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建立，国际上的人们已经开始觉悟。从现在起，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战争灾难显示我们的力量。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错综复杂之中，不存在什么不可避免性，也不存在什么必然性。无产阶级的力量既不是那样强大，可以使和平必然保持下来，但也不是那样微弱，从而使战争不可避免。在事物的发展尚不明朗，力量的对比未趋稳定平衡的情况下，人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那很大一部分未知数不仅我们社会党人感到可怕，那些轻率地发动战争的人也同样感到可怕。因为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和在各国国内产生的影响，今天谁都难以预料。

饶勒斯不喜欢宿命论者和冒牌的预言家们对形势作的斩钉截铁、过于武断的结论。他认为这要看斗争的发展，世界的命运取决于斗争。

我们社会党人并不害怕战争。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将知道如何面对现实，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战争朝有利于各民族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自由、无产者获得解放的方向发展。我们

对战争深恶痛绝,并不是因为我们感情脆弱、神经紧张。如果只有经受痛苦,人类才能取得巨大的发展,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那么一个革命者是能忍受这种痛苦的。可是现在,在今日之欧洲,并不是靠国际战争,自由事业和正义事业才得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宿怨才能消除。诚然,一百五十年来,欧洲已发生多次国际战争,这些战争在几百万人的思想上所留下的创伤至今尚未愈合,其后果至今还是欧洲和世界的沉重负担。要平复这些创伤,解决这些遗留的痛苦问题,只有发展民主和社会主义。因为民主将把人们的意愿作为国际法的准则。而社会主义则要建立一个人类集体社会,不过这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组织。为防止任何人利用它作恶,将制定一个符合正义、协调一致的总法律;在此法律下,各个国家在这个人类集体社会中享有自主权,正象每个人在本国享有自主权一样。因此,在和平环境中,民主和社会主义肯定会得到发展。如果欧洲爆发战争,那可能会发生革命,统治阶级最好对此多想一想。但也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反革命危机:反动势力无比猖狂,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独裁统治更趋强化,军阀集团为所欲为,以及一系列反动的暴力行为,卑鄙的复仇事件和迫害行为。我们坚信无产者定会逐步获得解放,我们坚信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胜利必将给反对瓜分、肢解别国领土的各国人民和各国少数民族带来公正的自主权,我们不想把这些坚定的信念压在这场野蛮的赌博上,压在这场血淋淋的赌注上。

饶勒斯反对战争,即使这场战争能导致革命他也反对。他不赞成这种野蛮的赌博。

饶勒斯认为法国人经过战争才建立共和制,德国人经过战争才达到统一,是“理想主义的一次巨大的破产”。饶勒斯在他的德

国听众面前对法国的历史作了精辟的分析。

我在这里可以以一个国际社会党人和法国人的身份，坦率地、毫无拘束地谈一谈我对法国的看法。当然，法国在她悠久的历史上也犯过许多错误。法国的统一先于别的国家，但从查理第八到路易十四，再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她曾多次滥用这种统一，欺侮、虐待当时还处于分裂状态、没有统一起来的国家。即便在大革命时期，她虽有纯真的热情，要争取全人类的普遍解放，但很快便沉醉于统治他人、目空一切的状况中了。正象贵国诗人海尔维格所说，她给世界带来了自由，如同带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一样，但她的军队到处耀武扬威，结果使这朵自由之花凋谢了。她从英勇无畏的行动转变到革命的和民主的运动后，未能坚持下来，自由和反动几经反复，有时甚至出现了一面唱着高调，一面进行奴役统治的可恶的个人独裁政权。她把国内政策中一些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东西带到国外政策中去，同情或支持一些新兴国家，但当这些国家的统一取得一定的进展后，她又产生不可告人的嫉妒心理而对它们加以阻挠或刁难。拿破仑的独裁统治行动轻率、混乱不堪，整个法国都曾积极参与，因而受害不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多次处于狂热、沉醉、颓丧的状态，但每次都产生了无数献身于崇高事业的优秀儿女，她首先动摇了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首先反对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她的文化细腻而深刻，她对于民主和共和有一种自发的要求，她的思想和意愿十分明确，做起决定来果断迅速，此外，她对人满腔热情，所有这一切美好的天性她都用来为人类服务了。今天，由于她经历了一系列严峻的事件，同时其它国家也已获得健康的发展，她已比较能正确地评价每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因此，她仍然是争取人类进步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一支必不可少、神圣不

可侵犯的巨大力量，她决心在自己的权利许可的范围内不让任何人对她进行欺凌和侮辱。我已经毫无拘束地在你们这些德国社会党人面前谈了我对法国的看法，因为我知道，正象我努力对自己的国家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一样，你们也在自己的心中对你们的国家努力作出公正的评价。三十五年前，我们经过战争才建立共和制，你们也经过战争才达到统一，这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理想主义的一次巨大破产。

1870年那次战争给法国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密切的法俄联盟使得法国的政府纲领有的时候似乎成了：“沙皇第一，法国第二”，从而使法国的政策成为沙皇政策的附属品。

因此，他们通过一个本来只应当使双方互相平等地保卫和平的条约给法国规定了一个听命于别人的、屈辱的地位。结果产生两个不良后果：一个在国内方面，一个在国外方面。在国内，我国统治者利用沙皇制度来反对法国的革命传统，从而使人们受到的重压除了法国反动势力外又加上了农奴制的俄国。在国外，法国对联盟没有任何发言权，联盟的方针悉由俄国一家作主，由俄国一家决定。这样，俄国便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共同保卫和平的条约变成了一个冒险的条约，法国将因此而大为吃亏，而俄国则将按照其如意算盘稳得好处。因此，共和制法国便成了俄国在远东实现其野心和冒险行径的仆从。由于执行了这个糟糕的联盟，整个欧洲的局势和欧洲各国的关系都被打乱了。俄国、德国^①和法国的联盟如果以维护和平为宗旨的话，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联盟，但它却转而反对日本，通过签订“下关条约”在远东为俄国贪得无厌的如意打算效劳，结果成了一个危险的令人痛恨的条约。即使如此，法国仍然不希望打仗，但自己既然已被条约置于俄国的管束之下，

① 疑为英国之误。——译者注

只是一个听从俄国摆布的盟友，法国就不知不觉地为以后要爆发的战争进行准备。因此，法国在不知道原委的情况下，参与了自己总有一天会被卷进去的冒险计划，而这个损害自由的反动政策同样也威胁着和平。法国的政策同俄国的政策拴在一起，就象一个吊篮挂在气球上一样。这个气球庞大无比，它带着俄国专制制度的狂妄野心可以把法国的政策带到遥远的地方，带到广阔的远东去从事冒险。气球万一漏气，或者其脆弱的、已经老化的外壳一旦破裂，则法国的命运就将不堪设想。法国人民很久以来一直被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蒙在鼓里，法国社会党人不断地向全国人民指出的，也就是这一危险。而法国之所以能在这个巨大的冒险行动发生之前缩身退步，没有卷入远东的这场冲突，没有毫无保留地支持利令智昏的沙皇政策，没有放弃自己的中立地位给俄国的军舰提供便利，致使和平的维护成为泡影，这部分地正是归功于社会党的洞察敏锐。

饶勒斯赞成法国同英国建立联盟。他认为这个联盟可以保障民主与和平。但人们似乎要在为此而签订的协定中加上把矛头指向德国的内容，对此，他每次都激烈表示反对。他认为这对和平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不知道我国的外交部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意图及其必然会产生严重后果。最近显示的一些迹象和一些人的表态已经是够严重的了。德国以比较明确的语言指责法国外交部力图对此加以掩饰，这已经对欧洲的和平和民主制度的稳步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当法国的新的外交代表还刚刚在勾划这一政策的轮廓时，是我首先看到这一危险并立即指了出来，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党的光荣。我们曾经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含糊其辞的东西，不要留下任何阴影。当意大利和英国

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和公共集会在巴黎刚开始举行的时候，我们就曾强调指出，这些协议不要有任何排它性和侵略性，以后可以逐步扩大到整个欧洲。去年十一月，当法英协定拿到议会来的时候，我曾特别强调指出：“请当心，法英协定可能会被欧洲一部分舆论解释成英国沙文主义者和法国民族主义者的联盟。请你们说清楚协定中没有任何暗地里针对德国的东西。”我并且再次说明，为了法国的自身利益和人类的文明，法国必须和德国签订一项真诚的、持久的协议，以便使法国政策的基础——一系列友好协定更趋完备。

饶勒斯的一些政敌指责他“总是替德国说话”。这完全是诽谤。饶勒斯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为人极为公正，他热爱真理，有着维护真理的天性。况且，他从来没有把本国的利益同真理分开来考虑过，也从来没有放过任何机会激烈批评德国的外交政策。他这次在普鲁士好战集团的首都发表的演说就严厉指出了德国外交的错误。

在那一度使两国情绪大为激动的危机中，我国外交虽然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但你们的外交也是有责任的。你们最严重的错误是没有明确地把你们对摩洛哥问题的重视和法英协定使你们在此问题上产生的忧虑及时告诉法国舆论。你们的总理从一开始就有保留——我的朋友瓦扬曾在演说中多次提到这些保留，以说明我国外交的责任——可是你们那些保留说得多么含糊不清！

这种态度同你们后来发出的咆哮又是多么截然不同！如果说，给自己留有余地是传统外交的特点，那么德国外交在这次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任何传统性可言了：一阵悠扬的笛声最后变成了一场狂风暴雨。诚然，你们的外交手段十分高明，这是一个共和制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可是你们如果真

心实意要维护和平，如果你们愿意让曾经受到命运的摧残但仍很自信的一个大的邻邦同你们德国签订一个体面的协议，最好可能还是采取一些不太生硬的办法来克服困难。

深深地触犯法国人，使所有的法国人——从社会党人到保守派——都大为反感的是，你们有些报纸和学者声称，如果德国和英国一旦打起来，就把法国作为某种人质。你们要我国同英国断绝关系，废除我国同英国签订的友好条约，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们不赞成同英国签订把矛头指向德国的条约，但也不赞成以同英国断交的代价来同德国握手言和。

针对各国政府互相挑衅、导致战争的政策，饶勒斯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广泛的世界联合的政策，为最终实现世界和平谋求实在的基础。

相反，今日各国不管经济竞争多么激烈，不管殖民竞争具有多么大的危险性，这种冲突并没有因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冲突而变得更加严重。各大国都已建立起来，它们在制度上虽然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大，大家都参加到世界总的发展行列中来了。没有一个国家执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针对另一国的。各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建立，无产阶级也已开始活动，虽然进展不一，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你今天如果能让德国、法国和英国打起来是找不到借口的。可是，为了能够大规模地、激烈地开展经济上的竞争，人们常常用思想冲突把这种经济竞争掩盖起来，以便为经济竞争寻找借口，遮人耳目，这样说并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解释。现在，再用这种办法来进行掩盖是根本不可能的了。那些想在英国和德国之间挑起冲突的人将不得不默认，同时也向全人类承认，唯一能导致它们之间冲突的是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然而，不管资本主义多么胆大包天，多

么厚颜无耻，它总不喜欢自己的丑行被人家看得一清二楚。它过去用了那么多冠冕堂皇的托辞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如今只剩下几片榕树叶可以遮身了。

世界无产阶级感到它的身上有一种如同自然界那样的双重革命力量：火山爆发的力量和滴水穿石的力量。今天的俄国正是火山爆发，其它地方则是源源长流。总之，有时是地动山摇，有时则是慢慢的浸蚀。但所有这些局部的行动和局部的斗争成果都要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去；每一个国家的大规模的骚动都要蔓延开去。工人阶级起了很大作用的俄国革命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一点谁能说得清楚？已经摆脱过去的束缚和教会桎梏的共和制法国，如果能够（象我所希望的那样）把思想越来越解放的几百万有民主思想的农民争取到工人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它有朝一日会具有多么大的实现全面解放的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只遇到过暂时性的挫折，它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确实象是一股来势虽慢但不可阻挡的自然界力量，如果它能取得政权的话，那对世界力量的对比、劳动的解放，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呵！因此，我们的努力是共同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才建立了能对因国家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混乱局面发挥影响的社会工人国际，因此，你们现在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终于使世界梦寐以求的和平有了实现的可能，而几十万年以来，每当各个种族、部落和阶级的人互相仇视、互相残杀因而玷污了人们的灵魂和双手的时候，这种关于和平的梦想就不断地出现过，不过只是作为一种无情的讽刺，或虚无缥缈的寄托罢了。

饶勒斯认为各国的利益和野心勃勃的打算不是用意识形态的外衣所能掩盖得了的。但他处事乐观，秉性善良，对于冷酷的现实未免看得过于美好。遗憾的是，事态的发展无疑否定了他的这种

看法。

可是他在批驳那些在战争问题上一味推波助澜的势力和鼓吹战争永恒的诡辩家们的时候，他的信心是多么坚定，说理多么有力，看问题多么深刻！下面是他就这个问题写的不朽的一段话：

有些人声称战争是对人类进行严格教育必不可少的手段，他们现在看到自己所鼓吹的理论正在变得渺茫起来了。因为人类在担心战争爆发的焦虑中一代一代地更迭，但并未因此而建立起严格的纪律。不管怎么说，大规模的冲突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而且越来越捉摸不定，不可能起什么好的作用。长期以来，军队不过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它在技术上虽然还可能有一定的能力，但它的士气已被虚假的战争和虚假的和平那种变幻不定的状况消磨光了。人们被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究竟是战争还是死亡了的战争。不管下一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有多么大，不管迫在眉睫的战争如何确实无疑，也不管人们过去如何高高兴兴地同死神打交道，这个官僚化的军队是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士气了。和平时期的军队的这种昏昏欲睡的状况恰如从火红的云彩上反射出来的表面上似乎很魅人的霞光投进一潭死水一样。因此，当力图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特权和解放劳动来维护国际和平的社会国际成立的时候，它不仅努力反对非正义和暴力，而且反对长期来消磨各国人民意志的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做法。在这项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德国无产阶级和法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可以做出许多事情。我们的责任崇高而又明确：始终不渝地宣传我们的思想，把人们的劲头鼓起来，组织起来，抱定信心，为建立正义与和平，为争取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那么事实上，所谓英德必然一战的根据究竟何在呢？两国间的经济利益的冲突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不过无论对于哪一方来说，战争都不能解决问题。毋庸置疑，英国的扩张势力十分强大，要消灭它根本不可能，而德国人口众多，又富有聪明才智，要击毁它的有条不紊的生产能力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打起来，这两个民族互相残杀，冲突将会波及到各个广阔的、波涛汹涌的海洋，但谁也不可能把对方消灭掉，而且在这些大伤元气的厮杀之后，他们还得互相依赖。即便是一方因得天独厚而把另一方打得从此一蹶不振，那么胜利的一方也将会使别的国家望而生畏，德尔布吕克教授说得好，这些国家将会联合起来，群起而攻之。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便是在这种联合进攻下垮台的。

因此，如果明智一点，英德两国为自身的利益考虑，应该就双方在全球各地发生的利害冲突和摩擦，举行谈判，寻求折衷、妥协的办法。这是英德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将因此而得到荣光。同时，这也是两国无产阶级立即需要坚持不懈地过问的问题。

法国对人类文明、和平事业、政治自由和社会主义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缓和英德两国的冲突。大家不要说，她这样做会两边不讨好，甚至会遭到两国的怒斥。当然，要是她心怀叵测，玩弄一套真真假假的把戏，那对她说来将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如果她光明磊落，没有任何混水摸鱼的想法，而是反复地公开努力寻求公正的和平解决办法，如果她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给双方火上加油，而是设法缓和它们的分歧，那么她将会得到以下两方面的好处而免受意外的打击：首先，一项如此光明正大的政策将会使她享有很高的威望；其次，将会受到本国全体公民的热烈拥护，他们将在很大程度上把她看成

人道主义、正义与和平的代表，为保卫她而战斗到最后一息。

戴尔加舍的罪过在于，他采取了一些过于自信的做法，把法国这个得天独厚的地位弄得一塌糊涂。现在要扭转过来也还为时不晚。但是，要这样做就必须有明确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我常常为公众在此问题上采取的不明朗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感到担心。我感到我们似乎又回到萨多瓦战役之后各项政策自相矛盾，严重脱节的混乱时期。法国不要战争，为了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她需要和平，正象她三十年来为建立困难重重的共和制需要和平一样。但她并不是委曲求全、外界对此不可存有错误的看法。同时，她应当把这一要求明确地、毫不隐晦地公诸于世，而她能向世界表明这一愿望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做法是既不跟着德国反对英国，也不跟着英国反对德国。她内心深处决不可有片刻的动摇，经受不住两国战争可能会给她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的诱惑。她应该相信德国和英国实现和平是可能的，并且不声不响地、真心诚意地不断在这一方面进行努力。这是一项明智的政策，一项不可不采取的政策。可是有些人一面要求和平，一面却宣称战争不可避免，制造战争狂热，玩弄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进行煽动，混淆视听。他们这样做就使法国失去了绝对明确地——既对别国明确也对本国明确——表明自己立场的好处，而这一明白无误的立场正是挽救法国和世界所必不可少的。

饶勒斯从来没有放弃把阿尔萨斯—洛林收回法国的主张。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希望以“人类的统一”来解决“法国的统一”。

自从1905年出现爱尔威主义之后，饶勒斯就一直不停地反对它，认为它极力阻挠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必要斗争。他说爱尔威有一种“装疯卖傻的天才”。他想颂扬瓦尔米的旗帜，但却

煞有介事地把它插到“牛粪”上去。

为了谴责不忠于共和国的共和党人，爱尔威喊出了“打倒共和国”的口号。所以他只好一直不停地在那里纠正自己糊里糊涂说出来的莫名其妙的话语。于是这个“老是打碎器皿的人”便不得不操起“修补匠”的营生了。

饶勒斯经常提到爱尔威的这些胡言乱语，以此来阐明他对于祖国、军国主义、战争和和平的看法。

他在 1905 年写道：

以鲍基戎为首的“爱国”小学教员最近供出了他们的秘密：爱尔威的可恶的、荒谬透顶的胡说八道不过是他们大加利用的一个借口。他们是有意要把国际主义同只要追问几句就会成为其反面的理论混为一谈的。

耐人寻味的是，某些社会党组织在讨论行动纲领的时候，竟然通过了爱尔威提法的议案，从而改变了纲领的精神实质。它们取消了纲领中具有自身特点的东西，只保留了完全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关于革命行动的一般性提法。是的，今天的社会对工人阶级所犯的一个最大罪行是把有着共同理想、共同愿望的不同部分的无产阶级拖入战争。工人阶级有权利也有责任向这个社会清算这一罪行，把处理世界事务和活动的领导权从那些贪得无厌、行动轻率、挑动国际冲突的压迫势力手中夺过来，把目前欧洲的这场冲突变为社会革命。只要和平存在一天，这个革命就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日益发展的民主制给劳动人民提供的办法，通过逐步夺取政权和扩大经济组织的办法努力进行。但这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可能会打乱这一进程。沙文主义的狂热可能把工人阶级淹没在血泊之中，战争可能把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推而后退，但也可能使少数大胆的无产者用革命的办法夺取政权，从而加速

这一进程。但是国家的存在是这场革命的基础，如果不保护国家免受威胁，革命又怎么能保护自己呢？因此爱尔威的提法有两点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主张对入侵采取消极的忍耐，一方面又主张消除祖国和无产阶级的界限，进行积极的社会革命，这种看法是完全矛盾的，势不两立的。可是奇怪的是，对于这种自相矛盾，一天也不能存在的理论，居然有人同意，有人拍手叫好。这种论调只有一种好处：它是在向有产阶级和特权阶级发出的许多次警告后的又一次新的警告。它告诉他们仅仅把祖国当作一种偶像来让人们世代崇拜是不够的，从今而后，对于每个公民说来，祖国存在的意义同它给予他们的权利直接相关，资产阶级祖国这种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象征和维护者，在工人的心目中已经同资产阶级所有制一样被抛到九霄云外。因此，如果我们想使历史上形成的大的独立社会免受任何外来袭击，现在就必须在新的所有制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不可战胜的祖国。

可是沙文主义是多么地愚蠢和下流！他们竟然说爱国主义就是“狂热地偏向法国”。不，不是这样。对一个法国人说来，爱国主义在于很好地了解法国，了解她的优点和缺点，美德和弊端，光明面和黑暗面，以便纠正她的缺点，克服她的弊端，消除她的黑暗面，发扬她的优点，美德和光明面，使之为人类的总的发展作出贡献。如果对一个法国人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法国，对一个德国人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德国，对一个英国人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英国，对一个意大利人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意大利，对一个中国人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中国，那就会在各国人民中制造一种盲目的、妄自尊大的偏见，导致非正义和暴力行动。凡是盲目地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的人一定认为别人只能享有低人一等的权利，这正是一切罪恶活动和不

公平行为的指导原则，是野蛮的民族主义者的理论公式。那些跟在鲍基戎后面宣扬这些无耻理论的小学教员定会对人类和祖国犯下罪行。这些爱国主义者是何等地可怜，竟然需要“偏向”法国，也就是说竟然需要贬低别的国家，贬低人类其它的伟大精神力量，才能热爱法国和为法国服务。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是各国人民在自由和正义方面享受平等的权利，每一个爱国主义者都有责任在本国发展自由和正义的力量。鲍基戎无需说他对其它国家怀有出自肺腑的尊敬。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意识地去偏爱”自己的国家，对于我国可能同别国产生的分歧和冲突不是按照理性和权利的原则去判断，而是随心所欲地凭自己的一套偏见去判断，那就没有什么国际正义的准则了。尊敬别国只能以正义为基础，假惺惺的姿态不过是一种虚妄的欺人之谈。一切凭感情用事的、不公正的政策都会象鲍基戎的提法一样成为一种令人恶心的丑剧。这些“爱国主义者”终于把自己的思想明白地说了出来，这真是件大好事。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和祖国究竟是什么货色了，那就是：对内推行社会反动政策，对外采取虚伪的暴力。一头样子很威严的动物终于露出了尾巴，而且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

作为一个和平的捍卫者，饶勒斯从不忽视任何人对于和平的努力，只要他的努力有益于和平。因此，他一直替海牙会议辩护。在图卢兹全国代表大会（1907年）上，他在答复与他持相反意见的人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至于海牙会议，象拉波波尔那样，说它是一个骗局是很容易的。我们却认为，如果无产阶级不进行干预，不抓住各国政府在不产阶级的压力下为维护和平而作出的最初努力，迫使各国政府认真对待海牙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倒很有可能是，而

且今后也将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一种虚伪的自我粉饰，或者至少是一次有始无终毫无效果的尝试。由于无产阶级施加了压力，由于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无产者紧追不放，这个会议终于在赫尔事件中圆满地解决了英国和俄国可能会发生的冲突。昨天，你们举出我们杰出的老前辈倍倍尔同志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中觉悟最高、责任感最强的人。拉波波尔公民，你一直在仔细观察德国，你可记得，关于上一次海牙会议，倍倍尔曾经向德国首相提出责问，谴责他和德国政府只给参加会议的代表作出了一些很不充分、十分有限的指示？他说：“我们要和平，海牙会议是为维护和平而产生的第一个机构，是为维护和平而进行的第一次尝试。我们希望政府认真对待，不要敷衍了事。无产阶级将努力使之成为欧洲各国、全体工人阶级和国际上为实现和平和公正而表达自己真实愿望的场所。首相，你为什么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拉波波尔公民，这位首相当时完全可以这样来回答他：既然你们社会党人都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骗局，是一个花招，而且有很大的危险，那就没有必要参加。

事实上，你那种谈话的口气好象是我们想搞一些幕后活动，在文字上做点功夫，写一些会后会编入《法律汇编》的文件，以便进行某些改革。不，改革不是这样垂手可得的。我比你更加清楚，议会可不是力量的发源地，而是力量形成后必然到达的地方。力量不是在议会产生的，相反，当力量形成之后，当无产阶级内部和邻近的民主势力中形成一个坚定的集团使得无产者可以自己的力量动摇这个民主势力时，这种动摇才会传到议会，才会把议会的大门震得嘎嘎作响而到达议会的内部。我们这些人——你们的议会代表——不过是在最后一刻负责把机器的最后一部分螺丝钉尽量拧好，使得有

组织的无产阶级这部分有生力量更好地发挥作用。不过仅此而已！拉法格曾经说过：“你们的那些工人劳保法，星期天休息，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险……”是的！资产阶级一直对全体无产阶级管得很严，我们已经让他们宽容一点，不要鞭打他们，不要虐待他们，把他们弄得精疲力竭，以致躺下去就再也起不来。工人有社会立法正象马匹有格拉蒙法一样。我想起我刚才提到的那位道德学家拉罗舍甫戈的《格言录》中有一句精采的名言。他研究人和动物可能有哪些共同点时，发现人当中也有一些狗、狼，许多的虎，少量的兔子，大量的狐狸以及更多的鹦鹉。最后他叹道：“无数的动物之所以至今还很温顺，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拉法格公民，人不管与动物多么相似，他还有一个特点：即使身上带着枷锁，即使不断地受到皮鞭的抽打，他还是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社会立法不同于格拉蒙法，因为无产阶级不象动物那样任人驱使，永远不会反抗，相反，它是一支觉醒的力量，它正在一天天站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由渺小的个人联合成巨大的力量。这个有组织有觉悟的、警惕性很高的无产阶级过去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今天也还是使这些改革得以实现和发挥效用的生动活泼的监督力量。

饶勒斯为和平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他在去世前几天曾同茹尔·盖得，龙格，桑巴和瓦扬到布鲁塞尔，代表法国社会党同工人国际的代表磋商防止战争危险的最好办法。他一直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7月25日，他被害前六天，为支持蒙太参加竞选，他曾到里昂附近的威兹发表演说，这是他在法国国内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说。下面是这篇演说的全文：

公民们：

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们，四十年来，欧洲的形势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危险、严峻，因此我有责任向你们讲几句话。公民们，我不是有意要把形势描写得那样糟；我不想说，我半小时前听到的关于奥地利同塞尔维亚断绝外交关系的消息一定意味着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即将爆发一场战争，我也不想说，如果奥地利和塞尔维亚打起来，冲突一定会扩大到整个欧洲，但我认为，目前的情况对于我们，对于和平，对于许多人的生命确实非常严重，欧洲的无产者应当尽一切可能作出最大的努力，团结起来对付这种局势。

公民们，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照会，语气十分强硬，如果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如果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对塞尔维亚人——他们是斯拉夫世界的一部分，俄国人支持他们——采取行动，那么令人担忧、也可以想见的是，俄国会参加到战争中来，而俄国一旦卷进来支持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奥地利在同塞尔维亚和俄国两个敌人交战的情况下，就会要求德国履行同它签订的同盟条约，而德国也已通过其驻各国大使宣布它站在奥地利一边。因此，如果冲突不局限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如果俄国参加进来，德国就会出现在战场上支持奥地利。这样一来，起作用的就不仅有奥地利和德国的同盟条约，而且有人们已经知道其大概内容的俄国和法国的秘密条约，俄国会对法国说：“我现在有两个敌人——德国和奥地利——我有权要求履行我们两国之间的条约，法国必须站到我这一边来。”现在，奥地利可能很快就会进攻塞尔维亚，而由于奥地利和德国将向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进攻，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将会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在我们大家以及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如此严重、如此危险的情况下，我不想就谁应对此负责的问题谈得太多。我们有

我们的责任。莫特刚才已经说了，我要向历史证明我们曾经预见到这一点，并早已把这种情况讲明，我们说以武力入侵摩洛哥在欧洲开创了一个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和互相冲突的时代，可是当时人们却说我们没有向着法国，但我们所关心的恰恰是法国。

哎！以上就是我们的责任。要是说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话还可以说得更明确些。那是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同我们法国人发生的一场斗争。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对它们进行任何指责，因为我们当时已在摩洛哥动手，为了要人家原谅我们自己的罪孽，我们对他人的事只好撒手不管。

因此，我国外交部长就对奥地利说：

“只要你把摩洛哥让给我，我就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让给你。”于是一场赎罪的交易便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了。我们还对意大利说：

“我已到了摩洛哥，你可以去的黎波里塔尼亚。既然我已冲到大街的一头，你可以冲到大街的另一头去。”

每个国家手里都拿着小火把出现在欧洲的各条大街上，结果造成了现在这场大火。你们看，公民们，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其它国家就没有责任了。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揭露德国外交的狡猾和残暴。

同时也揭露俄国外交的两面派行为。俄国人可能会支持塞尔维亚人反对奥地利，他们会说：“我这个堂堂的斯拉夫大国不能眼看着塞尔维亚这个斯拉夫小国被人欺侮。”说得好！可是是谁曾经给塞尔维亚以很大的打击呢？1877年，当俄国插手巴尔干，制造一个所谓独立的保加利亚以便对它进行控制时，俄国曾对奥地利说：“你让我干吧，我把波斯尼亚—黑塞

哥维那让给你管理。”你们大家都知道“管理”在外交人士的口中意味着什么。自从奥匈帝国得到管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许可后，它只有一个想法：尽量从这项“管理”工作中大捞一笔。

后来，当俄国外交部长同奥地利外交部长会见时，俄国对奥地利说：“我准许你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条件是你们让我在君士坦丁堡附近设置一个通向黑海的出海口。”德亨达尔作了一个表示，俄国理解为“行”。这样，它就让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可是当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装进奥地利的口袋后，俄国对奥地利说：“现在该轮到我来建立黑海的出海口了。”“什么？我对你说过什么啦？我什么也没说。”从此俄国便同奥地利，俄国外交部长伊兹沃斯基便同奥地利外交部长德亨达尔闹翻了。因此俄国曾经帮过奥地利的忙，它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斯拉夫人交给了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斯拉夫人在心灵上造成很大的创伤。

这就是俄国走到现在这条路上的原因。

自从奥地利接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三十年来，如果它为这个地方的人民做点好事，今日的欧洲就不会有这些麻烦。可是奥地利的教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推行暴政统治，镇压异教，以武力强迫当地的人加入天主教，从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可怕的形势是由于法国的殖民政策、俄国的狡猾伎俩和德国的无理要求造成的。欧洲现在正在噩梦中挣扎。

因此，公民们，我们现在是处在一片黑暗中，明天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一点把握。对此，我不想发表任何冒昧的谈话。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鉴于我们面前的灾难实在太

了，各国政府能在最后一分钟三思而行，悬崖勒马。这样，我们就不会一想到欧洲今天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惴惴不安。

你们都见过巴尔干战争，一支支军队不是在战场上全军覆没，便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爬不起来。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丢在战场上、路沟里或因染上伤寒病而躺在病床上的就有十万人之多。

请你们想一想眼前这场浩劫对欧洲会意味着什么。那将不会象巴尔干战争那样只有三十万人卷进去，而是这个数目的四倍、五倍、甚至六倍，即有二百万人之多。那将是一场怎样的浩劫、屠杀和毁灭！因此，尽管暴风雨的乌云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头顶，我仍然希望这个罪行最后不会发生。公民们，一旦暴风雨来临，我们全体社会党人所关心的将是如何尽快地把我国从统治者犯下的这一罪行中拯救出来，在此之前，只要还有一点办法，还有一点时间，我们都要加倍努力防止这场灾难发生。我们的德国社会党同志们已经在《前进报》上发出了反对奥地利照会的愤怒吼声，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党国际局也要开会了。

不管怎么样，请恕我的话有点悲观失望，在这场野蛮的屠杀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点希望来维护和平，以便拯救人类的文明，这就是无产阶级把它成千上万的兄弟们联合起来，我们希望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摆脱这场可怕的噩梦。

公民们，如果你们当中还有谁以为我在利用这一危险的时局争取竞选的胜利——不管这个胜利会有多大，那我感到十分惭愧。我要告诉你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你们同国际社会党站在一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你们大家的责任。因为当

此暴风雨来临之际，只有这个党代表着维护和平和恢复和平的希望。

（此文转自里昂出版的《社会主义未来》杂志，1914年8月1日至7日第384期）

这位不朽的伟大演说家这次在法国国内的演说和他7月29日在布鲁塞尔皇家马戏场发表的演说是他在听众面前发表的最后两次演说。

第六章

饶勒斯之死

饶勒斯虽已年过半百，但仍然精力充沛，体格健壮。作为一个忠心耿耿、勤勤恳恳的“理想”开拓者，他正信心百倍、埋头苦干，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眼睛注视着“观念”这颗北斗星。所以他没有注意到反动势力所煽动起来的仇恨和疯狂的情绪正在向他扑过来。饶勒斯为人十分谦逊。他每次对群众发表了铿锵有力、慷慨激昂的演说之后，便走下讲台到人群之中去。身为一个真正的伟大人物，他并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丝毫没有提防自己的安全，早已把盯着他的成千双充满仇恨的眼睛忘得一干二净。大街上和沙龙里流传着不祥的骇人听闻的谣言，但谁也没有把这些谣言放在心上。

可是在1914年7月14日至18日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之后，反动报刊对他的刻骨仇恨便倾泻无遗了。他们歪曲、篡改茹尔·盖得批评饶勒斯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举行总罢工，即使在各国同时举行那也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大背叛。他们把这句话中的对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删掉，断章取义地说成是茹尔·盖得指责饶勒斯叛国^①。关于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恶毒攻击，下面这篇文

^① 这句话的法文原文是：“crime de haute trahison contre le socialisme”，把后半句删掉后，“de haute trahison”在法文中是叛国的意思。——译者注

章可为一例。该文作者是沙尔·莫拉，题目叫做《论政权的严肃性》，登在1914年7月18日的《法兰西行动报》上（见该报第199期，第一版）。

茹尔·盖得说饶勒斯犯了叛国罪。说得好！那么他自己做了什么呢？他会不会从此同这个叛徒分道扬镳？

《时代报》对激进派同饶勒斯的联盟进行了揭露、批判、谴责和谩骂，说饶勒斯是大家的公敌。这就说得更好！但《时代报》将会做些什么呢？它会不会不再同饶勒斯交换意见，不再想当然地把他看成是一个真正的正常的法国人，到一定的时候，也不再按照一定的选举比例同他结成正式的联盟？

啊！要是盖得和《时代报》同这个他们一致认为是叛徒的人象过去那样继续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不会感到惊讶、愤怒、蔑视，甚至惋惜。我们将只是把这件事向公众指出来，请他们来看一看，想一想，并得出结论：政治就是这么回事。彼此之间虽然骂得不可开交，但骂完之后，便又在行动中进行亲密无间、称兄道弟的合作了。

在这次“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之前，饶勒斯就有过成百次类似的举动值得人们这样鄙弃他，他也确实遭到了人们的唾骂。大家都知道饶勒斯是德国的走卒。可是当他在议会大谈爱国主义的时候，议会的大厅和主席台上竟然没有一位议员，没有一位记者，没有一个卫兵走上去给他两拳，而他是理应受到这种待遇的。而且，当饶勒斯被任命为军队委员会成员，或者说当他进入负责调查总参谋部和国防部各机构的混合委员会时，也没有几个真正的法国人出来给他喝倒彩。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议会中的共和派自由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不应当过分地给他加上那些罪名，要么象一切所显示、所证实的那样，这些先生们现在在自己的报纸上这样对待他完

全有理由。他们在公开场合同这个拿国家利益做交易的人频频寒暄客套，说明他们对他的行为所感到的愤怒并不象他们对读者和选民说的那样强烈。因此，或者是他们认为叛国只是小事一桩，或者是波旁宫^①的气氛、语言和习俗使他们学会了什么事都不要认真，人们嘴上说的同具体情况之间的距离这里比别处更甚。

这是什么政权！无论是民族主义者议员，还是社会党议员，大家都把精力消耗在吵吵嚷嚷、长篇大论的发言上，但话一说完人人都是拍拍屁股了事，不闻不问了。“我亲爱的饶勒斯”，这是科香对他的称呼；而爱国主义者巴支尔竟在他被推举为候选人的那个选区散发的小报上，说他对饶勒斯表示“信赖和同情”。

这种有损尊严的嘻嘻哈哈的作风令人发笑，但这种作风所产生的后果却发人深思。既然俄国人都觉得我们“平静甚于池水，柔顺甚于羔羊”，既然他们都为我们对于“在阿尔萨斯—洛林发生的使我们丢丑的各次暴力行动”无动于衷而感到惊讶，既然全世界都为我们对于法国教士在墨西哥遭到屠杀一事处之泰然而感到痛心和惋惜，你们难道不认为这种把血淋淋的现实置诸脑后的可耻行为同我们习以为常的夸夸其谈的治国之道无关吗？

这种卑鄙无耻、目无国家的作风，我要说它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比饶勒斯的叛国罪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我们让全法国都来蔑视这种作风，由于我们拒绝实行它，甚至不肯容忍它，由于我们言行一致，我们今天才遇到了那么多强大的敌人！可是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也得到了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友

① 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译者注

道。大家知道，我们的政策不是空洞的言辞。我们的思想的现实性和行动的严肃性是完全一致的。

必须指出，作为一个能量不小的狂热分子集团的首领，沙尔·莫拉的这些话与戈埃那样的普通记者（他的论战方法是人们熟知的）所进行的猛烈批评是完全不同的^①。

饶勒斯对指向他的攻击未予理睬。7月28日，他同瓦扬、桑巴、盖得和让·龙格一起到布鲁塞尔去参加“国际”为拯救和平于29日在那里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大会。他在布鲁塞尔皇家马戏场作了最后一次演说。这次演说，使来自社会各阶级的几千名听众真正沸腾起来了。这是他为挽救世界和平而作的生平最后一次精彩的讲演。现将主要部分摘录如下（根据《人道报》和布鲁塞尔《人民报》的报道及我个人的回忆）：

德国呢？如果它知道奥匈帝国的照会，那么它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是不可原谅的。不过，假若德国政府说它不知道奥匈帝国的照会呢？它真是聪明到了极点！什么？你们签订了一份把自己卷入战争的协议，而自己居然不知道自己将被卷入！我要问，哪一个国家有这样混乱的政府！（鼓掌）

不过，各国领导人还在犹豫不决。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组织起来。我们法国社会党人的职责十分简单。我们不必要强迫政府执行一项和平政策。它已经在执行了。我曾经毫不犹豫地担当起我国沙文主义者强加给我的罪名，因为我坚决主张并将始终主张法德两国握手言和，因此，我有权利说法国政府是要和平的。（欢呼）

① 我在当天把莫拉这篇文章指给饶勒斯看的时候，他只是对我说了一句：“别去管它。我从来没有点过他的名，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不过我还是认为有必要把这篇文章告诉了《人道报》经理，我的朋友菲力浦·朗德里欧，他近来不断收到恐吓饶勒斯的来信。——作者注

饶勒斯在谈到战争威胁时说道：“阿提拉^①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但他的战马还在徘徊观望，踌躇不前。”

象他在一生中所主张的那样，饶勒斯反对法国跟在别人后面跑，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人要求执行我国同俄国签订的秘密协议，我们就运用我们同全人类签订的公开协议。”

他一生中最精彩的这次演说^②，最后两句话很有预见，现基本上按原样照录如下：

战争开始之后，大家都会被卷进去。可是当战祸蔓延，灾难加深的时候，各国人民便会对那些当权者说：“滚开！你们干的好事！”

饶勒斯从布鲁塞尔回来后，简直没有一天离开过被各个政党抛弃的议会。他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和平。

7月31日他被害那天，《人道报》发表了他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冷静是必要的》。下面是该文的主要几段：

我们宁可往最坏处着眼，宁可以最坏的设想来采取必要的防备，不过，所幸各方面都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理智。

* * *

只要想一想战争是怎么回事，想一想只有战争才能造成的人心惶惶、漫天流言、经济停滞、金融危机和财政崩溃所产

① 阿提拉（395—453），中世纪时的匈奴王，曾侵略欧洲，以凶残著称。——译者注

②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的精力是多么旺盛。他头一天刚从巴黎来到布鲁塞尔，旅途十分劳累。可是今天全天——7月29日——他一直在人民之家同社会党国际局的成员一起开会。会后，他为《人道报》写了一篇文章。随后嚼了两口面包便去参加大会，一面对我说：“我头痛得厉害”。可是虽然很累，他仍然认真地倾听各国演说家的发言，并作了一些意义深刻的插话，最后，他又作了一次长达三刻钟的长篇演说……——作者注

生的后果,只要想一想必须从现在起就延期兑换期票,不得不准备强行规定银行小额支票的行情,我们就不禁要问,那些完全丧失理智、十恶不赦的家伙究竟会不会挑起这场冲突。

据我看,当前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局势本身,甚至也不在于各国政府采取了哪些实际措施,不管这些政府干了多少坏事;当前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各国的实际愿望,而在于波及面越来越广的紧张心情和一天天蔓延的焦虑不安的情绪以及由于担心受怕、对前途悲观失望和长期的忧心忡忡而产生的一时冲动。对于这种人心惶惶的局面,老百姓可能顶不住,各国政府能否顶住也很难说。它们在那里互相恐吓,互相安慰,借以消磨时光(真是悠闲得很)。这种情况,希望大家不要存在幻想,很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星期。以为这场外交危机可以而且应该在几天之内解决是完全错误的。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的现代战争的一次战役要经过七八天的时间方可结束,同样,这次外交战一定会拖上好几个星期,因为它牵动了整个的欧洲和各大国庞大无比、部门繁多的政府机构。要经得住这场考验,我们需要有钢铁般的意志,更确切地说需要有坚强的理智和清醒的、冷静的头脑。为使人民能够继续克制自己,消除恐惧心理和紧张情绪,密切注视人们的行动和事态的发展,把万恶的战争从人类社会中排除出去,我们今天必须发挥他们的智慧、启发他们的认识。

形势虽然危急,但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顽强的意志,只要我们善于忍耐,在行动上英勇果敢,那么这种危险也不是不可克服的。我们只有现实地对待自己的使命,才能有力量去完成它。

星期天上午,社会党塞纳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将在瓦朗大厅举行会议,会上将要阐明当前的国际形势,确定“国际”期待

于我们的行动方针。我们将举行多次类似的会议，以便把无产阶级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并准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迎接国际代表大会的召开。当前重要的是，要不停地开展斗争，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警惕性不能有片刻的放松。只有这样才能保卫和平。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未来。

让·饶

饶勒斯同阿尔贝·费里会见后，最后一次来到《人道报》编辑部。下面是该报报道的他的被害经过：

饶勒斯在八点差一点来到《人道报》。他是从外交部来的，因为他受社会党议员团的委托，到那里去看望了一下勒奈·维维安尼。陪同他去的有列诺得尔和龙格。

他同本报经理及几位朋友谈了一会儿。他还未吃晚饭而且有许多事情要做。

大家于是来到距离《人道报》只有几步路远的“新月”餐馆。饶勒斯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进门靠左边的一张长桌上坐了下来。由于时局严重，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饶勒斯在用他那悦耳的男低音说话……他给他政治上的合作者作了几点指示。晚饭吃完了。这时，同年轻的妻子坐在旁边一张桌上吃饭的《红帽报》的道列埃站了起来。他手上拿着一张照片，走上前来递给饶勒斯的一位邻座，一面说道：

“你们看看这是我的小女儿。”

“可以看看吗？”饶勒斯微笑地问道。

他把照片拿过来，端详片刻，向年轻的父亲问了问孩子的年龄，一面恭维了他几句。

这时已是十点差一刻。

突然响了两枪，发出一道亮光。从一张桌边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饶勒斯被人打死了！饶勒斯被人打死了！

饶勒斯整个身躯已向左边倒下，大家都站起来，惊叫着冲上前去。在那一瞬间，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随后，饶勒斯的几位朋友向街上冲去，因为那两枪是从窗外射进来的，距离很近，饶勒斯当时正靠在敞开的窗户上。这时候，人们把饶勒斯抬到一张长凳上；他气息奄奄，双目紧闭。他是否知道人家在暗杀他，这个问题永远也不会弄清楚了。

他没有马上断气。一位在这里吃饭的职业药剂师，乘着人们去找医生的当儿，走上前去摸了摸饶勒斯的脉搏，然后摇了摇头。他把他的衬衣解开，发现心脏的跳动已经微乎其微。大家又把他抬到一张桌子上。跑着赶来的孔佩尔-莫雷尔握着他那一动不动的手，哭得泪人一般。列诺得尔用自己的餐巾把从伤口流出来的血擦去，看到后脑勺上有一个红红的、很小很小的洞，洞口有一点白花花的东西。

“先生们，”刚才赶到的医生说道，“我怕没有希望了。”

大家都泣不成声。三分钟后，医生说道：

“先生们，饶勒斯先生死了。”

政府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呼吁书。呼吁书全文如下：

刚刚发生了一起罪恶的谋杀事件：使法国讲坛增辉的伟大演说家饶勒斯先生被人无耻地杀害了。

我谨以我个人和全体内阁成员的名义向这位社会主义共和党人过早地离开人世表示我们的哀悼。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无比崇高的。在这些严峻的日子里，为了保卫和平，他支持了政府的行动。

当此国家面临严重困难之际，政府希望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持冷静，不要在人心不安定的情况下做出任何使首都发生混乱的事情来。

凶手已经抓到，他将受到惩处。望大家相信法律；当此国

家危急之时，我们都来做出榜样，保持冷静和团结。

代内阁而发

总理维维安尼

各报——包括《法兰西行动报》在内——都对这一暗杀事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以最美好的语言对这位伟大的死者给予赞扬。这里仅举出资产阶级的主要报刊《时代报》和社会党机关报《人道报》为例：

1914年8月2日的《时代报》写道：

正当形势危急，每个法国人都感到需要团结起来保卫祖国的时候，一个狂徒、无赖昨天晚上在《人道报》附近的一家餐馆杀害了让·饶勒斯。凶手从他的背后打了两枪，一枪击中后脑，一枪打在太阳穴上。

不管我们对这位伟大的社会党演说家所起的政治作用有怎样的看法，每一个正直的人听到这个令人深恶痛绝的谋杀事件后无不感到义愤填膺。人们的反应之所以强烈，特别是因为近一周来，饶勒斯不顾国际主义的党提出的那些理论，一直在每天写的文章中向国内同胞指出当前形势的危急，并说服大家回到为国尽责的岗位上去。

诚然，饶勒斯的支持者和朋友们是十分悲痛的，但他们应当听从饶勒斯本人曾经说过的一句含义极为深刻的忠告：我们必须停止一切有关政治的或社会的争论，去尽一个法国人的职责。我们深信他们会这样做，这次可耻的谋杀事件不但不会破坏而且会进一步加强我们之间感人肺腑的美好合作。

我们尽管一直反对这位《人道报》负责人，揭露他起的十分危险的作用，谴责他这个思想极端敏锐、无比廉洁正直的人所持的反对军队的态度和在对外政策上所犯的错误，况且他的报纸对我们也是从来不留情面的，但我们仍要对他的被

害表示我们的愤怒，并向死者表示我们的敬意。

《人道报》的文章是马塞尔·桑巴写的：

正当法国处在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更需要他的可怕时刻，他们从我们的身边夺去了他的生命。

啊！你们这些过去对他竭尽污辱的狂人！现在他死了，你们才发现他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你们现在为杀害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而颤抖了。

你们现在才承认他是一盏明灯，因为这盏明灯熄灭了。

在1870年战争中，当法国处于国破家亡，需要把自己剩余的力量聚集起来的时候，她找到了甘必大来完成这一艰巨的使命。

现在饶勒斯死了，我们当中谁还能撑得起这根擎天柱？

我们的敌人呀！今年春天我们刚刚失去弗朗西·德·普来桑塞，今天我们又失去了饶勒斯！

饶勒斯一死，动员令就颁布了！他一走战争便接踵而来！

啊！人们要是能听一听他的话，多采纳一点他的意见，我们今天恐怕就不会处在战争这个魔鬼的淫威之下！是的，我知道，我也看到人们对他的意见是赞同的。我看到部长们曾经询问他，向他征求意见，倾听他的看法。不过，他们在接受他的意见时，太优柔寡断了！他希望他们能说出明确的、颇有见地的语言来，但他们总是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说一些根本不顶用的话。

他怀着一片热诚想为国家做点好事，但终未如愿。倘若他还活在人世的话，他若看到我们刚才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些动员令，心中该有多么痛苦。

每一个了解他的人都敢担保，即使没有一点希望，他也不会罢休的，这个刚强的乐观主义者一定会为和平战斗到底。即

便在动员令颁布之后，他也不会相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们的职责是继承他的事业，以百倍的劲头去为和平而奋斗。

饶勒斯的被害哄动了整个世界。用英国一家报纸的话来说，人们几乎忘记了当前的可怕局势，一心关注着这场“全世界的灾难”。人们为失去这位情操高尚、有远见卓识的朋友而伤心痛哭。各党领导人出自内心的沉痛唁电雪片似地飞向图尔街8号他那简陋的住所。他的一家——妻子饶勒斯夫人，女儿玛德莱妮·饶勒斯和年轻的儿子路易·饶勒斯——沉浸在极度的悲哀中，他在社会党内的许多朋友和同志们纷纷前来探望他们，并时刻守护在这位为了国际社会主义和和平而献出生命的不朽的烈士遗体旁。

他的葬礼于1914年8月4日举行，沿途送殡的市民不计其数。我们现在摘录几段人们在他的墓前发表的演说。

内阁总理维维安尼含着泪说道：

星期四晚上我还接见过他。他的声音在发表演说的时候是那样洪亮，可是在谈话的时候又是那样柔和、令人信服，那样娓娓动听；他企求和平，但光明正大，不亢不卑。

他的心地，他的性格，他的高尚的思想，他的廉洁、简朴、献给事业的一生，他宣传信仰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他捍卫被压迫者的始终不渝的态度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和赞扬。

饶勒斯晚年的合作者瓦扬说道：

我觉得，在一场大难即将来临，各种野蛮的势力，各个帝国主义好战势力正在向我们袭来的时候，我们决不能丢弃或者放松我们的国际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仰。

莱昂·茹奥代表法国总工会说道：

我们的朋友饶勒斯，你这个国际和平和合作的捍卫者走了，如今，惶恐不安的世界正面临着欧洲有史以来最可怕的血

腥屠杀。你对人类的无比热爱使你遭到了不幸，你的眼睛再也看不到房屋被烧的熊熊火光，再也看不到被枪弹打倒在地、堆积如山、惨不忍睹的尸体了。

不过，这对于我们这些为你服丧的工人阶级说来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你这个胸怀广阔、视死如归的人虽然再也见不到这场可怕的战争，但在此艰难的时刻，你的过去，你的音容笑貌却无时无刻不在指引着我们度过这正在来临的血腥的黑夜。当代这个最伟大的人现在是安静地、毫无知觉地躺在棺材里了，现在，我们要在他的棺材面前大声疾呼地说：他同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隔阂。有人认为我们曾经反对过他。啊！这实在是一个特大的错误！诚然，我们之间确实有过一些策略上的分歧，可是这些分歧，可以说，我们谁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在行动中互相弥补不足。我们的坚强有力的行动就曾得益于他的思想指导。在各国因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大辩论中，他曾把我们的行动分析得一清二楚。我们同他在思想上始终是一致的。

饶勒斯曾经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活的理论。他的形象和事迹将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

马塞尔·桑巴说道：

正当法国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们把他杀害了。现在，他的敌人才明白法国和世界失去了怎样一个人。

费尔迪南·桑巴说道：

我代表所有的人向这位襟怀坦白的典范和表率致以最后的敬礼。

我代表他在大学里的同事、学生和老师向这位伟大的公民表示我们的敬意。他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善于以对人类的爱来表达对祖国的爱，并以对祖国的爱来表达对人类的爱。

卡米尔·胡斯曼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作了一篇令人难忘的讲演。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在全世界有一千万有组织的工人，对他们说来，饶勒斯的名字体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最崇高、最有说服力和最彻底的要求。

饶勒斯的天才并不只局限于一个党内。他不仅代表一个阶级而且代表一个时代。

饶勒斯不仅属于法国而且属于全世界。英国一家大报昨天写道，“他的去世是欧洲的一场灾难”……我想起了他在别国工人心目中的地位。我似乎感到外国的代表们还在等待他讲话，以便把重要的看法确定下来；他们有时也不赞成他的意见，但总喜欢同他的思想接近。他远甚于一个艺术家，一个语言家，一个演说家，他是思想的化身，道德的化身。他是执行纪律的表率。他好象是芬兰的橡树，这种树高如桅杆，深深地扎根于地下，树冠可以摆动而根部决然不动，而且其柔韧性反使它显得更加雄健有力。

饶勒斯的去世正是整个欧洲面临着血与火的威胁的时候。

当代这位最伟大的公民的被害预示着一场最大规模的灾难即将来临。饶勒斯一向是个乐天派，始终坚信人类的智慧和判断力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看来命运似乎有意不让这样一个人看到这场野蛮的屠杀。

饶勒斯的形象已经由这些艺术大师描绘出来，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了解他。

让我们来研究他的著作。

我们将可在他的著作中重新见到他。

第二部

思想家

第一章

饶勒斯的哲学

饶勒斯在哲学上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所缺少的只是时间，因为政治使他无法分心于哲学。但是他的全部政治活动都是受他的哲学理论指导的。饶勒斯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考虑问题很象一个观察敏锐、足智多谋的思想家，他那些杰出的活动都是以他的基本思想为指导，经过反复的研究后才展开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他在其哲学论文——《论感性世界的真实性》（1891年第一版，1902年第二版^①）——中所大体阐明的基本哲学思想，就不可能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的全部意义。

饶勒斯哲学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用一句术语来说，饶勒斯可列为进化论的泛神论者。不过这个词儿虽然指出了饶勒斯哲学的基本含义，但并没有说清楚在他

^① 本书所引部分全部根据第二版。——作者注

那既有哲学成分，又有诗歌成分的哲学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天才的丰富想象力。因为他赞成从柏拉图经过康德和叔本华到柏格森的那一伟大唯心学派，认为形而上学是思想的自发创造，并把这一认识贯彻于自己的实践中。任何思想的创造都是诗感的表现。所以饶勒斯说：“诗感就是真实。”

思想创造的基本形式是统一。我们从经验中接触到大量的、种类无穷的事物，把这些事物统一起来的是思想。存在的统一性，是饶勒斯哲学的主导思想。他说：“人的思想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是对于统一的要求。”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互相割裂的现象是不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寓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构成一个整体。“时间的任何一刻都可以永无止境地在此后的时刻得到回响，思想也可以一下子越过好几个世纪，重新找到它所离开的那件事情的心智的续篇。”生和死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生命包含着死亡”。“必然包含着自由，规律包含着偶然。”“我们部分地生活在偶然的领域内，部分地生活在规律的世界中。”

这也是柏格森的思想，他认为在“必然的海洋”上点缀着“自由的小岛”。所以饶勒斯批评拉舍连叶“把全部的现实都归结为严格的限定关系，从而把认为事物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们存在并且主张不给它们起名的这种没有定见的泛神论从人类思想中排除出去”。广漠与非广漠，空间与思想并不是绝对分开的。

“空间是自然界和思想之间订立的第一个协议，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最根本的协议；因此空间是一切经验和一切认识的基础，是思想的基础。”

“从化学分子到人的一切存在都由心灵和实体组成。”

我们要想了解宇宙，必须能够在自己身上发现它(similia similibus)①。我们只能想象同我们相似的东西。

① 拉丁文，相似的东西只能由相似的东西来认识。——译者注

饶勒斯同意卡莱尔的观点，他写道：“我深信，当第一批能思维的人在自然界的复杂现象中识别出一个个不同的人时，他们比机械论更加接近于真理，因为机械论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从千篇一律的模式中产生的，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宇宙很象戏剧，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角色。科学把各种力量都归结为很平常的统一，当我们试图说明这些力量对于人的不同的形而上学的作用时，我们并不是要同科学决裂，况且科学也不必要对我们有任何担心，同时它也不希望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我们只是想在宇宙观上把对统一的认识和对生命的认识协调起来。”

万物统一的一个结果是万物的渗透性。事物和事件是互相渗透，互相关联的。

没有反作用就没有作用。当我们对外部世界发生影响的时候，外部世界也对我们发生影响。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深入外部世界，外部世界也深入到我们身上来。我有时走在路上，心中便感到一种宁静的、深沉的快乐，这种感觉大地也有……我有多少次一踏上田间小径，心中便突然想道：我现在正走在大地上，我是大地的，大地也是我的；我不知不觉地放慢脚步，因为没有必要在大地的表面匆匆忙忙，因为我每走一步都感到大地的脉搏在跳动，感到我占有了整个的大地，我的心已经深入到大地中去了。还有多少次，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躺在路沟里，面向蔚蓝的东方，心中忽然想到大地在走自己的路，它正在摆脱白天的劳累和阳光照耀下的有限空间，快步迈向宁静的黑夜和无垠的天际，并且带着我一同去。这时，我的周身，我的心灵都感到了这种前进的步伐，同时我也从大地的身上得到了这种感觉。我感到蔚蓝的天空在我面前展现开来，没有一点磨擦，没有一丝皱褶，没有一点声响，真是出奇的安详。啊！同我们的视线与天穹之间的变化无常、捉

摸不定的关系比较起来，我们的肉体同大地结成的友谊是多么深厚，多么感人肺腑！要是我们这时没有感到自己是同大地连结在一起的，要是在我们自由驰骋的视线和遐想同我们与大地之间的联系——对于这种联系，我们的心已经由于莫知所措而说不出它究竟是一种依附关系还是一种友谊——之间不存在某种令人心慌意乱的矛盾，美丽的星空在我们的眼中将会显得多么逊色！

万物的这种渗透性造成了事物的绚丽多彩和无穷无尽的多样性。

在光的特性中，没有任何东西会把明亮的光激发得更加明亮，从而不让它掺和到晚霞中去，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晚霞把明亮的光压下去，也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阳光同黑暗一起融和成一种月色。如果空间不允许光把各种程度的明灭变化表现出来，如果广阔无垠的空间不在自己的各个部分把原始的光所表现的不同程度的强弱反射出来，世界就永远只会有同一种明亮程度的光。

布丰曾经说过，天体是天空这个建筑物中的运动的石块，这个比喻不但庄重而且贴切。每一个天体都是按照一定的轨道运动的，虽然恐怕没有一个数学公式能够揭示出这些轨道的规律。

无限不是一个不动的建筑物，按照布丰的说法，它是一个活动的建筑物。正是由于宇宙广阔无垠的空间可以有无限的作用和反作用，从而把无限集中表现在每一个有限的形态中，世界上才有无限和数学、遐想和形态的互相渗透和融合。

在物理学方面，“有些比较单一的不变的范畴简直反映了存在的不确定性”。地球上的一切有机体都是在单一化学成分的环境中发展的。生命的机能以有机界和无机界共同的物理规律和化学规律为基础。同样，天体也是无限的，当然也是

在单一的环境中运动的，因为天空“对于星辰的演变和这种演变的数学规律并没有任何妨碍，或者至少是不以任何多样性来干扰这种演变”。

大脑不会有任何新的创造，因为它深深地陷在有着各种具体运动的空间环境中……意识一厢情愿地注视着一切不断变化的光波振动。几乎可以肯定，同光和颜色保持联系的大脑运动不过是在人体内继续着天空中的各种运动……宇宙和宇宙中的各种具体运动形式渗透到了大脑中。确实，大脑就是宇宙的一部分；它同广阔的宇宙是用同样的材料经过同样的工序制成的。所以同大脑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并不因为大脑的存在而同世界隔绝开来。相反，意识是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

饶勒斯所说的统一不是一种僵死的一成不变的统一，而是一种运动着的、生机勃勃的统一，一种不断发展、不断产生的统一。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是生命。

心灵同已经存在的各种力量，同一切最初的感觉都发生冲突，并在这种冲突中适应下来，取得发展，一面要求澄清一直不明确的因素，希望把互相矛盾的因素协调起来。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宇宙看成是一个由力量和心灵组成的庞大社会：这些力量和心灵不断受到善与恶的争夺，在矛盾重重和痛苦之际，要求实现完美的、和谐的高超生活，于是把世界上一切永恒的因素——热、光、电、声——都利用起来，让这些因素把思想澄清下来，把它们组成越来越丰富、同整体越来越和谐的内心生活。因此，宇宙也同各个社会一样，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基本关系的创造。正如善与恶、行动和力量、上帝和世界是永远确定下来的一样，存在和存在、宇宙和宇宙、宇宙和个体、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基本关系也是永远确定的。说实在的，这些关系必然是同存在和意识一起确定下来的，因为这些关系

就是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不过存在是永恒的，意识也是永恒的。因为要是存在永远不说出自我的话，那末自我怎么能在存在的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觉醒过来呢？因此，光、声、热、物质，同存在和意识一样是永恒的。宇宙的发展不是表面的，它不显示出一个又一个可感觉的表象。因为力量和心灵都想通过内在的重要发展在无限中找到能够占有无限的地方。

世界上的事物普遍具有生命力，并不排斥这些事物具有其规律性和“合法性”。

世界上绝无不定型的生命。因为没有一种力量不受一定规律的约束。没有一条流水不给自己冲刷出沙质的或石质的河床，没有一种树汁不在毛细管中流动，没有一种飘浮的芳香不是一个化学反应式。但是生命在扩散到这些形态之后，仍然享有着无限的自由。

柏格森的哲学把直觉与推理，生命与科学，有机和机械对立起来，因而无法前进。饶勒斯避开了他所遇到的困难，他把在直觉派看来似乎矛盾的东西协调了起来。熟悉感性的东西并不排斥数量，而数量本身就具有精神的意义。一切事物都寓于一切事物之中。

数量既然是无限扩张的，它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精神力量。当一个走在旷野的农民心里盘算着如何干一件坏事的时候，他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再也不看一看天际：对他说来，空间已不复存在。

同柏格森一样，饶勒斯不赞成唯物主义，他认为“……唯物主义是一种无意识的诡辩，一看到任何意识现象都需要某些有机条件，便把意识本身说成是有机条件”。

万物的统一性和渗透性必然导致万物的生命力。生命无所不在。

金属有灵魂，因为金属能“发出声响”。但金属的灵魂很简单，不能回到自身，而“人的声音却充满了意识”。物体可以在我们身上发出声响，存在于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忘记心灵，摆脱“自我的统治”。声音是物体的看不见的灵魂。光表现出存在的无所不在。诗人的深沉而敏锐的目光可以“透过事物的外表”把事物揭示出来，可以透过现象把力量揭示出来。现象的物理的一面同它的形而上学的一面是互相依存的。对于这两个方面，人们都不应当否认，而是应当研究其相互依存的关系。事物的内在生命通过光表现出来。康德说空间是人的感觉的形态。我们认为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空间 = 感觉，或是感觉 = 空间。饶勒斯忠于自己关于万物渗透性的学说，这两种理解他都接受，他希望把二者协调起来，因为二者是互相渗透的。

由于生命的这种无所不在，我们人也摆脱了原来的状况，地位空前提高。人不再是孤立的，弱小的，他是庞大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较能充分说明人的这种新的状况的是宗教，宗教把上帝作为至高无上的力和天衣无缝的美的象征。万物的统一性和渗透性导致万物的生命力和神圣化。这是饶勒斯生物进化论的泛神论思想的必然结论。生命不再是一种奇怪的和偶然的神秘现象。生命渗入宇宙的一切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科学唯一承认的这种关于生命或存在的神秘性——因为人们至今尚未把它解释清楚，也不可能解释清楚——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在对饶勒斯哲学的主要方面作了简略的介绍之后，现在可以回到他原来的观点——感性世界的真实性——上来了。既然主观的自我只是整体的一个很微小的部分，它是不能创造整体的。正象部分不能创造整体一样，主观的自我也不能创造世界。现实不是遐想，因为遐想只能是现实的短暂的一瞬。

我们所看到、所接触到，并在其中生活的感性世界是不是真实的？从事实实践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幼稚可笑，而这些人中就有对事物接受很快，能立即研究其相互关系的思想家。可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学术之争，因为早在吹毛求疵的经院学风形成之前，关于宇宙的真实性问题便在人类思想中提出来了。还在希腊思想处于早期萌芽的时候，帕尔梅尼德就把世界同存在相比，认为世界只是一种奇异的幻觉。况且，我们并不否认常人对于世界真实性的理解。对于一个物体，常人是根据自己的各个感官所得到的的一致印象而真诚地相信它是真实地存在的。一只苹果，只要看得见摸得着，吃起来香甜可口，便是苹果。一根看得见摸得着的木棍如果碰到自己的肩头，那就是自己挨了两下木棍。因此，当人们提出外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时，他们便真的以为这是在怀疑他们自己的感觉了。莫里哀的喜剧人物斯纳莱尔身上引人捧腹大笑的地方，正是根据这一点展开的。这位哲学家从一开始便接受了常人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免得以后说起话来又自相矛盾，整个喜剧便是从这儿展开的。“我可能在听你说话，你可能在对我讲话。”他所怀疑的不是事物内在的那个神秘的真实性，而是他自己的感觉。可见，他把自己的感觉当成真实了，因为他是根据这些感觉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提出种种猜疑的。他考虑问题实际上同常人一样，但表面上却又显示出另外一种样子。他那可悲的矛盾处境也就在这里，使他无力抵抗上述关于挨了两下木棍的那种逻辑推理，因为对于这种逻辑推理的合理性他是早就默认了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世界是真实的吗？由于我们通常是把我们所感觉到的世界说成是真实的，这个问题便成了没有多大意义的同义反复。人们在思想上可能会提出，实际上也已经提出的问题是：世界何以

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性表现在怎样的程度上？但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家和常人的位置现在已经颠倒过来。刚才是常人战胜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接受了常人关于真实性的理解，只能说几句愚不可及、虚张声势的话来表示疑义。现在的情况则不同了，哲学家把常人弄得莫知所措，指出他们关于真实性的理解表面上天衣无缝，实际上漏洞百出。请大家注意：我这样把哲学家和常人加以比较，绝没有丝毫的贵族作风。我不认为人类在知识上也分为若干等级，有的是常人，有的是哲学家。每一个人都既是常人又是哲学家。即如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问题吧，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天真、无知到那种程度，竟然心血来潮，一本正经地认为世界已经改变意义，不过是一个虚幻的空中楼阁。反之，恐怕也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家：他虽然坚信世界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其各个部分十分和谐地联系在一起的结果，但他顶不住个人主义的诱惑而离开了整体，常常想把自己毁灭掉。因此哲学家如果看不起常人，那就是看不起自己。常人如果讥讽哲学家，也就是讥讽自己。提出世界是不是真实的，以及为什么人们对世界的真实性有那么多不同的理解，这又有什么可笑的呢？你说这张桌子真实存在，那首先意味着这张桌子对你的感官所起的作用相当强烈、明晰。如果它的图像很微弱，很模糊不清，给你的感觉十分淡薄，你一定会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可是事实却是桌子的图像非常鲜明，而且经久不衰。这是关于桌子是否真实的最初迹象和最初含义。其次是你的各个感官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你的眼睛看到桌子就放在那儿，你的手能摸到它。而且你用手抚摸时得到的感觉证实了你的眼睛所看到的形状；不但你的手感到它是一块硬物，而且你的视线也不能穿透它。世界的真实性问题不是一个短暂的思想意识现象。哲学家和

常人每天都碰到它，况且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关于实质的概念，我要说它几乎是最平常、最普通的概念。没有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不在经常运用它。有些轻易不愿屈尊为民的学识高深的哲学家，也在想象中和感觉上对它赞美备至，甚至奉为偶像。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为平常、每个人都觉得同真实性没有什么区别的概念，思想却深入进去，占了一份。当一个农民或是商人说：这棵树是存在的，这只水果是存在的，这块石头是存在的，他所使用的是关于实质的概念，但这个概念不是感官独自提供的，而是思想和感官一起提供的。因此最平常、最普通的真实性问题至少是部分地由思想确立的，而且只是由于思想的干预，它才具有全部的意义。因此，思想如果提出世界何以是真实的这样的问题时，谁也没有理由感到奇怪。这是因为：首先，每个人都觉得真实性有多种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其次，思想本身也是真实性的一个方面。

不过问题并没有完。一个物体无需给我以强烈的感觉，无需让我身上的各个感官——触觉、听觉、视觉——产生一致的印象，我仍然可以提出这个物体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在梦中也可以有比较清楚的感觉，而且各个感官的梦中印象也可以取得一致。可是我不会看不出来自己是处于梦寐状态还是处于清醒状态，不会分辨不清梦幻和现实。我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梦中的幻觉不能按照我的生活经验和我判断问题的规律同我的一生联系起来。反之，我所看到的现实生活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一切事物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而且是按照最主要的规律——因果律——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运动都由它前面的运动发展而来，任何一个事件都由它前面的事件发展而来。作为因果延续的条件和

最好说明，时间和空间的永远不停的延续表现在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中和每一个感觉上。因此，思想按照自己的主要形式、原则和规律，按照自己进行条理化和统一的自然天赋，决定着现实，并把现实同黑夜的幻觉对立起来。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除非他愚蠢之至或者神经失常，不能把现实和梦幻区别开来，所谓真实的东西就是思想能够识别的东西。

你们看，真实性这个词逐渐获得了多么崇高的含义，但这种含义并不是在少数著名人士的头脑中而是在所有人的头脑中，所有人的思想上获得的。这种高超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最讲究实际的人，最平凡的人内心所潜藏的一种能力。我知道，少数怀疑论者或职业哲学家，曾经利用梦幻和我们在梦幻中所看到的现实世界的表面现象来动摇我们关于世界真实性的信念。

如果人和梦幻都是孤立的事实，那么怀疑论者倒也可能说得对。但情况并非如此。任何事实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同一系列的事实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一个事实在我的眼中要具有完全的真实性，就必须在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事实中占有明确的、可以识别的位置，必须同宇宙间的其他事实一起实现一个理想的目标，因而在万物的和谐关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只有这样，这个事实才是真实的，因为它既符合必然的发展趋势又起着能动的作用，而且这时的真实性只不过是能动的理性，也就是说是有生命的行动，或处在行动中的存在。可是真实性这个词还有一个更广泛的含义。梦中那些互不连接的幻觉虽然不是真正的真实，但也不是虚无。除了同全部的事实保持着可以识别的，合乎理性的联系外，这些幻觉还说明了人身上所潜伏的无比丰富的想象力，也就是适应无限所具有的各种形态的不可捉摸的能力。

这种丰富的想象力由理性确定下来，成为宇宙间无比丰富、无比和谐的高超的现实。我们常常在凝思和遐想中玩味宇宙，但并不要求宇宙作出解释。我们如痴如醉地欣赏着地球的令人向往的生命力，不久之后，那满天星斗的庄严的黑夜也随着我的心灵达到更高的境界而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黑夜了。这种黑夜不带有任何明确的日期，不能触发人们任何的回忆，不同任何思想有关；简直可以说它超越了理性，成为永恒的体现了。

事实不但在空间中不是孤立的，而且在时间中也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联系，组成一个有生命的机体。

思想不能设想，一个由各种特征表现出来的物体只是这些特征的堆积物，不能设想这些特征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事实上，在自然界的任何物体中，温度、形态、密度、颜色是共同起变化的。你若把一块金属加热，你的各个感官都能感受到它的变化。这种情况在生物身上就更加明显。动植物的各个器官或组织互相都有着密切的依附关系；树汁的内在力量，树干的抵抗力和清脆的传音性，以及树叶的颜色也都有着密切的依附关系。一切都使人相信，每一种生物，无论是人还是植物，都可以用一个定义概括出来。未来的人不会变得越来越小，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一切都是在其祖辈的生殖器官中形成的，而且人的体质和思想的各个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他的意志力和嘴唇的轻微颤动，他的眼睛的颜色和难以描述的忧伤的表情，一切都是在受胎时早已决定了的。因此生命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在生命的各种特点展开之前，它就已经包括这些特点，并把它们协调起来了。

一切成分都要求有自己的生活，都要求和谐。

进入有机体的每一种成分在某一行动中消耗殆尽之后，

为了不使自己彻底灭亡，不得不在这一行动中以原来的样子坚持下去，结果成了一种僵化的东西。这样一来，整个生物体或化学个体的形态便成了一堆僵死的成分。它已不再成其为形态，而是一种堆积物了。因为要成为形态，要具有真正的统一，各种成分就必须有自己的生活，同时要求把这种类型的形态和统一协调起来。所以每一种成分除了要有自己的生活外，还应当具有存在的资本和一系列准备实现形态的要求；因此每一种成分在其活动结束后，还应当具有存在的东西，而且永远具有存在的东西。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会毫无根据地限制宇宙中各种成分向更加美好的形态和更加广泛的统一发展。

这种关于万物的统一性、渗透性和生命力的思想是一个伟大而又深刻的思想，用这种思想去观察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无视现实，想建立某种人为的信仰的观点是多么地错误！这种只相信事物的外表的观点不过是怀疑论的一种伪装，它恰恰反映了这种理论的空虚。饶勒斯坚决反对一切消极的、狭隘的理论，把这些毫无意义的理论远远地排除在生活之外。

勒南告诉我们，他从一开始便把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同意见扔到废物堆里去了。为什么不象他那样去做呢？说实在的，把残害花草、遮天蔽日的恶风藏到风神的袋囊中去那是再省力不过的。可是当我们把那些问题搁置一边后，天晓得这些问题会不会突然来打乱我们吟诗作画的乐趣？同时，用艺术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不但得不到什么结果，而且非常累人，没有多大意思。人们一旦放弃用理性去观察事物，很快就会堕入幼稚可笑的印象派中去。两代人以来，法国似乎出现了懒于思考的现象，人们判断问题的成熟性似乎也在下降。人们满足于就事论事，或者说，满足于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上做文

章,而不是深入进去,征服它。上帝、宇宙、无限,已经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时髦语汇,没有一个思想家愿意使用。现在,对于信仰的要求好象又复苏了,到处都可以遇到一些彷徨无主的人在寻求信仰——有些人是苦于笔头写不出东西而在寻找题材,这种情况自当别论。人们似乎在要求得到某种信仰,大家都为世界的空虚和科学的软弱无力而感到厌烦,所以要求得到某种信仰……但信仰什么呢?谁也说不上来。几乎没有一个灵魂受折磨的人有勇气去寻求真理,让自己的各种看法去经受一番考验,以坚韧不拔的努力为自己寻找一个能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休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处所。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空虚的灵魂追随空虚的灵魂,如同两面镜子,中间没有任何物体,照出来的只是它们自己。人们不去从事脚踏实地的探求工作而是整天忧虑重重,这倒也更加简便,更加别出心裁。或者,如果需要某种解决办法,就到中世纪的某个神秘主义者那儿去寻找,这同传说中的懒汉一样,不愿意花点力气去发掘地下的宝藏,而是想到水下去从古代失事的船舶上去寻找一点财宝。完全没有信仰要求的人灵魂是卑贱的,一谈到自己的信仰就搬出一大套理论来辩护的人,则同经院哲学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在社会方面都很乐于谈论正义,希望实现人类博爱,同样,我们对于这些卑贱的人也寄予很大的同情。

饶勒斯的泛神论是生命力很强、富有创造性和影响很大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不是只是他那形而上学的思想随意创造出来的呢?我们认为不是。除了一些个别的提法以外,这种泛神论拥有坚实的基础,强调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一这条包罗万象的宇宙规律是真实地存在的。从柏拉图到斯宾诺莎和歌德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和现代科学的杰出代表,都曾经根据感觉的经验和理性

的构思所得到的启发，提出过这种统一性。

要求统一是哲学和科学的灵魂。寻求个别的解决办法是不大可能成功的。理论体系一个一个地提了出来，但问题依然存在。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够回避这个问题。

这个关于万物统一的思想运用到社会方面就叫做：普遍的一致性。

因此，我们将在饶勒斯的每一个卓有成效、生机勃勃的活动中，看到贯穿在他的哲学著作中的基本思想：万物的统一性和渗透性，普遍的一致性和生命力。

这位伟大人物的整整一生便是在这种高超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度过的。他的伟大的一生一直在争取实现这一崇高的不朽思想：统一。

第二章

饶勒斯和教育

饶勒斯在他有计划地复兴法国的事业中，正确地把教育放在第一位。他希望教育能够从各个方面去进行。他自己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就是有目的、有意识地继续着他在教育方面展开的活动的。因为政治究竟是什么？他认为政治不是一种可怜的、低级无聊的投机手段，而是用来为阶级、民族、国家服务的，进行民众教育的强有力的工具。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当是对全国进行教育的大教育家。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活动家应当是一个对全国进行公民美德教育的楷模。只有反动派的蛊惑宣传和自由主义者的轻率的、从先验论出发的批评，才故意把那些职业政客的可耻的庸俗的野心，同那些政治组织的伟大建设者们所怀抱的崇高愿望混为一谈。

蒲鲁东认为民主制是一种教育原则占主导地位的制度。他说：“民主就是 *peudocratie*①”。他的伟大的对手马克思也承认教育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他说：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布朗基对于世俗化和共和制教育的特别重视也是大家所知道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首领茹尔·盖得在把社会党的一切行动

① 此字疑为蒲鲁东所创，大概指的是教育。——译者注

都归结为对人们进行宣传和组织，也就是对人们进行系统的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的准备工作归结为用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无产阶级。

即使从狭义上来讲，饶勒斯也把他在议会内外广泛展开的绝大部分活动用在教育方面了。他在担任教授、议员、记者和《小学教育杂志》负责人的时候，就经常谈到教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饶勒斯对教育上存在的问题作了周密的调查，对其中每一个细小的方面都了如指掌。1888年1月15日的《图卢兹电讯报》登载了一篇他向小学教员讲的十分精彩的讲话。其内容如下：

你们手上掌握着孩子们的智慧和心灵，你们肩负着祖国的重任。交给你们的孩子不应该只会写信，看信，只会识别街头广告，只会做加法或是除法。他们是法国人，他们应当了解法国，了解法国的地理和历史，总之，了解她的身体和灵魂。他们将成为公民，他们应当知道自由民主是怎么回事，知道国家让他们享受哪些最高权利。总之他们将长大成人，应当让他们知道造成我们种种不幸的根源是形形色色的个人利己主义，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崇高原则是自豪加仁爱。必须让他们大体上知道人类是逐渐克服其粗暴本性的，使他们能够分辨出人类文明这一辉煌成果的主要方面。应该向他们指出思想的伟大，教给他们尊敬和崇拜灵魂，唤起他们对于无限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我们的欢乐，也是我们的力量，因为有了这种感情我们将会战胜邪恶、黑暗和死亡。

这几句话说得言简意赅，明确透彻，对于小学教师的使命再也找不出更恰当的话来概括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几句话包括了全部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包括了全部的世俗道德，甚至于某种理性信仰。因为人既然想超越自己，想克服自己的平庸

和在地球上的短促的生命，那末对于无限的要求便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人通过什么合乎理性的办法才能摆脱这种使人感到屈辱的平庸地位呢？通过广漠无限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通过人在一生中所要完成的无穷尽的事业。人只要把自己同永无极限的科学真理结合起来，虔诚地、热烈地怀抱崇高的理想，把现在同过去、同将来联系起来，便可超越自己。人总是要死的，但人类还存在。只有把自己同人类等同起来，我们才能跻于永恒和无限之中。这是我们使自己成为不朽，或者说同无限“结合”起来的一个十分自然的、合乎理性的办法。同其它各方面一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饶勒斯的泛神论思想，他把理性信仰的健康成份同现代科学坚不可摧的成果协调起来。他对人们说：你害怕死亡和虚无是不无道理的，但只要你行为高尚，正直善良，只要你坚守真理和正义，为真理和正义而生存，你就能摆脱死亡和虚无。为了使这个同空气和阳光一样重要的人生真谛不被精神贵族所垄断，饶勒斯把它交给了每一个小学教员，并让他们作为一项责任把这个人生真谛传给每一个儿童。

反动派对于小学教员这些“下等人”的冷嘲热讽虽然十分恶毒，但往往显得空泛无力，现在世俗化的共和制学校有了这样一个纲领，也就有了精良的武器来对付他们了。但是饶勒斯只破坏那些他准备扬弃的东西。饶勒斯是一个建筑师。他之所以要破坏，那是为了用一些更能经得住时代的新的要求和新的情况考验的新材料重新建设起来。由于他采用了这种复兴的办法，饶勒斯就成了对一切被历史判处死刑的东西无情地加以摧毁的最大破坏者。

饶勒斯对于与时代“完全不协调”的小学教育大纲进行了深入的、击中要害的分析。他批评“法国现行的制度十分可怜，每一级都有考试，这些考试只看表面，不重实效，从而扼杀了教师的首创

性，辜负了人们对教育的信赖”。

饶勒斯可能不久就会到一所小学去巡视，他要建议小学生们多读点书，因为大多数小学生不会读书。

“如果会读书”，饶勒斯在 1888 年写道，“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小学生有选择地读七、八本书，肯定会对人类的历史、太阳系的构造、地球在太阳系中的历史和法国在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有一个相当全面、相当深刻的了解。”事情要自然而然地去做。“孩子们的求知欲没有止境，你可以慢慢地把他们引导到天涯海角。”饶勒斯认为儿童同自然界、社会和国家一样，也具有“思想的萌芽和发端”。他说：“你们看，他们多么轻而易举就分辨出善和恶，一下子就触及到世界的两个极端。他们的心灵中蕴藏的宝藏已经到达地表，只要用手一扣，就能发掘出来。因此不必害怕用一些严肃、纯朴、高尚的语言去同他们谈话。”

于是，他把自己对小学教师的意见作了精辟的归纳。他说：“如果你们一方面教孩子广阅博览，一方面通过一些亲切、认真的谈话同他们谈一些涉及人类思想和意识的原则，那么你们就可以毫不费劲地在几年内做完教育家们一生才能做到的事情。每一门学问都有它的顶峰，到了那一天，许多东西都会变的。”

这种万物统一观是多么丰富的思想！它既是全部现代科学的基础，也是各种哲学的重要依据和最后成果。饶勒斯本着这种思想打开了各个重要问题的大门，钻了进去，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我们在掌握了万物统一观的思想之后，便可以去研究已经显示出来的思想的雏型和苗头，发现某一运动的方向。这样，我们所希望的解决办法也就应运而生了。因为这种解决办法只会出现在事物的开始和萌芽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方向上。古人说过：In omnibus rebus respice finem（对于一切事物都要研究它的终结）。饶勒斯同现代派和进化论者持同样的观点，他说：“对于一切事物，你

都要研究它的开始。”这个办法极为有用。因为事物的终结毕竟遥远得很，而且没有展现开来，至于事物的开始和萌芽，只要我们深入钻研事物的现状、活动情况和演变过程，当然是可以找到的。

1886年10月21日，在众议院对参议院通过的《关于小学教育组织工作》的法律草案作出修改之后，饶勒斯在众议院发挥了自己的思想。他主张这项工作由市镇来做。他说：

诚然，人们通常是在需要间接地反对世俗化的时候，才打出市镇享有特权这块牌子。但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之后，我认为这种策略的深处有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市镇虽然不是一个虚构的自由人，但也不是一个实在的自由人。当然它是历史形成的，它从国家中独立出来，它的权力来自国家。他从国家得到了征税的权利，而没有这项权利其它一切都谈不上。因此，如果你给予市镇独自开设、管理学校的权力，它就没有权利反对公共教育的主导方针，因为它的权力来自国家。这个主导方针是：法国社会不再建立在代代相传、很有争议的宗教思想上，而是建立在人人接受的、自然的正义思想上。既然这个方针的表现形式是世俗化，那么不仅国立学校，而且市镇自己办的学校也应该世俗化。因此，我的主张很简单。我只要求，当市镇对国家承担起一切义务，建立的国立学校达到国家要求的数目之后，它还有权用自己的经费在不离开世俗化的前提下，开办一些实验学校，人们可以在这些学校里试验新的教学大纲和新的教学方法，提出更为大胆的理论。

况且，先生们，请你们注意，关于这一点，1882年的法律和今天提交诸位讨论的增补法并没有说清楚。我曾询问过好几位最懂行的议员，他们大都对我说他们不知道市镇的特权是否还存在。有几位并且对我说：市镇的这项特权当然还存

在,不过只是没有明说。咱们注意一些,别再谈啦;更不要告诉市镇,说他们可以同国家竞争。咱们可不能重蹈忏悔神父把错误泄露给忏悔者的覆辙。先生们,我们的政敌现在并不缺乏能把错误告诉给忏悔者的智囊和指路人。继续在法律中把市镇的特权弄得含糊其辞不是一个自由国家应有的做法,同时,不把这件事告诉市镇也是不实际的。

至少从现在起,我们应当考虑让市镇办一些自己的学校,这主要是因为市镇和国立学校的一切联系从今尔后即将中断。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小学教育——不管哪一个年级——的全部事务应当由市镇和国家通力合作来进行。

否则,人民将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替自己的孩子们接受一种自己并未参与意见的教育,正象资产阶级一百多年来无可奈何地接受一种自己无权干预的教育一样。因此,还是让个别市镇办一些自己的学校吧。这样,市镇就会成天使各个家庭考虑教育问题。我希望,当共和制学校结出第一批硕果,大批真正的劳动者来到地方政府的时候,如果你让他们自由发表意见的话,他们将会告诉你们,他们过去受的教育哪些对他们帮助最大;他们将会告诉你们究竟哪些知识在实践中最为有用:是关于某些技术规则的具体知识呢,还是对于某些普遍原则的扎扎实实的了解;他们会告诉你们,应当在怎样的程度上把二者结合起来;他们会告诉你们,哪一方面的历史知识最能使他们了解当代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他们还会告诉你们,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理解科学归纳宇宙所使用的一些深奥的原理;他们还会给你们举出一些例子,讲一些生动的故事,强调某些看法……。

公共教育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在宗教传统和批判科学的斗争中,饶勒斯坚决赞成后者。但他激烈反对人们对宗教意识进

行任何污辱。

今天有两种力量在争夺人们的思想：一种是对过去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坚守不渝的传统势力，一种是以科学为后盾的批判精神，后者不仅批判宗教信条而且批判哲学信条，不仅批判天主教，而且批判唯灵论。

在宗教方面，你们能够解决困难，而且也已经解决：推行公共教育只能求助于理性，这样，任何除理性外还赞成别的理论的观点便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小学教育之外了。你们整天喋喋不休，说我们把上帝从学校赶了出去，我要告诉你们，是你们的上帝喜欢呆在阴暗的教堂里。在宗教方面，我们可以保持沉默，但不放弃我们的观点；我们只有一项义务：不在学校里搞人身攻击，因为这种攻击只会伤害一些人，而且于事无补。我们要用科学的真理不断地攻击你们。

在哲学方面，只以理性为标榜的理论不胜枚举，你们究竟选择哪一种呢？你们已经选定了在国内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我指的是传统的唯灵论，不过你们也不能不这样做。

你们代表着国家，你们只能做一件事情：为孩子们解释国内普遍接受的思想。我的意思是在国立学校，人们只能讲授在国内最流行的观点，但我要再说一句，作为我国“国学”的唯灵论，这种学说已经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和欧洲知识界人士的摒弃，不过他们这样做正确与否，就不用我来多话了。

先生们，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的国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异，存在着同事们没有想到的一个严重困难，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在法国各地，在各个阶层中爆发。现在城乡各地流传着各种理论，你们这些国家的代表，肩负着民族的重任，你们只好传授一些各地可能接受的理论。我的意思是说有些大城市的劳动者已经掌握了批判精神和科学的一般成果；在这

些大城市中，唯灵论不可能成为人们独一无二的思想准则和学校的教条。我还要说一句，国家虽然不能超越在人民中普遍存在的观点，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你们应当允许市镇通过自办的学校试探一下人们的意见，并根据这种思想状况允许在教育方面有不同的做法。

1889年12月1日，在讨论这一年的预算时，饶勒斯为维护小学教员的物质利益进行了辩护：

先生们，首先，我同意预算中的必要开支。上一次议会休会期间，为了使收支平衡，我就对我那个选区的小学教员说过，鉴于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他们应当等待，应当把法律规定的八年期限作适当宽延。我现在感到我错了，但我发现自己的错误不是由于听了某些人的大喊大叫，而是绝大多数人痛苦地在那里忍耐着，一声也不吭。我们很久以来就已经正确地决定改善小学教员的待遇，以提高他们的独立地位和威望。我感到如果我们现在再一次把他们的待遇改善往后推延，我们可能会使他们大失所望，因而影响甚至妨碍小学教育的发展，可是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小学教育是我国目前的唯一财富。

我们不应当这样做，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下，共和党还从来没有这样迫切地需要大力推动民众教育的发展。

我一想到国内自由可能遇到的危险，一想到劳动阶层将来的必然发展趋势和一个自由民主制度的责任——它应当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造就优秀人材……我就不禁感到我们国家的民众教育还处在刚刚起步的原始状态。

我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学校的数量太少，尽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天花乱坠；不仅是因为设有高小的学校少得可怜，

也不是因为正如报告人在他的内容丰富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小学一个教员要教 70 至 80 个学生。不！不是上述原因，而是我们没有给那些直到十三岁还在读小学的儿童以他们理应得到的全部教育。这是由于我们缺少头脑比较清楚的教员，我们的民主制度可能还缺少足够的为劳动阶级的未来设想的雄心壮志。

必须指出，1888 年坐在中间派席位上的饶勒斯，当时就已经谈到了“劳动阶层将来的必然发展趋势”。这再一次证明他的思想的一贯性。

在提出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之前，他在这一时期就已经要求对教育实行某种社会化。他希望给劳动人民的子弟提供“适合他们情况的，同资产阶级子弟一样充实、一样完备的教育”。因此他大声疾呼：

先生们，请你们来做一个对比吧！你们看一看，十四岁左右从国立中学毕业的资产阶级的子弟已经知道或可能知道物质世界最基本的规律以及人体的主要器官及其功能，他们已经知道人类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姓名及其简历。他们已经培育起一定的艺术感，能够欣赏和体会从《奥德赛》——当然通过译文——到《阿达利》的合唱，和《秋叶》这些世界名著中的朴素而高尚的美。

可是你们把十三、四岁从小学毕业的大批劳动人民的孩子同他们比一比吧。先生们，我并不是要求他们也得到与资产阶级子弟一模一样的文化知识，我所不明白的是，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们传授相当的文化知识。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子弟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向高深、全面发展；我们看到，他们在低年级的时候就由一些水平较高、出类拔萃的教师授课，特别是你们在最近过分强调改善低年级的学习条件后尤其如此。因

此,我们有理由说,你们还没有为劳动人民的子弟做他们有权享受的全部事情。可是他们将长大成人,他们将成为劳动者,成为公民,有鉴于此,为了斗争和生活的快乐,他们也有权得到适合于他们情况的,同资产阶级子弟一样充实、一样完备的教育。

先生们,劳动人民的子弟应当首先能够迅速对政治机构和管理机构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右翼席上鼓掌起哄)是的,我说他们应当能够迅速对这些方面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你们为什么反对我的话,你们自己很清楚,因为你们不愿意给他们提供这些起码的知识。你们应当知道,在法国这个国家,现在还有三百万选民——这大概也是你们所希望的——想当然地认为预算中有几十亿法郎落入私人腰包。

右翼席上:这是真的!

饶勒斯:你们说这是真的。很好,正是这样。如果你们不希望这些命运不济的选民愚昧无知,让他们相信这些事情,你们就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是的,一些无耻之徒已经越来越多地打入政治生活中来,在他们的欺骗下,现在有几百万天真的人认为预算委员会的成员在围着聚宝盆商议,进行神秘的分赃。我们没有通过发展教育去对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旧制度积累的愚昧无知进行反击,我们没有能对下层大众进行启蒙,但这并不是当前这场危机的症结,而是存在于这场危机中的一个很大的危险。

先生们,应该使这个年轻的民主制度热爱自由。它有平等的要求,但是没有同这种平等要求同等的自由观念。要得到这种自由的观念是一项更为艰巨、费时更久的事情。所以,要通过比较高级的思维能力的训练,培养劳动人民的子弟对人的意义,进而对自由的价值有所认识,因为没有自由,人是不能其为人。

此外，即使最不留心的人也已发现劳动阶层中正在出现一种趋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萌发出一种雄心、希望和遐想。

既然我国劳动人民努力摆脱雇佣劳动条件的时刻似乎已为期不远，既然象政治上所做的那样，他们也想在经济上争取到他们那一部分最高权力，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劳动成果的分配和劳动的管理，那么他们的子弟在校外感受到这种正当的雄心壮志的同时，也应当在学校里通过足够的思维训练学会思考，学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学会鉴赏名著的能力和养成建立新秩序所必不可少的各种美德。先生们，我甚至认为——有人或许以为我在想入非非——，劳动人民的子弟将来就是因为从事单调的、枯燥无味的工作而不能尝到艺术享受的乐趣，不能通过法语领略各种名著中的简朴、高尚的美是不公道的。我不是不知道，对于劳动人民的子弟来说，困难要比资产阶级的子弟大得多。法国现在有一半地方，小学教员还在费尽心血给学生们讲授法语的基本常识。他们在家里虽然能经常接触到热烈的气氛，淳朴的思想，以及对于劳动和秩序的热爱和敦厚的感情，总之可以接触到扎扎实实的品德，但肯定接触不到足够的文化知识，因而不能理解文学名著所给予人的美感，因为那些名著并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一个经过修葺的美丽的花园。

为此，必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改善师资队伍，提高教学水平，以便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今后几代人得益；二三十年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就会随着劳动人民家庭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出现平衡，而不是象现在有时见到的那样，靠学校的低劣来维持这种平衡。

饶勒斯希望通过思维能力的训练，使劳动人民的子弟对于“人

的意义有所认识，”从而“爱好自由，因为没有自由，人是不成其为人的”。

在关于劳动人民的教育的问题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崇高的目标了。寡头所有制政权把人看成商品，资本主义的生活实践把人的意义和尊严越来越糟蹋得不成样子。饶勒斯希望从现在起就反对这种贬低劳动人民尊严的做法，并以教育来进行这一斗争。但是他也看到了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他为他们要求进行的教育改革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不过这位演说家当时已有着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抓住这个矛盾，进一步提出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待遇。他说“我国劳动人民努力摆脱当前雇佣劳动条件”的时刻已经临近了。因此，早在1888年，他就已考虑到对经济实行重大的变革。他希望劳动人民的子弟在学校里通过足够的思维训练，学会思考，学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养成建立新的秩序所必要的各种美德。”饶勒斯从一开始参加议会活动便对人类和世界怀抱着绝对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同他的万物统一观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将反复强调这一点。饶勒斯对拥有特权的统治阶级说道：“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正在走向自身的解放，走向新的社会。你们帮助他们一下吧！”他要求特权阶级执行一项开明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他满怀善良的愿望和理性，看到一轮红日正在社会的地平线上升起，特权者们的心已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打开了。

饶勒斯的哲学思想——关于万物的统一性和普遍的渗透性的思想——对于他深刻理解社会生活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研究教育问题的同时，立刻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同国家赖以生存的全部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非常自然地——这一定使许多在场听他发言但没有思想准备的议员以及许多读者感到十分突然——从教育问题谈到了资本集中的问题。你只要把这次讲话听

到底,或者把这篇文章看到底,就会发现这两个问题的关系是十分自然、十分明确的,不禁感到茅塞顿开。

我过去说过,本世纪的社会运动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资本家阶级正在日益严重地伤害无产阶级的尊严和压迫中产阶级。中小工厂主已经被大资本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大资本能够添置大型机械设备,只有他们能够以很低的利息得到信贷。

因此小店铺越来越被大商店吞并,小店主越来越被股份公司吃掉。此外,金融投机也对中产阶级不利。大银行老板已成为国内的一股强大势力,他们逐渐抬高自己手上掌握的铁路股票的行情,并从历届内阁政府得到方便,使他们的股票得到稳定的股息。因此铁路运输价格中就不得不包括比原来的实际股票价值多出的10亿法郎所付的利息。而铁路运输价格的提高则造成了生产费用的全面上涨,结果使一大批中小资本纷纷垮台。

随着工商股份公司逐渐成为金融企业,投资交易不仅扩张到这些公司的股票,而且也扩张到产品和商品上来了。今天,这种投机交易已经发展到无孔不入的程度,羊毛、丝绸、糖、咖啡和金属材料没有一样不是投机经营。因此工商业市场也同金融市场一样震动频繁,惶恐不安,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小工厂主和小店主也不知不觉地被吸引到交易所中去了。只有腰杆硬的人才能顶得住投机交易的一切冲击,也正因为这样许多小资本家都被压垮了。

不过,这还没有完。大资本家们又商量起来,他们说:“既然一切都是一场赌博,那就要赌得十拿九稳。因此必须建立强大的同业公会来垄断产品。只要全部商品都在我们手里,价格就将由我们来决定。”臭名远扬的铜业公会是这类公会中

最著名的一个，它后来垮台时造下的孽同它成立时造下的孽一样多。此外这类公会在国际上还有几百个。

农村生产者这个中产阶级也遭到了资本主义的祸害，许多佃农纷纷破产。因为土地也被卷进了投机交易的洪流。随着大城市、消费事业和运输工具的发展，随着剩余资本的增加，帝国腹地的土地价格和租佃价格突然直线上升，地主向佃农索要的租金超过原来的两三倍。投入土地的资本也象其他行业的资本一样要求得到大量的报酬，佃农同意了，因为他们舍此别无他法，其次也由于他们被价格全面上涨所带来的暂时繁荣弄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

这样，在1860年到1880年的二十年中，土地赚了惊人的数额，但这笔钱并未用到土地上去不断提高生产。相反，它只是从佃农那儿转了一下手便又落入终日游乐的地主腰包里，地主则把它或是挥霍掉，或是进行别的投资了。因此当农业危机发生，国外竞争加强的时候，当1882年各种股票急剧下跌导致物价全面暴跌的时候，佃农这个中产阶级就被过分沉重的负担压垮了。因为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没有给他们留下必要的资金去改良农具、土壤、牲畜，增加肥料，加强竞争能力。他们于是发现从1860年到1880年的这场繁荣完全是虚假的，冲击一来，不过是一场空，等待他们的只是破产。所以农村生产者这个中产阶级今天希望为他们在农村的劳动寻求保障。

中产阶级受到的损失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也在精神方面。不仅他们的独立性受到了损害，而且高等教育和科学几乎一直在着力培养的他们身上那种乐于助人的感情也受到了冲击。中产阶级中的科技人员在这个新世界里安顿了下来，他们青云直上。但他们为此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站到了

强权的一边，我指的是站到了暴虐的资本一边。随着机械化和大工业的发展，资本家需要工程师，这样，工程师也就得以飞黄腾达。可是他们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同他们应当做的距离何其遥远！他们本来可以把科学用来为劳动和劳动人民服务。他们不仅可以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而且可以发挥人的意义；不仅可以指导机械设备的生产，而且可以帮助人们团结起来，高瞻远瞩，公平合理地分配劳动成果。他们可以在革新机器的时候留有余地，逐步为被机器排挤出来的劳动者提供新的天地，可以在取得生产者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生产定额，免得造成产品积压和失业的危险，总之可以实现邦塞尔在1848年提出的理想方案：使机器的发展同人的进步共同进行，就是说不断地使二者的步伐协调起来。

当然，他们是愿意这样做的，只要看一看1830年到1848年期间巴黎高等工业学院的情况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那些年轻人当时都有着宏伟的理想和崇高的志向。他们感到，随着科学和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环境将使劳动人民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本来想通过社会变革来校正工业变革，并想让科学真正地在各个方面起到解放的作用。

可是，12月2日，^①随着政治自由的消失，社会博爱的思想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从那以后，他们这些人也就逐渐地、自然而然地被资本夺去，被资本吞噬了。资本一步一步地让他们适应其要求，如今，他们已沦为股息的奴仆。但是他们也感到自己这种迫不得已的急剧变化对他们是一种屈辱，内心很是痛苦。因此，我深信，当博爱的曙光重新在地平线上出现

^① 路易·波拿巴在军阀、银行家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并于第二年12月2日自封为法兰西皇帝，称拿破仑第三。第二帝国遂代替第二共和国。——译者注

的时候，这些中产阶级的科技人员定会兴高采烈地焕发起当年襟怀广阔的情操。（1888年）

最后这两段话，饶勒斯指的是伟大的、情操高尚的一代思想家、政治家、工程师和工业管理人员。他们曾经聚集在圣西门的旗帜下，但由于一些做法和说法欠妥而长久地被人们完全忽略和遗忘了。这些人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那么多人都不信教的情况下却让自己为教会卖命，为宗教迷信效劳。他们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杰出人士，他们曾经既想把工业搞起来，也想建立一个以劳动和科学为基础的新社会。

上面说的是1888年，现在让我们跳过二十年——饶勒斯在这二十年中一直是很关心教育问题的——来到1909年1月21日和24日。饶勒斯在这两天又就教育问题发表了意义重大的演说。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并可看到他对教育所赋予的广泛意义。

围绕教育的垄断问题究竟有哪些看法和利害关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饶勒斯想把这个重要问题上的那些信口开河的庸俗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国家的教育究竟应当由谁来搞？他答道：

人们在争论不休，好象一个大国可以随意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教育。先生们，你是不能想教什么就教什么的；我甚至认为，你也不能知道什么或者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就教什么，你只能是怎么样就教怎么样。我同意刚才有人说的一句话：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繁殖”的问题。

我并不是说教师应该努力给孩子们或年轻人传授或者灌输这样或那样的公式，这样或那样的理论。

如果这样去教学生的话，那只能把学生变成一种思想盲从的人。假如有朝一日社会党人能够办学校的话，我认为教

员的责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在于在孩子们面前讲什么社会主义。

如果教员是一个社会党人，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党人，那是因为他的思想所享有的自由应用于某种具体而广泛的知识后把他引导到社会主义上去的。因此，他能引导孩子们或年轻人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他自己思考问题的这种自由，把这些广泛的知识教给他们。

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公民执行国家最高权力或发挥政治威力不是靠任何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教条公式。只要公民或成年人享有自由，有自己的特性，并愿意执行这一权利，那么这个现代国家就可以说：“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所仰赖的独一无二的巨大源泉。”

“你不能想教什么就教什么，你不能知道什么就教什么，你只能是怎么样就教怎么样。”这句话说得十分正确、深刻，指出了应当由此去寻求问题解决的方向。教育只是我们自身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职能，也就是说历史上以一定社会形式确定下来的国家的特性和性质的表现形式。国家是自己教育自己的。国家只能给孩子们提供它在达到一定的文明后所能提供的教育。奴隶制国家教给孩子们的是盲目服从和卑躬屈节。自由人的国家培养的是具有独立思想、享有自由的人。君主制培养的是臣民。真正共和制的国家培养的是公民。一个国家如果带上了资本主义的枷锁，内部分裂出反对自己的阶级，则这个国家必然在教育上反映出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和国内的各种利害冲突及阶级斗争。

饶勒斯把方法确立以后，便去努力确定国家担负教育职能的思想。

饶勒斯忠于自己不怀抱任何偏见的基本思想，他不愿意只从某一个时代或某一个党的观点去观察法国。他希望全面地观察法

国，正象他希望全面地观察真理、正义和人类一样。

在过去各个时代进行过斗争的那些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党派，信仰哪个宗教，赞成哪种理论，只要他们曾经思考过问题、提出过要求、经受过痛苦、寻求过出路，即使他们在当时的斗争中可能表现为保守派也罢，他们都势所必然地曾经是一种前进的力量，推动的力量，革新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些微小的努力和进步的成果接收下来，我们忠于过去的这些力量，好象奔向大海的河流忠于自己的发源地一样。

先生们，是的，我们也崇拜过去。每一代人的灶火都不是白白地在那里燃烧，白白地发出光辉的。由于我们正在前进，由于我们正在为实现一个新的理想而斗争，我们才是祖先的真正继承者。我们从祖先的灶火中接收过来的是火，而你们却只是守着那些灶火中的灰烬……就是说我们一贯地把个人放在一个集体中加以考虑，不管我们这种信仰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也不管这种信仰起源何处，得到过谁的批准和保障。

我们一谈到对于人类的希望和正义所怀抱的信仰，你们就说：“你们这种信仰没有得到上帝的‘批准’和许可。”顽固不化的天主教徒们，你们是否认为日本的宗教也得到了你们的上帝的批准？

不，先生们，事实是不管你们怎么说，随着世界的扩大，你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地都存在着大量的、正在喷发的泉水，而这些泉水并不是你们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事实是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人的意义和思考问题、忠贞不贰、勇于牺牲以及捍卫尊严的品德是各个民族都具有的；重要的、有价值的，不是这种勇于牺牲和思考问题的精神的局部的、地区的、暂时的表现形式，而是这种品德本身。

是的，饶勒斯想维护和挽救过去一切能够保住，能够挽救下来

的东西。他甚至崇拜过去。但同时他还以慷慨激昂的言辞，给那些想把现在从属于过去，想把生命从属于死亡从而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思想僵化、头脑昏聩的复古派和守旧派以致命的打击。他说：“我们从祖先的灶火中接收过来的是火，而你们却只是守着那些灶火中的灰烬。”

火就是生命。过去含有生命的因素，正象现在也含有生命的因素一样。因为过去包含着现在，正如现在也包含着将来一样。要把这些生命的因素分离出来，就要无情地砸碎生命暂时表现形式的坚硬外壳。斯宾诺莎说过：一切存在都想以其实体永远存在下去。正象现在想以它今日的形式万古长存一样，过去也想万古长存。但永恒的运动法则不让它这样做，于是生命之火熄灭了，过去便只剩下一堆灰烬……守旧派死抱住这些灰烬，一片虔诚地认为自己仍在忠于过去的生命，可是他们实际上只是守着过去的尸骸。

只有服从运动的法则和进化的法则的人才能真正继承过去。比如法国大革命便是继承了大革命前的法国的全部业绩，同时把传给它的沉重的僵尸扔在一边或者毁掉了。

先生们，有些人说大革命创造了法国这个国家，我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就早已存在。

我的意思是说法国象一个有意识的人一样早已存在，不过她的统一的象征是王族，因为王族好比是体现了她的出身、地位和权利一样。即便在那时，她也是一个整体。诚然，大革命使这个国家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而变得更加统一了。可是为什么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会变得更加统一、更加自觉、更加热气腾腾、更加强大呢？是不是由于宗教的复兴，是不是由于天主教的统一，大革命才得到这火一般的热情呢？不是，先生们。这是因为那些过去一直受奴役，一直持消极态度的公民

全都能行使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的结果。由于他们带着焕然一新、热情洋溢的精神面貌参加到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来，整个法国才沸腾起来，因而变得更加伟大了。

在1790年7月14日的联邦节上，当各省代表会聚一堂宣布国家统一和共同享有自由的时候，使全国上下人心振奋、热情奔放的并不是瘸腿主教在马尔斯广场主持的那个立宪仪式，不，新时代的曙光不是从那个临时搭起来的意义不明的祭坛上发出来的，而是从人们的内心发出来的，因为人们有了共同的感情和希望。

我并不是要同坐在右翼席上的天主教议员过不去，我只是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在1793年和1794年，在共和国成立第二年的那些如火如荼、充满牺牲精神的日子，天主教曾经在短暂的时间内实际上处于最不受人重视的地位——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硬扯在一起——那时人们很少想到天主教，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国家。

同样，先生们，尽管拿破仑的半无神论的独裁政权外表披的是正式的天主教外衣，但促使大部分不信教的帝国儿女去进行史诗般的远征的却不是出于对天主教——当时的国教——的崇拜。当时那股奔放不羁的热情并不是天主教掀起来的，而是由于大革命把我们的祖国世俗化了，帝国才从世俗化中得到了好处。

可是，先生们，科学呢？谁没有看到科学的独立性已在各个现代国家显示出来？我是把科学当成一种国家机构来说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有一些国家实验室，而且是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些高度概括的材料后对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了无比深刻的影响，因而实际上起到某种独立机构的作用。过去一些时候，虽然教会的一些说教同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

究成果风马牛不相及，但科学却不得不说自己的研究活动是以这些说教为指导的。可是今天，科学以其独到的研究方法，通过实验扩大计算成果，又通过计算证实实验成果，已经观察到空间中的一些无比遥远的事实，进而把一些关系确定了下来。现在已没有一本书，不管这本书把道理说得多么透彻，能够在任何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不信教的人——的思想上抵销或挫败科学在它所涉及的学科和领域内所阐明的真理。

我也不认为科学已穷尽一切问题。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有一天写道：“世界已无神秘性可言”，我觉得这种天真无知的话不应该出自他这位天才之口。

但是，科学在它所研究的领域，所达到的学科中，在它所确立的关系上，它所向无敌，不是任何其它权威所能驾取得了的。如果一本书在研究和探索宇宙的时候同科学发生争论，错的肯定是那本书，对的肯定是宇宙。

因此，世俗化的运动，理性的运动和独立思想的运动如今已深入现代世界的各个领域。今天的社会可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社会。自从旧世界响起新世界的号角，大革命在古老的钟楼里敲响新时代的钟声以来，人们的生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充满活力。不但人们的生活充满活力，不但新世界的原则还在同旧世界残存的原则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且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正摆在被理性发动起来的新世界面前。

先生们，我们有时一谈到民主制，就往往流露出一种蔑视，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一下，宣布今天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没有一个人受到排挤，没有一个人遭到歧视，人人都享有自己的权利，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

这不单单是一个说法或提法的问题，宣布每个人都享有权利，那就要真正让他们能够通过思想的提高和文化知识的增加，通过一系列实际的社会保障来行使这种权利。如果你想让每个人在实际上成为其天赋所具有的那种样子——一个自由的人，那末这种社会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政治民主要通过理性原则本身所包含的力量，通过被人人都有权怀抱希望这种思想所唤醒的群众提出的要求，发展成为社会民主。这样，不断发展的人类思想就会越来越开阔自己的视野。

先生们，我们的一些右翼议员常常指责我们的思想缺乏哲学基础，因而不得不以没有哲学指导的旧思想为依据，或是自卑自贱，甘愿接受卑微的实用主义思想。

他们忘了，人类至今还受着自然界规律的约束，而在这严酷的自然界中，人类正努力建立一个社会形态，使每一个人都真正享有自由，并通过正义的实施，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个社会形态建立起来，在这个蒙昧的、未开化的世界上实现这一可能，从而使人们享有的这种自由和相互关系的协调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在现实生活中为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世界奠定了基础。

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世界，饶勒斯终于说出了他内心的这一重要想法。在饶勒斯的思想中，一切都可归结为高尚的、无所不包的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是具体的，是以全部的现实为依据的，因为观念，人类的理想这些无形的力量也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这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可见常常需要把生活中这样或那样原始的、未经加工的表现形式排除掉方可揭示出推动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反动派认为民主制是一些庸俗无聊、野心勃勃和怀有仇恨情绪的人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

饶勒斯却认为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原则。他大声说道：“自从理性的权利得到确认以来，自从旧世界响起新世界的号角，大革命在古老的钟楼里敲响新时代的钟声以来，人们的生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充满活力。”

反动派通常总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高尚的道德观念和理想主义的主要思想传统。这种所谓高尚的道德观念被他们当做一种宗教灌输给逆来顺受的被压迫者，其实往往不过是把低级无聊的物质利益生搬硬套到理想主义上去。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一般说来不过是一种“精神警察”，意在维护特权阶级的统治和社会的不平等。它以响亮的口号掩盖庸俗不堪的事实。饶勒斯把这个字借用过来，但赋予它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含义。

由于“一些庸俗的东西”的存在，人们在谈到民主制的时候往往流露出一种蔑视，可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一下，宣布今天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没有一个人受到排挤，没有一个人遭到歧视，人人都享有自己的权利，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

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来看，或者用法学家的话说，从法学的观点来看，饶勒斯是对的。宣布人人都享有权利，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已经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个权利是以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决不容许人们借口它只是一种诺言而迟迟不去实现。这个诺言是以崇高的革命斗争争取来的，它标志着历史的转折和新纪元的开始，标志着政治上将要遵循的一个新的方向。而一个新的方向之所以不能否定，不能忽视，就是因为它表明还有一段路非走不可。

因此，道路只有一条，必须沿着既定的方向走下去。已经宣布的权利不能成为一纸空文。饶勒斯对此十分清楚。所以他提出“政治民主要通过理性原则本身所包含的力量，通过被人人都有权怀抱希望这种思想所唤醒的群众提出的要求，发展成为社会民主”。

希望“不断发展的人类思想越来越开阔自己的视野”。

饶勒斯非常明白思想是不足以约束世界的，单靠有道理还不能战胜汪洋大海般的不公正势力。所以他提出让“被唤醒的群众”来为思想服务，或者用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话来说，“让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思想服务”。但是，即使在提出利用“被唤醒的群众”这种物质力量的时候，饶勒斯在根本上仍然很自觉地忠于他那“用理想主义的观点解释世界”的思想。因为他在谈到“被唤醒的群众”时加了一个限定语：“被人人都有权怀抱‘希望’的思想所唤醒的群众”。而一个唯物主义者则可能会说：“被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所唤醒的群众”。

统一不是大杂烩。饶勒斯深知人们在思想上互相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他在1910年发表的关于教育问题的演说中，引用了红衣主教纽曼说过的一句寓意深刻的话。这位绰号叫做“牛津魔术师”的红衣主教说道：“在人类社会，有些人如果死去的话灵魂可能得救，而他们周围的一些人死后则永远不会得救。这两种人常在一起聊天，互相握手、问好、寒暄，不知道他们之间相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一个可怕的深渊。”饶勒斯也知道，“现代生活表面上天衣无缝，人们的关系从外表看来十分融洽，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似乎都互敬互爱，十分亲热，但每个人如果都把自己的原则执行到底，互相之间便会出现可怕的隔阂”。饶勒斯这位世界和平、世界大同的倡导者，似乎在痛苦的一瞥中看到了那可怕的障碍，看到了他自己无法制服的敌人——仇恨。所以他接着说道：“我一读到纽曼写的这句话，心中就感到象是在噩梦中一样，这些意志薄弱的可怜的人彼此都以为有着共同的感情，经历过共同的遭遇，但我仿佛看到他们的脚下就要出现一道可怕的鸿沟把他们分割开来”。

饶勒斯以确凿的材料证明，“教育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所提倡的各种原则同天主教教会的原则和基本观点

展开的激烈冲突”。

饶勒斯不希望让崇高理想的教育由教会垄断。他不主张把劳动人民的教育局限在“可怜的卫生常识和庸俗的道德规范”上，局限在“人生常识和烹调知识”上。否则那将是公民社会的破产。因为这将表明“只有教会能够给人民传授一点知识”。

但是法国会不会由于这种冲突而永远处于不可克服的分裂状态呢？不会的。阶级斗争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方可进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双生子，它们都是同一种生产体系和思想体系产生出来的。”它们都有着“共同的要求”。因此不可能出现“国家的全面分裂”。

饶勒斯以雄辩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教会的立场正处在演变过程中，指出教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已经做出了一些让步。它现在已赞成伽俐略在天文学上的伟大发现，虽然它在起初曾对他极力加以攻击和诽谤。它通过信奉天主教的大学者拉巴朗之口，接受了现代地质学的观点：“一个地区动植物的逐渐演变只需经过几百万年就可看得出来”。对于《圣经》是在“六天内”写成的说法，我们当然谁也不会相信。教会的一些知名人物也承认“《创世纪》的一部分来自迦勒底人的传说”。这种变化甚至在教会内部也明显存在。教会正在同民主制讲和。它通过拉莫奈和拉科戴尔之口说：“你把自己同各国政府的关系摆脱掉吧！因为这些政府是你的累赘，同时也是套在各国人民身上的锁链。你只有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才可去砸碎套在各国人民身上的锁链，并把日益发展的民主制同教会协调起来。教会已由于人们因此而产生的误解面临被抛弃的绝境。”列昂十三世的通谕(Rerum novarum)也出自同一思想。因此，“现在是理性得势了”。

饶勒斯把他的这种看法归纳为一句话：“天主教如果要逆时代潮流而动必将寸步难行。”所以他对教会说：“不管你们怎么做，你

们面前摆着两条路：或者自取灭亡，或者向科学、民主和自由作一些新的重大的让步，使得祖国的所有儿子都能在一片和睦的气氛中走到一起来。”

因此，是教会排挤饶勒斯，而不是饶勒斯排挤教会。不管怎么说，饶勒斯对教会的了解胜于教会对饶勒斯的了解。请看下面一段话：

当天主教死守着它那抽象的教条拒不妥协，似乎使法国在生活和教育问题上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时候，教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作了一些让步。另一方面，先生们，我们这些革命党人难道对教会采取了宗派主义的立场吗？我们不但不做宽容派——米拉波曾经正确指出用“宽容”这个词来对待他人的理论是不妥当的，是带有侮辱性的——我们对待各种理论不但不采取宽容的态度，而且尊重这些理论所代表的人格和精神。

这种精神贯穿于整个法国大革命的始终。诚然，这次大革命为了能顺利进行，为了捍卫自己的思想，曾不得不进行过一些尖锐的内部斗争，你们可能会举出这些斗争来指责它。可是你们应当知道，恰恰是由于这次大革命人们才对我国的伟大传统有了深刻的认识，这才是这次大革命非常了不起的和无比重要的地方，你们这些顽固的守旧派恐怕也不会对此无动于衷。看到历史上出现的那支伟大力量在创造新世界的同时，又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人们对旧世界的认识，这确实是很不平凡的。

先生们，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不仅是因为大革命使人们经历了极为复杂的严峻考验并因而促使人们去思考一些问题，也不仅是因为大革命在推翻旧世界的时候给它涂上了一层魅人的，富有诗意的浪漫色彩，而且是因为通过这次大革

命，在旧社会一直是默默无闻、乱糟糟的人民力量开天辟地第一回象火山爆发一样从社会深处迸发了出来，显示了行动和理性的巨大威力，从而促使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在事情澄清之后去研究这些伟大的人民力量。

火山爆发时把地层深处理藏多年的岩石和熔岩喷发了出来，因而促使地质学家们去研究地层深处的构造。同样，大革命的伟大力量也把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的人民生活——法国社会的基础——象火山爆发一样地表现了出来，因而促使历史学家们去进行研究和探索。沙多勃里昂、梯叶里和米希勒等伟大历史学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他们带着前所未有的热情把过去的历史再现了出来。

先生们，这是我们当代文明史上的又一光荣。绚丽多彩、充满智慧的希腊文化对本国的过去和其他国家的了解应完全归功于希罗多德那样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由于他们个人的钻研精神，人们才打开了眼界。在此之前，希腊人一直把同本国文化无关的东西一律视为未开化的。基督教呢？他们对待古希腊和古罗马常常是多么地不公正！历史上第一个能够想到遥远的过去，能够体会到历史的延续性和人类传统的大的社会实体是现代世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而不会贬低过去。

勒米尔：这是由于基督教的关系。

饶勒斯：是由于基督教的关系！但基督教只是我们这个社会实体的一部分。而且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们，有谁否认过这一点？

吉拉尔-瓦莱那一天说我们继承的是希腊文化。不止于此。我觉得我们从希腊文化继承来的是对于规律、速度和平衡的认识，以及对于朴素的美的鉴赏力。我认为希腊文化不

是造成法兰西的伟大的唯一因素。东方的基督教的传统也有一份。我们法国的思想如果没有把那些伟大的犹太人严肃认真的态度吸收过来，那就会大为逊色。这些犹太人不仅把正义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美，而且怀着满腔热情要求实行正义。他们向公正的上帝呼吁这种正义，以便对待一切蛮横无理的势力。他们希望能出现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人都能按照正义的原则取得和解，那时，用赞美诗的作者或先知的话来说，他们所祷告的上帝将会把“每个人脸上的眼泪擦干”。

法兰西民族的思想就是由希伯来人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这种对于人类正义的热烈要求同纯洁、有力、合乎理性的希腊人思想融合成的。

我承认，我无法理解皮佑所表示的惋惜。我们的敌人说起话来真是反复无常！巴黎大学有一个时期曾遭到指责，理由是它教授维克多·古仁和茹尔·西蒙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据说会把人们引向泛神论，泛神论又会把人们引向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要不是命中注定掉进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的泥坑，那一定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祸！这些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可是曾几何时，一度遭到痛斥和诅咒的茹尔·西蒙和古仁的哲学现在却又有人为它鸣不平，埋怨小学教员不再天天背诵他们的经典论断了。

* * *

这何等可悲地反映出你们的内心在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我知道耶稣会教士和杨逊派教士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他们的互相指责还是比较公正的。可是德拉古约涅埃尔那样做对吗？他在谈到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学时，把著名散文家、诗人和英勇无畏的哲学家都一一列举出来，连笛卡尔和《伪君子》的作者莫里哀也未漏掉，而唯独对巴

斯卡只字不提，以证明他对那些距今较近的人恨之犹甚。

其次，在谈到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时，你们这些掌管人民教育的人，基督教徒的徒子徒孙，你们有什么权利象德拉吉约涅埃尔那样对待伏尔泰和卢梭？关于这两个人我不想多所评论，因为我的观点可能不够公正，或者说，有人会怀疑我存有偏见。我只想根据他们自己的互相评价来作出判断。不过，你们在向孩子们介绍伏尔泰时有什么权利只让他们知道一句卢梭骂伏尔泰的话，而在介绍卢梭的时候又只让他们知道一两句伏尔泰对卢梭的批评或讥讽？

教会对待他的敌人是不愿持公正态度的，但它的敌人却对教会给予充分的肯定，指出它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有时很有益的作用。教会出的教科书错误百出，类似关于伏尔泰和卢梭的贬词不胜枚举。

但世俗的教材呢？如果说世俗的教材也有某种倾向的话，那就是过于乐观。

所以饶勒斯接着说道：

啊！我可不是要埋怨今天。我只是觉得人们很可怜，不知道今天是过去伟大成就的结晶，也是明天取得伟大成果的保证。因此我丝毫没有贬低今天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在人类前进的历史上，今天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是我们的一些教科书对今天的赞美未免太浮夸，太过分了，这样做不仅对过去不公道而且对将来也没有什么好处。我们的教科书一谈到过去的君主制，必定是富人住在如何富丽堂皇的宫殿里，穷人则住在如何简陋的贫民窟里。我承认，每当我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十分担心，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离开拥挤不堪的贫民窟，绕过繁华的大街去上学时，头脑中会不会出现一个痛苦的问题而大声问道：“那么今天怎么样呢？”

我们的作家对过去的饥荒大书特书，把整个时代一笔抹煞，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态度欠公正，他们没有看到这不能完全归罪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组织，而是由于生产工具的不够发达造成的。我们一方面为因贫困而产生的饥荒对过去的社会大加指责，另一方面在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产品大大丰富的今天，我们又常常不能，也不知道，甚至压根儿不愿意帮助那些至今仍受这种痛苦煎熬的人们摆脱困境，我一想到这些心中就十分难受。不要忘记，印度大饥荒和爱尔兰大饥荒都发生在十九世纪的今天！我们已进入工业文明的今天，但失业现象依然严重存在！先生们，今天是应该赞美的，但要适度，要留有余地，不要言过其实！

我们不应当没完没了地把时间花在评价过去上面。当然，一个历史学家在叙述过去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几乎不能不同光明灿烂的今天作比较，几乎不可能不带着激动的心情去研究、寻求一切预示当代这些伟大成果的先声。但每一个时代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当时的斗争方式和自然发展来评价。

我们应当上溯到克劳维，基督教和高卢人的存在之前——高卢人甚至在罗马人之前就具有明显特征了——就是说，我们应当从法国历史的远古时代开始，把每一个时代，每一代人的情况弄清楚，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以及生产和文化状况，看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工作中有哪些危险或棘手的问题，并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正确的评价。

只有这样从发展的眼光来阐述历史，你才能对今天作出公正的评论，才能一步一步地帮助孩子们对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同时，你也会看到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突出的方面。我自己就觉得查理曼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公元八世纪，

当一切都处于分崩离析的时候，他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个濒于绝境的世界组织起来，维持下来。查理曼帝国陷入封建割据后，我们的语言也随之解体，成为一种无法明确表达思想和分析问题的生硬语言。可是我发现三个世纪后，到了十二世纪，却出现了一些伟大的诗歌，这些诗歌摆脱了政治上的混乱和生硬的语言，所用语汇十分成熟，保留了拉丁语的清脆特点，并且具备古法语分析问题的准确性。混乱之中竟能产生有条不紊的思想，这不能不叫我大为赞赏。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说的是我自己而不是你们——由于精力有限，不可能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把这个历史发展分析清楚，可是孩子们却应当按照这种办法去学会了解真正的法国。这个法国不是某一个时代所能概括得了的，不但若干世纪前的某一天不能概括，而且前不久的某一天也不能概括。这个法国有她完整的历史，她经历过日日夜夜，经历过黎明和黄昏，复兴和衰败，如今，她在经过一切艰难险阻和沧海桑田的变化之后，正在走向一个光明灿烂的时代，这个时代今天尚未到来，但她在思想上已经意识到这一天是会到来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而且我想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一方面，教会如果想存在下去，就应该继续进行它几百年来不得不进行的那种必不可少的转变，直到完全承认人们的思想自由和民主权利；另一方面，教会可以在世俗化的革命的新法国，对全体人民进行教育，但要胸怀广阔，放开手做去，而不要小里小气，缩手缩脚。同时，它应当教育人民尊重法国的过去，尊重各种社会力量，各种首创精神和国家的一切伟大之处。我想我已经把我的话说清楚了，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世俗化的全民学校，把国家的每一个儿童都吸收进来。饶勒斯还想迫使教会的卫道者们同意由国家来负责关于现代

法国的教育，使每一个孩子都热爱“世俗化的革命的新法国”。

饶勒斯就是这样巧妙地对他的听众进行了细心的解释，使他們看清应当由谁来“垄断”教育。这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它引起了许多次激烈的争论。下面是饶勒斯在1910年的那次演说中对此问题发表的看法。

最后，我想就此问题说两句话。《辩论报》以十分客气的措词说我反对“垄断”，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我说了两点。第一，建立国立学校似乎应当由国家去进行。

埃纳尔：谁也没有否认这一点。

饶勒斯：……我的意思是这种国立学校应当把每个儿童都吸收进去。

埃纳尔：这是把孩子们收归国有！

饶勒斯：埃纳尔先生，请允许我把这两个词解释一下。

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国家的权利，也不是什么家庭的权利，而是孩子们的权利。

作为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力量的话：孩子们有权接受来自地平线各个方面的阳光，国家的责任在于防止一部分阳光被人遮断。

这就从权利的问题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我要再说一句，我并不认为国家在执行教育的职能时一定会独断专行。同时，正象我的杰出的朋友阿拉尔所指出的，我也不认为对国家实行监督不会起作用。相反，我认为这种监督可以进行，因此我认为由国家建立面向每一个人的学校在理论上和原则上没有什么行不通的。

不过，我要声明一下，而且我也一直这样认为，由于这项权利非同寻常，只有当孩子们的权利被人们以自由的名义肆

无忌惮地滥用，因而引起公愤，需要加以制止的时候，国家才能够使用这项权利，也应该使用这项权利。

我还要说一句，我们在从这一方面着手解决问题，正式通过法律对其他儿童推行国家教育之前，应当首先把学校整顿一下。否则，即使有了法律，如果我们对每班六、七十人的现象听之任之，怎么能去招收新的学生？如果我们不敢把小学在校儿童的年龄延长到十四岁，我们又怎么能去招收新的学生？我们的小学教员的人数正在增加，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给他们提供更加广泛更加高深的文化知识，又怎么能去扩大招生？阿拉尔前天说得好，教员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提高教育水平必不可少的。可是他们当中许多人教授的学生太多，负担过于沉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获得更加广泛、更加高深的文化知识呢？

因此，饶勒斯要求首先进行一系列改革，然后才去解决由国家把教育包下来的问题。

他在这篇关于教育的讲话的最后一部分，要求限制工作日，采取“英国劳动日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样，“教育问题便又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党人”，他要在“这两个方面”进行斗争。

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一切事物都寓于一切事物之中。宇宙是一个整体，人类也是一个整体。饶勒斯的万物统一观在他最为关注的教育方面也可看得十分清楚。

第三章

历史学家饶勒斯

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写法。以描写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为主题的战争史曾经在几百年间是历史学家们喜爱的题材。可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文化史或者说文明史已逐渐在历史学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人们开始探索各国平民和平生活的发展趋向，研究艺术和科学，工业和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新的潮流中，人们对于事件的兴趣已没有对持久存在的事实发生的兴趣那样浓厚了。我在拙作《历史的哲学》（1903年巴黎版）一书中，曾经指出这个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是由一位阿拉伯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1332—1406）在十四世纪开创的。

举世震撼的法国大革命也给历史学带来了革命的变化。圣西门就曾要求对工业和生产的研究给予优先的重视，从而把“工业原则”同军事原则和神学原则对立起来。奥古斯汀·梯叶里、基佐和米涅等第一流历史学家都赞同这个观点。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使这种关于历史的新的写法最终确立了下来。卡尔·马克思给这种写法规定了符合历史规律的形式。他把社会、政治、法学和宗教等方面从属于“经济因素”，更确切地说从属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已不再是一个无人过问的地方，它象是一个工厂或车间一样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国家之间和

民族之间的战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让位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集团的斗争。历史在民主化，它成了人民的历史。帝王将相从他们的宝座或者说从他们那一直受人赞扬的舞台上走了下来，同大厅里或竞技场上喧哗的人民群众混在一起了。

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历史的文风也出现了变化。它不再以华丽的文采来吸引读者而是着力于介绍和传授知识。它不再注重情节的描写，而是提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历史学家饶勒斯在历史研究方面也象在其它方面一样努力进行归纳，把看来截然相反，完全不同的人的优点十分和谐地综合在一起。他那本出色的研究革命的著作便有意要把“普路塔克，米希勒和卡尔·马克思”，即英雄史学，悲剧史学和社会史学糅合在一起。

饶勒斯被认为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只要读一读他的《革命史》便可以确信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曾经象他那样全面地研究了革命的经济“基础”。他在《“制宪会议”导言》一文中对他的历史研究方法作了这样的说明：

我想用社会主义的观点向劳动人民，向工人们和农民们介绍一下从1789年到十九世纪末的各个历史事件。我认为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个十分广阔、内容无比丰富的历史事件，但我并不认为这个事件已经穷尽所有的问题，以后的历史不过是其发展的结果而已。法国大革命为无产阶级登上舞台间接地准备了条件，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两个基本条件：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但它实质上是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政治和经济在向前发展，大工业已经形成，工人阶级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农民们忧心忡忡，他们在工业集团和商业集团的包围下被竞争挤垮了，知识资产阶级^①

① 知识资产阶级，原文为la bourgeoisie intellectuelle。——译者注

对赤裸裸的唯利是图的社会感到格格不入，思想上产生了混乱，这一切都在一步一步地孕育着一场新的社会危机和一场新的、更加深刻的革命，无产者将在这场革命中夺取政权，改变所有制和道德观念。因此，我想对1789年以来社会各阶级的发展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作一个简略的介绍。虽然要把社会生活连续不断、十分曲折的发展，截然分明地分为几段，常常会显得有点武断，但我们仍可以相当准确地把一百年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从1789年到1848年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确立自己地位的时期。他们在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和贵族的斗争中利用了无产者的力量。无产者那时虽然非常活跃，在某些时候并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仍然只是一种次要的、在当时起辅助作用的力量。他们有时也把资产阶级有产者吓得惊慌失措，但他们的行动实际上还是为着这些有产者的。他们还没有形成截然不同的社会观。巴贝夫及其少数支持者的共产主义在督政府和第一帝国把他们镇压下去之前，不过是这场革命的一个威武雄壮的插曲。即使到1793和1794年，无产者同第三等级也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当时既没有鲜明的阶级觉悟，对于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形式的所有制也没有什么要求或想法。他们没有超越罗伯斯比尔的平庸思想，只是想由小土地所有者和手工业小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政治上享有国家最高权利，经济上维持现状的民主制。他们身上还不具备能够创造财富，给人带来美感和欢乐的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在那如火如荼的日子里，他们的影响并不很大，只是反映了自己的愤怒和要求。他们对那新的理想所具有的巨大而柔和的魅力一点也未感觉到。

饶勒斯这些话并不是机械地重复马克思的提法，这是他做了

大量的研究和观察之后，对于当时的现实及其最基本的方面所得出的结论。

饶勒斯不仅研究了大革命如何使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他还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各个时期进行了研究。他看问题一直很仔细，充满现实主义观点。

路易一菲力蒲时代的资产阶级既反对贵族和僧侣，也反对工人，它“一本正经地认为自己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理性在社会方面的体现。而当时的革命者也还未成为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主要在知识分子”中较为流行，圣西门的体系充满了资本主义思想，蒲鲁东的体系则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思想。

可是工人阶级已开始觉醒。当然，在1848年2月到1871年5月的资产阶级统治第二阶段，工人阶级的思想还没有明确下来，还处在混乱状态。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有威胁力量的阶级，统治阶级不得不把“被红色幽灵吓破了胆的”各个保守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它。在巴黎公社时期，工人阶级的思想受到了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派等不同倾向的影响。

此外，在思想混乱的同时，运动本身也杂乱无章，乱作一团。1848年革命的准备工作的民主激进派或者说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的，也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进行的，而且主要的可能还是前者。到了六月，资产阶级民主派便把无产者赶到了炎热的巴黎大街上^①。1871年的公社运动也是由于商业资产阶级^②的反抗——付款期限法和凡尔赛老爷们的严酷无情把他们激怒了——，由于巴黎的爱国主义义愤和人们对共和制失去信心造成的。

① 指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译者注

② 商业资产阶级，原文为la bourgeoisie commerçante。——译者注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不久便在这场混乱中发挥了自己的革命影响。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系统研究公社的长篇著作中说得很对，工人阶级乘着混乱第一次夺取了政权。这个新的事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无产阶级利用了某种突然性。它在四面被围、群情激奋的首都是一支组织得最好、威望最高的力量，但它还没有能力把整个法国都争取过来。当时的法国是以梯也尔为首的僧侣、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法国。这样，公社如同一根烧红的铁矛一样，一碰到大的冰块便折断了。但1848年至1871年，无产阶级还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在1848年，无产阶级参加政权还几乎是一种幻想：路易·布朗和工人阿尔贝在临时政府中丝毫动弹不得。忘恩负义的资产阶级把全国各地的社会渣滓都搜罗来对付他们。而这些社会主义者竟也在卢森堡宫进行纯理论的探讨，他们放弃努力，安于这种根本不起作用的经院式讨论。他们没有力量采取行动，于是便逃之夭夭。所以当受蒙骗的工人阶级举行六月起义的时候，连政权的边也没有摸着就被镇压下去了。可是到1871年，这些起义者的后代却取得了政权，并在一个时期内掌握了政权；他们搞的不是骚乱，而是革命。

不过，这些无产者在取得政权以后未能把政权保持下来。但他们仍然给自己的后代发出了响亮的、满怀希望的信号，而且这个信号被大家理解了。无产阶级发展的第二阶段到巴黎公社宣告结束。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这支力量虽然还不太整齐，行动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却是不可忽视的了。因此，由于公社的努力，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时期才终于到来了。在这个新时期中，社会主义正在有计划地把全体工人阶级都组织起来，把安于现状的农民从思想上争取过来，并且团结对资产阶级政权失去信心的知识资产

阶级，全面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新型的理想的所有制。

我们现在已不必再为混乱担心。工人阶级和社会党已经在思想上形成一致。虽然在枝节问题上还存在着派别争论，但无产阶级的各种力量实际上已经按照同一个理论，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团结起来了。如果明天无产阶级就夺取全部政权，它立刻就会按照既定的方针果断地去掌握它。但到了那时，不同倾向的争论肯定还会有。有的人可能主张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有的人则可能希望给劳动人民的地方团体以尽可能多的自主权。为了调整国内新产生的关系，调整行业工会、市镇、地方团体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奠定个人的充分自由和社会的团结友爱，为了把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活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我们将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因此，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不同的意见是肯定会存在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把社会党人、无产者团结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思想，社会党已不再是分裂为无所作为的对立派别集团。它已逐步实现其生机勃勃的坚强团结，对社会越来越发挥重大的影响。现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伟大的力量：劳动、思想、科学、艺术，甚至信仰——人们认识宇宙的一种手段——都把自己的复兴和发展寄托在社会党身上。

饶勒斯一直表明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决反对他们把一些现存的提法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饶勒斯热爱生活，对生活的各个极其错综复杂的方面深为了解。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在对革命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观点。《导言》中有几段谈到这一点，现全文摘录如下：

无产阶级究竟克服了哪些危机，进行了哪些努力，经历了

哪些事物的发展才有了今天这样大的发展，以致明天要起决定性的作用呢？这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党人都想谈一谈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经济条件——生产和所有制的形式，——是历史的根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职业，而职业，作为个人活动的经济形式，往往决定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给人们带来痛苦或欢乐，使人们对未来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憧憬，同样，在历史发展的每个时期，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决定着政治形态，社会习俗和思想发展的总的趋向。因此，我们在叙述每个时代的时候，将努力揭示出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我们将努力揭示所有制的发展和工农业在技术方面的演变。绘制一幅统计表只能求其简略，同样，我们在介绍经济状况对政府、文学和制度所产生的影响时，也只能大概地谈一谈。

我们没有忽视经济力量对于人所产生的影响，常常被人用狭隘的观点加以曲解的马克思本人也从来没有忽视这一点。可是人们的兴趣和思想千差万别，人们的生活无比错综复杂，不是用一个简单而生硬的经济方面的解释所能概括得了的。此外，虽然每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人类社会，他们受的影响也主要是周围社会环境的长期影响，但是人们的感觉和思想同时也生活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这个天地就是宇宙。

毫无疑问，离我们无比遥远的星星同人类社会虽然并无多大关系，但在诗人的想象中，这些星星所发出的光辉却能激发起与他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感觉和社会生活最根本的方面相一致的遐想，这正如月光能把地上的湿气变成一团薄雾在草原上飘浮一样。从这一点上说，即使是无比遥远、几乎毫无意义的闪烁不定的星光，社会制度和决定社会制度的经济制度也能把它拿来同自己协调起来。歌德有一天走进一家工厂的时候，突然对他的衣服发生反感，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衣服需

要经过那么多机器加工才能生产出来。可是德国资产阶级要是没有在工业方面取得这些初步的发展，死气沉沉、四分五裂的日耳曼世界就不会感受到，也不能理解使浮士德大为感慨的那种对于生活的紧迫感。

饶勒斯坚持唯心主义的泛神论思想，把人同宇宙中的各种力量联系在一起。所以他在《导言》中写道：

不管人们同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有着怎样的关系，当人们陷入无比大胆、无比美好的梦幻的时候，他们的心早已越过人类社会而到达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同宇宙接触的结果使他们的心中激起了一股神秘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处于运动状态的永恒生命力，它在人类社会之前便已存在，在人类社会之后也将继续存在。因此，否认思想和遐想对于经济制度和一定的生产形式的依附关系是徒劳的、错误的，但只用经济形式的演变来简单地解释人类的思想发展也是可笑的和武断的。人们的思想常常凭借社会制度来超越它，同它作斗争；人们的思想同社会政权既存在着一致性，也存在着冲突。允许开普勒和伽俐略从事自由科学活动的是部分摆脱宗教束缚的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君主制。可是思想一旦掌握真理，就摆脱了君主、社会和人类。真理本身及其条理分明的关系成了思想直接活动的领域，所以尽管开普勒和伽俐略曾经把现代国家作为其进行天文观察和研究的基地，但他们在观察或研究完成之后便只属于他们自己，只属于宇宙了。他们的思想跳出了他们曾依靠过，并在那里激发起研究热情的人类社会，只是按照广阔无垠的星空的规律行事了。

我们在叙述社会经济形态的部分机械演变的过程中，将始终突出被永恒的宇宙从人类社会解放出来的这种自由思想的崇高尊严。即使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也不会对我

们这种做法加以指责。马克思就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说过，迄今的人类社会一直是被经济形态的必然性或盲目运动支配着，制度和思想并不是自由人有意识的活动成果，而是无意识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认为，我们还停留在史前时期。只有当人们最终摆脱无意识力量的统治，通过自己的理性和意志来管理生产的时候，人类的历史才会真正地开始。那时，人类的思想将不再受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并由它自己管理的经济形态的专制束缚，它将直接地、自由地观察宇宙。因此，马克思预见到思想充分享有自由的时期必将到来，在这个时期中，人类的思想将不再因经济的奴役统治而遭到曲解，因而也不会歪曲世界。马克思当然不否认，一些伟大的人物已经摆脱这个黑暗的蒙昧时期而进入自由境界。建立一个真正完美的人类社会已经随着他们的努力而开始了。我们的任务是搜集思想生命的最早表现形式，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看到共产主义人类社会的自由的、热火朝天的伟大生活。到了那一天，人类将摆脱一切束缚，通过科学、行动和幻想而占领整个宇宙。现在这股微风在人类社会的汪洋大海中虽然只掀起一些小小的浪花，但它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将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狂风暴雨。

人类社会的各种表现形式是由人类所处的经济环境决定的，马克思从现实生活出发对人类进行研究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思想力量的影响。饶勒斯以多么优美而丰富的语言和多么高度精确的文字赞扬了马克思的这种思想！他并没有直接引用马克思的话，只是在谈到“思想享有充分自由的时期”时，暗示了忠实地解释马克思思想的恩格斯说过的一句名言：社会主义是“必然向自由的飞跃”。人类一旦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他们的行动将只由自己的本性和自由来支配。但未来的发展有赖于今天。“现在这股微

风在人类社会的汪洋大海中虽然只掀起一些小小的浪花，但它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将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狂风暴雨。”

于是，饶勒斯在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并对马克思的观点加以发挥后，对历史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他写道：

因此，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既有马克思的唯物论，也有米希勒的神秘论。经济生活无疑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和原动力，可是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有思想的人便要求给予思想以充分的活力，迫切希望把要求统一的思想 and 神秘的宇宙结合起来。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亚历山德里曾经说过：“巨大的海浪把我们的小船高高托起，我因而看到了从海浪中钻出来的正在升起的太阳。”同样，经济革命的巨大波浪也将把人类社会这条小船高高托起，使得人类——这些劳累了一整夜而感到精疲力竭的渔民们——从更高的高处来迎接黎明的曙光，迎接即将在我们面前升起的思想的曙光。

因此，虽然我们将着重从经济角度去分析人类社会的伟大现象，但我们并不忽视历史的精神价值。一百年来，自由和人类这些美好的名词常常被人用来掩盖剥削制度和压迫制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法国大革命虽然颁布了“人权宣言”，但在有产阶级看来，所谓人权只是资产阶级和资本的权利。

有产阶级宣称，只有当有产者能够继续以所有制的形式对非有产者进行统治的时候，人才可以享有自由，可见所有制是支配其它一切力量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无耻的阶级利己主义和十足的虚伪性。可是在大革命初期，人们在某些时候曾经把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同人类的利益看成是一回事，人们的心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充满了纯真的热情。而且，在由于资产阶级处于混乱状态而造成的无数冲突中，在各个政党和阶级的斗争中，还涌现了许多可

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对于那些表现了顽强意志的英雄们，我们一视同仁，始终怀着深厚的敬意。我们把那些流血事件撇在一边，既赞扬1850年遭到政变当局镇压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也赞扬1848年6月牺牲的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

一百年来，那些走投无路的无产者们为了实现一个遥远的目标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对他们的感人品质特别予以重视，有谁会为此而埋怨我们呢？社会革命的完成不仅靠事物的必然发展，而且靠发挥人的力量，靠发挥精神和意志的力量。历史永远也不会不需要人们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和高尚纯洁的情操，今天这个战斗的阶级中所显现出来的个人的情操一定会反映在明天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标准中。因此，把一百年来热爱观念、视死如归的各个英勇不屈的战士发掘出来让人们去效法，这本身就是一项革命事业。有些革命者曾经读过普路塔克的《列传》^①，对于这一点，我们是不会讥笑他们的；当然，他们在读这本书时内心所焕发出来的满腔激情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形势的发展。但他们至少是岿然不动地屹立在暴风雨中，一阵阵的惊雷和闪电并没有使他们惊慌失措。如果他们因为渴慕英名而走上了热爱自由的道路或者在斗争中表现得英勇顽强，那么谁也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们。

因此，在这一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社会主义史中，我们不想对人类生活的实际状况作任何删改，我们将努力理解和阐明在各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的演变过程，思想对于全部真理的热烈要求和一些人

^① 普路塔克(Plutarque, 约46—约120)古希腊传记家，散文家。代表作有《列传》，共五十篇，其中希腊名人传和罗马名人传各二十三篇，彼此对称。——译者注

怕艰苦、藐视暴政、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怀。无产阶级只有完成经济发展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因此，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经济发展和人的意义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我写这部历史是受了马克思、米希勒和普路塔克的启发——把这三个代表不同流派的伟大人物放在一起，读者一下子肯定会感到困惑不解——，我要在这本书中把这一段历史时期每个革命活动家在思想上的细微差别和他们基本相同的学说观点以及共同的信念都反映出来。

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普路塔克、米希勒和马克思这三个伟大的人物，每个人都代表着一种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虽然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饶勒斯要把他们的不同特点都糅合到他的历史著作中去。结果做到没有呢？这个问题只有在对他这部书进行全面而公正的研究之后方可作出回答。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饶勒斯完全具备做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条件。首先，他天生具有识别真理的敏锐感觉。这是他的为人的最基本的方面。其次，他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也相当敏锐。他热爱工作，孜孜不倦。他能够全面地、系统地看问题，同时，对于细小的枝节也从不放过。没有任何问题能够难倒他，他什么问题都想研究一下，什么都想看一看，什么都想问个究竟。除此而外，他还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心胸无比开阔，判断是非铁面无私，而且知识极其渊博。你们看，他身上全部集中了做一个现代伟大历史学家所必需的高贵品质。

还有一个优点是饶勒斯所特有的，他的历史著作也因而有了特别高的价值。这就是他是一个泛神论的唯心主义者，这使他的眼界变得无比开阔。可以说，由于掌握了这种关于万物的统一性和渗透性的思想，他能够高瞻远瞩，把一切都一览无余，因而在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时候不可能做出任何目光短浅、心胸狭

隘、偏听偏信的事情。相反，他能够从事物的整个发展去分析每一个事件，能够全面地看待一个伟大人物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因为这些优缺点是处在时而尖锐、时而缓和的矛盾状态中的。因此泛神论的唯心主义浸透了饶勒斯的灵魂。人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一个具有各种互相矛盾的特性的混合体。人身上既有着超人的美德的萌芽，也残存着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令人发指的恶习。而且这些美德和恶习并不是相安无事，和睦相处的，相反，它们常常明争暗斗，闹得一塌糊涂。所以人是一直在不断变化的，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他不断地同自己作斗争。有的时候他吃了败仗，痛苦不堪，于是就衰落、就沉沦；有的时候，他又成了自身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于是就崛起，就复兴。饶勒斯对于人身上的这种斗争一直给予高度的重视，他密切地注视着革命英雄人物内心演出的一幕幕悲壮的戏剧。

饶勒斯由于亲身参加政治活动，对于政界和各个政党的内部情况具有深入的了解，因而拥有深入研究革命诗史的雄厚基础。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积极的政治活动更能使人了解历史。只有亲身参加历史的创造，才能深刻认识历史，才能看到其中的内情。大革命时期的人物距离我们今天并不太遥远，我们常常有同他们一样的想法和要求。在今日的巴黎经常参加社会党一个组织的生活，细心观察其活动情况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比读一些单调乏味的资料更能使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1793年某个革命组织的实际状况。饶勒斯作为一个社会党人对于本党的活动十分注意，它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因此，他能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准确地考证许多事情，而那些成天埋在故纸堆里，想从那里发现一些名堂的历史学家就难以办到了。

此外，饶勒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民主共和派，这也给他提供了很大方便。他的行动本身就是革命的继续。他自己就属于从大

革命开始的整个革命发展的一部分，因而本身就体现了这种革命的发展。所以饶勒斯在研究革命的时候，也就是在研究他自己。他同革命已经合为一体。他在自己身上找到了革命的踪迹。同时，他也在研究革命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他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他认为大革命的英雄或先烈们一定讲过的话。他可能为自己不能在身后参加这个世界性的革命发展，因而不能重复那些自己说过的话而感到十分痛苦，他可能为自己不能再为那些肩负伟大使命的人传播自己的思想而感到十分遗憾……

他对于马克思深为了解，在经济问题上造诣很深，因而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革命的物质力量。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没有一个人对革命的经济史进行过象饶勒斯那样深入的研究。他掌握许多当时的经济生活的情况。因此他对革命的了解非常扎实，如同日常生活一样具体。在他的眼中，革命已不再是一出看起来很热闹但没有多大意义的古典悲剧或者民间剧，而是一场为实现新的生存条件和所有制，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无情斗争。他所看到的，已不再是一些互相在那里明争暗斗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而是一些为了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要求得到一块土地的有血有肉的人。

饶勒斯用几年时间写完了他的革命史，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时刻。当时正是德雷福斯事件和为实现世俗化、民主制和社会改良进行斗争的时期（即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孔勃内阁时期）。如此繁重的工作，我们简直不知道他是凭着什么样的本事来完成的。

终身研究法国大革命而且其著作颇受好评的历史学家奥拉尔先生对此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们要把他的这个评价基本上全部在本书转载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一般说来，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对兼顾哲学的历史学家往往没有多大好感。下面就是奥拉尔先生

发表在他主编的杂志《法国大革命》上的一篇文章（1902年，第43卷）：

迄今为止，人们知道的饶勒斯是一个哲学家、演说家、辩论家。大家可能会担心他在初次涉及历史研究领域的时候，会不会显示出他在这一方面并不精通。然而事实却是他是一个道地的历史学家。他施展了他在历史学方面的全部才能，写了一部合乎真实情况的、具有科学根据和科学观点的著作。

我想先谈一谈他的取材。由于他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一个党员，一个战士，我要首先指出他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他的这种立场实在是无懈可击，没有一个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接近于这一点，而且即便差得远一点的也没有。他的这种立场没有任何矫柔造作的地方和勉强而为的感觉。这位情操高尚的人完全是自然而然地在那里对过去的历史进行观察和评价，不带任何偏见和好恶，而且即使是当他从过去的历史推导出他的全部政治理论时也是如此。这部社会主义史是一部不带附加语的，无比高超、无比纯净的历史。

这位态度公正的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或者基本上从来没有）被自己头脑中的想象牵着走。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人，他了解或体会到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没有采纳米希勒写法中的一些不好的方面，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根据假设来进行推测，以便把过去的历史和革命者再现出来，他没有采取某些人的作法，用一些真真假假的材料提出某个理论上的看法。他尽一切可能把他认为最真实、距今最近、最可信、最重要的文章搜集在一起，引用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不管这一部分是长还是短，而且尽可能让当时的人说话，即使是自己进行解释或归纳，也从来不对所引文章的思想妄加评断，而是让自己

呆在一边^①。他根本没有考虑文章的结构和数字的引用如何得当,相反,他把一大堆原始的统计数字同伊斯纳或维尔吉纳的华美文章放在一起。他对所引材料不做任何加工,但放的位置恰到好处,一目了然。

这部长篇巨著虽然态度公允,没有任何想象的东西,但通篇充满了激情,这正是历史学家饶勒斯的一大特点。他在介绍历史事件时也有自己的评价和激动的议论,他的论证令人信服,笔锋犀利,但所有那些评价、议论、论证和嘲讽简直可以说就是他所引用的事实和文章本身得出的结论,所以是那样自然,那样轻松,没有一丝一毫歪曲事实的地方。例如他喜欢评论党派之争,喜欢痛斥吉伦特派,赞美丹东,但他是在对他们作了极为巧妙的介绍之后才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而且他对他们的介绍绝对公正,对人物和事实从不抱有任何偏见。

奥拉尔对饶勒斯的这个评价同我们对他的看法完全一致。作为一个加入了政党的人,饶勒斯是有自己的好恶的,但他却能做到公平、正直、不偏不倚,这是因为对于真理的热爱在他身上压倒了一切,战胜了一切。

有些人才疏学浅或者心怀叵测,说饶勒斯的文章“华而不实”。我们还是来听一听这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是怎样说的吧:

我在前面说过,他根本没有考虑文章的文采。这一点在涉及基本内容,特别是涉及数字和事实的时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他在进行一般性评论的时候是否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呢?我随手翻开这部书,第1卷第770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农

^① 比如在叙述宣战的准备工作时,书中所引用的关于雅各宾俱乐部和立法议会对此问题进行的辩论,就是这样。——作者注

民注定要永远带着锁链，因为他们无法弄清楚锁链上的铁环哪一个开头，进而断定它是用什么金属做的，用什么样的铁锤打出来的。”我可以想象到有些喜欢卖弄学识的人一定会讥笑这个比喻不伦不类。这些人读书只是浮光掠影，深入不进去。如果他们认真读一读，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比喻正是非常贴切而又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不但不愿把农民全部解放出来，而且要他们相信他们身上的繁重负担是由一些具体的压迫措施和剥削措施造成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要炫耀自己，而是想说明作者就是这样写的。他就是通过一些比喻和统计数字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事实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人采用这种办法来精辟地分析法国社会的革命进程。

饶勒斯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已经可以对这个发展进程进行全面的概括。他说，我们至少可以“在大的方面提出一些明确的看法^①”。他的工作的出色之处也就在这里，他以大量的篇幅重新研究了封建制度的逐渐解体，并首先谈到了1792年末的工资增长情况。他在这两方面以及其它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有些是局部地解决了问题，有些是暂时提出了一些总的看法，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我觉得都是无比珍贵的。

现在我来谈谈这本书的取材。

这本书的取材相当丰富，材料的处理十分老练，有它的独到之处。作者完全认识到报章作为原始材料的重要性，利用了不少《巴黎革命报》，《巴黎每日新闻报》和马拉办的报纸上的文章。对于回忆录，他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当事人写的东西

① 《制宪议会》附录，第6页。——作者注

(如布佐和罗兰夫人的《回忆录》),他引用了大量的书信,特别是费尔申的书信。他在国家档案馆也找了一些东西。他还大量使用了《公报》上的材料。对于第二手材料,他用了一些地方志,比如已故的F·卢维埃尔写的加尔省志,和某些传记,如勒维—施奈德尔写的让蓬·圣—安德烈传和蒙吉埃写的罗伯尔·林黛传。他对我们这个研究会的出版物了如指掌,不过吉弗雷编写的《国民公会人名录》除外,他如果参阅这本书的话就不会把一些人名拼错^①。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他根据米希勒的一句不太明确的话发现了里昂社会主义者朗热写的一部重要著作(见第二卷,第329至348页)。他引用了许多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很有意义的文章。我对他发现材料的敏锐性和把材料组织成文章的绝妙技巧大为佩服。

奥拉尔认为《社会主义史》这个题目不科学。他写道:

我刚才已向读者指出这书本的重要价值,可是这本书也有缺陷,这就是题目不科学,使人感到是为论战而写,而且版面过于拥挤。

乍一看来,奥拉尔似乎很有道理。因为社会主义物理,社会主义几何确实是不存在的。所以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历史这样的题目呢?可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一下,就不得不承认饶勒斯是对的。历史涉及到国家、阶级和个人的根本利益。在国家、阶级和个人的手中,历史是用来捍卫其自身利益和生存,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和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武器。绝对客观,绝对公允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休谟就说过,几何定理如果能引起人们的利害冲突的话,那也会引起争论的。每个国家,每个政党,每个阶级,每个大历史学家都是

^① 比如他把Reubell写成Rewbell, Jeanbon写成Jean-Bon, Cloots写成Cloutz,等等。——原著注

按照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在认识上和思想上所达到的水平来解释历史的。

任何一本历史书都是不公正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世界观最好——这种看法当然是由我们自己的利益决定的。社会主义世界观所捍卫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同时在实践中和历史观点上把人类的事业同工人阶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况且工人阶级不同于其它阶级，他不享有专门的特权（如出身和财产），只是根据一条内容丰富、广泛适用的原则——人人都能工作——提出自己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的历史观是当代最能持公正态度的思想。当然，这种历史观并不妨碍历史学家去占有各类确实可靠的材料和采用最完备的科学方法。奥拉尔说饶勒斯的《社会主义史》在这一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这是很对的。

奥拉尔指出饶勒斯没有说明“他在研究和综合那些素材时有哪些明显的计划和构思”。大家看不出来他在国家档案馆查阅了哪些“种类”的资料。大家不知道作者在引用一些革命报刊的材料时为什么要厚此薄彼。他的书中所摘引的那些议会发言究竟出自何处？是《公报》还是《辩论报》？法律条文呢？饶勒斯是从《议会档案》找来的。奥拉尔善意地向饶勒斯指出，《议会档案》只有一次准确地转载过一篇法律文稿。有关“议会”的报导就更糟了。《议会档案》的那些作者常常张冠李戴，笑话百出。因此，在法律方面应该查阅议会会议记录，而在发言方面，应当查阅给这些发言出的专集，实在找不到的话，则应查阅《公报》、《辩论报》和《法兰西共和报》。奥拉尔还指出了其它的一些类似缺点。

饶勒斯同意圣西门派历史学家和卡尔·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大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舞台。他反对把这场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错误说法。

所有制问题没有在任何地方认真提出来过。无疑，手工

业者、工人和“相当于小工厂主的制毡工”确实参加了初级议会，如同他们在俱乐部参加候选人的选举一样。但他们没有任何理想可以提出来同被大革命解放出来、备受赞扬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分庭抗礼。他们只是希望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希望这个民主政权在发展过程中能保障一切权利，把各方面的主要力量都调动起来。

在各地举行的此类初级选举中，无产者似乎并没有起突出的作用。我们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个雇佣劳动者、工人或农民说过什么强有力的话。只有一个无产者被选进国民公会，我相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初级议会推荐到选举议会。选举议会几乎是清一色的资产者，主要是行政官员、法官、医生和外科大夫。自耕农也有不少，他们大都拥有田产，或是生活小康的佃农。

例如这儿有一份关于丰特内县夏太涅莱选举议会的代表所从事的职业统计表，其中有商人，县法官，检察长，省长，县秘书长，省刑事法院书记，法务官，治安法院法官，自己耕种土地的教士，地主，佃农，拥有田产的教士，国民自卫军指挥官，旋工，自耕农，治安法院书记，治安法院法官，外科大夫，镇长，木材商，公证人，种植主，面包师等等。

其他各县的情况也是如此。夏山在他那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中对旺代省作了详细的介绍。如果我们手头能有一份象旺代省那样详细的其它各省的名单，就一定会发现，除个别略有差异外，基本上是相同的。

大革命时期的行政官员在选举议会占了很多席位，法务资产阶级^①也通过这些官员——因为他们主要来自法务资产

^① 法务资产阶级，原文为 *la bourgeoisie légiste*。——译者注

阶级——占了许多席位。大家不要忘记，这些官员都是选举产生的，人民非常热烈地拥护他们；大家不要忘记语气强硬的布龙斯维克声明主要是针对他们而发，他们参加大革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人们没有让雇佣劳动者和无产者起突出的作用，并不是因为看不起他们，也不是因为思想守旧，不信任他们，而是因为在当时，他们的利益和大革命的利益完全一致，这样的话，为何不把革命的大权交给那些公开主张革命的人去掌管呢？

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有哪些特点呢？饶勒斯在经过一系列意义重大的调查研究之后答道：

普选制是新近建立的，几天前才第一次开始实行。无产阶级未能取得丝毫政权，它没有一个代表担任政府行政官员、省长、县长或镇长，而政治人材也不是马上就可以出现的。1792年革命的力量还依附着、而且仅仅是依附着资产者。

可是这些资产者可以说并不是那个明显地同无产者为敌的资产阶级。国民公会中有一部分商人，少数工厂主，此外还有两个铁工厂的老板。但总的说来，企业主是很少的。即使在卢昂那样工业发达的城市，虽然企业主参加竞选的劲头很大，而其它人对此大都并不十分热衷，但结果却是都莱那样的法学家当了有产资产阶级^①的候选人（不过后来还是落选了）。

工业相当发达的下塞纳省派到国民公会的是：迪埃普法官阿尔比特，前教士团成员、迪埃普市长波戈尔，卢昂医生阿尔迪，加尼法官伊格尔，科德拜克市长埃盖，卢昂治安法官总部书记杜瓦尔，纳夫夏太尔县长万桑，阿弗尔法官富尔，古尔

① 有产资产阶级，原文是la bourgeoisie possédante。——译者注

内县财务官勒非弗尔，卢昂治安法官柏卢戴，阿弗尔治安法官巴约尔，卢昂治安法官马利埃特，卢迪涅埃尔种植主杜柏来，伊夫多神父卢奥。

在毛纺工业十分发达的塔尔纳省，产业资产阶级^①力量很强大，他们劲头十足，以致过了几个月，也就是在5月31日之后便把全省拖入联邦运动中去了，波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那么塔尔纳省选派了哪些人呢？天主教牧师拉苏斯，炮兵军官拉孔勃·圣一米歇尔，省刑事法庭庭长梭罗米亚克，省行政官康马斯，加亚克县行政官马尔夫朱尔，卡斯特尔选举人多拜尔默尼尔，法官古里，罗舍居德（侯爵），省行政官梅耶。没有一个工厂主，没有一个商人。确实，天主教产业资产阶级对拉苏斯绝对信任，通过他与吉伦特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吉伦特省，十二名议员中有三名商人，他们是：杜科，鲍耶—丰弗莱尔和杜普朗吉。其它九名是行政官或律师。在商业欣欣向荣的罗纳河口省，却没有一个商人当上议员。

大丝绸商、阿维尼翁市长杜普拉所以当选是因为他在孔泰起的革命作用，而不是作为商人的代表。

在制铁工业和玻璃工业十分发达的默尔特省和默兹省，有些铁工厂的老板影响很大，手段毒辣，但他们当中却没有一个当选。

我曾根据罗兰的著作指出伊泽尔省的工业发展欣欣向荣，这种发展无疑对巴尔纳弗提出大革命的经济理论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那儿也没有一个企业主当选，当选的却是：维埃纳法官波德朗，格勒诺布尔法庭庭长热内瓦，公证人、治安

^① 产业资产阶级，原文是la bourgeoisie industrielle。——译者注

法官塞尔瓦亚,格勒诺布尔县行政专员阿马尔,格勒诺布尔市长普鲁奈尔·德利埃尔,省行政官波瓦西埃尔,格勒诺布尔法官热纳修。

以里昂、鲁阿纳和圣艾蒂安为中心的罗纳—卢瓦尔省,工业发展历史悠久,阵容十分强大,而且已经发生多起社会风潮,可见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而该省的席位也几乎全被行政官员、法官、医生这个法务资产阶级和“知识”资产阶级全部囊括。他们是:维尔弗朗什法官夏塞、蒙布里松法官杜普、里昂市长维特、蒙布里松市长杜布歇、瓦尔布瑞特治安法官贝罗、镇首席法官侯补、外科大夫普莱沙万、蒙塔圭市长默兰、蒙塔圭法官米歇、维尔弗朗什法官米歇、自然科学家巴特兰、鲁阿纳法官福莱斯特、蒙布里松县行政官查沃尼,还有朗特马。

工人阶级只有一名真正的代表参加国民公会。关于无产阶级唯一的这位代表,饶勒斯详细向我们描述了他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不消说,他是从发生过第一次真正无产阶级起义的工业城市——里昂地区来的。

商界的唯一代表是里昂的一名商人居塞,可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和手工业工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国民公会中能有一名工人参加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工人名叫庞特·加戴(诺埃尔),他是圣艾蒂安的一名武器制造工。不过必须承认,此人的表现很是一般,没有在革命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他在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问题上发表的意見,我只找到他的一篇写成文字的东西。这篇东西文笔虚浮,态度狂妄,十分蹩脚。一些工人作家和工人诗人常常喜欢摆弄这种玩意儿,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语言具有纯朴而高尚的美,所以不愿使用它。

“公民们,杀害法兰西民族的凶手究竟可不可以或者应不

应当受到判决，我不想以哲学的阳光来驱散人们在此问题上散布的诡辩的乌云。”文章开头这样写道。现在的时局是这样危急，庞特却还有闲情逸志，写了六行令人不堪卒读的歪诗：

啊！我亲爱的祖国，
要是凶残的暴君被人保护下来，
你又要受到他那残暴的统治。
我的意见如果不被采纳，
我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你，
为了你，我甘愿流尽最后一滴血。

假若庞特曾经请一位议员代笔，这位议员恐怕不会有那样大的兴致，把他的意见写成诗歌形式，而且从十八世纪在资产阶级中流行的诗韵和章法来看，他也不会第五行犯那个明显的语法错误。所以这首诗出自庞特本人的手笔，是确实无疑的。可见罗纳—卢瓦尔省派到国民公会的这个议员，是一个粗通文墨，笔下马马虎虎过得去的工人。他感到自己当选非同寻常，所以总在他的书面意见的上方写道：“圣艾蒂安武器制造工诺埃尔·庞特的意见”。而且每一次都要在意见书上暗示出自己的身份。第一次是这样写的：“我没有受过语言的训练，不会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第二次（1793年1月15日），他在意见书上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国民公会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说：“公民们，我们都是庞大的法兰西共和国的缔造者，可是我们竟然对于判决十恶不赦的暴君迟迟下不了决心，我们的后代一定会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你们在会议的第一天有勇气废除君主制，把国王赶下台，可是对于这样一个过去因为进行了那么多阴谋活动和罪恶勾当而被赶下台的独裁者，你们却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也不能做出判决。他们一定会很奇怪，这个恶贯满盈的暴君，全国人民一想到他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而你们却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为他进行辩护。他们一定会很奇怪，国民公会是由从各个等级中自由选举出来的人组成的，它拥有我们伟大的国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是我国铲除压迫势力和暴政势力最彻底的地方，可是它在判决有史以来最野蛮，最凶残的暴君的问题上却是如此迟疑不决，软弱无力。”这个意见的语气虽然有点夸张，但铿锵有力，开门见山。假如我们有机会参加对于国王的审判的话，我们倒是很愿意再听一听工人的这种铿锵有力的发言。但我现在要讲的是庞特对于国民公会的看法。国民公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包含了各个等级的代表。这个工人议员并没有去考虑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否都按照真正的比例向国民公会选派了自己的代表。但选民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把一个或几个工人选进国民公会，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议会有各个等级的代表参加：古代的议院是把奴隶排除在外的，蛮族国家的议会所依靠的只是自由人，而英国的议会则是只有乡村中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寡头才有权进入。

是的，一个地位卑下、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一个奴隶的后裔，自古以来第一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个现代工厂的工人能审判国王，指责优柔寡断、意见不一的资产阶级在处决国王的问题上迟疑不决，一个成天同铁锤和剪刀打交道的工人能同全国人民一起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制定法律，这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一场革命。诺埃尔·庞特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应当感谢他。随后他再次强调自己来自人民，说道：

“路易的辩护士们的最后一招就是向人民发出呼吁。我

是根本不会滥用我的权力的，否则那是有意糟蹋自己的权利，因为我是真正的人民一分子。”

显然，这个制造武器的工人在这里给“人民”这个词下的定义比他在政治语汇中所使用的含义要更加深刻、更加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他想到的是他刚刚离开的工厂和他的那些心地善良、为人质朴的伙伴们。所以他接着写道：

“至于我本人，我对公众给予我的信赖看得比荣华富贵重要得多。有些胆小的议员可能会那样做，因而遭到人们的羞辱和唾弃，我不会跟着他们走。我从家乡来的时候一身清白，我希望回去的时候仍旧如此。”显然，他心中想的是他的朋友和同事们，也就是圣艾蒂安的冶金工人们可能会怎样指责他。因此他说：“无论如何我要规规矩矩，坚定地走我的路，向大家证明一个工人是不会背叛革命的。”诚然，他没有把工人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因为阶级的政治在他的头脑中尚未形成。但是他斩钉截铁地向议员们宣布，如果他们继续拖拖拉拉，不采取果断行动的话，他就退出国民公会。从这种严肃的表态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支新的、意识到自身特点的明显不同的力量已经形成。从庞特的这些发言中，我似乎听到了决定他为国民公会的代表时，圣艾蒂安、里昂和鲁阿纳的工人们在工厂里互相交谈的那些热情、豪放的话语。当然，这只是一棵嫩弱的幼芽，但是它预示着，如果普选制和共和自由能够保持下来，如果民主制这种形式不遭到破坏的话，工人阶级可能会取得的发展。

饶勒斯指出“一支新的、意识到自身特点的明显不同的力量”已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工人阶级第一次在法国议会中发表了自由、独立的讲话，态度虽然有点拘谨，羞怯，但这只是“一棵嫩弱的幼芽”。指出这棵幼芽的存在，正是历史学家最起码的责任。然而

只是在社会主义的史学出现之后，才有可能把这种阶级的事实揭示出来。这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史学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关心工人阶级在这一点上并不矛盾，这是同奥拉尔这样的历史学家真心诚意的想法不同的。

但是，人们对资产阶级已经谈了那么多，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呢？

饶勒斯反对袭用现存的提法，他努力把这个词的概念加以深化和扩大。他写道：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资产阶级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资产阶级不仅是一个成分极其复杂的阶级而且是一个变化不定的阶级。国民公会时代的革命资产阶级和路易·菲力蒲时代的以金钱谋取权位的资产阶级无疑在思想上和利益上有许多共同点。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国民公会时代的那些身为法官的资产者同路易·菲力蒲时代的资本资产者一样起劲。可是前者所怀抱的理想以及他们身上的灵魂是不同于后者的。作为大革命的捍卫者，他们所要确立的是资产阶级的形象，而不是给资产阶级的个人利己主义以一定的约束。私人占有制是随着罗马法的执行，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出现的，他们对这种所有制根本不愿触动。为了大革命的利益和建立新的社会，他们当时完全可以让有产者多付出一点牺牲并克制其贪得无厌的要求和个人利己主义的欲望，在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给在大革命中建立丰功伟绩的人民以一定的报偿。可是他们保护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自己还要卖力。而大革命之所以只让为数很少的商人进入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不仅是因为商人和工厂主忙得分不开身（他们那时做生意并不象今天这样，由设在巴黎的有限

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统一经营),也不仅是因为那些商人和工厂主没有法官那样的口才(这在民主国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因为大革命本能地不愿意让它的这项伟大事业打上的阶级烙印即过于狭小,因为大革命的爆发不仅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整个思想运动发展的结果,它希望全国人民的意愿和人们相互关系的广泛谅解能在法律上体现出来。因此,立法议会在8月10日之后轻而易举就宣布实行普选制,可是这件事如果让受工厂等级观念严重束缚的产业资产者、资本家和工厂主组成的议会来做,那就不那么容易了。正象工人庞特所说,国民公会的这些捍卫者们身上所肩负的是全国各个等级,是整个民主制度,而这位来自圣艾蒂安的工人作为当时法国革命情绪最为高涨、最有觉悟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代表,他向国民公会的这些资产阶级捍卫者讲话时,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另一个阶级的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在胜利面前有点不知所措,畏首畏尾的合伙者,同时他们也正需要这样一支说话毫不隐晦的生力军促进一下,消除他们思想上的过多顾虑。

因此,大革命标志着两种力量的增长——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人类整个的思想运动。这就对促使革命爆发的基本因素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妨碍饶勒斯全面地去观察历史事实。因为马克思作为一位革新的经济学家,虽然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来研究“经济因素”,但他并没有否认思想和精神的作用。

在1792年那个最危急的时刻,受到革命形势波及的并不只是一个阶级:全国的人民都动了起来。

人们焦急期待的有关前线的消息要越过重重障碍方可传到人们的耳中。隆维失守了吗?凡尔登能守得住吗?呵!整

个法国好象成了一个火热的熔炉，国民公会成了作战参谋部。选举活动常常不得不中途停下来，因为爱国主义者捐献的物品如潮水一般涌来，在这些物品中，有夹着纸币的信件，有漂亮的农村姑娘和富有的资产阶级小姐寄来的首饰和手镯。大家都希望以此为自由事业略尽绵薄。当男人们在选举议会或俱乐部开会的时候，女人们也聚集在教堂里，但她们来到这里并不是进行祈祷——或者说，祈祷只占很短的时间——而是赶制军装、帐篷和绷带之类的军需物品。巴黎的报纸每天登载的新闻是：各个教堂都挤满了爱国的妇女，用公社的话来说，她们要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服务。勒巴父子的信札对此描写得最为详细：在法国北部的加来海峡省，妇女们晚上提着小油灯来到教堂，把油灯挂在炉壁上，为受伤的士兵纺纱织线，缝制衣服。她们常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侧耳倾听来自前线的隐隐约约的炮声：敌人的大炮已经到达里尔城下了吗？有时候一个男人——镇子上或村子里的一位革命者——走进来向她们讲几句话，叫她们面对严重的局势，要始终如一，坚强不屈，以保卫我们伟大的母亲——自由的祖国。

有时候，来者只是站在教堂的门坎上随便讲几句，因为那儿的灯光比较明亮，可是在妇女们的请求下，他们也常常登上圣坛。这些妇女几乎全都是基督教徒，但她们并不认为这样做对神明会有任何渎犯或不敬之意。她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基督教怀有一片虔诚的感情。今天，她们的心灵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但这种感情依然如故，现在这种感情在她们的心中同捍卫祖国的自由和未来的崇高热诚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了，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强烈。如果有哪一个神父敢于反对自由的事业，他绝不会有好的下场。如果旧的宗教试图扼杀人们对于自由事业的这种新的信仰，那就让它见鬼去吧，

那就让这些妇女们在教堂里工作时所使用的灯光去代替原来那盏神秘的灯光吧，因为她们的崇高的劳动是为了那些为自由和权利而战的人们。

因此，新的思想正在大量涌现出来，突然爆发的反抗精神越来越强烈，过去这些逆来顺受的人们如今昂起头来了，他们摆脱了那种默默无言的忍受状态，这突如其来的反抗声浪简直把古老教堂的低矮屋顶冲垮了。男人们有的在前方战斗，有的在市政厅投票选举，总之都在坚持战斗，妇女们在教堂里从事着比祈祷更为热烈的工作，激动人心的国民公会便是在这种举国上下同心协力的气氛中诞生的。

饶勒斯把今天同未来、过去同今天的关系，从各个方面展现了出来，从而确立了历史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在教堂里虔诚地祈祷的妇女同时对于自由和幸福也怀抱着热烈的希望。在这些天主教徒的心中，旧的宗教信仰已经同争取人类解放的这种新的信仰融合在一起。所以“人们摆脱了那种默默无言的忍受状态，这突如其来的反抗声浪简直把古老教堂的低矮屋顶冲垮了”。

历史所从事的不是破坏，而是用新的东西来取代和更新。饶勒斯的唯心主义的泛神论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都把历史的延续性这条规律揭示了出来。这条规律同时也总结了实验科学广泛发展的理论。谁要是顽固地否认事物的这种永恒的相互关系，那就是有意不承认铁一般的事实。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是大革命中出现的一场主要内部斗争。饶勒斯对这场斗争的看法最能说明他那公平正直、胸怀宽阔的为人。

许多人都认为饶勒斯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确实，他在写《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一书的时候，正在同马克思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的“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展开激烈的斗争。人们一定

以为他可能会从大革命的历史中找一点子弹来对付这些整天唱着革命高调的人。如果这样去看饶勒斯，那就是完全不了解他的为人。对于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斗争，“这个社会主义的吉伦特派”——人们对于他的这一点了解很少——是坚决反对吉伦特派的。他在这部历史著作中经常批评吉伦特派，有关部分读来令人不忍释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于大革命的总的看法和他是怎样写这部革命史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多介绍一点这方面的情况。

随着吉伦特派独霸天下的欲望越来越暴露无遗，连选举他们的人心中也产生了一种困惑不解的不安心情。可是吉伦特派得意忘形，刚愎自用，他们把不赞成他们的做法的罗伯斯比尔和巴黎视为仇敌，确信自己轻而易举便可以让巴黎以外的各省都跟着他们走，因而拟定了一个同对方决一死战的计划。如果他们胸怀宽广一点，度量大一点，不把马拉的少数带刺的、不起多大作用的讲话看得过于严重而去有意扩大事态，如果他们团结在丹东的周围，坚定地、一心一意地努力拯救祖国，建立自由的事业，巴黎很快就会放弃他们的成见，法国各个革命力量也早就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永世不衰的共和国了。可是他们要独占第一把交椅，谁要是对此稍有拂逆，那就是触犯天颜。他们要在大革命的顶峰成为一枝不容同类的独放的鲜花。

他们很快就把自己的计划拟定出来，妄图利用九月流血事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公社和罗伯斯比尔身上。他们到处蛊惑人心，制造恐怖，公开散布只要公社存在一天，人们就别想恢复自由的和平生活，说什么那些无法无天的人在对人身进行迫害之后紧接着就会去抢劫财产，因此必须把为公社效劳的这帮乌合之众消灭干净。

饶勒斯批评吉伦特派目光短浅，头脑发昏，刚愎自用。大革命的温和派在反对山岳派的时候所采用的暴力手段往往并不亚于山岳派。今天人们称之为“机会主义者”的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暴力是力量薄弱、鼠目寸光的人最喜欢采用的一种办法。吉伦特派便是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大革命的策源地和心脏——巴黎——的。

更有甚者，有一个时期，巴尔巴鲁控制的那一帮法国革命力量都集中到科西嘉省和旺代省去了。吉伦特派轻率地离开了大革命的摇篮和祖国的心脏——革命热情一直高涨的巴黎——逃到法国最南端毫无生气的的不毛之地去了。科西嘉省是法国最不出名的一个省份，不久之前才并入法国版图。旺代省的分裂思想和反叛思想也相当严重，吉伦特派竟想凭借这两个省的力量来拯救处于危难中的祖国。这种做法不但叫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因为他们如此轻率地便决定离开巴黎，结果只会削弱巴黎的防御能力。祖国的山河已经支离破碎，放弃巴黎而想保存那些残存的地方，这只会加速法国的灭亡。当然，如果我们根据他们这种离奇的私逃来指责吉伦特派犯了严重的叛国罪，那是非常不恰当的，但他们那些异想天开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吉伦特派是挽救不了大革命的祖国的。他们对祖国似乎怀有二心，正当需要把各种力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却在流向不定的卢瓦尔河和奔腾湍急的罗纳河上随波逐流，飘流到远方去了。不知道地方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那样留恋，如此丧魂落魄，以致看不到伟大的祖国正在遭到严重的威胁。

巴尔巴鲁同孟德斯鸠将军举行谈判并取得他的支持后，便不可一世地把自己看作是南方抵抗外敌的中心，是罗纳河

岸的南国英雄，可以拯救失去自由的塞纳河岸的人民。

吉伦特派看问题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他们为了地方上的局部利益而牺牲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伟大的革命的法国就是南方那么一小块天地。

如果说吉伦特派分裂国家的阴谋早已有之，那是胡说八道。事实上，他们只是在巴黎这个心脏地带的自由事业遭到失败之后才在南方建立起那个共和国的。可是谁会忘记，就在这个时候，马赛的义勇军正日夜兼程奔向巴黎，为保卫国家而投入争取自由的战斗？谁会忘记，对吉伦特派的那些幼稚可笑的计划本来就不太热衷的塞尔文，当上国防部长之后便只有一个想法了：在巴黎坚壁清野，取消一切会使首都暴露目标的冒险计划？然而，当吉伦特派一心想着他们那个小小天地的时候，他们的心中确实有一种分裂、瓦解革命力量，促使法国失败的不可告人的打算。罗兰之流所关心的就是南方那块小天地，好象那就是法国最终的版图。正象罗兰自己不慌不忙，以一种令人瞠目的语气所说的，他们要“划一条南北分界线”，希望在这块小天地里永远实现——而不是十天半月——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因此，他们对祖国的心脏莲藕断丝连的感情都没有了。我曾想知道在他们那些计划中，有没有回过头来进行凯旋式的北伐，重新夺取巴黎的计划，但没有找到。他们似乎已被南方灿烂的阳光所陶醉，沉湎在一种心满意足的自豪感中。这些人心中所结下的仇恨非自今日始。他们这些想法不仅是在比较随便的私下闲聊中透露出来的，而且也是在隆维和凡尔登失陷之后的严峻日子里，在内阁会议上说出来的。丹东后来实在被吉伦特派对他的刻骨仇恨逼得忍无可忍，只好在国民公会毫不客气地把这件事端了出来：“一个人说话既然应当襟怀坦白，那么我现在提醒诸位，我们

之间互相信任的空气有一个时期简直糟透了，以致没有人再愿意当部长，罗兰本人就想离开巴黎。”

罗兰夫人把这件事说得轻描淡写，但她也不能否认确有其事。她说：“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考虑到普鲁士人日益逼近巴黎，有人提出应当怎样做为好，是否需要把同全帝国有关的国家机构先行撤出，不过只是泛泛而谈，只是提出了一种设想，而且本来还可以谈得更深一点。根本不存在一位部长威胁其它部长的意思。丹东在事后杜撰出这条罪状来，一方面是为了攻击我丈夫，另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捞取资本。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因为内阁那次会议是在我家开的，散会后，有人向我丈夫谈起，我在一旁听到了。”

这种关于撤退的言论一开，不管它是多么谨慎，多么吞吞吐吐，后果是很坏的，它使得人心更加惶惶不安了。这些话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出来的，因为隆维和凡尔登虽已失陷，但守卫麦茨的克勒曼和守卫塞当的杜摩里埃在九月上旬并未遭受任何挫折，而且征招义勇军的工作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吉伦特派的撤退计划和甘必大离开巴黎到外省去组织抵抗毫无关系。国防政府并未离开巴黎，它还留在那儿，并受到敌人的包围。甘必大在卢瓦尔河流域组织军队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保卫南方，而是向巴黎进发，解巴黎之围。可是奇怪的是，对九月流血事件竭尽歪曲，挖空心思要借此搞臭丹东的吉伦特派似乎并未想到，把国民公会撤出巴黎会使各种各样的人在惶惶不安的首都掀起一股复仇狂和恐吓狂。被革命抛弃而失去希望的巴黎，大街上一定会血流成河，九月流血事件同它比起来那将是小巫见大巫。

饶勒斯还利用一切机会指出吉伦特派的折衷主义立场令人发指。他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在审判国王时所玩弄的花招。下面这段

文字对当时政界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这种文章也只有饶勒斯这样一个亲身参加政治斗争、对政治斗争的内幕深为了解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布佐妄图从侧面展开活动，以便分散人们的注意。他当即要求把奥尔良公爵逐出国外。他说，废黜国王现在既已确实无疑，那就应该确保君主制能够永远废除。可是不管是把路易十六处死还是把它排除在政权之外，奥尔良公爵一定会——不管他是怎样想的——成为一个有可能登上王位的人。他是波旁家族的后裔，同时很善于笼络人心。他可能会因为民众的拥护和君主制依然享有的很高威望而被人们扶上王位，难道这种危险不是严重地存在吗？我不知道布佐的担心是否出自真心，反正我是不相信的。无疑，奥尔良公爵自从大革命开始以来确实扮演了十分可疑的角色。大家都认为在导致10月5日和6日事件的那场骚乱中，有证据表明他是用金钱直接参与其事的。那时的法国，共和党人还没有开始活动，如果推翻路易十六，这位革命的公爵当然想由自己取而代之，而不会有其它的目的。宣布建立共和制以后，他在议会中一直同极左派在一起活动。他为马拉创办刊物提供了一笔罗兰所不愿提供的经费。布佐可能认为这是善于收买人心的王公们的一贯伎俩，他们为了稳步取得政权，极力想博取革命上层领导人的欢心，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夏尔特公爵在军队里同杜摩里埃呆在一起。他们让他在热马普建立了出色的功勋，全家因而沾到了一点革命的荣光。

布佐和他的朋友们可能认为，在山岳派那些不太好打交道的民主主义者眼中奥尔良公爵是一个备用的人物。如果共和制不适合法国的社会，如果人们要求实行原来的君主制，奥尔良公爵将成为大革命所选中的国王。为了对付路易十六的

弟兄,为了使自己在同他们的斗争中有一个立足点,他将不得不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保存大革命的主要成果。此外,他将以高额的薪俸和丰厚的津贴来收买雅各宾派的那些穷汉,让他们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对他搞的那些阴谋了如指掌,如果说出来就会使他在世界舆论面前彻底完蛋。以上可能是布佐假惺惺地说出自己的忧虑的时候,心中所想到的理由。后来的历史也正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许多识时务的声名显赫的革命者都拜倒在波拿巴的脚下了,而且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就是通过革命这条曲折的道路建立起波旁王朝的。因此不能说布佐的这些忧虑全无道理。可是在1793年初,共和制还刚刚建立,人们正沉浸在胜利后的喜悦和满怀希望的时刻,全国军民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国民公会的民主主义者在这个时候会去钻营个人的私利,大革命的事业会很快因为人们的意志衰退和贪图享乐而全部断送,这种看法很难叫人信服。布佐也并不真的认为罗伯斯比尔、丹东和圣-茹斯特会出卖共和制,用路易十六的血去为那个道德败坏、胆小如鼠、遭到世人鄙弃的奥尔良公爵祝福。他之所以要那样说,主要是一种计谋。这种计谋十分恶毒,无耻透顶,一度曾使山岳派非常难堪,愤怒不已。因为,如果否决布佐的提案,他们就会遭到人们的诽谤,说他们想通过这个波旁家族的后裔实现复辟君主制的希望,而如果把奥尔良公爵任从吉伦特派去处置,那就等于宣布路易十六并不是共和制的唯一危险,甚至可能还不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如果人们不细加留意的话,那就是承认把路易十六处死是共和制设下的一个圈套。同时,关于奥尔良公爵的提案是吉伦特派提出来的,所以这也就是告诉大家真正爱护共和自由的是吉伦特派,只有他们才是高度警惕地捍卫共和自由的。因此,这个大阴谋具有无法形容的欺骗性,完全是为

着诋毁山岳派，以便把他们搞得身败名裂。处死路易十六本来是正当的革命需要，吉伦特派这一手则要把这种必要性全部抹煞掉。因为处死路易十六既然并不能使全国最终摆脱君主制，那么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死路易十六如果不能使法国一劳永逸地实行共和制，那么这只能是一个毫无价值、极不光彩的无耻行动。因此，当布佐指出路易十六肯定就要受刑的那个绞刑架掩盖着君主制复辟的危险时，当他向人民指出阴森可怖的绞刑架下存在着君主制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时，当他诬蔑迫切要求处死路易十六的那些最积极的革命者在策划反革命阴谋时，当他告诉人们处死国王——人民是一致要求处死他的——不能排除一个混身沾满国王血迹的人有可能登上王位复辟君主制时，他就把处死路易十六的革命意义全部抹杀了，他就在这一革命行动中加进了一滴置人于死地的毒汁，对这一革命行动提出了最荒谬的怀疑，而大革命的精神却正是要通过这一革命行动而永远地、势不可当地确立起来。

这是明目张胆地玷污革命的智慧。如果布佐这时心里没有鬼的话，他就应当设法使国王免于一死，向全国人民说清楚把国王处死很可能导致君主制的复辟。但他对处死国王不置一辞，同时又悄悄地在人民中间散布这样做如何危害共和制的言论，从而指责即将进行的革命行动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处死路易十六的同时也会把共和制绞杀掉。

山岳派起初没有觉察布佐所玩弄的花招，所以赞成把奥尔良公爵逐出国外。可是到了第二天他们就后悔起来，明白自己中了吉伦特派给他们设的圈套。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对吉伦特派进行了愤怒的斥责，同时声明决不能让人家看出来他们同奥尔良公爵有什么瓜葛。然而马拉却大声表示，不应当理睬吉伦特派搞的这种转移视线的奸计。他的讲

话博得了热烈的欢呼。不久之后，由于杜摩里埃叛变，从而十分清楚地显示出确实有人想把奥尔良家族的人扶上王位，复辟君主制，雅各宾派才由于罗伯斯比尔的高瞻远瞩而立于不败之地。1792年12月，马拉直言不讳地大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不应当上他们的当，不应当让来自侧翼的阴谋活动模糊我们对即将进行的伟大革命行动的认识。”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大革命的要求。这样，针对奥尔良公爵而采取的措施便撤销了。在战胜了一系列阴谋诡计，解决了一系列争论之后，结束君主制的绞刑架终于显示出了它的轮廓，虽然这个轮廓还有点模糊不清。

吉伦特派不仅在重大问题上施展阴谋诡计，而且不放过一切机会反对那些最积极的革命者。可诅咒的九月事件就曾被他们用来疯狂攻击山岳派。

布佐写道，必须承认，错误首先在于当时的记者，特别是立法议会的议员，因为他们没有把议会的情况和巴黎市的情况告诉他们各自所属的省。他们当中胆量最大的人也只是做了一点和稀泥的工作，原谅人们的越轨行动，掩盖他们的过火行为和其它罪行。如果他们把事情真相告诉我们，告诉各省的选举议会，法国就得救了，自由、和平、幸福都能得到保障。各省选举议会只要通过一项决议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只需把议员们请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开会，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及其同党就进不了全国的国民公会。大家没有想到这一点，国民公会在巴黎举行，于是一切都完了。

这个傲慢无比、色厉内荏、尖酸刻薄的家伙发表的这一通言论真是十足的奇谈怪论！他这样说，主要是埋怨各省选举议会没有发出反对巴黎的信号。他忘了，当时人们正需要对付外国入侵者，不能向巴黎宣战，否则整个革命事业就会付诸东

流。如果要全国人民必须在布里索和罗伯斯比尔，或罗兰和丹东之间进行决择，那全国会惊愕成什么样子？乱成什么样子？可见布佐的小集团宗派思想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不过，吉伦特派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决心在竞选活动中利用九月事件，这是大革命和法国的万幸。什么！革命的人们当时所需要的是高度的宁静气氛和团结一致、奋勇向前的精神，难道在这个时候可以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分裂成两派吗？九月事件究竟应当由哪些政党和个人负责，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弄清的谜，难道在这个时候应当让人们去纠缠这个问题，而不去考虑重大而又明确的问题——共和制和自由吗！

这件事同前面的问题一样，如果照布佐的意思去做，将同样是犯罪。当布佐的吉伦特派宗派思想和地方观念大为发作的时候，他走得那样远，公然反对巴黎做首都，对国民公会在巴黎开会表示遗憾，并且发表了一条庸俗不堪的意见坚持这种看法：

“如果人们在选举当中得知巴黎市内的真实情况，法国就得救了。国民公会肯定不会在那儿举行。”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国民公会如果在巴黎以外的地方举行，就可能把丹东、罗伯斯比尔、马拉等巴黎的代表拒于大门之外，让他们去杀人放火，去胡作非为，或是去实行独裁统治。让巴黎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在政治上彻底消亡，这正是布佐在选举活动中未能实现的痴心妄想。不过，他这些话并不是一个失败者的绝望的悲鸣，也不是一个流放的犯人梦想卷土重来的复仇的呐喊。1792年9月24日，他一回到国民公会，便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对选举活动表示了类似的遗憾。他说：“我虽然是巴黎革命的局外人，但我还是来了，因为我深信我可以继续在这里保持我的独立地位，

我给自己规定的道路我是走定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转而他顾。现在国外流传的一些消息和关于流血事件的一些说法，我听了十分气愤。如果这些流血事件的真实情况传到我们那些省去，立法议员先生们，这些省的选举议会可能会建议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开会。”

好一个巴黎的革命！真是妙不可言。好象那些革命都是巴黎自己的事，好象7月14日和8月10日只是巴黎的事件！但布佐所表示的这些遗憾和他对他的朋友和记者——布里索、加弗拉、孔多塞——以及对维尔利昂和十二人委员会等议员的指责，说明吉伦特派领导人并没有把九月事件同选举活动搅和在一起。因此，革命者的激情并未受到挫伤，革命党内部的团结也未受到损害，仍可以同8月10日革命的形形色色的敌人，同保皇党和温和派进行斗争。

布佐本人虽然大体了解事件的经过，但他没有把这些事宣扬出去。他不敢破坏大家在思想上的团结一致，而当此国民公会诞生的关键时刻，拯救祖国的自由事业的正是这种精诚团结的精神。

但是，吉伦特派在选举时期对于革命内部开始出现的尖锐斗争也不是压根儿不敢提及。

他们要求各省的选民警惕“强盗们”，也就是罗伯斯比尔的朋友和公社特派员的谰言。他们肆无忌惮地把各省同巴黎对立起来。可是我要再说一遍，关于革命内部出现分裂的流言并未在各省引起强烈的反应。在前方告急的危险局势下，选民们摆脱了个人的偏见，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在国内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以及怎样同外国的暴君进行斗争。他们听到革命内部出现争吵时只是表现出了一点惊讶而已。在革命热情高涨、警惕性很高、一向对情况颇为了解的马赛和南方

普罗旺斯省,革命人民对巴黎出现的严重分歧竟然毫无所知。巴尔巴鲁留下来的关于罗纳河口省选举时期的描述,通篇文字是那样充满激情,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赛及其周围的小城市——它们与马赛是呼吸与共的——的革命人民当时的一大特点:革命的热情和诚实的品德非常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大家不要忘记,巴尔巴鲁是一个狂热的吉伦特派,他的下面这一段文字是在流放期间写的。大家不要忘记,他刚刚当上国民公会的议员就因为有计划地从事反对罗伯斯比尔的活动而失去了许多曾经投他一票的选民的支持。当然,他也可能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而故意把马赛正在出现的极端民主运动渲染成具有强烈的马拉派色彩。但我想强调的是,当时马赛的革命热情无比高涨,分裂活动根本插不进去。在这些南方的民主主义者看来,罗伯斯比尔和吉伦特派发生争吵还是一件不太可信的新闻,所以他们竟然天真无邪地跑去向巴尔巴鲁了解事情的真相。而巴尔巴鲁在流放期间,即使头上笼罩着死神的阴影,也似乎仍旧沉湎于那些热烈场景的回忆中,为那火热的生活而激动不已。为人阴郁、狡诈的布佐就从来没有流露过这种感情。当巴尔巴鲁在8月10日之后从马赛回去为吉伦特派组织竞选时,马赛的所有民主主义者似乎都认为他是革命的象征,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共和制的希望。

一个真正的温和派,就是说一个思想委琐、不敢考虑重大革命问题、不敢采取重大革命决断的人,是永远不可能对眼光狭窄的温和主义进行这种批评的。

确实,作为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和革新者,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思想家和坚定的实干家,饶勒斯是一个具有真正革命思想的人。他勇于接受一切新的思想,敢于采取一切重大的决定。他从来不愿意把革命和暴力等同起来。他坚定不移地极力反对暴力,这不仅

是因为他为人正直、善良、雍容大度，而且是由他的世界观决定的。因为他认为暴力会中断历史的连续性及其正常的，按照一定规律的发展，会破坏历史的法则以及事物和生活发展的规律。暴力是一种故障，它标志着事物不能正常地、平静地发展而采取突然爆发形式的根本弱点。暴力不仅是对生活的蔑视，而且也是一种无能为力表现，不能巧妙地掺和到历史现象中去，平稳地向前发展。暴力象一个精神病患者和性格暴戾的人一样，一旦发作起来便失去分辨力和节制力，毫无能力对自己加以约束和控制。

不幸的是，生活并不是一首悦耳动听的交响乐。它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驾驭得了的。它甚至很少考虑或者根本不考虑我们的要求。一些原始性的力量积聚到一定的程度，一有机会就会爆发。由于历史就是一部敌对社会势力的斗争史，所以历史的发展常常出现时而动荡、时而明显中断和时而出现剧变的现象。

不过这种剧变性并不排除历史是正常地、按照一定的规律、一定的步调、很有节奏地向前运动的。这种发展到了自然的终点便产生了革命。

每当人们想用“革命的”策略取代这种正常的发展，而发展的终点也横亘在那里不让人们强行取代的时候，饶勒斯是坚决反对这种“革命的”策略的。不过，他在这场斗争中往往做过了头，因而造成很坏的后果，因为他让一些向终点发展的力量来反对终点，也就是说以发展来反对革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重新加以探讨。

饶勒斯憎恶一切宗派活动。他毫不留情地既反对吉伦特派也反对艾贝尔派。每当革命局限在某一派的小天地里而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饶勒斯就无情地指出来加以抨击。他要给大革命提供空气和空间，因为大革命标志着生活的欣欣向荣，而不是走向衰落。

饶勒斯以独具匠心的笔法把那些伟大的革命家描绘得维妙维

肖。

下面就是他对罗伯斯比尔的生动描述：

罗伯斯比尔曾经直言不讳地表明，除了自由的人类之外，他不信仰任何上帝。但他在谈到“玛丽亚的儿子”时，仍旧带着一种神秘的敬意。他不想一下子就把罩在上帝身上的纱幕撕碎，因为人民还在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心中所怀抱的最崇高的希望和最高尚的美德寄托在对上帝的崇拜上。他一定希望人民不久之后能够自己发现这种谬误，摆脱自己在信仰上的这种残存的迷信和错误，但又不损害对于正义的理解和对于不朽——正义的核心——所怀抱的希望。

这个萨瓦的代理牧师在成为符合新教会法的神父之后，有一天来到本村的教堂，教堂里聚集着政治上获得自由的天主教徒，他在领圣体之后，从教堂的祭坛上对他们说道：

“朋友们，你们的信仰洁白无瑕，远远超过哲学家们的吹毛求疵，我对此一直深表敬意。不过，我已经发现，在长期享有自由和运用理性之后，你们头脑中的污秽已经消除得相当干净，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缠绕的有关象征性问题的主要情况弄清楚了。不，关于上帝以面包和酒这种物质形式出现的说法是站不住的；说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富有宽容和牺牲精神的无可比拟的楷模而存在于你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倒比说上帝藏在那一点面包和酒里更为实在、可靠。罩在这些象征性东西上的纱幕应该取下来了。人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用不着在心灵上再保存这些象征性的东西。此外，关于上帝能在人身上以物质形式出现的说法也是站不住的，这一点你们自己也意识到了。上帝既没有藏在面包和酒里，也没有以物质形式藏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万世永存的上帝使人所具有的那种神圣性在基督的身上及其一生中表现得那样突

出，所以我们大家都把基督遵为神而使之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这里也是一样，用不着使用象征性的东西。不必要用一些感人的、但不很全面的形象来表示万世永存的上帝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在享有自由、酷爱正义的人民的中心，上帝已经得到最完美的表现。基督的光辉不过是一缕黎明的曙光，它预示着神圣的自由之光即将来临。我们现在已无需乎面向东方，而是应该准备迎接自由人类的光辉灿烂的时代。你们没有弄错，我们也没有弄错。你们以象征性的东西来表达你们对真理的向往，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并没有使你们迷失方向，因为它们使你们为接受完全的真理做好了准备。有些人对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大肆嘲讽，有些人则凭着自己的理性推断所产生的模糊预感，凭着内心所萌发的一种比较明智的欲望，在忽明忽暗的道路上不避艰辛，最后终于迎来了明媚的光明，所以前一种人距离正确的道路，比后一种人更为遥远。不，我们身上没有任何污垢需要洗刷，我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后悔的。我们现在所崇尚的仍旧是那个真理，不过我们终于不需要隔着一层纱幕去崇拜了。这是我们在长期中怀抱的虔诚信念所得到的报答，是自由事业的最伟大的胜利。”

以上是罗伯斯比尔在教会法颁布后对于教会的期望，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他在思想上还没有明确的看法。他可能希望人民从信奉天主教改为信仰理性，而不要有丝毫为难的情绪和屈辱的感觉。他常常为某项财政提案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行这种重大而稳步的转变感到十分恼火。有人试图通过经济政策，通过减少税收的办法来使人民摆脱宗教信仰，他们似乎想为人们广泛地放弃宗教信仰规定一个奖励税率，理由是单靠思想觉悟很难做到这一点，罗伯斯比尔对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愤怒。罗伯斯比尔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对人民怀有

深厚的敬意，对他们体贴入微。所以尽管他有许多缺点和恶习，尽管他常常暴露出无知狂妄、嫉妒成性、心胸狭隘，但他仍旧得到了人民的爱戴。他深深地打动了人民的心弦，这是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孔多塞在他的 11 月 9 日的日记中曾经对罗伯斯比尔作过一番尖锐的剖析，指出他身上有着浓厚的神父味道。他写道：

“人们常常感到不解的是罗伯斯比尔不论走到哪里，在家里也好，在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里尔俱乐部也好，还是在国民公会也好，为什么总有一大群妇女跟随左右？这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就是一种宗教，罗伯斯比尔在这个宗教组织中建立了一个派别。那些妇女就是他的虔诚信徒。显而易见，他的威望全都是妇女替他造成的。他到处布道，到处骂人；他总是板着面孔，一脸怒气，神情忧郁，对什么事都处之泰然，一心一意走自己的路。他声嘶力竭，不断地攻击有钱的富翁和德高望重的名人。他生活简便，不近女色；他只有一项使命：发表讲话，几乎到处发表讲话。他培养了一批门徒，有自己的贴身警卫。只要有可能为自己拉几个人过来，他就向雅各宾党人发表演说，否则，如果他的名声受到威胁，他就一言不发。他本来可以找个职位，替人民做点事情，但他不屑一顾，宁愿扮演现在的角色，以为这样可以统治人民。只要能引起哄动，他就出场，否则，如果没有他讲话的机会，他就溜之大吉。他具有作为一个宗派领袖的各种品德，但要做一个宗教领袖，则全然没有。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严于律己的名声，想与圣人媲美。他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说，张口上帝，闭口先知。他把自己打扮成穷人和弱者的知音，一本正经地接受他们的膜拜和敬仰。如果有危险，他在危险发生之前早已逃之夭夭，但危险一过去，便只见他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罗伯

斯比尔只是一个神父，而且永远只是一个神父。”

是的，罗伯斯比尔身上确实有一股神父的味道和结党营私的味道。他总想表现自己绝对正确，态度令人不能容忍。他器量狭小，十分自傲。他一贯专横跋扈，以其一孔之见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他的脑际终日被某个观念萦绕着，心肠十分冷酷，久而久之也就把自己同自己的信仰等同起来，把自己的野心同自己所进行的事业等同起来。但是，这个人在道德上倒是非常廉洁的，他对于生活的热爱无比虔诚，他小心翼翼、决不贬低或伤害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各种特点，并努力从人的思想和信仰的最平凡的方面去寻求人身上主要的高尚之处。

此外，罗伯斯比尔倾向于基督教的思想是由于他有着比较浓厚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同基督教的悲观主义和卢梭的悲观主义十分类似。基督教的悲观主义并没有发展到一切方面，而且没有最终形成，因为它究竟给人类打开了无比广阔的视野。但它对于人性和社会的评价过于悲观。它认为人如果单靠自己，没有上帝的搭救，就会变得愚昧无知，就会产生邪念。由于人处在这种不健康的状况下，他在科学上和艺术上所取得的一些外部成果便不可能达到他的内心。社会如果单靠自己，则永远也不会^在正义方面达到自然的平衡，而只有这种自然的平衡才能使人们不去作那些异想天开的幻想。卢梭的思想比基督教的思想还要阴郁，还要忧虑重重，所以也是很悲观的。他认为人的本性原是天真无邪和鲁莽无知，二者皆备，他现在正在向文明状态过渡，但到了文明状态之后，知识的发展必然会带来道德的腐败。没有一个社会制度能够实现正义。即使再完美的民主制度能否适合现代的大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卢梭在谈到人民行使国家主权时，对这一点能否成为现实十分悲观。他为自己所憧憬的美好的人

类社会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能实现而痛苦万分，无力再坚持下去，因此只好超脱尘世，去追求一种同基督教相近的多神论，他认为这种多神论可以建立一个亘古未有的社会，实现完美的正义，不过广大的世界不明白他的苦心孤诣，拒绝了他的想法。

罗伯斯比尔并没有把卢梭的悲观主义全盘接受过来，因为他相信民主制在现代的大国是可行的。但他认为，即使在民主制完全建立之后，也还会有许多坏的东西使人类感到烦恼。他觉得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是不可能全部消除的。他认为把拥有不同财产、不同地位的人都拉到同一个水平上来而不妨碍、挫伤人们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已预见到在一代代不断更迭的人类社会中，永远会有一些人傲慢、自私，另一些人则处在嫉妒和痛苦之中。他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没有看到人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的社会中，每个人的力量都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因此，他觉得革命事业不管会有多大的发展，不管会取得多么完美的成功，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空泛得很，因为那些残存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由此而必然产生的种种弊端早已把它毁了一半。所以他对基督教怀有某种敬意，觉得基督教在人们心中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比革命的影响还要深。因此他小心谨慎，不去触动人们对于正义和幸福所怀抱的过多的希望，他觉得大革命永远也不会使之成为现实。

罗伯斯比尔思想上的激烈斗争，这个心肠冷酷的钢铁汉心中的难言苦衷和长期的忧伤也就在这里。他所进行的事业是很难完成的，而且他早已知道，这项事业即便完成，也不能全部满足人们的心愿。所以他不愿意铲除过去遗留下来的思想寄托，虽然他现在正在同过去的旧势力展开斗争，以便

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新秩序。

罗伯斯比尔曾经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显存在的缺陷而感到十分痛苦，他曾经希望对基督教作一番新的解释，以便从中觅取一种能够在精神上带来欢乐的力量。他对社会悲观绝望，认为社会的自然发展不可能给他带来这种力量，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难道能因此而埋怨他吗？是的，他的思想对大革命不能克服的人间苦难和不公正行为确实非常苦闷，调子十分低沉、阴郁，令人捉摸不透。

同时，他这种想法也是充满危险的。首先他大大利用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利用了他们对那些过时的宗教信条所怀抱的经久不衰的幻想。他借口人民的思想状况多少年来一直同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让这种宗教信仰继续存在下去。显然，他并不急于看到人民去接近科学，去自由地、大胆地探索宇宙。

其次，他的想法也十分轻率，认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会逐渐失去其本来的面目，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纯朴的信仰。基督这个偶像统治人们的思想已经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人们对它的崇拜，与其说是把它当作关于上帝存在的抽象的、静止的、苍白无力的概念，不如说是把它当作一种在历史上形成的、有血有肉、富有人性的上帝的形象。所以不久之后，一有风吹草动，人民的情绪稍有低落，要求很高的整个基督教便又成为一种肤浅的多神论了。罗伯斯比尔没有把教会连根拔除，转瞬之间这种专制势力便又从埋藏很深的根部发展起来了。

最后，罗伯斯比尔的那个纯朴的信仰在某些方面同除去污秽的基督教并没有多大差别，令人担忧的是他在把这些东西变为人们的思想和道德的准则以后，会不会动用国家的力

量来推行他这种基督教和哲学思想的混合物，并通过这种神秘的办法把法国重新拉回到古代不容异端的状况中去。

这是多么深刻，多少尖锐的心理分析！多么精辟，多么经得起推敲的评价！罗伯斯比尔的为人，无论是光明面还是黑暗面，都被饶勒斯全部揭示了出来。他认为罗伯斯比尔的主要特点是：真诚地热爱人民的事业，尊重人民。“罗伯斯比尔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敬意，对他们体贴入微。”同时，他认为罗伯斯比尔身上“有一股神父的味道和结党营私的味道。他总想表现自己绝对正确，态度令人不能容忍。他器量狭小，十分自傲，他一贯专横跋扈，以其一孔之见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他的脑际终日被某个观念萦绕着，心肠十分冷酷，久而久之也就把自己同自己的信仰等同起来，把自己的野心同自己所进行的事业等同起来。”这样，罗伯斯比尔的心理活动就被饶勒斯全部暴露出来了。这样一个人处在那种思想状况下，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而自己竟毫无觉察的。由于他做这些坏事为的是拯救观念——人类幸福的前提，所以他真心实意地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给人类做点好事，是为了造福人类。他作了权衡，认为好处大于坏处。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无法觉察的因素是相当大的，一旦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发作起来，他的自尊心和永远不能满足的个人欲望便会使他把人民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他也没有想一想，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利拿人的生命开玩笑去进行他所谓的拯救人类的事业。特尔克马达想给那么多的灵魂带来永恒的幸福，但他如果对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稍加怀疑的话，他是不会烧死那么多人的。

妄自尊大，虚荣心十足，这是每一个政治家都无法克服的两个弱点和永远洗刷不了的污垢，但罗伯斯比尔并不只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在道德上倒是非常廉洁的，他对于生活的热爱无比虔诚。”同时，由于他对于人性的每况愈下怀有悲观的情绪和错误的看法，

所以便转向基督教，主张把基督教改造一番，使之成为人类的复兴服务。事实上，这正是统治阶级长期以来一贯遵循的理论，即所谓“人民”需要宗教的理论。这种观点把上帝看成是一个担任警戒任务的，要价不高、呼之即来的万能的“宪兵”。

饶勒斯看到了心肠冷酷的罗伯斯比尔内心所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位刚强的革命家，一方面致力于摧毁旧的势力，一方面却认为保留“过去遗留下来的思想寄托”对于人们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是自己挽救不了自己的，因此需要有一种超然的力量来拯救他。于是天上有上帝，地上有罗伯斯比尔。地上的保护并且得到天上的配合。因此饶勒斯正确指出的罗伯斯比尔对于人民的尊重不过是一种相对的说法。罗伯斯比尔尊重人民，同样人民也尊重罗伯斯比尔以及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和上帝的化身所肩负的双重使命。现代社会主义认为，人民的解放应当由人民自己去进行，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距离这种认识还差得很远。

所以饶勒斯批评了罗伯斯比尔的想法，认为这种想法“充满危险”。因为“这种想法大大利用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在道德观念的名义下把那种盲目的宗教信仰保存了下来。他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人们可以随意改变一种宗教——比如基督教——，可以把“在历史上形成的、有血有肉、富有人性的上帝的形象”变成一种“关于上帝存在的抽象的、静止的、苍白无力的概念”。

最后，罗伯斯比尔所创造的宗教一旦被他用来干预国家生活，很快就会恢复过去的宗教面目和习惯做法，把“法国重新拉回到古代不容异端的状态中去”。

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象饶勒斯这样对罗伯斯比尔的性格和思想进行过这样深刻的分析。

饶勒斯对马拉的分析也非常成功。他不喜欢马拉，但能够公平地对待他。他不喜欢那些充满憎恨、心狠手辣、常常把事情弄得

不可收拾的人。但他太了解事物的相对性和人们身上不可克服的弱点，因而没有把这些方面看得十分了不起。他知道仇恨本身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有些阻碍事物发展的障碍物，是由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缓慢现象造成的，把人杀死并不能消除这些障碍物。由于饶勒斯思想敏锐，又有着无比善良的天性，能够从多方面去观察一个人，所以他看到马拉身上同时还具有明智的和温和的一面。下面几段可以说明这一点：

马拉的明智的、温和的策略主要是在国民公会和公社发生冲突的时期形成的。他的报纸^①在10月8日那一天就表现出很强的政策性，看问题十分敏锐，并且很注意分寸。

* * *

马拉有敏锐的政治感觉，他在议会受尽污辱，但却能这样地来谈论议会，这说明他有着惊人的自制力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心。

马拉深信（布佐的言论和他死后留下的文稿都充分说明这一点），吉伦特派一有机会便会要求国民公会离开巴黎；如果这项糟糕的决定被采纳，不但大革命的事业将付诸东流，而且会葬送整个国家。为了使这一危险局面不致发生，马拉恳求巴黎保持冷静，自始至终遵守法律。

除去在具体问题上通常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以外，马拉似乎还有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高度责任感。

他看问题十分准确、沉着。他早已把那些敌人看透，感到他们表面上叫得厉害，实际上外强中干，不过需要时时提防他们。但只要不让他们有隙可乘，他们很快就会不攻自破的。

* * *

^① 即马拉主办的《人民之友报》。——译者注

即使在吉伦特派显赫一时，取得明显成功的时候，马拉仍然胸有成竹地把他们的弱点看得一清二楚。他在雅各宾俱乐部提出来的政策，就是这种温和的、充满信心的政策。

马拉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九月事件之后，他从人们的埋怨和不满声中看到了这种杀戮的办法只会有利于反革命。他认识到，他那关于建立革命军事法庭的想法很容易被人指责为实行独裁。所以在国民公会时期他希望不使用暴力和屠杀，而是通过民主主义者的明智的政策逐步地把公众舆论争取过来，依靠公众舆论的支持来重新实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致，从而使诡计多端的吉伦特派无法兴风作浪。当国民公会一旦摆脱宗派的束缚，完全能够不受干扰地处理问题的时候，它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全力以赴地把法国当前面临的危险弄清楚，然后加以克服。马拉在这里既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大吹大擂。相反，他对事物进行了简明的分析，为克服当前的巨大危险作出了相应的努力。

* * *

马拉所以能够采取客观的和冷静的态度，这是他付出巨大努力的结果。啊！我敢说他现在也还在满腹狐疑，动不动就做出毫无道理的事情来。他现在在狄戎家里对那种“外交艺术”大加赞美，可是几天之前，他还在杜摩里埃家中把它贬得一无是处。

* * *

但不管怎么说，吉伦特派把自己的全部政策都用来反对马拉是非常荒谬绝伦的。而且好象马拉这时候正希望缓和一下。可是就在他努力克制自己，决定采取温和的态度并身体力行的时候，他所遭到的谩骂和恫吓却变得更加变本加厉了。他于是心灰意冷，依然故我起来，重新同吉伦特派展开了一场

殊死的搏斗。他又深深地陷入盲目仇斗的状态，坚持认为穷人要翻身只有消灭富人。Ut redeat miseris, abeat fortuna superbis.这句话是他的报纸的刊头题词。

以上摘录的是分散在《国民公会》各卷的饶勒斯对马拉的评价。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饶勒斯抓住了这位伟大革命家的两个主要特点：多疑和心胸过分狭隘。不过，说马拉对有钱人的憎恨是出于……对备受痛苦的人民的热爱可能要恰当一些。他也进行了一番“权衡”，把受尽折磨的穷苦人同作恶多端的几千名富翁作了对比，认为必须把后者消灭干净，使之永远不能欺压人民。我不认为马拉的“消灭富人”是为消灭而消灭。马拉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感情易于冲动，性格比较暴戾。要是存在某种替代的镇压办法，使他既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又能饶恕某个“贵族”，他是很乐意而为之的。担心自己身上的温情会贻害自己，这种感情在他心中压倒了一切。他最恨那些对革命事业无动于衷，表里不一的人，他们明明看到有些人在做坏事，但胆小如鼠，不敢揭发。他敢于打抱不平，不怕做一个革命的“刽子手”。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他把个人的名誉和安全置之度外。他以提出激烈措施的办法来严格约束自己。人民在感情上所流露的好恶是很少会弄错的。人民喜爱马拉，因为马拉善于赢得他们的爱，即便是做一些失去理智、甚至犯罪的事他也在所不辞。

马拉的头脑十分清楚，他的缺陷并不是他身上所固有的，而是由于他个人对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阶级的看法造成的。他对于消灭一些坏人看得太重，过分采取了“外科手术”的办法。这正是古往今来的政权惯用的做法：把社会上的弊病说成是少数人的胡作非为造成的。但这种恐怖主义是个人头脑发涨的结果。归根结蒂，统治世界或者说接受他人统治的毕竟是大多数，因此应当把大多数人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可是恐怖主义搞的那一套却是为渊驱

鱼，把这些人给吓跑了。个人确实可以领头做出一些事情来，这在历来都是很必要的，但如果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后果就不堪设想。因此，个人的行动只有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才不会一事无成，或长久不了。大革命所保存下来的东西正是大多数人做的，或者说是为了大多数人做的，即为一例。

社会主义一贯考虑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有它才摒弃了这种恐怖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因为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方法。马拉作为一个头脑清楚，品行端正的人，他胸怀坦荡，但怀有过分的理想主义；同一切恪守陈规、思想又不对头的人一样，他只是把资产阶级时代大家所犯的错误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这个错误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结束。一些人毁掉的东西，另外一些人可以把它恢复起来。波拿巴就把少数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所毁掉的东西恢复了起来，建立了独裁政权。但他没有能够恢复旧的制度，因为旧制度已经被法国大多数人宣判死刑。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大革命时代的第三个关键人物——丹东。

丹东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有一个绝招，能够把各种困难和人们之间的敌对的、仇恨的情绪淹没在革命的洪流中。他不搞什么谩骂，也不与人家争论；他没有让议会去反对公社，也没有让公社去反对议会。他不象罗兰那样怨天尤人。他把各种力量都调动起来拯救祖国和自由的事业。他让它们都去为这个崇高的目标奋斗，希望通过这个办法使它们达到和解，根本不同它们纠缠所争论的问题。他善于用慷慨激昂但很有分寸的语言鼓励人们宽容为怀，并对利益受到威胁的人进行抚慰。

当此局势危急之际，国家可以调动一切物资。但国家因为保卫国防而从公民手中拿走的东西，将全部给予赔偿。然而丹东是采用什么办法来结束公社政权中的专横武断和不正

常的行为的呢？他没有大发雷霆，吵闹不休。他宣称自己是“革命的”部长，把自己的权力同公社产生的革命背景联系起来。他把自己的称呼加在公社的身上，因此而把自己的事业同公社的事业融合在一起。同时，他要求议会行动起来，组织各种委员会深入法国各地，协助政府的特派员做好工作。议会后来使得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恢复了平衡，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它自己，而且公社也无所怨言，这难道不正是采取了这一强有力的行动的结果吗？最后，巴黎给自己划地为牢，生活在公社所划定的对外界不信任，与之断绝一切往来的天地里，这样做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并使自己的情绪越来越走向偏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城市处在一个多疑的环境中并不是一件好事。不但让巴黎生活在狭小的天地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包得很严，与世隔绝的孤零零的世界不是上策，而且让法国各地同巴黎之间好象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必须恢复巴黎和各地的联系。可是就在丹东似乎全盘否定公社所建立的那种严密的控制体制的时候，他下令在全巴黎实行挨门挨户的搜查，从而使公社得到了彻底的满足。经过这项挽救国家危亡的重大措施之后，谁还敢为公社在8月10日之后采取的一些小规模的措施而埋怨它呢？这项重大的革命行动是由执法机构提出、议会通过、公社执行的。因此，这就使各个不和的，敌对的势力团结起来，使它们互相影响，共同牵扯到同一个行动中去了。

但是丹东是不是要用一两天的时间集中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暴力行动，对被搜查的公民任意怀疑呢？请注意，他在谈到搜捕奸细之后，特别谈到要搜检武器。因此，革命当局在一两天里对巴黎的大搜查，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搜

罗武器。这样，革命政权的士兵就可以高高兴兴地走上前线，从而把造成巴黎分裂的党派之争带到前方去，借敌人的炮火把它洗刷干净。丹东的发言象是从高山之巅奔腾而下的激流一样，充满激情，明澈似镜，我从中得到的印象就是这些。他没有一点有害的或无聊的想法，没有一句凭空捏造的谎言。

马拉和罗伯斯比尔都认为手头拥有武器的人是巴黎的保卫者，解除他们的武装可能会带来危险，丹东力图让他们放心，说服他们必须让巴黎和全法国的人民大批走上前线。但他在消除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的满腹狐疑时，丝毫没有指责他们缺乏爱国热情。布里索的报纸就大不一样了，它在8月31日怀有恶意地写道：“尽管马拉和罗伯斯比尔努力冲淡公民们的参战热情，不让他们奔向前方去援救自己的同胞，巴黎绝不会因为这种无耻的利己主义而蒙受耻辱。”啊！同这些卑鄙的想法比较起来，丹东的襟怀显得多么广阔，他的思想有多么高超的境界！

饶勒斯喜欢丹东身上那一股火一般的热情和高超的思想境界。丹东使得斗争变化无穷，使得广阔而丰富多采的生活变得更意义。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能够“把各种困难和人们之间的敌对的、仇恨的情绪淹没在斗争的洪流中。”这也是饶勒斯所擅长的地方。所以饶勒斯喜欢丹东，也就是有点儿喜欢他自己。

饶勒斯的讲话也“象是从高山之巅奔腾而下的激流一样，充满激情，明澈似镜”。同丹东一样“他没有一点有害的或是无聊的想法，没有一句凭空捏造的谎言”。

因此，饶勒斯得以实践他的诺言。他运用普路塔克的写法，把大革命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经久不衰。他运用米希

勒的写法，把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放在历史的审判席上，以生动活泼的文字对他们的“错误”加以批评，对他们的优点加以鼓励，好象这些人物至今仍旧活着，好象这些事件刚刚发生不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经济方面掌握了大量的、扎实的材料，对国内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对大革命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了深刻的分析。法国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象他这样去研究历史。

如果运用得当，普路塔克、米希勒和马克思这三个人的方法，并不是不能糅合到一起的。不过应当把主要人物的影响局限在它们为环境所决定而必然采取的率先行动上。不能用否定过去的办法来理解过去。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常常就是否定。最后，必须承认，社会生活所仰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生产力及其发展——是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根本基础和“最后”的决定性的因素，同时也不能否认，认识和思想的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认识和思想的因素不仅是少数人发挥的，而且主要是有觉悟、有组织的群众发挥的。

然而饶勒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是没有缺点的。社会民主党杰出的历史学家弗朗茨·梅林就批评过他在这项工作中走得太快，说他的写法是一种“猛冲的作法”，用法国人的话来说是“每小时150公里的作法”。他对待饶勒斯不够公正，指责饶勒斯对腓得烈大帝的作用——梅林对此人有深入的研究——评价过于乐观。

梅林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可能有点道理。是的，饶勒斯有时确实过于乐观，他常常把自己对问题的透彻理解和心中的火一般的热情带到他所研究的人和事物中去。可是饶勒斯的每一个观点都是事先经过深入而扎实的研究之后才拿出来的。他之所以很少弄错，就是因为他只提出自己深入研究过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饶勒斯完全具备做一个历史学家所应有的条件。法国和世界各地过

去有不少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这种人今天也还大有人在，饶勒斯虽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比他们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

饶勒斯在写历史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在《1870—71年法德战争史》（收在《社会主义史丛书》中）一书里，首先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阐发自己的看法的。帝国妄图阻挠德国的统一，从而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全书便是围绕这个观点展开的。下面两段话概括了他的观点：

反对派、自由派和共和派很难对帝国的含糊不清的政策发表坦率的意见，澄清混乱不堪的事实。杰出的议会自由派在野党领袖梯也尔先生，莫名其妙地既有着精明的判断力，又怀有严重的偏见。他十分敏锐地看出帝国的对外政策软弱无力，自相矛盾，虚伪透顶。他曾经向帝国预言，它协助意大利统一，必会助长德国对于统一的要求，为德国的统一准备条件。帝国既然承认意大利有统一的权利，难道能说德国没有权利统一吗？它既能帮助沙瓦王国统一意大利，又怎么能够阻碍霍亨佐伦王国去统一德国呢？因此，如果帝国在承认意大利的统一之后，继续大胆地、毫无私心地去承认德国的统一，如果它能明白并且宣布欧洲可能会出现一个同法国一样存在的德国和意大利，梯也尔的反对意见就无所用了。可是由于帝国在协助意大利统一的时候——何况这种协助不是无条件的——不敢承认和接受德国的统一，它的政策必然会可悲地处于自相矛盾的状况。

而且，帝国也不得不采取虚伪的和撒谎的手段，因为它在民族统一的原则问题上叫得太响；更有甚者，它在意大利统一的问题上创造了一个太引人注目的先例，不可能公开反对德国的统一而不遭到人们的非议，从而使自己威信扫地。因此，它只好转弯抹角地反对德国的统一，只好在两个自相矛盾的

政策之间玩弄诡计……拿破仑第三的做法实际上是帮了俾斯麦和普鲁士的忙，但他并不相信普鲁士会取得成功……他在意大利的事件中提高了自己关于民族政策的革命威望。他在德国的事件中想利用肢解、分裂和保持毫无作用的平衡政策，使法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考虑不但十分繁琐，毫无仁义，而且特别天真，使得帝国的外交政策和意图全部寄托在普鲁士的不能成功上。这个很不光明正大的、可笑的把戏，被梯也尔清楚地看了出来……

第三部

社会主义者

第一章

行动的统一

在人们中间，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饶勒斯最初属于中左（1886年至1893年）；从1893年至1898年他倒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接着，从1898年到1905年他又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转为改良主义的内阁派的社会主义；最后，在他光荣的一生的末期，即从1905年参加在地球厅举行的代表大会起一直到去世为止，他始终主张“统一”的社会主义。对于这类众所周知的说法，饶勒斯本人当然也是知道的。他把这种说法称为“颠扑不破的”，因为这好象是一张精确的“地形图”，上面清楚地标明：饶勒斯在其议员生涯的最初阶段属于中左。一些政敌出于党派的利益精心炮制并大肆渲染的这一说法在部分意义上其实也有它真实的一面。与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饶勒斯不停地在生活中学习，不断思索，深入和认真地研究生活中越来越错综复杂的问题。他顽强地追求真理，对人对己从来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考虑，仔细推敲，决不肯轻易放过。他在政治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都

要把疑难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重新研究一番。他的思想既缜密又开阔，不但能清楚地看到基本的困难，而且知难而进，敢于向困难挑战，把各种疑难汇集起来，加以剖析，力求彻底解决。他能恰如其份和熟练地运用辩证法，特别喜欢把各类问题按轻重缓急排列起来，以便完全制服和战胜它们。他是一个细心的、一丝不苟的和不知疲倦的观察家，因而能不断获得新经验和新知识。饶勒斯能在视野所及的范围内洞察一切，抓住一切，了解一切——不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且抓住事物的本质。饶勒斯从来不会不懂装懂，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象他这样诚实的人。他在现实生活面前永远是一名好学生。他向周围的一切人请教，从最有名望的学者一直到报刊记者和最普通的社会党人。因此，议会大厦的走廊、编辑部、举行代表大会的大厅以及用于公众集会的商店货栈，都成了他的学习课堂。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在议会休息厅里被一大群代表各种政治色彩的记者团团围住这样饶有趣味的场面。他面带笑容，仔细倾听别人的讲话，尤其注意向对方提出问题。他在提问的同时，常常讲一些诙谐、幽默的俏皮话。对于别人提出的问题，饶勒斯总是有问必答，既亲切又认真，从不苛求于人。他向来不以势压人，故弄玄虚，或者强词夺理，而是象苏格拉底那样，用朴素易懂和风趣的语言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力求以理服人。那些听众便是他的老师，而他则是一名杰出的学生。他能用一句似乎是随口而出但又意味深长的话，一下子澄清争论不休的问题，使在场的老师们个个心悦诚服；或者用婉转的方式，结束争论，免得大家不欢而散。饶勒斯在同别人谈话或者交换意见时，不仅彬彬有礼，而且和蔼可亲。

人们不难懂得，由于采取了这种实事求是和服从真理的态度，饶勒斯在其政治生涯中，有时不得不改变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的观点和策略。而如今的政治家们惯于以势压人，把对方以及

对方的论点完全不放在眼里，这种盛气凌人的恶劣作风成了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和吓唬外行的法宝。饶勒斯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从来“没有天真地认为，在二十年的摸索、学习和斗争的过程中，自己是一成不变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决不会胡诌生活从未教会他任何东西。”

但是，变化是次要的。他的观点和策略的实质始终没有改变。这仅仅是在基调不变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些变化而已：共和的、世俗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力图把最崇高的理想主义同最具体的现实主义和谐地结合起来，把未来的力量同过去和现在的力量结合起来。

饶勒斯在文章里，曾明确无误地解释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他的基本倾向始终没有改变。这里，我们想引用饶勒斯为《议会演说》（1904年由克拉里汇编出版）撰写的长篇序言中的一些典型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的全部政治活动的实质是相同的。

饶勒斯在序言中写道：

我毫无愧色地接受要我把在议会中的演说汇编成册的建议。请不要以为这是为了炫耀自己。一个战斗不息的政治家如果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抱着自我欣赏的态度而不愿拿出反映昔日斗争的演说，那是一种轻率的态度。这些材料固然说明了个人的行动在迅猛发展的形势面前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但是为社会党人收集有用的宣传资料，从而帮助整个民主力量更加明确我们党的思想和行动，这不是没有裨益的。对于我来说，用真实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自己的成长过程，也同样不是没有裨益的。我从来没有天真地认为，在二十年的摸索、学习和斗争过程中，自己是一成不变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决不会胡诌生活从未教会我任何东西。我第一次当选

议员时，只有二十六岁，可以说还只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我们这儿与英国不同，英国贵族很注重他们的子女在进入生活各领域之前的政治文化教育，而我们的大学和师范学校仅仅是中学的继续，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小天地，学生的思想有时确实十分活跃，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从未与外界的人和事有过直接的接触。在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的头脑里，从外面传来的最微妙、最深奥的信息有时却与最莫名其妙的无知混杂在一起。这好比居住在一间冷清而又宽敞的房间里，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连离得最近的物体也辨别不清；好比房间里摆满镜子，天边的霞光照进来，只是在那些镜子里来回反射，令人眼花缭乱而已。

我在低年级的时候，就已学习或接触过从费希特到马克思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在法国已经成立社会主义小组，这些小组正在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而且在盖得、马隆等许多人中间已经展开激烈的派别斗争。因此，象我这样的人，一旦接触实际生活，势必有许多新鲜的东西需要学习，不但要修正和补充早先学到的孤零零的书本知识，而且必须作出新的努力，为自己辩护或者抵制新鲜事物对自己的巨大影响。一旦与那些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人接触，他们便对我的思想突然产生十分强烈的诱惑力。我目前正在检查他们对我的影响。尽管我已同他们发生不和，甚至到了关系破裂的地步，但是我仍不能完全摆脱他们的影响。每个正直的人的思想都是这样发展的。人们通过深入的、常常是默默无声的工作来寻求内心世界和运动着的事物之间的平衡点。

因此，我丝毫不必由于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而感到羞愧和不安，我有权说，自从踏进社会以来，我

的思想和行动的基本方向始终没有改变。我始终是一个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我的理想始终是建立社会共和国，一个有组织 and 独立自主的劳动共和国。尽管我在最初的时候缺乏经验和知识，但我始终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我在议会的一系列演说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种连贯性，而我的一系列文章也许能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我并不希望消除关于我从“中左”突然转向社会主义的这类传说。人们根据党派偏见臆造出来的故事是永远不可能杜绝的。如果说从1885年至1889年我在议会里没有加入任何党派组织，如果说我常常同先进的左翼站在一起投票，如果说我在各种场合越来越明显地倾向社会主义，但就位置来说，我是坐在中间的。在很多人看来，这一点已经足以能够划定我究竟是属于哪一派的了。不过，从那时候起，我就是不折不扣的集体主义派的社会主义者。我的所有讲话都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我的理想和我所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始终如一的。

其实，认为我从主张中左的理论和纲领转为赞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这是不正确的。同样，认为我在1893年至1898年间曾主张采取粗暴革命和毫不妥协的对抗，尔后又主张温和的改良主义和慢慢来的态度，这也是不正确的。当然，当社会党人在1893年第一次获得巨大胜利的时候，我确实过分乐观，幻想在很短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实现我的全部理想。历届反动政府不断向我们寻衅，威胁我们，扬言要把我们从共和国里撵出去，剥夺我们的社会权利，把我们从国家生活中开除掉。就在同这些反动政府的激烈的斗争中，我曾求助于无产阶级的巨大热情和力量。今后如果政府禁止集体主义和工人阶级自由地和合法地向前发展，我也将会这么干的。每当我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不禁感到无限自豪。我在

这一动荡的年代里发表的演说清楚地勾划出今天社会党人行动的轮廓。

这始终是同一个基本思想，即把社会主义同共和制联系起来，用社会民主来充实政治民主。这始终是同一个方法，即利用共和制和合法性，只要这一合法性不被反动派的轻举妄动所破坏，或者不被它们背信弃义地肆意歪曲。这始终是同一股热情，即对人类的灿烂文化以及对无产阶级的组织壮大和经济解放的巨大热情。这始终是同一个考虑，即希望人们停止对这一热情的指责，希望用积极的法案形式来揭示社会主义的组织特征。这始终是同一个机会主义的态度，即为了社会党和工人运动的利益，尽量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倾轧，利用一切自由的力量，利用由于法国具有革命和民主传统因此国内压迫不算太厉害的这一有利条件。这始终是同一个意愿，即实行满足眼前利益的改革，以便准备甚至着手进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改革。这始终是同一个策略的坚定性，即在强烈反对杜毕伊、佩里埃和梅利纳内阁的过程中，支持最果敢、最坚定的——我想说，几乎是最不妥协的——内阁派社会党人加入布尔儒瓦内阁。我在上面重新回顾了自己二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其中并未涉及我那充满矛盾的私人生活。这确实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有时会碰到陡峭险峻的斜坡，有时路旁突然出现万丈深渊；有时表面通畅平整，其实埋伏着危险。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条道路始终通向同一个目标——日益壮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

从这份珍贵的自传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饶勒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在政治生活的艰难曲折和惊涛骇浪中毫不动摇，令人感动地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他是通过“学习”，也就是通过思考，通过对事物的理解和内心活动，最终接受社会主义的。

在他开始学习的最初几年里，他就已经“学习或接触过从费希特到马克思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饶勒斯具有敢于讲真话的这一难能可贵的品德。据他本人讲，他所接触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凭天生的直觉摸索到的这种社会主义具有这样的一个缺陷：他当时并不知道“在法国已经成立社会主义小组，这些小组正在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他在热切地追求真理和努力实践的过程中，开始同社会主义小组的领导人发生接触，并着手研究他们的事业。饶勒斯首先发现社会主义，然后才发现社会党人和他们的组织。这一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研究饶勒斯以后与这些组织的关系的钥匙。他首先努力向突然展示在他面前的社会党人的生活学习，不断丰富原先学到的“孤零零的书本知识”。同时，他又十分警惕“新鲜事物”对他的“巨大影响”，警惕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最初的传播者突然对他产生的“十分强烈的诱惑力”。他凭自己的理性和眼力来判断这些创始人身上所具有的、最初曾使他眼花缭乱的魔力。换句话说，他正在努力使自己不要过分迁就和轻信别人，否则，即使最优秀的分子也会在精神世界的先驱和前辈面前变得唯唯诺诺，无所作为。他本能地力求保持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外界影响之间的平衡，以便在“运动着的事物”中间保持自己的特色和个性。

但是，饶勒斯始终不能克服他在法国社会主义创始人和最初传播者面前的那种腼腆和胆怯的心理。凡是认真研究过这位社会主义者一生的人，都能发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我只想在这里讲一件动人的事情：那是发生在统一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饶勒斯公开要求茹尔·盖得允许他改变对某一问题的态度，虽然他在头一天同这位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举行单独会谈时已经就这个问题做出过保证。他对参加会议的各组织的代表们说，他原先受了盖得的影响，后来，经过独立思考，他又“反悔”了（我准确

地记得，饶勒斯当时用了“反悔”这个词)。

饶勒斯在1903年或1904年撰写了这份自传材料(《议会演说》一书于1904年出版)。这一时期，他遭到早期的法国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和代表们的猛烈的，而且常常是不公正的攻击。但他并不计较这些恶毒的攻击。他说，“尽管发生不和，甚至到了关系破裂的地步”，但他“始终不能完全摆脱”那些“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人”——他们在历史上不可避免地发生分裂的时候扬言说，饶勒斯已经丧失社会党人的尊严——对他思想所产生的“突然的十分强烈的诱惑力”。很难找到象他这样豁达大度，心胸开阔的人。看来，饶勒斯担心的是，如果不尊重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传播者，那就可能意味对这一思想的不恭。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位社会主义者的一生，我们再引用一份由他本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这是他在庆祝《社会主义评论》创刊二十五周年的宴会上的一次席间讲话。

他说：

我不能在纪念《社会主义评论》创刊的这一伟大的日子里，过多地回忆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情，因为这一刊物的特点恰恰在于她一方面充满着活力，另一方面她并不属于哪一个人，并不带有明显的个人和宗派色彩。但是我不能不想起，当我还处于中左一边的时候，是《社会主义评论》首先向我发出召唤，并且为我引路。

我记得在别的什么地方曾经讲到过，我在1885年或1886年就土地问题发表过一次演说——塔布里什也许不知道这件事，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是社会党的正式报告人——我在演说中替农民，替耕耘土地的人说话。后来，我在阅读《社会主义评论》时，发现卢阿纳的一篇文章。卢阿纳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书呆子。我敢断定，此刻他正钻在文件堆里拚命寻找《社会

主义评论》的历史，同时却又忘记了今天正是该杂志的创刊纪念日。他在文章中写道：“先生，到我们这边来吧！您是我们的人，您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最早的证明。

他的话使我很受鼓舞。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找到行动的中心。于是，在某一天——我想我已经在别的地方讲过这个故事了——某一天晚上，我满腔热情，兴致勃勃地沿着殉难者大街，来到《社会主义评论》编辑部。作为一个地方议员，作为一个感情上已是社会党人但并不了解社会党的新人，我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战战兢兢地顺着又窄又小，光线昏暗，弯弯曲曲和摇摇晃晃的楼梯往上走。我神色尴尬地站在编辑室的门口，贸然地问：“贝努瓦·马隆先生在吗？”那些编辑们很不客气地回答说：“贝努瓦·马隆先生不在。”我窘迫极了，赶紧下楼。尽管我走得很急，但一阵社会党人和革命者的哄笑声仍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这样一来，我在很长时间内不敢再到那里去了，但是我并不因此而埋怨《社会主义评论》。我正是在这家杂志上，开始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组织的文章。

我曾计划写完这些论文，但很遗憾，我没有能做到。

好吧，公民们，我们也许还有机会来谈这些事情。你们看，我在回忆这些遥远的往事时，心里并不难过。尽管许多年过去了，尽管差不多相当于四分之一世纪的二十年已经使我们中间大多数人不再充满青春的活力，但是我在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并不感到忧伤，相反，心里觉得甜滋滋的。

首先谈谈政治行动、工会行动和合作社行动这三者之间的互相配合。好吧，托马，我们不必在次序问题上扯皮。我究竟在什么时候讲过，议会行动是主要的，而工会行动则应处于

从属地位呢？假如我确实讲过这类话，那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我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之间不应该争论这种谁主谁次的问题。我认为，既然存在象工会、合作社和政治这样两、三个最基本的行动，那就没有必要象开宴会似的给它们规定座次，而应该最大限度地开展这三方面的工作^①。

饶勒斯在其曲折多变、动荡不定的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思想是什么？饶勒斯本人曾说过：“我始终是一个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不过，这两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两者在他的身上是焊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和生动的整体；他因为他是社会主义者，所以才是共和派；他因为他是共和派，所以才是社会主义者。

他善于归纳，富有哲理，思想开阔；他喜欢通过事物的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寻觅事物深处的统一。他不是把共和国，哪怕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表面摆摆样子的共和国，同全面实现最革命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对于饶勒斯来说，社会主义是民主共和制的延续和体现。另一方面，他认为，不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共和制只是一种毫无现实意义的空洞的形式，一个没有血肉的躯壳，是虚无飘渺的幻影，含混不清的许诺和不可能实现的遐想，尤其容易被反动派利用来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

这种共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统一是指导饶勒斯全部政治和社会主义行动的原则。这一原则合乎逻辑地和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民主力量、世俗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统一行动。

他在法国议会上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宣布这种行动的统一。

1885年12月23日的《公报》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

“让·饶勒斯：你们看到了左派的联合。”

^① 《社会主义评论》，1901年版110页。——作者注

这个指导饶勒斯全部活动的、关于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联合的思想，早就神奇般地体现在他的第一次议会演说中。

他铿锵有力地说出了“联合”这一宝贵的字眼，作为对阴谋反对共和制的波拿巴分子保尔·卡萨尼亚的回击。饶勒斯讲这句话的时机和这句话本身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实际上，保尔·卡萨尼亚曾经就政府在10月18日的第二轮选举中对选民施加压力一事，要求向政府提出质询。内阁总理布里松当即进行反驳，但他却不同意推迟质询。于是，保尔·卡萨尼亚在“左派议员的一片喧闹声中”撤回自己的要求。饶勒斯用“左派联合”这句话向后缩的右派质询者提出反质询。

如果我们知道，共和党人正是依靠了联合的力量，才在第二轮选举中免遭惨败，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位满腹牢骚的波拿巴分子的心情。1904年，饶勒斯在回顾这一时期时，曾经写道：

1885年大选之后，当我被选入议会时，共和党人的处境十分危急。保守派、帝制派和教权派夺走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更多的席位，没有能够成为多数派，这仅仅是因为共和派中的激进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经过第一轮选举的相互厮杀和火并之后，感到大势不妙，便在第二轮选举中仓促达成协议。不过，万一他们再次遭到失败，他们之间的协议就将化为乌有。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保守党人对此抱有巨大的热情和希望。不管怎么样，共和国一共才只有十五年的历史，这段时间还不足以消除人们对旧政权的眷恋，不足以排除复辟的可能性。自从革命使法兰西进入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以来，共和制处于所谓的政府危机阶段。战争一结束，共和派便利用王朝和法兰西的惨败，钻进了四分五裂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内部，搞出一个可笑的保守的共和模式。他们在“5月16日”事件中，击退了保守派的反扑，因为保守派立足于

从过去的事情中得出的一鳞半爪的经验教训，任意占卜未来，向全国揭露说，共和制孕育着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结果连最信赖他们的人或者头脑最糊涂的人也都觉得他们言过其实。

可是反动派现在却声称，他们的经验具有决定性意义^①！

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样，对于饶勒斯来说，社会主义除其本身的含义之外，还包含共和制这一基本思想。因此社会主义的行动成了捍卫共和制的行动，成了保卫共和制的最有力的武器。

1904年，饶勒斯曾就这个问题作过以下论述：

任何人都无权忘记：早在一个世纪前，这个国家被迫经历了一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极端革命，但是它在保障充分的自主权和允许合法活动继续存在这两方面，从未受过长时间的、循序渐进的教育和培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后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定，新生的法兰西还未来得及消除的敌对势力常常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不顾国内的条件是否成熟，革命一举推翻了陈旧的君主制度。就在为了摆脱困境而进行的一场对外战争的可怕动乱中，旧制度彻底崩溃了。请允许我稍加改动地借用丹东的一句话：新世界诞生之后，正是通过激烈的和几乎是强制性的手段，才得以把遗留在母体内的这张王权“胎衣”清除干净。因此，共和制虽然是革命原则的合乎逻辑的产物，但她更象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故。革命曾一度出人意料地转向完全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继续打着原来用以反对旧世界的人权的旗号，另一方面却限制公民的选举权，缩小行使这些权利的范围。他们把三百万无产者和穷苦人贬为消极公民。只有当资产阶级需要利用人民的力量来镇压王公贵族的叛乱时，他们才同意放松限制。甚至在同国王和逃亡

^① 《公报》，1904年5月，6页。——作者注

分子的帮凶——教会进行殊死的斗争时，资产阶级依然不得不照顾大多数法国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一切企图把革命限制在满足他们私欲范围之内的人，一切在新社会里业已获得好处从而妄想阻止革命向前发展的人，多少年来成批地加入了那些死抱住过去的利益或尊严不放，竭力维护旧制度和为反革命效劳的人的行列。这些人看到革命引起了所有制的大规模变革，便害怕随着革命的深入，新的所有制有朝一日也会发生动摇，遭到与部分旧的所有制类似的命运。由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在革命的进程中总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他们今天一齐转向反对政治民主，以防止这一民主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农民本能地对人民的自主权和对工人无产阶级持不信任的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第三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一百年里，革命虽然取得节节胜利，但真正的、明确的革命只是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发生。革命力量除了在1792年和1793年的革命风暴中以及在“二月闪电”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之外，在这漫长而又痛苦的一个世纪里，不是神权君主制复辟，就是假民主的独裁统治或者是资产阶级凭财产获得选举权的寡头政治统治。然而，现在这一切已经宣告结束。革命采取了她的合乎逻辑和正常的形式——共和政体。但是，如果共和国内部的一切代表旧制度的势力，一切君主和王朝的势力，一切贵族和教会的势力，一切军事独裁和宗教独裁的势力，以及近百年来被革命所摒弃的一切阶层，沆瀣一气，对共和制设置重重障碍，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不过，一切旧势力和现代政治寡头再也无力建立一个持久的反革命政权，即使是一个不完全的政权也罢。尽管如此，他们仍狼狈为奸，不断兴风作浪，威胁共和制。只有到了该制度产生与其相适应的并能永远确

保共和制存在的社会形式的那一天，他们的活动才会终止。

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共和制就始终面临着威胁，始终处于危险之中。这是因为共和制本身包含着一对原则矛盾：人权的普遍性和资产阶级特权造成的种种限制之间的矛盾；代表未来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和旧制度的残余——“一切君主和王朝的势力，一切贵族和教会的势力，一切军事独裁和宗教独裁的势力”——之间的矛盾。在一个以普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资本主义寡头的存在对共和制构成了一个经常性的威胁。因此，在这样一个本质上是矛盾和对立的社会里，人们必须不断地为捍卫共和制而斗争。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饶勒斯不停地要求共和国采取社会行动，因为这是彻底巩固共和制的唯一办法。

饶勒斯高瞻远瞩，从这一角度深刻地描绘了法国的党派斗争。他从不用庸俗和卑劣的手法来指责某一个人的个人野心和叛卖行为。

1885年的机会主义者和激进派曾因为反动势力的复苏而相互指责，这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他们本应该怪罪于历史本身，同时也怪罪于他们在1881年至1885年的内部分裂。当时，关于向北圻^①提供贷款的提案在议员中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议会就是在这样一片谩骂声中开场的。共和党内部的两派一开始就当着右派议员的面，相互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以至以后的岁月都打上了这一激烈争吵的不祥的印记。我认为共和国的最大不幸之一，就是在1885年的议会上，没有能够消弥这种分裂和争吵的苗头。如果允许对治理世间事务这样繁重和复杂的工作发表意见的话，那么，我想说，克列孟梭一生中最大的过错就是没有能够制止这场冲突。我记得，在

① 指越南北部，靠近中越边境的地区。——译者注

冲突即将爆发的前夕，当时的内阁总理布里松曾提请克列孟梭注意前不久的选举结果，并要他从中汲取共和党人必须协调一致的教训。克列孟梭当即回答他说：“我始终朝前看，从不向后看。”

但是，向后看就是人们所说的总结经验。而且正是在向后看的时候，人们才能意识到维护共和党内部团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那么激进派在这方面非要争个高低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远征北圻的战争已近尾声，法国同中国也已签订了条约^①，政府所要求的九百万法郎是用于占领和治理殖民地的费用。拒绝拨款，这将使法国不可避免地撤出这一地区，并且将被看成是一种撤退的信号。如果激进党确实希望法国撤出，如果他们认为法国非放弃北圻不可，认为无论从人类的权利还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我们都必须这样做，那么他们有责任在下一届议会中继续进行这场危险透顶的争论，哪怕冒着彻底决裂的危险，他们也有责任继续反对他们多年来一直反对的任何殖民行动。在辩论中，激进党人摆出了种种理由，要求放弃北圻。正当法国在欧洲本土上已经捉襟见肘的时候，如果再把一部分力量分散到远东地区，那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格莱斯顿先生在蒙受失败的耻辱之后，由于主动放弃德兰士瓦，不是反倒受人称颂吗？

但是，在1885年10月，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激进党人真正愿意放弃北圻。没有哪一届激进党政府会愿意承担这一责任。不，乔治·贝兰是一个例外。他通情达理，具有百折不挠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他决不会在这一可怕的决定面前退缩。可是他单枪匹马。表决以后过了几个月，我听到乔治·贝兰和克

① 指1885年签订的中法条约。——译者注

列孟梭之间的一段有趣的对话。克列孟梭突然问贝兰：

“如果我们执政，您会不会撤出北圻？”

“是的，立刻撤出，但需要几个月的谈判时间，以便保障那些为了我们而在那里受苦的人的安全。”

“但是我决不会这么干，决不会！”克列孟梭立即反驳说。

由此可见，从1885年起，激进党的领导人就已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政党的命运真是妙不可言！今天，身为殖民部长的激进社会党人杜美尔格，掌管着辽阔的法国殖民地（而且干得蛮不错）。拉奈桑和杜梅这两位激进党人在印度支那执政的时间最长。克列孟梭的挚友和得力的合作者比松是驻突尼斯市的总督。为了使突尼斯免遭突然袭击，贝勒当比谁都更热心于发展宾泽特^①这一优良的军港。激进社会党人杜毕也夫在一篇脍炙人口的报告中，专门研究如何用一项经过深思熟虑、宽宏大量和合乎人道的政策来巩固法国在殖民地的势力。假如激进党人在1885年能心平气和地考虑问题，假如他们对自己和对国家都能做到襟怀坦白，他们就不至于向共和党的多数派挑起这场争论。这场激烈的舌战完全是人为的，因为激进党人原先已经接受——可能他们自己未必清楚这一点——他们所反对的那个解决办法。激进党人应该对共和党政府这么说：

我们曾尽力反对殖民主义政策，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项特别危险的政策。它之所以危险，因为它分散了法国的力量和资源，而且它还起到涣散人心的作用，成为政治寡头和社会寡头用来转移视听的有效工具。现在要让法国从北圻、马达加斯加和突尼斯撤出来，这并不取决于我们，再说我们也

^① 旧译比塞大港。——译者注

不反对议会通过向这些殖民地拨款的提案。

我们不愿意看到共和党人为了一个局部的、已经成为过去的问题而争执不休，以至影响将来。我们只要求多数派做一件事：要求他们向自己和向国家做出庄严的保证，保证不再进行新的征服冒险，不再把国内改革所需要的财力和物力用于这类冒险勾当。为了表达我们的和平意愿和追求民主理想的坚强决心，让我们组成一个进步的多数派，组成一个致力于改革的政府。我们面临的问题成堆：彻底进行教育的非宗教化；制定结社的法律，从而为政教分离创造条件；实行全面累进所得税收制，以便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制定人人平等的兵役法，服役期一律定为三年；颁布一项关于抚恤金和退休金的法律。如果你们不愿意一下子全部实行这些改革，你们至少应该与我们协商，在取得一致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明确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激进党的突然崛起向你们表明，国家并不害怕大胆的民主改革。这里有180名激进党人，他们愿意支持一个有诚意和有决心实现范围虽然有限但内容明确的纲领的政府。我们决不会戏弄这样的政府，不会给它设置陷阱，不会节外生枝，用一些临时想出来的、毫不相干的提案来找它的麻烦，不会要求它去做那些超越它和多数派商定的范围的事情。我们希望它能存在下去，并且采取行动。我们只想提醒全国的大多数人，我们集中力量要进行的那些初步改革之所以有价值，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将为以后更广泛、更深刻的改革开辟道路。我们知道，一项改革的实现必将引起其它改革，而且民主的原则有其固有的发展形式。

那些反对过激进党政策的共和党人和机会主义者保证说，他们的纲领始终是共和党总纲领的一部分；例如，彻底消除宗教对国家的影响，建立公正的税收制度，向弱者提供社会

救济等等，只是他们的方法与我们的不同。我们愿意与他们真诚地合作，为逐步实现共和党人的共同纲领而努力，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确认，共同纲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理想，他们必须和我们一起去争取至今还在犹豫不定的动摇分子。

饶勒斯的政治观点来自于他对法国现代历史的一整套哲学观点。不了解历史的深刻含义，不了解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就不可能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饶勒斯的政治主张之所以了不起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来自于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间·事·物，即公·众·事·务·的·统·一·性·和·连·贯·性。这是政治家同庸俗的政客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真正的政治活动家同摇唇鼓舌的蛊惑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判断事物，那么，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他也能够公正地对待，或者说正确地评价自己的政敌。事实上饶勒斯比谁都更善于判断和了解其它营垒里的人。请看饶勒斯在1904年是如何刻画最为极左派所憎恶的茹尔·费烈的嘴脸的：

当激进党人在议会一开始就犯下这个决定性错误时，当激进党人和整个共和派都身不由主地卷入一场盲目的混战时，各机会主义政党则抱成一团，幸灾乐祸地在一旁观望。他们没有公开地向社会党人提出联合行动的建议。

茹尔·费烈在过去的两年里，习惯于领导一个强有力的内阁多数派，但是这个多数派由于谅山一役^①的失败，宣告解散。他现在用愠怒和轻蔑的眼光看待一个不再受他领导的、支离破碎的多数派。茹尔·费烈因长年劳累而疲惫不堪，而且他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他置身于公开的和隐蔽的仇敌的包围之中，四面楚歌，无处可以申诉自己的意见，所以他的沉

① 1885年，温和派共和政府派出的侵略军在越南谅山遭到惨败。——译者注

默并不令人奇怪。要是他能够不顾别人的谩骂和攻击，抛开个人的烦恼，毅然决然地在新的多数派内部建立更广泛的铁的纪律，那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伟人！但他只限于在会外活动，躲在幕后，一心想笼络新来的人和为自己的前途盘算。他向代表不同政治色彩和内部不很稳定的各届政府秘密地施加影响。在总结一个被斗败的政治家——由于他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和思想的高度集中，他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经验教训时，他依然软硬兼施，力图通过自己的言谈来发挥影响。他在仇敌的重重包围之下，表现出巨大的勇气。要是他不耿耿于怀，不急切地希望那些反对他复出的势力会象他所预测的那样最终丧尽民心，土崩瓦解，那么，他的勇气就更加令人钦佩了。但是，茹尔·费烈在议会里却一言不发。瓦尔德克—卢梭也故意避免在议会里抛头露面。前部长们口口声声地替过去辩解，替他们自己所干的这件或那件事情辩解。

机会主义头目的全部态度表明，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一混乱不堪的局面，不知道如何同那些一度骗得民心并且左右议会的狂妄自大的“吵客”们进行谈判，以便达成和解。

于是，误会加深了。起初还只是一些过激的言词，后来“沉默的毒汁”完全毒化了双方的关系。而且从甘必大到费烈，机会主义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因此很难在1885年同激进党人接近。甘必大并不嫌弃共和民主的传统纲领，他只主张“分批”实施这一纲领。而费烈则始终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时机永远不会到来”。在他看来，改革不是主要的，只有治理国家才是主要的。他只关心内阁的寿命长短。

这倒并不是因为这位很有才干的人缺乏哲学头脑或者目光短浅。他之所以不愿意考虑将来的事情，因为关于资产阶级

的主导作用的观点使我不想看到任何突变。一天，我追问他，在他看来，最终的政治目标应该是什么：“您的理想究竟是什么？您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是什么？您打算把社会引向何方？”他回答说：“撇开这些问题吧！一个政府不必为将来的事情吵吵嚷嚷。”“不过，您终究不是经验主义者，您对世界和历史有全面的看法。您的目标是什么呢？”他想了一会儿，仿佛在寻找一个最能代表他的思想的说法，最后他回答道：“我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没有上帝和没有国王的人类社会。”如果他再加上“没有老板”这几个字，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完整提法。因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神权政治、君主制和资本主义，用思想和才能的自由合作来取代信条的权威、君主的暴虐和所有制的专横。但是他却停留在社会问题的门槛上。他是不是真的认为，人类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将永远保持其现有的经济形式？不，他对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认识。他反对德满先生，反对主张组织小生产同业工会的反动乌托邦，他赞同现代大工业，维护粗犷的和毫无约束的动物机械论，他的思想十分活跃，似乎也正在考虑进行新的变革的可能性。同业工会在过去是有用的，但它们的使命已经完成，各种组织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更新。

资本主义寡头所有制会不会消亡？这是可能的，但是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对此进行揣测。他认为，建立一个真正的新社会制度的想法不是一种能够影响现在、甚至能够决定不久的将来的力量。尽管如此，他对所有制并不抱有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偏见。他并不把所有制看成是“人的个性的体现和延续”。我曾听到他和阿兰—塔尔日之间的一场简短的争论。阿兰—塔尔日说：“所有制是一种社会组织。”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制只有通过社会才能建立起来，因此社会有权用一些

法律来调整和约束由社会本身产生的力量。茹尔·费烈回答说：“所有制首先是一种政治组织。”这就是说，它是防止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手段，而这类竞争是造成经济生活动荡不安的原因；它是产生领导阶级的途径，这个领导阶级将使业已巩固的利益在公众生活中保持其稳定性。对这位实证主义者来说，资产阶级共和制是进步和秩序这两大力量结合的产物。按照奥古斯特·孔德的观点，这两股力量是整个历史的组成部分。费烈在一次简短的，但十分精彩的讲话里谈到：“没有这个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就不可能建立任何持久的东西。”从此，他的思想便暴露无遗了。

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些预料之中的反抗能否最终阻止共和制的合法发展，问题在于大资产阶级是否会用现有的强大的手段来发动一场政治上的政变，或者起码发动一场经济上的政变；他们会不会用损害公众威信，开除工人，关闭工厂，以及制造失业、贫困和危机等办法，使刚刚萌芽的新制度蒙上一层痛苦和绝望的阴影。或者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力量会不会采取强大的和有步骤的行动，迫使资产阶级接受所有制方面的逐步和系统的变革。资产阶级在过去曾被迫接受普选制、结社的权利、工会的权利、关于限制劳动时间的法律、人人平等的兵役制；现在资产阶级正在逐步接受义务保险制度，即在法律上确认劳动和生活的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无疑还会接受改革运输业使之成为公众服务和进行市政社会主义的尝试。

这是一个摆在全体公民面前的重大课题，这是一个我认为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合法发展并采取下面两个办法才能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以便缓和习惯势力的反抗；其次，应该不断地大力宣传新思想，充分发挥社会党的宣

传力量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坚持不懈地提出合法要求，迫使资产阶级寡头在这种气氛的包围下，不得不逐步承认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可避免性，迫使他们无法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反抗上面，迫使他们精力分散，既想负隅顽抗——但只能是局部的和零星的反抗——又想通过审慎的谈判，了解新制度可能会在福利和行动方面给他们什么保证。

饶勒斯对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这是因为他在判断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时，总是以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所能达到的那个阶段为依据的。他曾说过，这是他们在自己活动的历史和政治范畴内，愿意并且能够做的事情。他们虽然完成了自己的事业，但他们并未由此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茹尔·费烈很愿意建立一个“没有上帝和没有国王”的人类社会，但他并未想到还应建立一个“没有老板”的社会。因此饶勒斯责备他“停留在社会问题的门槛上”。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历史的人立即会说：鉴于茹尔·费烈的阶级立场，他不可能不停留在社会革命的门槛上。饶勒斯忽略了这一点。他所感兴趣的是各种思想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各个政党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他们的分歧点。能够吸引他，能够对他产生魅力的是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不是使他们分离的东西；是历史的连贯性，是人以及事物之间的统一和协调。饶勒斯是一个伟大的统一论者，伟大的调和论者；他热情支持和酷爱统一与调和，主张人与人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建立真正的和谐关系。他热衷于把哲学、政治和社会三方面问题结合在一起，他是宣传世界大同并为之奋斗的勇士。崇高的思想境界，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再加上富有魅力的天赋和善良的秉性——这一切使他具备与其哲学观完全吻合的政治观和社会观。饶勒斯是当代政治生活中最有才华的人。宽广的心胸和非凡的才智是产生这样一位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伟人的原因。我们的时

代和整个法兰西都可以为他感到骄傲。

饶勒斯研究人和事物的方法是深入生活，置身于人和事物之中；这一方法使他更加容易理解布朗基和瓦扬。瓦扬是饶勒斯的得意门生，但他也曾是饶勒斯的敌手。1905年社会党统一以后，瓦扬成了饶勒斯的朋友和合作者。饶勒斯善于进行合法的活动，他是一位有觉悟的和通情达理的革命者。布朗基和瓦扬则一直鼓吹革命的方法。饶勒斯具有锐利的目光，从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从不为名人所吓倒。他能洞悉客观事物的本质，能在布朗基和瓦扬身上发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东西。请看他在1904年是怎样评价布朗基的作用的：

首先上台执政的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是贵族和僧侣的联盟。人民不是在革命政权的荫庇下和强制性的推动下，进行自我教育，从而由不自觉变为自觉地争取自身的解放。人民在反对反动政权的斗争中，赢得并行使自由的权利，维护并行使国家的主权。布朗基的设想无疑已经过时，再也跟不上思想的迅猛发展。人民没有乞求革命专政的帮助，便建立了共和国。这一共和国优先考虑的是发展和解放教育事业。

早在1885年以前，非宗教化和启蒙运动已经开始。但根据布朗基的说法，这主要是革命影响的结果。看来，单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就足以使这一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后来，虽然爆发了布朗基所希望的革命，但她并未依照布朗基原先设想的方法进行，而是采取了别的形式，即依靠全体人民的更加直接和更加广泛的合作。布朗基梦寐以求的巴黎专政和无产阶级寡头统治只不过是一场把年代搞错了的冗长不堪的序幕。冲破了牢笼的思想已经在向蒙昧开战，故这出戏从一开始就在完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

布朗基生前是否已经发现，他的那个革命业已完成？或

者因为革命采取了和缓与分散的形式，所以他一直迟迟不愿承认她？根据熟悉布朗基晚年情况的加布里尔·杰维尔的回忆，布朗基一向十分注意教育问题。对于布朗基来说，其它一切问题只是各党派玩弄的花招而已。他似乎曾一度希望克列孟梭把共和民主最大限度地引向自由和光明的境地：到那时候，自然会提出最终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这样的问题，法兰西将通过明智和自由的普选进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这意味着什么呢？不管这位多疑的革命者玩弄什么样的词藻，他事实上已经抛弃原先指望通过革命专政来进行启蒙运动的念头，他把希望寄托在共和法制上。这就是说，他希望通过普选制的实施来进行普选制方面的教育——教育和社会在他看来是一码事——从而他不再停留在口头上或仅仅依靠某个党派，而是实实在在地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但是，当时的许多革命者并未意识到，按照布朗基的观点，他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普选制时期。

从表面上看，这位冷酷无情、主张密谋的革命家阴沉忧郁，疑神疑鬼，一向沉默寡言。但是饶勒斯通过这些表面现象，发现布朗基首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积极从事共和合法活动的活动家，一个世俗教育的支持者。

瓦扬的情况更加有趣。正当早期社会主义组织——茹尔·盖得及其朋友们领导的法国工人党和主要受瓦扬影响的革命社会党——起劲地反对饶勒斯的时候，饶勒斯发表了一篇题为《瓦扬的哲学》的文章。他丝毫没有争论的意思。文章中的瓦扬以崭新的面貌，以进化论者，甚至可以说是以饶勒斯主义者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令人瞠目。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饶勒斯的敏感和他的思想的基本统一性：革命的发展。下面是该篇文章的大段摘录：

几个星期以来，瓦扬公民游离于喧闹一时的争吵和无关紧要的分歧之外，泰然自若地叙述他的方法的特点。他依然是一位战斗的革命家。不论在过去还是在将来，他都支持和鼓励被压迫者为砸碎身上的枷锁而进行英勇和短促的斗争。他痛苦地看到，人类的进步常常要用暴力来换取；他希望民主迅速壮大，从而使人民的行动变得更自由、更方便、更广泛，使无产阶级不再需要象革命的资产阶级那样，采用流血的手段来争取自身的解放。但是，他心里明白，究竟采取哪一种革命方式，这并不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自己。工人阶级也许有朝一日将不得不为了反对统治者的野蛮袭击和特权者的暴力，而奋起进行自卫斗争。“毫无理性”的民族主义会使“上等”阶级和中间阶级兽性发作，因此不能对完全的和平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瓦扬公民应该估计到革命时常会采取突然的和戏剧性的方式。

要想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饶勒斯用挖苦的口吻说——就必须乐观地为自己设想一些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获得成功的条件。

那些动不动就妄想给予决定性打击的人，或者那些希望通过一场灾难来彻底改造社会的人，都是半自愿地被一些空想迷住了眼睛。按照瓦扬公民的看法，随着社会主义学说的日益丰富，也就是说，随着社会主义越来越清楚地懂得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任何一种革命的思想都需要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经过长期的探索，才能真正反映这一规律性——那些人的空想就越发变得令人难以理解。

瓦扬公民的这一政治和社会哲学观是同他关于宇宙和生

活的总哲学观联系在一起的。他常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这实际上是概括他思想的最通俗的和在法语哲学词汇中最确切的说法。他确实受了德国哲学的伟大精神的影响，受了斯宾诺莎、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精神的影响。他是一元论者，对于他来说，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力量，不管它们表面上如何千差万别，如何相互对立，归根结底，它们在原则上、本质上和规律性上都是统一的。瓦扬不承认二元论，不承认所谓的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他厌恶唯灵论，因为这一学说把现实世界一分为二，因为它提出两个原则，而且必然地把其中一个原则置于另一个原则的专制统治之下。二元论就是对立的观点，在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中，其中必然有一股力量统治另外一股力量，除非它们之间能够互相平衡和抵消。

宗教把自然界的生命置于被人为地同躯体分离的灵魂的专制统治之下。基督教和唯灵论把世界置于上帝的专制统治之下。所以二元论带来了压迫和恐怖。相反，如果一切现象和一切事物只是同一种力量或同一种思想的各种不同反映，那么任何事物都不应试图压迫其它事物；这样，便可在普遍存在的、运动着的统一中，建立力量之间和事物之间自由的和不断发展的和谐关系。处于所谓的物质和精神之外的力量是什么样性质的力量？瓦扬公民似乎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怎么重要。

几年前，他曾明确地写道，一元论者，不管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去迎合向往世界统一的思想的需要，迎合不愿屈服于外界势力的生活的需要。我不打算在这里探讨这些重大的问题。我只想顺便说一下，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建立关于宇宙和生命

的学说的日子已经临近。

革命的资产阶级曾经有一部百科全书，无产阶级也应该有一部类似的，但内容更为大胆更为广泛的新百科全书。

它应该包括从康德、黑格尔、孔德、马克思直至勒南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观点，还应包括拉普拉斯、达尔文直至麦克斯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观点；它应向无产阶级介绍主要的成果和主要的流派，因为无产阶级希望有充实的生活，希望建立充满光明的世界，使个人思想的火花与社会生活的光芒辉映相交。

编写一部生动的社会主义百科全书是一项崇高的任务，这将由我们的党和全人类一道去完成。

* * *

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和必不可少的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经济力量的增长和人类力量的发展。即使当一种生活形式和社会形式急剧地转变为另一种生活形式和另一种社会形式的时候，革命变革还得靠人们的埋头苦干，靠不知不觉的调整，靠愿望和行动对特权的不断冲击，就象海浪对岸边的岩石不断冲刷一样。瓦扬公民厌恶一切导致僵化和绝对化的东西。例如，瓦扬指责法国工人党的土地纲领，不是因为该纲领主张暂时保留小农所有制，也不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过渡阶段，而是因为它把这一过渡僵化。纲领没有明确指出，小农所有制即使在被共产主义完全消灭之前，通过与共产主义接近或接触，仍然会发生某些变化。纲领还把小生产所有制看成是处于改革浪潮之外的一块岸边的石子。

这种细腻和深刻的哲学使他对一切过渡性质的改革，对一切酝酿和导致革命的微小变化都十分敏感。他和许多社会党人一样，不同意这样的论点，即在资本主义彻底崩溃之前，

一切类似过渡性质的改革、行动和机构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如同关于在黑夜尚未完全消失之前，天边不可能出现任何微弱的曙光的说法一样荒谬。

在资本主义的环境里，争取社会各阶层的声援和维护工人尊严的组织形式确实要比在社会主义环境里的组织形式低级一些，其效能也要差一些。但是瓦扬公民并不因此而认为，由于存在着新的组织形式和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组织。恰恰相反，他认为，争取声援和维护尊严的新型组织的多样化，最终将迫使那个中伤和贬低新组织作用的环境再也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 * *

依我看，我们目前应该努力保障向这一方向的稳步发展，并加快这一发展的步伐。我在下面扼要地谈一谈三个必要条件。

一、应该使无产阶级中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直至整个无产阶级，逐步掌握革命和发展的总哲学观。这就是上面讲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后还将谈到。

二、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阶级政党，这个党必须明确自己的最终目标，并善于在一切问题中——教育问题、个人所有制或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救济问题等——划分无产阶级应该遵循的阶段。这将是统一社会党的行动纲领草案。

三、这一发展和过渡性质的行动，这一过渡性社会，必须有一个与之适应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

瓦扬公民提出了分阶段发展的主张，提出了以日益具有人民性的法律来促进发展的主张，这说明他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能够制定并且执行这些法律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

因此,我认为,组成一个坚决支持左翼政府的左翼多数派是极其重要的,不管这个多数派怎样缩手缩脚,也不管这个政府怎样犹豫不决和残缺不全。依我看,它是把我们社会引向我们所向往的平等这一崇高目标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的粗陋的但必不可少的初级形式。尽管它在许多方面是羸弱的、支离破碎的和令人失望的,但它初步显示了略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所具有的组织力量。

现政府很可能只是在无力地和笨拙地反对教会和军国主义。但是它的对手是教皇、修道会、军队中仇视安德烈将军的小集团、以及象哥萨克人那样一味盲从的饥民。虽然有这些人在作对,但它还能继续存在下去。这说明,只要民主力量作出新的努力,只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无产阶级组织,那就完全可能组成更大胆、更能干的左翼政府。使我感到吃惊的是,继佩里埃、利鲍、杜毕伊、梅利纳、卡芬雅克等人执政之后,人们对这一有希望的征兆似乎仍然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永远是一个内阁派。(引自1901年1月8日的《小共和国报》)

饶勒斯根据瓦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充分加以发挥。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同宇宙和生活的总哲学观相联系的政治和社会哲学观。

二、这个哲学观应该是一元论。二元论带来压迫和恐怖。因此,统一性对于人类和社会主义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力量,不管它们表面上如何千差万别,如何相互对立,归根结底,它们在原则上、本质上和规律性上都是统一的。”

三、我们需要一部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它包括康德、拉普拉

斯、黑格尔、马克思、孔德、勒南、达尔文和麦克斯韦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观点。饶勒斯大概试图发动一场同狄德罗和达朗贝领导的革命资产阶级百科全书运动媲美的社会主义百科全书运动。

四、在实际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应该采取革命的循序渐进的办法，用以协调眼前的日常斗争和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关系，协调“运动”和社会主义“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使两者互相衬托。

五、为此，社会主义必须有：(1)一个有明确纲领的阶级政党；(2)一个相当灵活和进步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它能适应社会主义不断深化的要求。这只能是左翼的内阁多数派和左翼政府，只能是坚决实行民主的共和制。

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进一步阐明，为什么这些主导思想是饶勒斯政治活动和社会主义活动的基础。

饶勒斯的总政策

饶勒斯的总政策从属于他的社会政策或社会主义政策。他懂得，若要通过广泛和深刻的结构改革来建立一个新社会，首先必须保证世界有巩固和持久的和平，必须驱散战争的可怕阴影，必须彻底消除各国之间的仇视和不信任。在所有的问题上，饶勒斯从不满足于制定一项表面化的总政策，而是力求抓住事物的本质。为此，他常常深入地、具体地研究世界和法国的形势。他清楚地看到，靠武力维持的和平正在导致今天的世界各国走向崩溃，它使向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和平过渡的前景变得黯淡起来。饶勒斯不断谴责欧洲各国在这方面白白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1909年11月18日，他在批评戈什里提出的1901年度预算时，指出了这一始终威胁社会进步的危险。他说：

先生们，另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用武力维持和平所需要的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今天在欧洲各国的财政预算中占据主要地位，变成它们的沉重负担。预算中虽然还包括一些社会性开支，但是军费开支无疑是其中最大的一项开支。

军费开支的剧增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德国的财政赤字。尽管他们最近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收效甚微。

许多年来，德国没有通过一项重大的社会法令，它却在欧

洲市场上大肆抢购军火和船只，结果造成五亿马克的赤字。

英国政府的预算也出现了五亿赤字，其中很大一部分——一半以上——是用来追加军费开支的。在我们这儿，财政部长和整个财政部正在竭尽全力地要求增加二亿的税收，因为陆军和海军的经费又增加了一亿四千万。

先生们，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欧洲问题，也是财政预算问题；这就是说，关系到我们是否会陷于绝境的问题。

尊敬的戴奥道尔·雷纳克先生曾经呼吁缓和欧洲的局势，以便限制军备生产。我认为，我们首先能够而且应该分析造成欧洲各国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然后才能要求法国发挥她的巨大作用，消除造成苦难和不幸的罪恶根源。

反动派蛊惑人心的宣传无耻地攻击饶勒斯，说他故意贬低法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这是不值得一驳的。饶勒斯主张奉行和平、尊严和正义的政策，正是为了让法国更好地发挥她的崇高和伟大的作用。

饶勒斯知道，法国的政策取决于欧洲各国在制定自己政策时所处的条件。他力图了解它们的政策的实质：

财政赤字，经济萧条，每况愈下的局面固然是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但是导致局势紧张的最直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依我看——我相信，你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英国和德国之间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但始终是深刻和可怕的冲突。

这场冲突威胁着我们大家，并将加剧或引起其它冲突。就连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纠纷也只是英德之间激烈争夺的一个插曲和一个侧面。我认为，如果在巴尔干半岛的动乱中，没有英国和德国的插手，整个巴尔干问题便能较为顺利地获得解决。外交部长先生恐怕不会不同意我的这种看法。

因此，先生们，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关系到欧洲和法国命运的问题，同时也是关系眼前利益和财政开支的问题。这就是说：欧洲各国是否应该长期维持目前的制度；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冲突是否将永远继续下去；为了这种靠武力维持的和平，我们大家是否还将负担沉重的军费开支；它们之间的冲突会不会导致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大规模战争；或者这场冲突会不会慢慢缓和下来，最终通过和平方式获得解决；法国能不能在这方面发挥其作用。先生们，尽管你们可能会认为我有点过分乐观和轻率，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一冲突是可以和平解决的。鉴于法国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她有责任为促使这一冲突的和平解决贡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如果我这么说，恐怕不能看成是对祖国的不恭吧！

如果我现在说这些充满信心的话，这还因为眼下有迹象表明，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正在趋向缓和，似乎已经出现一丝希望。不久前，英国自由党政府总理在市长先生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一席讲话使你们感到鼓舞。他说，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有希望变得越来越正常和亲密，两国没有什么理由需要互相敌视；两国的有识之士都持有这一看法。

但是，如果我希望和平解决冲突，如果我认为我们可以为此作出努力，这倒不完全是因为我听到了这些官方人士的讲话，而主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德国和英国最终必将明白，假如两国之间爆发战争，这对它们来说，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请法国议会允许我再三强调这些问题。我不会添枝加叶，信口雌黄。不过，今天世界的事情就是这样错综复杂。对一切灾难和冲突的反应必然是：如果不关心世界和平，就无法解决国内的问题。

要是事情确实象我所认为的那样，我觉得很有必要通过正确的分析向诸位说明：德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现在并没有发生冲突，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法国可以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我想说，德、英两国人民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对他们来说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饶勒斯在这里指出了欧洲形势中具有悲剧性的一点：英国和德国的冲突。他看到了危险所在。他的手指已经触及到这一迫在眉睫的灾难。但是他不愿意完全相信这一点。他知道，战争不仅是犯罪行为，而且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他力求消弥这一危险，防止这一犯罪行为的发生，制止这一疯狂举动。要是两个文明大国之间发生战争，那实在太荒唐了。因此，他不能接受那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饶勒斯以其清晰的头脑、雄辩的口才和丰富的经济知识，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了自已的作用。他最清楚不过地指出，这类互相残杀是毫无经济意义的。

不管德国的海军力量明天将变得如何强大，不管其舰队能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找到什么样的避风港或基地，德国的海军根本经不起几次短促的袭击，德国的经济力量也无法支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先生们，你们从每天报刊上刊登的数字中可以看到，在我国经济缓慢发展的同时，德国的工业生产却在高速度地增长，它在很多方面——我并不否认这一点——确实很了不起；但是德国的经济力量并不是坚如磐石，它不是建立在过去逐步积累的雄厚资本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贷这一脆弱的基础上……这好比是一座雄伟壮观的高塔，其根基却十分浅薄，稍一震动，便有倒塌的危险。

不久前美国发生的危机对德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就是明证。由于金融货币危机，美国的购买力一度受到限制和削弱，

结果在德国引起严重的危机。

德意志民族的祸根，德国工业的祸根恰恰在于在和平时期构成其力量的那种组织形式。德国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一是工业和银行紧密相联。银行家们操纵、管理、领导和控制着各个工业部门。

这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因。这种组织形式使德国工业在竞争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使它能够从长远利益上来考虑问题。但是，由于工业通过银行与整个信贷联系在一起，而信贷容易发生我所说的那种波动，因此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势必从根本上动摇德国的经济力量。

有头脑的德国实业家都懂得这一点。一年前，金融家们在柏林举行会议。他们发现，任何一场战争都将给德国的财政和经济造成深刻的混乱。

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不仅将给德国经济带来灾难，还将在英国引起深刻的政治危机。饶勒斯描述了英国国内的形势。

对于英国来说，危险并不小一些，虽然其表现形式不尽一样，但危险的程度却是相同的。英国的力量固然相当强大，不过，她目前也是困难重重。她不满足于海上霸主的地位，不满足于为本国的船队寻找避风港和供应基地。她虽然拥有大片殖民地，但是，在非洲、亚洲，在所有飘扬米字旗的地方，人民已经开始觉醒，开始采取行动。土耳其的革命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当新土耳其的一位高级外交官员指出，埃及的命运已经最后决定的时候，开罗和康士坦丁堡却爆发了大规模起义。

英国政府在印度陷入困境。日本人民的斗争波及整个亚洲。在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敌视运动和暗杀事件此起彼伏。各种团体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大规

模的群众集会接连不断；抵制英国货的运动日趋高涨。大部分宗教团体要求英国给印度更多的自由。在这一运动的最左翼，或者按你们的说法，在这一运动之外，革命的暗杀活动极其频繁，有点象 20 年或 25 年前爱尔兰的情况。英国政府不敢悍然下令镇压，因为世界各国的沉默就是对这类运动的消极支持。

前天又发生一起暗杀印度总督的事件。刺客把镪水注入椰子壳内，制成炸弹。这是欧洲文明和亚洲大自然巧妙结合的象征。

先生们，这是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运动，它使英国的有识之士深感焦虑。英国自由党政府的做法很得体：目前，英国政府不打算镇压和遏止印度的骚乱，不打算扼杀日益觉醒的印度人民渴望独立和自由的迫切要求，不打算采取高压政策。它准备逐步地给印度人民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利。两天前，即发生刺杀事件的第二天，总督一字不改地宣布关于建立经过长期酝酿的新体制的决定：保障印度享有新的权利，增加立法会议代表的名额，广泛吸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代表参加，而英国官员在这一机构中将只多占三个席位。同时，他还宣布设立权力较大的省议院，选举产生的各个团体的代表和印度教地区的代表将在这一级议院中占据多数。

毫无疑问，扩大自决权的范围是维护和协调人民自主权同欧洲各国和解原则之间关系的途径。但是，一旦爆发战争，一旦战火蔓延开来，英国势必无法克服她所面临的困难。在正常的和平时期，她则完全可以凭借自由的精神，采取果敢的行动，战胜这些困难。

饶勒斯预见到，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流血冲突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他看到了一个企图从战争的废墟中捞取好处的可怕的竞

争对手正在崛起。这就是美国。

伟大的德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不愿互相残杀，不愿把世界拖入战争冒险中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

正当德国和英国互相嫉妒，在世界各地明争暗斗的时候，美国正在崛起，它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长期以来，美国只出口原料，而现在已转为自己加工原料，出口制成品。例如，它现在不但出口原棉，而且向世界各地倾销棉布。它的对外贸易增加了一倍。两个月前，美国总统塔夫脱在国内作了一次宣传旅行，行程长达一万四千公里或一万五千里。他反复强调这样一种想法：美国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建立一支商船队。美国越来越积极地参预世界经济生活，参预各国之间的经济冲突。

英国人和德国人曾因为在中国修建铁路而发生争执。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便言归于好，开始合伙。英国人起初承包最长的一段铁路。德国人从中插手，向中国提出更为优惠的条件。英国人和德国人，再加上后来的法国人，成立了混合委员会。他们之间刚刚达成协议，美国就不通过本国的企业家和商会，而通过驻北京的代表正式提出抗议：“那么我们美国呢？”美国也要求参加在中国修筑铁路。美国的经济影响和野心正在日益增大。

英国人对此十分清楚，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许多弱点。你们是否知道，英国从国外进口的食品中，有41%来自阿根廷共和国？美国认为，要是它能控制阿根廷的经济，它就能进而控制英国的全部生活。于是，美国肉类食品托拉斯在阿根廷大办企业，致使英国政府和保守党的各大报刊感到严重不安。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说明，如果英国和德国互相厮杀，彼此削弱力量，美国就会利用它们之间的不和，趁机扩大自己的市场，把网撒向世界各地。这样一来，一个更加强大的美国将出现在它们的面前。

1914年和1915年发生的事情完全可以证明，饶勒斯的观点和预见是正确的。

饶勒斯透过欧洲战争的可怕阴影，还看到了土耳其和中国的觉醒。

促使英国和德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的第三个原因是，使欧洲各国垂涎三尺的那些地区的人民逐渐拒绝成为掠夺的对象。土耳其和中国正在要求摆脱外国的经济控制。

在哈米德政权下，土耳其在小亚细亚的铁路工程几乎全部让德国人包揽。年轻的土耳其并不想驱逐德国的势力，它继续让德国人在小亚细亚的铁路中拥有许多股份。但是，不久前土耳其同意英国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享有较大的通航权，因为它想通过巧妙的平衡，来保障自身的自由。

另外，你们可以看到，中国越来越巧妙地在对她垂涎欲滴的各个列强中间周旋，让它们互相竞争、互相对立，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权。

因此，那些企图用武力打垮对手进而称霸世界的人肯定会对此感到大失所望。

两国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不仅那些正在虎视眈眈的外部势力会趁虚而入，而且国内也将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每一个有头脑的德国人和英国人不可能不看到冲突的严重后果，不可能不看到，加紧扩军备战必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先生们，这是使用武力的应得报应。正如贝尔特罗先生所说的那样，涅墨西斯神^①正在密切注视一切可能导致战争和武力的行动：人民感到厌倦的这一天日益临近。有些人不顾人民的疾苦，一味迎合贪婪和专横的资本家的要求，使战争危险日趋严重；他们还拚命搜刮民脂民膏。但是，算账的日子必将到来。到那时候，他们将面临可怕的抉择：或者要求统治者做出牺牲，但他们只想从战争中捞取好处，根本不愿承担战争的费用；或者用增加税收的办法，让遭受剥削的人民做出新的牺牲，但是这样一来，人民必将奋起反抗，将会提出种种要求，这就是说，扩军奋战将引起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使那些冒险分子丧魂落魄，因为他们原以为只有战争的风险，但是他们却招致了革命的风险。

饶勒斯是维护国际和平的不朽战士，他从来不是那种认为只要口头上高喊“和平”便能消除战争阴影的乌托邦分子。他既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对战争的危险性从不采取自欺欺人的态度。相反，正因为他看到了这一危险性，所以才起来进行斗争。他的观点是主张积极行动的观点，而不是认为战争无法避免的观点。战争的紧迫性迫使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斗争，更加坚定了他为消除这一危险而斗争的决心，更增强了他的斗争意志。他为创建一个美好的世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决不会因为邪恶势力过于强大而临阵脱逃。他知道，人们为了进步事业所做的任何点滴努力都不是白费的。饶勒斯不但看到了战争的威胁，而且也看到这一威胁来自何方。他揭露说：

先生们，我们决不会对战争的危险性熟视无睹，我们希望法国采取明确的立场。德国和英国各政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复仇之神。——译者注

是希望和平的。但是，只要国内存在着蠢蠢欲动的冒险集团，哪怕他们只是一小撮，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果各国人民放松警惕，少数人在外交上的轻举妄动或阴谋诡计，都会出其不意地导致一场巨大的灾难。

我知道，虽然绝大多数德国人希望和平，但仍有一小撮人跟在施里曼博士后面叫嚷：一旦德国和英国之间发生冲突，法国将成为人质。似乎法国很容易被当作人质。

至于法国，饶勒斯希望她“不要有任何别的想法，不要在暗地里搞什么报复政策”。民族主义者因此而对饶勒斯怀恨在心，指责他打算放弃法国收复在1870年失去的省份的权利，放弃“报复”的机会。我至今还记得利鲍先生在议会讲坛上发言时的情景：那一天，他激昂慷慨地——不知他真的动了感情，还是在装模作样——提请饶勒斯注意不要伤害爱国主义的“崇高情感”，不要放弃恢复权利的机会。

但是，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行动上，饶勒斯从来没有要求法国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他只希望不要通过流血冲突来收复失地，希望通过自由、理智和民主制度的正常和不可避免的发展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冲突只会在旧的废墟上增加新的废墟，只会在原来犯罪的基础上再次犯罪。他清楚地懂得：战争不但不能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而且还会引起新的问题；它只会给交战的双方带来害处，造成无法收拾的复杂局面；它只会导致新的疯狂行为，因为有人将会借口消除过去的疯狂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采取新的报复行动……饶勒斯热爱自己的祖国，不愿意看到法国身上的旧伤刚刚痊愈，立即又增添新的、更可怕的创伤。饶勒斯是最伟大、最有远见和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亲身经历了昔日的种种苦难；每当他想到这些苦难还有可能重演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变得十分沉重……

下面是他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充分地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最真挚的爱：

所有象我和我的朋友那样真诚地希望和平的人，所有希望法国不要有任何别的想法、不要偷偷制定报复政策的人，都应该看到，有人在威胁法国：“法国将成为奴隶，将为另一国家的政策效劳，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属地”，这时，如果法国能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她希望和平，不愿卷入任何冒险行动，那将是对这些恫吓者的最有力的回击。

这是我要说明的一点。此外，我想补充说明：一方面，我们必须向莱茵河彼岸的某些泛德意志集团讲清楚我们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不希望英国的运输业主和资本家产生错觉，误以为我们将参加一场蓄谋已久的对德战争。

施里曼的话刺痛了你们的心。我承认，我也不喜欢英国的《伦敦世纪报》上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说，英国应该尽快建立一支远征军，以便更有把握地把我们拖入未来的冲突。

任何人都无权摆布法国的命运。我要说，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英国和德国之间发生冲突，我们是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一定作用的。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大声宣布，我们不愿卷入任何冲突，不愿参与任何阴谋，我们希望自由地致力于世界和平。

戴奥道尔·雷纳克：饶勒斯先生，我们的这一做法在萨多瓦没有获得成功。

饶勒斯：雷纳克先生，我在一开始引用你主张限制军备的那些话时，曾经指出，光有 *Pium votum*——真诚的愿望是不够的，应该有勇气正视困难，并着手解决这些困难。我觉得，我这么说是完全有道理的。

导致法国在萨多瓦的做法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奉

行了我所主张的光明磊落的政策；恰恰相反，那时因为我们奉行了一项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政策。正当德国内部趋于统一的时候，法兰西帝国不懂得，也没有勇气出来加以反对；同时，它也没有勇气接受这一事实。它不起来反对和制止这种局面，只是在心里嘀咕和为自己打小算盘。它悄悄地对德国说，法国不会接受德国的统一。由于帝国奉行了一项含混不清和自欺欺人的政策，结果引起一部分人的恐惧和另一部分人的错觉。这就是法国失败的原因。至于我，我则希望法国能这样说：

法国应该成为一个骄傲和独立的国家。她不愿受人欺负和蹂躏，不愿受别人愚弄，为别人的阴谋效劳；她不愿为了单纯的报复而牺牲世界和平，不愿看到世界的和平事业断送在邻国中某些诡计多端的资本家手里。

依我看，这是一项十分明确和有效的政策。它丝毫不要求放弃权利，也不谋求征服别人的权利；它相信，随着民主和平信念的增强，将会对权利作出公正的修改。

法国和德国的关系史中有两个主要的事实：首先，四十年来，法国在遭到惨败而处于孤立的最初阶段，并没有屈服，没有丝毫奴颜媚骨，她一直坚持维护和平。在这一时期，由于人们对战争还记忆犹新，复仇的政策本来可以获得更为强烈的反应。无论在那时候，还是在同俄国和英国结盟和友好的时期，法国从不打算用武力提出赔偿的要求，从不打算把世界和欧洲的命运寄托在实力和战争上。

同时，还必须记住另外一个事实：在这四十年里，阿尔萨斯——洛林显示出法兰西的强大生命力。1870年战争失败后的十年、十五年里，该地区的人民曾在希望和忧虑中期待着某些人低声议论的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以便摆脱外国的统治。

但是当他们看到一年年过去了，在麦茨的议员安东尼发表强硬的意见之后，再也没有人为他们说话时，他们自己就拿出真正的勇气来。阿尔萨斯——洛林人民不再把恢复正义的希望寄托在命运和武力上，他们懂得，他们的责任和出路在于：在欧洲目前的版图内，保持其原来的思想特征，在征服者的统治下，永远保持珍藏在心灵深处的法兰西精神。因此，先生们，在阿尔萨斯的资产阶级中间，在阿尔萨斯人民中间，法兰西文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广泛地传播过。

饶勒斯把那种要求给被并吞的省份以更大的自治权的呼声，把反对普鲁士官吏暴虐的保护性措施，看作是进行和平报复的一个步骤，看作是争取阿尔萨斯——洛林人民继承和发扬法兰西文化的权利的一个步骤，看作是“法兰西文化和德意志文化”和解并导致两国和解的开端。

饶勒斯是一位机灵能干的议员。他在同一次讲话中，考验统治阶级的爱国心。他说：

好吧！就算你们是爱国的。请你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证明这一点。解开你们装满金子的口袋，把钱拿出来，捐献给祖国。把你们的一小部分收入作为税金捐献给法国吧！请以民主的精神组织我们的国家，使她为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一切财富的人民服务。请效法英国的榜样，因为英国发动了一场旨在彻底改革税收制度的伟大运动，并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下，制定了民主改革的广泛计划。

当时，正值1910年大选的前夕，饶勒斯利用这个机会来激发人们的觉悟。

我清楚地知道，最初征收所得税并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我同样知道，按其性质而言，这一税赋将随着项目的增多而增加。因此，在紧急关头，你们满可以象英国那样，用提高

所得税的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很关心财政预算的平衡。我们不会玩弄什么把戏：一面投票赞成进行社会改革，一面却反对国家相应地增加财政收入。但是，我们有权要求国家的这笔收入符合民主的纲领、要求和学说。

对于我来说，只要你们不同意实行全面的累进制所得税，任何关于增加新课税的建议都将是不自觉的混淆视听。

请你们想一想，这一拙劣的政策将会使共和党的内阁多数派，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将会使整个共和党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呢？数月之后，你们将回到全国各地去，把新的课税带回那里，但是其中不包括所得税的问题。农民将会对你们说：有的税你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起过；例如，你们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你们将提高酒精的税收；你们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你们将恢复酒的流通税。凡是你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起过的课税，你们都投票赞成。只有一项税收，你们跟我们说了整整十年，却仍不见下文。由此可见，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

先生们，请允许我对你们说，事实上，我们这种毫无远见、毫无用处和死气沉沉的政策同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充满朝气的政策形成了令人痛心的对照。是的，在海峡的那一边，确实有一个伟大的党，这个党与我们的党不一样，它敢于对国家承担决定性的责任。有人诽谤说，英国的预算具有社会主义的味道。这太荒唐了。只有在那些决心审慎地、逐步地把生产资本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的地方，才是社会主义。英国预算的目标并不在于此。这样的预算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历来反对贵族垄断土地的英国个人主义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要求，因为工人们希望退休法和即将颁布的失业救济法不受税收制度的影响。在这场波

澜壮阔的运动中，英国民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胆和果敢。

内阁总理兼内政、宗教事务部长阿里斯底特·布里安先生：饶勒斯先生，您所要说的就是坐在这里的内阁总理吧？

饶勒斯：内阁总理先生，我想用巴斯卡的一句话来回答您：如果您不懂我的意思，您就不会向我提出问题。

唯一使我们感到苦恼的是：不管人们怎么说，不管人们怎样指责国家保守或过激，目前，我们的缺陷是，国家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缺乏足够的认识。

请各位听明白，我并不要求国家的各个部门都成为典范。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国家在人民的监督下，毫无组织和管理的能力？不。这是因为国家在工业部门中常常受到谴责和反对，得不到支持……人们不是积极地组织国家，而是热衷于泼冷水和拆台。

我不想就国家和个人关系问题同茹尔·罗歇进行纯理论性的辩论。……

茹尔·罗歇：这不是纯理论性的辩论。

饶勒斯：我认为，根据您的措辞来判断，这是抽象的辩论。

茹尔·罗歇：如果您愿意使它具体化……

饶勒斯：您和我坐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认为，从广义上来说，个人和国家的对应关系是抽象的。如果没有刚毅、积极、果敢和自由的个人和公民，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如果国家不够强大，不能给个人的发展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个人也就不可能完全自由。对于生活低于一定水准的个人来说，单纯的自由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对于生活水平低于最低标准的个人来说，对于被愚昧、无知、贫困、疾病压得喘不过气的个人来说，自由只不过是残酷压迫的代名词而已。

正当我们在公民面前大肆颂扬祖国的时候，正当我们要求全体公民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或利益的时候——这不仅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而且也是为了在国家的旗帜下，间接地保护那些因生活极端困苦而放弃单纯的个人自由的人的利益——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居然贬低、侮辱甚至丑化国家，这真是咄咄怪事！

依我看，我国历史上的最大不幸是国家的形象被丑化，刚刚兴起的我国工业被丑化。

有一次，勒鲁瓦-博利约在这个讲台上，驳回了某一建筑师提出的一项需要五亿投资的很不恰当的工程预算。他便根据一个建筑师的错误，来衡量整个国家的能力。

比埃尔·勒鲁瓦-博利约：这并不是唯一的错误。

饶勒斯：如果把私人资本所造成的浪费同我不想否认的、由国家造成的浪费相比较，我不知道哪一个更为严重。

我再次声明，我丝毫不想原谅国家的缺点，也不想延长不好的制度的寿命。应该建立新的监督条件，应该号召议员们和公民们，号召消费者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对国家进行严格的监督，使整个国家变得井井有条。但是，我们决不允许有人借用所谓现代资本主义秩序的名义，对国家的集体行动进行类似的攻击。为此，饶勒斯要求：

……实行累进制遗产继承税，垄断酒精的生产，垄断保险事业，收回大型矿山，由国家管理大型水利电力部门，以有组织的民主制度来监督国家各工业部门，并在这些措施的有力推动下，制定出关于残废、失业、疾病和住房的社会保险法令。税收制度方面的大胆改革将有助于在其他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

必须讲清楚这一点。政府应该抛弃犹豫不决的态度。

饶勒斯从不把国家同人民对立起来，就象他从不把军队同人民对立起来一样。作为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把国家看成是“组织起来的人民”。国家本身不是产生弊病的根源。不这样认为，那就是把组织本身也看成是一种弊病，而这一组织恰恰是朝气蓬勃的、不断发展壮大的秩序。为了捍卫国家，饶勒斯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当资产阶级从国家那里捞到尽可能多的特权和利益之后，一旦国家用自己的力量为工人阶级谋福利时，他们便高声叫嚷：行啦，到此为止！他们指责国家挥霍浪费，然而，私人资本却可以肆无忌惮地浪费。他们指责国家滥用权力。但这只能说明对国家的监督不够有力，国家还不够民主！仅此而已。

显然，饶勒斯在这里讲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他是根据国家的sub specie aeternitatis——永恒的职能——来谈论国家的，即国家是社会的组织者和总利益的一贯捍卫者。简而言之，饶勒斯只想了解亚里斯多德、霍布斯、黑格尔和费希特所说的国家。

很遗憾，无论是现代的国家，还是古代和封建的国家，都不是理想的国家。除了总的职能之外——这是国家的真正职能——现代国家的首要职能是维护建立在寡头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现有秩序。它首先必须冒着被消灭的危险去完成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具体职能。只有当它完成捍卫现有秩序的使命，从而证明它的用处时，它才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本着同一个社会民主纲领的精神，饶勒斯不停地抨击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

1913年11月27日，他在议会的讲台上大声疾呼：

是的，为了今天和明天，为了未来，现在是制定新政策的时候了。关于摩洛哥问题，我不想重提昔日的争论——议会知道我们的立场和我们所做的努力——我只想对你们说，今天，你们是否打算拨出大笔经费，以便再次派远征军去摩洛

哥？你们正在准备新的远征，就象大选以后你们准备制定新的课税一样。不过，姑且可以原谅你们这一点……

四天前，《法兰西军队报》——你们知道，这家报纸很了解内阁的内情——透露了计划的具体内容：不对塔扎地区直接采取行动，因为在那里的崇山峻岭中，无疑会遇到难以战胜的抵抗。其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摩洛哥的山民将被来自非斯和西部的军队包围。这场远征正在周密的策划之中。不知身为财政部长的杜蒙先生是否会事先签署这项计划？不管怎么样，我要求政府不要利用议会盲目同意拨款的这种情况，致使国家再次耗费大量的财力。

你们在这里，在议会中，可以为摩洛哥做件有益的事：按照公正和温和的法律去管理那个国家，使人们忘掉历史上的野蛮征服。如果你们采取公正、人道和克制的态度，你们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进入那些高山地区；如果你们不盲目地采取行动，处处谨慎小心，如果你们懂得，你们无权让一个财政面临枯竭的国家再以高昂的代价去换取什么荣誉，那么你们至少能够把用于摩洛哥的经费减少一亿；而且，如果你们决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全民族皆兵的伟大理想，你们还可以在短时期内把目前正常的军费开支减少四亿。

饶勒斯知道，殖民政策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是，他一贯要求奉行人道的、公正的和明智的政策。在殖民地问题上，饶勒斯始终主张和平渗透。这不仅仅是出于利他主义——这个原因本来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而且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还出于作为一个目光敏锐、思想开阔的政治家的考虑。他从来不把明显的国家利益同权利和正义的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利益割裂开来。可以这么说，饶勒斯在制定社会政策和道德政策方面，是一位天才的先驱者。他是协调利益同正义、权利以及明智政策

之间关系的天才先驱者。一句话，他是制定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策的天才先驱者。

饶勒斯在政治斗争中也采用一些手腕，但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为崇高的事业服务的。为了争取权利，他在议会里不完全拒绝使用马基弗利的手法。饶勒斯善于运用策略，熟知政治家的，甚至政客们的“花招”。如果他有时玩弄手腕，那是为了挫败对方的阴谋和实现远大的理想。

饶勒斯不知疲倦地揭露一切旨在反对和平的阴谋。1913年11月，即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这位和平的忠实信徒在法兰西议会的讲台上，再一次为真正造福于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国际和睦的神圣事业——辩护：

这些年来动荡不安的局势究竟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外交上的风云变幻，各国领导人之间频繁的接触和书信往来，各色人物的粉墨登场——这一切究竟带来什么好处呢？那种制造流血和死亡的政策究竟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都在衰退，只有军费开支扶摇直上，只有贫困令人沮丧地加剧了。

目前时机极为有利。时机确实已经成熟。

伟大的和平力量在这一混乱的局势中，依然坚持斗争。人民，人民中间头脑最清醒的人，最明智的民主党人，欧洲各国中最诚实的公民，足以使惊慌失措的政府恢复镇静的数以百万计坚决要求和平的无产者——所有这些人组成了这支和平力量。但是他们缺乏组织，行动分散。因此，需要有一个继承法国大革命的传统、支持各国人民自由与和解的政府，以便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和平大军，组织起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大军。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在体现这一精神的过程中，在目前还显得不够有力的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有三个国家的人民

与冲突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能够在一起发挥调解人的作用，这就是：德国、英国和法国。

是的！米拉波在革命爆发前夕，从普鲁士朝廷写信来，曾说过这样的话：“当德国——那时候叫普鲁士——英国和法国步调一致，和睦相处时，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革命便将宣告成功。”

爱德华·瓦扬：这是千真万确的。

饶勒斯：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但请注意，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社会大动荡的前夜，正是后来席卷全欧洲的法国大革命的前夜。请注意：今天，各国群众正在苦难的深渊中绝望地挣扎，压在他们身上的负荷越来越沉重。德国无产者面临失业的威胁；英国无产者在工会的领导下，正准备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总罢工；法国无产者中间孕育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在欧洲，在世界其它地区——例如在南非，贫穷的印度籍工人正在奋起反对资本主义——劳动人民倍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庞大的战争机器的剥削，怨声载道；他们正在组织起来。如果你们不接受社会党的建议，法国以及整个欧洲都将发生可怕的骚乱，我们衷心希望的合法发展的可能性也将因此而不复存在。

饶勒斯所说的建议是由社会党议员联名提出来的。该提案指出：

议会不安地注意到，由于迫不及待地进行殖民扩张，由于欧洲各国大肆扩军备战，由于维持一支保守的、反动的和庞大的国防军，国家的负担大大加重了；

议会确信，这一沉重的负担必将引起物价飞涨和危及国家的生产能力；

为此，议会要求政府：1)限制在摩洛哥的行动；2)建立民

兵,逐步缩短服兵役期,削减职业军队的经费开支;3)建议各国政府接受国际仲裁,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和纠纷。由法国出面,着手建立一个减轻人民负担的国际新秩序;

议会决定暂停讨论拨款问题,直至政府就上述要求向议会作出积极的保证为止。

饶勒斯所希望的和平决不是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和麻痹人们思想的和平,而是积极有效、生气勃勃的和平,是足以建立起强大的新法兰西的和平。这个思想支配了这位政治家的光荣一生。他在1887年12月31日的《图卢兹电讯报》上写道:

法国并不想低三下四地乞求和平,但她希望和平。她需要和平,以便发展自己的经济。由于长期处于危机状态,她的经济即使没有倒退,至少也是停滞不前。她需要和平,以便完成业已开始的伟大事业:在曾经经历过无数次互相矛盾的革命的国土上,最终建立自由的制度;通过不断摸索,实现宪法中规定的、适合法国国情的普选制。国内的民主要求日益强烈,人们正在寻求建立民主与和谐的道路。必须解决巴黎向整个法兰西提出的巨大的问题,这一问题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上伟大和艰难的业迹。但是,只有在安定和平的环境里我们才能把所有这一切告诉全国每一个人。我们面临的问题成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希望战争呢?

有人说:“必须结束靠武力维持的和平,因为这种和平的代价太大了。”饶勒斯反驳说,“由于人口、资本和劳动强度的增加,现代国家变成了身强力壮的巨人”,因此国家还能够长时期地负担庞大的国防预算。“不过,一场新的战争是否能最终导致裁军呢?”饶勒斯不安地问道,“即使我们赢得了战争,我们是不是肯定能把对方打得一败涂地,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此高枕无忧呢?”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我们应该自始至终坚定地奉行和平政策,不要神经过敏。”

我们不但需要和平，而且为了“继续我们的事业”，我们需要“相信和平”。而对战争的威胁，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拿起武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但是，在1887年，他不相信战争会爆发。

在这一点上，饶勒斯从来没有动摇过。反动派出于恶意和无知，竟然指责饶勒斯企图使法国在全付武装的德国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保持清醒的头脑，拿起武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这就是饶勒斯的一贯要求。

饶勒斯认为，单方面裁军和所谓的内部裁军是对祖国的背叛，因为反动派正在发出疯狂的叫嚣和从事罪恶的勾当，正在拼命制造战争气氛；然而，反动派并不知道，他们的这种危险而又可笑的做法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饶勒斯希望法国强盛和受人尊重。同时，他也知道，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但要看它拥有多少武器装备，而且主要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体制。1904年，他在圣埃蒂安发表了一次演说。下面便是《社会主义评论》根据当时的记录稿整理的那次讲话内容：

事实上，无论是僧侣还是民族主义者，谁都不敢说自己希望战争，否则将会招致全国的反对。但是，和历史上一切感到日暮途穷的反动政党一样，他们在心底里却暗暗希望战争，把战争看成是转移国内视线的法宝。战争一旦爆发，我们揭露过的那些造谣惑众的骗子便会纷纷出笼。

战争一旦爆发，僧侣们就会说：“世界正在燃烧，而你们还想继续神父和修女之间的争吵吗？你们出兵中国，那里急需我们的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想分散传教士的力量吗？”对于僧侣、教士们来说，对于策划屠杀和政变的将军来说，对于代表压迫和黑暗势力的、受到我们无情鞭撻的反动分子来说，战争是一根转移视线的救命稻草。我们百倍憎恶战争，因为战争是野蛮、不人道和反动的。

饶勒斯从未忘记，在法国和德国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阿尔萨斯-洛林问题。这两个省份“在感情上一直是属于法国的，而且应该在事实上归还法国”。饶勒斯把这个问题归纳为：“我们是否相信法国民主的前途？我们是否相信德国民主的前途？”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我们就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念：“从广义上来说，致力于民主，就是为祖国效劳。”他不愿意对德国搞什么“把拳头放回口袋里的政策”。他在1887年依然坚持反对茹尔·费烈接受俾斯麦对中法问题的干涉。因为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同掠夺我们国家的人进行谈判。只有当两国以凯尔桥为界时，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对话才能重新开始。”

他在1887年写的一篇文章，表达了他的一贯思想：

实际上，我们必须回到法国大革命前的对外政策上去；我指的是法国侵占比利时以及拿破仑发动侵略之前的对外政策。只有通过权利和对权利的认识，我们才能恢复我们在欧洲的地位。只有通过耐心和对未来的认识——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可以称之为希望——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在欧洲民主中，确保我国领土的完整（见1887年12月31日的《图卢兹电讯报》）。

1887年和1888年是和平的关键时刻：这两年里，发生了施奈倍雷事件^①，布朗基主义也取得了进展。欧洲上空乌云密布。饶勒斯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镇定自若。为了赢得和平，“必须相信和平”。他有力地驳斥那些妄图通过战争来永远摆脱军国主义的蛊惑者：“人们不可能用战争来摆脱战争。”（见1888年2月12日的《图卢兹电讯报》）。

^① 施奈倍雷是法德边境上的一个村庄。当时在那里发生了一次几乎引起法德两国冲突的边境事件。——译者注

饶勒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他认为，只要相信和平，就能建立和平，所以他在1888年确信，“战争的阴云已经散去”，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仍坚持认为，中欧地区不太可能爆发战争。整整四十年的和平以及显然只有疯子才会发动战争——这一切似乎可以证明饶勒斯的观点是正确的。

请不要过早地断言，饶勒斯在这方面缺乏远见。人们不应该忘记，饶勒斯首先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活动家。他不会虚张声势，装模作样，似是而非地占卜未来。他讲和平，那是为了赢得和平，为了增加实现和平的可能性。有人把一条马基佛利式的格言捧为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如果你希望和平，你就应该准备战争。”而饶勒斯则以更加充分的理由说：“如果你希望和平，你就应该相信和平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真心希望和平，你就应该拿出勇气，希望到底。”让饶勒斯充当居心不良的欧洲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替罪羊，那是不公正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挑起战争，根本没有为消除战争祸害做出过什么努力。

饶勒斯认为，法国和俄国之间的联盟必须本着同一个和平、权利和尊严的精神。这个联盟一产生——更确切地说，关于这个联盟的想法一产生——饶勒斯就要求联盟只限于“纯粹的防御性质”（见1888年2月12日的《图卢兹电讯报》）。因为在俄国的政策中，隐约有一些我们不了解和我们不能接受的咄咄逼人的东西。两国只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订立同盟。我们和俄国只有一个共同利益：“防止奥地利和德国联合发起突然袭击”。饶勒斯还指出：“在法国政策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维护自由和真正的独立。独立自主的民主政策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维护和平，确认权利。”

为了维护法国政策在法俄联盟中的独立性，饶勒斯在临死前几小时，还在同政府进行交涉。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最好不过地证明了饶勒斯思想的坚定性和连贯性。

饶勒斯根据内政和外交的需要，承认联盟的政治意义。法国舰队于1891年访问喀琅施塔特港后，饶勒斯在《图卢兹电讯报》上写道：

多么奇妙的事情！七月革命产生的君主制从来没有得到过沙皇俄国的正式承认，帝国和沙俄一直处于交战状态。而现在法兰西共和国却得到了沙皇俄国在事实上和感情上的承认，被看成是法兰西的合法代表，尽管法国国内的那些保皇分子千方百计地企图使共和国永远处于孤立的地位。

使饶勒斯感到欣慰的是，共和国“从今以后将在世界各国的心目中树立起法兰西神圣的、不可抹杀的高大形象”。因此，他觉得，“喀琅施塔特的盛大欢迎场面是多么美好和激动人心”。法国人和俄国人之间不再存在误解和戒心：法国在向俄国国旗致敬时，并没有降下自己的国旗，共和国的自尊心没有在沙皇的威严面前受到损害。全欧洲都看到，“俄国热烈地欢迎整个法兰西，两国之间的完全承认，突然形成一支强大无比的力量”。

与俄国结盟对法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有助于“维护欧洲的和平”。首先，它使互相友好的法国和俄国免受三国同盟的进攻。其次，它对俄国的政策起着良好的影响，它能阻止俄国采取冒险行动。但饶勒斯审慎地指出，只有在我们是俄国的“朋友”，而不是“乞求者”或“顾客”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影响。因为法国的政策是明确的（“我们不想进攻任何人”）。俄国的政策则是另外一回事：“许多世纪以来，俄国的政策在东方遇到麻烦时，就可能突然导致冲突，从而把我们也卷进去。”人们可以看到，饶勒斯从一开始就赞同法俄联盟，但同时也郑重地指出建立这一联盟所必需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是：保持独立性，从而使一切战争冒险都成为不可能。很遗憾，这一点从未完全得到遵守。

饶勒斯比欧洲各国的外交部看得还要远一些。他建议法国向

全世界人民宣布一项慷慨的民主政策，以便瓦解三国同盟。他在1891年指出，俄国的君主制与奥地利和德国的君主制大不相同。俄国的君主制是“人民的灵魂”，而三国同盟的君主制与人民之间存在着“日益深刻的误解”。

和平与社会主义民主“正处在同以特权阶层为支柱的军事君主制发生冲突的前夜”。

不应该忘记，饶勒斯在1891年尚未正式加入社会党。然而，他却建议法国的共和党人“以和平的方式，领导和完成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置身于欧洲民主最前列的法国必将消灭当代世界中互相敌视的势力，从而保障世界和平(1891年)。

饶勒斯从不希望法国干涉别国的内政。他正确地认为，从国外进口的自由，靠征服者的刺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都不可能持久。他说：“我们不应该在别国进行我们自己都无法容忍的政治宣传”(见1891年8月6日的《图卢兹电讯报》)。但是，他承认和要求榜样的力量。他希望“法国实行经济民主并且和谐地组织劳动，从而在国内实现完全的正义”。只有这样，法国才能“再次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爱戴的解放者”。饶勒斯力求把“法国的爱国主义理想和人道主义理想”紧密结合起来。

后来，饶勒斯在抨击实现联盟的方式——他并不攻击联盟的本身——的时候，他仍然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和策略。法俄联盟的政策破坏了饶勒斯提出的首要和基本的条件：法国政策的独立性。1896年8月俄国沙皇来到巴黎。这时，饶勒斯的调子已经改变。他以报复的口吻写道：

除非巴黎市民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已经完全堕落，否则，机会主义和反动派不能指望他们会上街向沙皇欢呼。因为两年来，政府使我们的对外政策在俄国的政策面前蒙受奇耻大辱。

由于沙皇是欧洲反动派的最典型代表，所以这样的耻辱更叫人难以容忍（见 1896 年 8 月 14 日的《小共和国报》）。

饶勒斯还指出：“人民群众倘若向一位专制统治者欢呼，这将影响到国内的政策。同样，一位专制君主若在巴黎街头招摇过市，这也会在人们的头脑里留下一定的印象。”因此，“只能要求法国人民和社会党人对沙皇的来访保持沉默”。作为法国人，饶勒斯不会忘记，“历届政府是怎样把法国的利益和尊严拱手奉送给俄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沙皇希望照顾威廉皇帝的面子，因此，为了博得沙皇的欢心，法国舰队只好驶进基尔港，“向肆无忌惮地对我国进行军事挑衅的德国皇帝表示敬意”。法国“成了俄国在远东的仆人”，这甚至引起受到俄国威胁的中国的猜疑。法国“一声不吭地听任沙皇政府在亚美尼亚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杀”。她同意帮助土耳其人镇压“克里特人民的正义斗争”；“在英国不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法国忘记了自己的传统，采取反对克里特，反对希腊和反对人民权利的立场”。不光是一向被人认为喜欢夸张的社会党人这么说，就连《时代报》的外交专栏的日常编辑德·普来桑塞（他那时候还不是社会党人）也认为：“现在是法国设法挽回面子的的时候了，因为她在俄国面前卑躬屈膝，已经威信扫地。”向俄国水兵欢呼的市民并不知道，“笨拙和奴颜媚骨的统治者”将把“友好关系”变成为“主仆关系”。

饶勒斯也不希望人们欢迎以沙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中最反动的势力”。俄国反动派同法国反动派毫无相同之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工业和资本主义文明已经进入俄国”。和巴黎、鲁贝一样，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现已建立起一些大型工厂。不久前，就在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的第二天，四万名圣彼得堡的工人举行罢工。沙皇政府进行了干预，不准厂主向工人让步，于是，厂主收回了已经做出的让步。

饶勒斯接着指出：“看，这就是要求巴黎无产者大声欢呼的东西。其实，这等于要求他们再次把俄国的无产者置于死地。”沙皇和威廉皇帝一样，变成了“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卫士”，变成了“欺压各国工人的势力”。饶勒斯在建议巴黎的工人和社会党人不要举行毫无意义的抗议活动的同时，要求他们“默默地旁观”反动派的检阅活动。这样，他们在第二天既可对共和法兰西说，他们始终是共和派，又可对全体社会党人说，他们始终是社会主义者（见1896年8月14日的《小共和国报》）。

同年9月1日，饶勒斯写道：“他（指沙皇）既想利用我们，但又不想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搞坏关系。”饶勒斯揭露了保守党人的阴谋。这帮家伙希望“共和国的人民象站在皇宫的客厅里那样，毕恭毕敬地站在巴黎的街头”。沙皇的想法是维持原状。因此，那些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法俄联盟身上的民族主义者只是一群傻瓜。“沙皇不会给法国带来任何东西。”不仅如此，他将使人得出共和制本身是“对法兰西的背叛”这样的印象。饶勒斯知道，社会党人的抗议活动根本无济于事：“这只不过是一些涌来涌去的人群而已。”但是，他同样知道，当抗议的浪潮过去之后，“在法国将只剩下一个法国共和主义政党：社会党”（见《小共和国报》）。

其实，联盟只是一种形式。其内容取决于法国的对内政策。在反动势力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联盟起着反动的作用。然而，孔勃推动下的民主运动在保卫共和时期取得的胜利，几乎抵消了联盟所造成的恶果。当饶勒斯在去世前几天看到，法俄联盟将使法国卷入一场最可怕的战争冒险中去的时候，他再次坚决拒绝接受这一危险和含混不清的联盟。他在布鲁塞尔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我当时有幸在场，亲耳聆听了他的那些令人终生难忘的话：“如果有人要求执行我国同俄国签订的秘密协议，我们就运用我们同全人类签订的公开协议。”（见1914年7月的《人道报》）

这样，关于饶勒斯对法俄联盟采取自相矛盾态度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饶勒斯一贯反对共和党人在国外进行革命宣传。但是，他也不愿看到法国在俄国面前——不管是沙皇的俄国或者不是沙皇的俄国——，在任何国家面前低三下四。他知道，法国需要同别的国家结盟，但是对于他说来，结盟不等于屈从：他是一位杰出的法国人、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结盟以及其他一切问题上，饶勒斯远比他的政敌和诽谤者更加热爱法兰西，因为那些人不仅自己跪倒在沙皇俄国的脚下，而且还企图使法兰西——革命和人权的故乡——也这么做。

把法国变成俄国的奴隶是挽救不了法国的。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国际政策

自从1847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共产党宣言》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两人执笔，并以他们的名义发表的；其实，这是由欧洲各大国流亡的优秀社会党人共同起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便成了社会主义的口号。即使最革命的社会主义也从未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者放弃其国籍和背叛本国的同胞。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庆祝波兰独立的集会上，曾以十分审慎的态度对待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的第一国际的各国支部。因此，从第一国际诞生的那天起，民族自治和民族独立的思想就是国际的指导思想。第一国际的精神领袖卡尔·马克思的全部科学观和历史观从一开始便同那种无视民族存在这一基本事实的态度格格不入。马克思的学说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事实这么说：“我希望你成为我想象中的那样。”他的学说也不要求人们按照某一偏见去创立、塑造或更改历史；相反，它在开始时，总是服从客观现实，力图掌握其实质，即起主导作用的东西。它尊重事实，信奉事实。它在提出与生活相抵触的主张之前，首先要求不折不扣地了解生活。这一主要特征使现代社会主义不但具有科学性，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保守性，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这一表面的保守性并不妨碍现代社会主义具有

彻底的革命性，这是因为它不把现实看成是凝固的、静止的和一成不变的东西，而看成是富有生命力的、不断地运动着的东西。简而言之，现代社会主义认为，现实是处在无休止的运动之中，处在革命的变革之中。毫无疑问，民族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如果有人否定这一事实，如果有人在行动中忽视这一事实，那么他就是一个幻想者，一个乌托邦分子，一个白痴。但是，和任何历史事实一样，民族的存在不是一个僵死的事实，它处在变化和发展之中。阶级社会的分化，革命阶级觉悟的提高，国际资本主义和国际市场的发展，世界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各种关系的发展——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新的国际观念的形成和国际组织的建立。

和基督教教义、科学知识一样，工人阶级也是没有国界的。

但是，国家并不因此而消失，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才能和特殊的生活环境。不过，一个崭新的、日趋重要的事物已经诞生，这就是国际主义。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都受到这一事物的影响。但是，统治者和领导者在利害关系上的国际主义，同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互相声援的国际主义不一样，因为一切现代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具有相同的总要求，相同的指导思想，甚至可以说，他们具有相同的争取解放和砸碎资本主义桎梏的纲领。如果说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但当他们一旦具有社会主义觉悟，他们便会要求国际间的团结一致。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在事实上虽有民族之分，受到民族斗争的冲击，但是在权利和思想上却具有国际性。各国工人阶级都在本国范围内为了一个实质上具有国际性的理想和社会而奋斗。工人阶级是国际主义者。同样，资本主义在物质利益方面——更不必说在野蛮地对付工人阶级方面——也是局部的国际主义者。

但是，每个国家都顽强地表现出它的民族倾向。如同国家一样，资本主义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国际性。在私有制度下，争取

生存的斗争具有民族性。统治阶级之间的经济竞争和政治争夺，使得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连续不断，扩大和加深了种族、人民以及国家之间的天然差异。瓜分世界地盘和财富的斗争从有人类社会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之后，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斗争。这场争夺“日照面积”的斗争愈演愈烈，其后果也越来越严重。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要求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开拓新的倾销商品的市场，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以便扩大其政治和经济霸主的地位。由于技术生产力和机器生产神奇般地发展，一架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机器——现代军国主义应运而生，并以前所未闻的速度急剧膨胀。技术的巨大进步反倒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先进的武器装备有可能毁灭全部技术成果。半资本主义和半封建的国家为了迎合资本的需要，把我们的社会变成一座戒备森严的兵营。自从法国大革命（1789年——1793年）爆发以来，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威胁始终存在，这促使欧洲的军国主义迅速发展。军国主义逐步吞噬民族的有生力量，使国际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势必把军国主义看成是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它同军国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事实上，社会主义同军国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希望组织生产，而军国主义却致力于破坏。社会主义力图实现各国之间的团结友爱，而军国主义却依赖对别国的仇视和不信任为生。社会主义主张民主和思想自由，而军国主义是专横和反动的。一切保守和反动的阶级都纠集在军国主义周围，因为军国主义是这些阶级的命根子；而一切先进的阶级都团结在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旗帜下。

因此，自从1889年在巴黎成立第二国际以来，广泛地依靠各国社会党的力量，不断地展开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这一直是第二国际的一个中心议题。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是这场斗争的高潮。

饶勒斯参加了这次会议。同年9月7日，饶勒斯在梯伏利—渥克斯厅，向巴黎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汇报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情况时，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国际主义思想及其策略，讲明了反对军国主义斗争的意义。在这场斗争中，饶勒斯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说：

公民们，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宣告了什么呢？大会宣告了两点：首先，它宣告各民族享有自主的权利，各国的自由不容侵犯，全世界无产者应该组织起来反对任何暴力和侵略，以保障必不可少的国家独立。与此同时，国际代表大会还宣告，全世界无产者应该组织起来，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维护和平是为了使世界各国免遭突然袭击和武装入侵；维护和平是为了阻止专制独裁和特权阶层企图以流血冲突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维护和平是为了使世界无产阶级免受战争的浩劫，是为了避免各国受苦受难的劳工兄弟互相残杀。

国际代表大会宣告了两个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真理：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国家有权利和有义务竭尽全力地维护自己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可怕的冲突，为了防止使无产阶级在心灵上和肉体上蒙受更大创伤的流血冲突，劳动者的职责是制止战争的爆发。但是他们不应该——请你们听清楚——他们不应该仅以诅咒和无可奈何的叹息来制止战争：国际代表大会指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他们无权停留在叹息和诅咒上面，无所作为，致使独裁者和资本家有可能对和平发动偷袭；他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进行议会斗争或革命，扑灭战争的火苗。

对我党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很清楚：工人国际在斯图加特提出的观点和法国社会党在利摩日以及在南锡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人王德威尔得在一开始就指

出，国际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由各个支离破碎的民族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而是由各独立国家组成的和谐与自由的联合组织。他还说，各国的自由和它们各自的特点是壮大无产阶级队伍和创造人类精神财富所必需的。倍倍尔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讲到，在一个被奴役的国家里的无产阶级，例如波兰的无产阶级，最关注的问题是本国的复兴，他们无法把精力全部集中在直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上面。倍倍尔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一个民族放弃自卫的权利，这就是替凶残、野蛮和反动的统治者效劳。王德威尔得和倍倍尔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讲的这些话只是重复了我们党在利摩日和南锡提出的观点，也是我本人在党内自由辩论时，常常用来驳斥爱尔威的那些话。

事情最清楚不过了！各国社会党在斯图加特明确表态，他们反对战争，支持民族独立；反对使“无产阶级在心灵上”蒙受创伤的“流血冲突”和“独裁者以及资本家的诡计”；他们主张民族自卫。因为对一个民族来说，放弃自卫，就是“替凶残、野蛮和反动的统治者效劳”。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是：“既不要背叛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也不要背叛祖国！”采取一切合法的或革命的手段，以战争制止战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用战争来捍卫民族独立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里，饶勒斯很自然地谈到那个主张在民族问题上采取冷漠态度的爱尔威主义。他说：

“公民们！我将毫无顾忌地跟你们谈谈爱尔威主义……”

有人插话说：“不存在爱尔威主义！”

另一人接着喊道：“爱尔威万岁！”

饶勒斯说：

主张思想自由的人首先应该允许别人对任何人和任何事

物心平气和地、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

我刚才说，我将毫无顾忌地跟你们谈谈爱尔威主义，因为如果我对爱尔威的一部分提法和观点持必要的保留意见，我坚信，你们中间任何人都决不会说，我这样做是因为胆怯或者出于竞选上的考虑……十六年来，我几乎一直生活在辱骂声中，很少有清静的日子……因此，我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了，对大多数反对我们的人的那种爱国主义狂热，我只能嗤之以鼻……如果我确实认为，爱尔威的全部提法都是正确的……

这时有人喊：“好极了！”

饶勒斯接着说：

请注意，公民们！你们几乎站在我们的反对者一边，来理解我刚才说的话……我刚才说——我刚才用的是条件式——如果我确实认为，爱尔威的全部提法和全部观点都是正确的，那么，不管别人怎样谩骂，不管冒什么风险，我一定直言不讳。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为了对爱尔威的论点持保留态度，我需要把别人对我们的攻击抛置脑后。

我想说明，就在爱尔威在这个大厅里首次提出他的著名论点的第二天，我在向巴黎市民发表演说时指出，在一个先进党的内部，在一个处于运动状态的党的内部，在一个宣称要改造世界的党的内部，不应该害怕任何观点和任何提法，不应该采取排他的态度，而应该用说理的方法，用讨论和分析的方法，逐步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存精。

公民们，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好方法。爱尔威主义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方面它越来越强烈地主张依靠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去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爱尔威主义的这一部分主张是站得住脚的，健康的，应该保留。我坦率地承认，

摩洛哥问题之所以能如此明确和直截了当地提出来，部分地应归功于爱尔威的努力。

但是，当人们专心致志地思考某一问题时，难免会顾此失彼，忽视一部分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爱尔威没有能够充分地考虑到民族这一事实，忽视了世界无产阶级必须捍卫和维护民族自主权这一点。公民们，在这方面，我不想多说了，因为他本人在南锡已经承认，他为了让别人更容易地接受他的思想，结果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和片面。是的，在当今的世界里，无产阶级不能不关心民族的独立。如果依靠一个民族对其他战败民族的并吞和统治来实现世界大同，那么，这只能是建立在奴役基础之上的大同。世界大同只有通过把各个独立自主的民族联合在一起，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爱尔威说——他现在还坚持这么说——一切国家，起码是那些文明程度相似的国家，应该是平等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是，正因为它们之间是平等的，所以任何国家都无权奴役别人……古人说：可怜可怜那些奴隶吧！因为他们只有半个灵魂……是的，被奴役的民族也是如此：他们的灵魂被人宰割了，他们的才华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为了工人解放和组织人类社会的伟大事业，我们需要每个人都贡献出他所固有的力量、智慧和才干。

* * *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法国社会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希望各个民族拥有与自由人民的才能相称的防卫手段，用以捍卫本民族的自由：不要职业军队，不要等级森严的军队，不要那种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中间招募并经专门学校培养的军官团。把人民武装起来，组织起来，组成民兵，由人民自己挑选那些懂科学，具有民主思想而且不脱离现实生活的人

担任官长。在实现全面裁军之前，这就是国际所希望建立的武装力量的形式，以此反对外来入侵，捍卫民族独立，制止侵略战争的爆发和防止对被奴役的人民实行阶级统治。

上面一段引文清楚、有力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社会主义不允许奴役、宰割、征服、欺负和侮辱别的民族。作为人剥削人制度的死敌，社会主义坚决反对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政治和经济剥削。任何主宰世界和称霸世界的企图都是有碍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通过把各国独立自主的民族联合在一起，实现全人类的统一。为了确保和平与独立这二者的结合，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一个民主的国防体系：民兵。一支真正民主的军队应该成为保卫国家的盾牌，而不应该成为侵略别国的工具。

面对战争的威胁，我们应该如何行动呢？

国际社会主义首先宣布，从现在起——请你们听清楚，我说的是从现在起——即便在资本主义陷于混乱的情况下，只要无产阶级确实愿意，他们便可防止战争的爆发。噢，对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战争，故只有连根铲除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不错，这是社会主义的真理。不错，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战火连绵不断，遍及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在阶级内部，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爆发战争；在国家内部，阶级与阶级之间爆发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爆发战争。资本主义就是混乱、仇视和贪得无厌。资本主义就是为了猎取利润而不择一切手段的畜生。

是的，资本主义和战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国际不希望我们在反对战争的时候，仅仅满足于高谈阔论，消极地等待资本主义的崩溃。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首先指出，战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最终消灭战

争。决议接着又指出（这是借用倍倍尔在最初的提案中的一段话）：“或者，当人民被战争所造成的人力和财力方面的沉重的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便会起来扔掉这个负担。”因此，全世界的工人和无产者，如果你们愿意，如果你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力量，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如果你们在历史的决定性时刻，发扬你们父兄当年争取自由时的那种大无畏精神，那么，即使在今天，即使在动乱不堪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即使在被君主、皇帝、军阀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里，你们也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不错，资本主义确实是战争的根源。资本主义要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它千方百计地企图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尽可能地减少工人的工资。为了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你们并不坐等资本主义的灭亡，你们现在已组织起来，与企业主展开了斗争。当企业主利用黄色工会破坏罢工时，你们便同黄色工会展开斗争。同样，你们也决不会听任战争的火焰把你们吞噬。国际要求你们从现在起就采取行动。从今天起，你们就可以根据局势的发展和人们所作出的决定，采取必要的行动。除了你们，除了无产阶级，利益——即便有一定的阶级联系——总归是不一致的，因为资本主义不但分裂了我们的社会，而且也使资本家内部四分五裂。所有资本家，所有资产阶级，所有大、小有产者在同一个时候都具有相同的利益，这种情况是相当罕见的。就在我向你们讲话的时候，海盗、专门猎取奇闻的记者、冒险的银行家、阴险毒辣的资本家，正在做远征摩洛哥的美梦。但是正当这些上等阶级对摩洛哥海岸垂涎三尺的时候，在中、小资产阶级中间，甚至在尚未完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农民民主阵营中，千百万人不愿意法国把金钱和生命用于这种无谓的和罪恶的冒险事业。不过，这支和平力量是分散的、零星的和动摇

不定的。

如果他们有一个组织严密、态度鲜明的和平中坚，那么他们将成为一支无比强大的力量！只有你们这些工人阶级，只有你们这些城市产业工人，只有你们这些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才能够而且也应该成为这个和平的中坚，组成这支组织严密、百倍警惕的和平力量。到那时候，你们将率领这支浩浩荡荡的和平队伍，你们将不但作为本阶级的捍卫者和拯救者，而且将作为人类文明的捍卫者和拯救者，出现在世界面前。工人国际在指出立即采取反对战争的行动是必要和有效的同时，建议人们采用它从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政府那里搬来的那套办法来捍卫和平。

始终有一部分社会党人认为：除了宣传社会主义之外，没有其它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办法！资本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饶勒斯承认资本主义和战争之间的联系。但是他不认为，社会党和工人阶级就可以“满足于高谈阔论”。他要求社会党人采取反对战争的行动，就象他们不停地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那样，就象他们通过日常斗争，争取缩短工人受剥削的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那样。如果人民在决定性的时刻，拿出当年争取初步自由权利的热情，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即使在今天，即使在动乱不堪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即使在被君主、皇帝、军阀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里”，人民也能够防止战争。资本家不是铁板一块。除了资本家中的冒险分子以外，有些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分子也反对进行“无谓的和罪恶的”战争冒险。农民不希望战争。工人将组成“浩浩荡荡的和平队伍”，将作为“人类文明的捍卫者和拯救者”出现在世界面前。幸好，工人阶级可以建议人们采取从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政府那里搬来的那套办法，来捍卫和平，这就是：国际仲裁。

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对国际仲裁持怀疑的态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们看到，沙皇在发动对日战争和屠杀俄国工人的前夕，居然还向海牙会议提出国际仲裁和裁军的建议。人们看到，聚集在海牙的各国政府的全权代表虽然整日忙于开会，但始终毫无结果。人们还看到，当各国政府的代表在讨论保障和平的途径时，卡萨布兰卡却受到了大炮的密集轰击，美国舰队从大西洋开往太平洋，企图以此威胁日本。当劳动人民看到所有这一切时，他们当然有权对资产阶级推崇备至的国际仲裁不表示过分的关心。

然而，公民们，为什么外交家、政府代表和各国政府感到有必要每隔三年召开一次这样的国际和平会议呢？如果说这仅仅是一出闹剧，那对统治者来说，这可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时间一长，人民慢慢也想登台演出，但他们的态度将要认真得多。

当国家之间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们将对统治者说：请你们通过你们的外交官解决你们之间的分歧。如果你们的外交官解决不了，那就把分歧提交给你们自己指定的公正人去裁决，并且服从他们的决定。不要弄刀舞枪，不要流血：服从全人类的裁决，服从理智的裁决。如果你们不愿意这么做，好吧，这就说明你们是一伙十恶不赦的强盗和刽子手。这时，无产阶级有责任起来反对你们，把手中的枪对准你们……

* * *

我认为，由于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在不久前提出这条必须遵循的国际仲裁的原则，一切问题就变得简单了。不再需要从错综复杂的时局中和政府的诡秘的活动中，寻找出谁是进攻者，谁是被进攻者。哪个政府拒绝仲裁，从而引起流血

冲突,那它就是侵略者,就是世界文明的敌人,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国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权利和责任不是替罪恶的政府充当炮灰,不是拿着从事冒险勾当的政府发给他们的枪枝,去屠杀边界另一边的工人和无产者,而是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这个罪恶的政府。

谁能反对在这样的国家里开展革命运动呢?如果我们用革命的方式来揭露和谴责政府拒绝海牙会议仲裁的罪行,那么,污蔑和攻击我们的保守党和激进党的英雄好汉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将对保守党人说:什么!你们想剥夺无产阶级认真对待沙皇政府建议的权利吗?我们将对克列孟梭的激进党政府说:是谁以法国的名义派全权代表去海牙讨论国际仲裁问题的呢?如果列昂·布尔茹瓦和柯斯当·德斯杜耐勒在试图说服各列强接受国际仲裁之后,从海牙回到国内,看到全体法国工人起来要求认真执行这一仲裁时,他们将作何感想呢?这将是一场发自无产阶级内心的革命,因为当他们想到,有人企图把他们拖入一场反对别国无产阶级的战争时,他们必然要奋起反抗。同时,这也是一场发自全国人民内心的革命。到那时候,无产阶级将拿起武器,但不是为了去犯罪,而是为了拯救祖国和争取解放,为了建立一个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将对集结在边境上,或者企图越过边界的侵略者说:“你们要和平吗?让我们接受仲裁吧!”社会共和国将以此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要是侵略者不同意,继续动员他们的军队,那一定是为了镇压本国的无产阶级,这时候,无产阶级必须起来保卫自己,保卫革命的祖国。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这项形式多样,但坚定有力的行动策略。你们可以看到,国际的这一理论是多么彻

底、合理、明确和完整。为了使一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指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防止战争的爆发，或者用革命的方式惩办战争的策划者。它责成由各国社会党的代表组成的社会主义国际局推动和协调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使所有在本国政府的胁迫下卷入冲突的人民一齐起来反对和制止战争。

要么仲裁，要么革命！饶勒斯虽然向来主张采取合法与和平的行动，但是如果政府拒绝接受仲裁，饶勒斯则决心用起义的方式，来推翻这个罪恶的政府。

饶勒斯确实打心眼里反对暴力，但是为了防止战争，他并不排除采取暴力的可能性。他英明地预见到，战争将危及欧洲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一切成果。他看到，人们将犯下疯狂的战争暴行，反动派将因为胜利而变得趾高气扬，现代社会将遭到阿提拉的践踏和蹂躏，无产阶级将互相对立，互相仇视，互相残杀。饶勒斯要求作出最后的抉择：要么和平，要么革命！他知道，社会主义和战争之间将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消灭战争，否则，社会主义将被战争扼杀。

这位雄辩的演说家回顾了国际和平运动的历史。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每个听众的心。

尽管代表大会上必须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尽管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代表有九百人之多——这仅仅是一些表面的细节，却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你们看到，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多么有条不紊，具有多么强的针对性，如果你们看到，代表大会对诸如移民这类具体问题所作出的决议是多么详尽周密，你们便会说：是的，国际已经不再处在摸索和混乱的阶段了，它现在是世界上一支代表光明的力量。无产阶级将团结在它的周

围，它象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为一切受苦人照亮前进的道路。不管是矿工、玻璃工、织布工，还是疲惫不堪的贫苦农民，也不管是什么民族和肤色，他们都是受剥削的穷苦人，都衷心希望国际无产阶级能在将来获得解放。

公民们，今天我无法确切地向你们说明，我们在法国国内应该如何立即实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国际行动的原则。我们的会议决不能草草地走过场，而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定期会晤，以便确定我们自己的行动计划。

我只想谈一件事：在国际内部，需要深入研究和比较各国人民的优点、力量和特色。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国人民一向具有奔放的革命激情，而我们的德国同志则历来十分乐意公开自己的想法。考茨基在《新时代》上曾直言不讳地说，从今以后，德国社会主义不再是老大哥了，这倒并不是因为德国社会主义后退了，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得到了发展。因此，各国人民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我们的革命热情多少能够感染别人，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德国社会主义那里学到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的，在组织、教育和策略方面表现出来的才能。

刚才有人要求我谈谈摩洛哥问题。好吧！不过，叫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尽管我们已经做出许多努力，但我们仍无法迫使海盗们就此罢休。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议员背后，工人的力量仅仅处于萌芽状态。

唉，法国总工会在五、六百万无产者中间，只有五十万会员。如果它象德国工会那样，几年功夫，工会会员就超过一百万，或者象英国工联那样强大——目前正在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代表着一百七十万缴纳会费的会员；如果你们除了革命的理想主义和奔放的热情之外，还有一支人数相当可观的力量，那么，政府就不敢强迫国家去进行一场殖民远征，即

使这个政府受到《晨报》、《时代报》、《辩论报》等报刊的支持。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首先教育我们，为了完成国际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大家必须组织起来，发展和壮大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知道，几年来，巴黎的某些同业工会已经组织起来。我知道，建筑工会已比三年前组织得更加出色。一切取决于你们能否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咒骂自己的祖国，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因为这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应该成为国家的主人，而要做到这一点，那就要看你们自己了。为什么现在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呢？因为你们四分五裂，软弱无力。你们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如果你们组织起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你们便能使祖国社会主义化，国家便是属于你们的，从而也将属于整个无产阶级。这就是国际对你们提出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和世界各国同志共同奋斗的目标。

不过，不要以为，饶勒斯对社会党人与资产阶级——哪怕是激进的资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抱有什么幻想。他十分了解这些激进派的政客，了解他们无可救药的无知和胆怯。因此，他的话是针对盲从激进派的群众而讲的，目的是要他们看清那些利用他们的人的本质。

我要说，除了那些对理想已经丧失热情、浑浑噩噩的激进党人之外，其他激进党人的心里都很明白。当他们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实现了他们的政治纲领之后，他们便认为，现在应该搞一个社会纲领。只要这个社会纲领毫无实现之可能，他们总是十分乐意把它抬出来。后来，由于纯政治性问题在上下两院相继获得解决，由于我们逐步提出税收等社会问题，由于他们将被迫要求一部分他们的追随者作出必要的牺牲，于是，这些激进党人便说，纲领的内容无疑相当精彩，但只能

停留在纲领的阶段上。他们开始寻找一个阻止纲领实施的体面办法。他们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们说，实施纲领固然是件好事，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非得有社会党的合作不可，而社会党人现在却在鼓吹起义和革命，他们是一群不要祖国的家伙，因此我们无法同他们真诚地进行合作。他们懂得，只有同我们合作，他们的纲领才能得以实现，但他们并不想实现纲领，所以就诽谤我们。爱尔威是个怪物，我则是爱尔威手下的一员干将。由于激进党人尚未完全抛弃他们的纲领，他们便老是跟我们纠缠不清，并揪住爱尔威不放……因为他是一个怪物嘛！这样一来，如果谁投票赞成有关的改革——工人养老金、向企业主征税、累进制所得税等——谁就是帮社会党人的忙，就是帮饶勒斯的忙……而饶勒斯是为爱尔威效劳的……爱尔威又是为德国皇帝效劳的。

这些先生们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企图放弃他们的纲领。他们在开小差方面真有两下子！他们把爱尔威主义运用在政治上……

公民们，我知道这出闹剧将如何收场：他们不停地指控我们，不断地谴责我们，而且越说越离奇，结果反倒把他们自己吓唬住了，把他们的大部分追随者吓唬住了——起码在一段时间里，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他们处处与我们作对，他们只有投入保守派和反动派的怀抱，才能找到出路……但愿他们万事如意！

我的朋友瓦莱纳想用这样的话来吓唬他们：你们反对社会党人，所以你们只好听从反动派的摆布，这样，你们就无法实现你们的纲领……瓦莱纳是多么幼稚啊！这恰恰是激进派所希望的。不过，对于他们来说，不实现纲领，那是不够的。保守派、温和派和梅利纳派不但希望他们的阶级要求得到满足，

而且还希望他们个人的欲望也能得到满足。他们对激进党人说：“好！脱掉社会党这件外衣吧！”他们还说：“这还不够……为什么你们还要保留区别于一切共和党人的‘激进’这个形容词呢？……”他们得寸进尺，最后要求激进社会党人放弃其一切称呼……然而，事情并非到此为止。他们说：“不管怎么说，你们直到现在才知道，社会党人是一群怪物。你们知道得太迟了。我们早就向你们指出过这一点！你们现在和我们一样感到担心，而我们则一直在担心这群怪物。由此可见，我们比你们高明得多。”这样，激进社会党人将完全消声匿迹，他们与保守派的昔日追随者完全同流合污了。让他们消失吧！这是对他们最公正的惩罚！

至于我——我认为，我是以我们党的名义在这里讲话——我不想大吹大擂；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时期；我很清楚地知道，激进党人和保守党人将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而且他们将在激进和激进政府的旗帜下进行联合，所以显得格外阴险和保守；我同样知道，他们准备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毫不犹豫地说，他们的联合将会使我们在议会中失去相当多的席位。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知道，我并不轻视议会活动，政治活动，竞选活动。我认为，我们党有足够的力量进行议会活动。面对联合起来的敌人，我们党即便遭到暂时的挫折，也决不会示弱。她宁可失掉一部分席位，但也要高举自己的旗帜。我们党不愿为了追求表面的胜利而断送整个事业。与反动派狼狈为奸的激进党人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是虚假的和不光彩的……

* * *

公民们，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对待

周围的一切事物。我们信心百倍地奔赴战场。伟大的诗人但丁在一首题为《新生》的诗中写道，当他想到蓓阿特丽的花容月貌有朝一日也会凋谢时，他不禁痛苦得发狂……但是，社会正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将永葆其美妙之青春。它们将象劳动一样永恒，象科学一样不朽。国际的战士们，我将和你们一起去迎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1907）

饶勒斯在他的巨著《新军队》中，极其精辟地阐述了他对祖国、和平以及国际的看法，故毋需在这一章里多讲。这部充满激情的光辉著作，显示出他那伟大和高尚的品格。

从今以后，为了建立新的秩序而发扬各民族在传统、历史和特性方面最美好的东西，这对国际社会主义战士来说，是一种幸福、骄傲和力量的源泉。一切反映人类美德的崇高和无畏的举动，一切敢于创新的行动，一切大胆的想法，一切自由、民主和启蒙运动中的成就——这些成就为人民享受高度文明创造了条件——我们都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一运动不能持续地向前发展呢？为什么至今处于从属地位，处于蒙昧或半蒙昧状态的人，不起来争取自由和光明呢？难道不正是在社会合作的制度下，人们的首创精神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人们的智慧和思想才能充分发挥吗？国家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当国内的阶级斗争被一个融洽的社会所代替，当集体所有制成为共同的思想基础，国家就会变得更加统一。当过去的一切努力最终导致全球的解放，当平等和正义的蓓蕾在全世界开放出绚丽的花朵，当人类思维的最细腻和最高级的活动，最终在发展个人文化和社会文化方面给每个人带来骄傲和欢乐时，国家的连续性将变得更加深刻。这样，祖国将成为一面生动地反映一切思想意识的镜子。原来局部地、似是而非地属于无产者的祖国，将全

部地、明确地归他们所有。祖国永远是属于无产者的，因为世世代代的努力最后将使他们纵情享受正义的欢乐。由于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祖国从事旨在按照一个更加崇高的思想改造国家的斗争，从现在起，他们不再是游离祖国之外的局外人了。他们生活在祖国中，因为他们能够对国家施加自己的影响；因为国际社会主义的活动受到独立国家的庇护；因为民主——现代国家的形式——有助于雇佣劳动者的斗争；因为只有当各国的无产者都进入最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境界，只有当他们成为民族智慧的精华时，他们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当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在世界大同中保持其原来的特征，只有当人道的乐曲响彻每个国家时，新的人类社会才能繁荣昌盛。在从自然到精神，从实力到正义，从竞争到友爱，从战争到联合的运动过程中，祖国将既具有一切本能的有机力量，又发挥思想的巨大威力。无产阶级胜过其它任何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能顺应祖国发展的潮流。当无产阶级在咒骂自己祖国的时候，当他们自以为在咒骂自己祖国的时候，他们所咒骂的，其实是给祖国脸上抹黑的贫穷，是使祖国分裂的不公正，是使祖国发狂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仇视，是掩盖剥削祖国行径的花言巧语。表面上似乎是在咒骂，其实是号召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只有保持民族的独立，高度发扬民主，并把全民族的聪明才智运用在解决新问题上，也就是说，只有让全人类都了解关于祖国的概念，国家才能向前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和社会主义国际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向无产阶级提出两个密不可分的任务：竭尽全力维护和平和捍卫国家的独立。是的，为了维护和平，无产阶级必须开展一切形式的活动，其中包括举行国际性的总罢工，甚至进行革命。社会主义的敌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意或无意地散布了多

少流言蜚语啊！他们忘记了，由于各国的外交还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由于对外政策往往不受国家的监督，任何鲁莽的举动，自以为是，蓄意挑衅或者金融集团的贪婪，都可能突然招致冲突；他们忘记了，少数几个人，一个小集团，一个犯有偏执狂的人，都可能使国家卷入冲突，从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们忘记了，战争与和平现在还游离在民主法则之外。在国家内部演变的过程中，还会发生突然事变和暗杀事件。这些事情引起的后果当然是可以消除和限制的。当疯子或罪犯挑起战争时，人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控制或者扑灭这场火灾呢？阿诺多因为个人之间的纠葛，竟把法国推向同英国开仗的边缘；德尔加赛则因为个人之间的纠葛竟把法国推向同德国开仗的边缘。德国政府内部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影响到整个欧洲大陆的政策。战争的可能性随着霍尔斯坦集团或纽伦堡集团的势力大小而增加或减少。金融界幕后争夺摩洛哥的冲突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法国金融家和德国金融家之间的敌对情绪使欧洲的和平岌岌可危。起先，他们相互对立；后来为了更有效地掠夺摩洛哥，他们很快达成协议，狼狈为奸。一般说来，协议的效果还算不坏，但是，达成协议的动机同原先冲突的原因一样地不光彩。面对这些个人之间的纠葛，面对这些偷偷摸摸的幕后活动，面对刊登在报刊上的这些耸人听闻的谣言，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伪善的资本控制了报刊宣传，他们出于财政上的考虑或者由于狂妄自大，极力制造混乱和散布仇恨的种子，并把亿万人的性命视作儿戏。对此，人民只有一个保卫自己的办法，无产阶级也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公开表明，无产阶级“决不会走”这条冒险的道路，或者更明确地说，他们将起来反对阴谋的制造者，他们将尽一切可能粉碎战争势力，他们将把祖国从那些掮客的手中夺回来！无

产阶级很清楚，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肯定会遇到不少障碍。假如他们对此掉以轻心，假如他们把这一切想象得过于浪漫，那就是犯罪！无产阶级十分明白，只有当他们采取了在这个很不健全的民主制度下所能采取的一切办法之后，他们才有权采取上述痛苦的方式，也才有获得成功的希望。无产阶级必须密切地注视事态的发展，以便在战火尚未蔓延开来之前，就把它扑灭。无产阶级应该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一切政治性会议——尽管他们的代表目前处于少数，但是以后会逐渐增多的——以便揭露阴谋，消除误会，不断向要求正义与和平的善良的人们揭露各国外交的贪婪性或冒险性。无产阶级应该通过这些代表和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法学家，起草一份国际公法，用以防止资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竞争和暴力行为。无产阶级必须保护所有的人民和民族，反对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去换取特权、垄断权和租界。无产阶级应该扩大国际仲裁的范围。他们不应该在庸俗的小人的诱惑下，鸚鵡学舌地嘲弄海牙法庭；相反，他们应该尽力维护海牙法庭，为它创造更好的活动条件和提供处理争端的一切可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每个提交海牙法庭仲裁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若解决诸如捕捞权这一类的问题，就能够制止英国和德国在海洋上的争夺，就能够剥夺进行海军方面的军备竞赛的任何借口。各国的无产阶级组织应该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越来越有力地表明自己的和平意愿。他们之间日益明显和日益牢固的友谊，应该成为战争狂人的巨大障碍。当全世界的社会党人和劳动者在议会、工会组织、合作社以及各个联系日益广泛、日益紧密的世界工人联合会里，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时，当他们运用智慧、理智、宣传和组织的力量来防止冲突，从而使国家免受战争的浩劫和由战争引

起的革命考验时,到那时候,如果那些富有冒险性和掠夺性的政府一意孤行,如果政府首脑为了转移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力,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君主制,保护资产阶级的特权,或者为了满足资本家和金融家们的无耻的要求,到处兴风作浪,如果他们不顾世界无产阶级提出的关于国际仲裁的严正要求,执意发动罪恶的战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有权并且有责任同面临这场可怕灾难的各国社会党人一起,依靠革命的力量,推翻这个进行疯狂掠夺和屠杀的政府,并在这场暴风雨中大声呼吁和平与正义,捍卫国家和人类的安全与尊严。

由于我在评论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意义时,曾多次阐述上面的观点,故受到了某些人的猛烈攻击,被他们污蔑为祖国的叛徒。我认为,今天他们再也不敢在社会党和国际面前重复这些无耻谰言。虽然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在反对战争的国际革命斗争中迈出了新的一步,虽然它把各国无产阶级采取联合行动防止战争的问题,提到了各国的议事日程上来,但是它并没有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那样,成为敌人谩骂和攻击的目标。欧洲民主正在逐步接受国际的伟大思想。今天人们至少不敢大声指责我们法国社会党人企图破坏保卫祖国的努力,不敢说我们如果不是外国的走狗,至少也是受别国社会党蒙蔽的可怜虫,说这些国外的社会党利用国际主义的虚伪口号来掩盖其民族沙文主义的真实意图,利用革命在法国国内煽动无政府主义,为他们全副武装的国家效劳。不,人们至少不敢重复这些陈词滥调,因为整个欧洲正面临着一场动乱。各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受到冲击。人民已经厌恶靠武力维持和平的这种耗资巨大的办法。各国人民都希望能自己管理国家事务;甚至在政权相当稳固的国家里,人民的力量也正在积聚和

发展。因此,再也不能说,战争所引起的革命将仅仅局限在拉丁语国家里。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再也没有一位君主,一个阶层或者一个阶级可以不冒风险地玩弄战火。国际将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而在国际范围内采取行动,发动一场革命运动来反对侵略势力。由此可见,反对和污蔑国际的做法是多么荒谬!就连过去曾经最激烈地反对我们的人,现在亦已懂得,如果国际社会主义以工人革命来严正警告那些好战分子,那是为了使民主的文明世界免遭突如其来的战争灾难。战争将使社会的稳步发展成为泡影。与此相反,如果民主与和平得以确立,如果人民的权利和国家的安全得到充分的保障,资产阶级社会就可以通过非暴力和不流血的方式,在不必耗费巨大财力的情况下,逐步地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为了和平而不惜以革命运动来威胁战争贩子的人是最有远见的,他们为人类的发展,为社会稳步、健康和迅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无产阶级知道,反对战争——甚至以革命反对战争——和捍卫国家的独立,这一双重任务是艰巨而又伟大的。肩负这一崇高和光荣使命的阶级,必须进行大量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必须发扬机智和勇敢的精神。无产阶级决不会天真地认为,他们可以把瞬息万变的局势事先纳入四平八稳的轨道。在这场可怕的动乱和危机中,光凭一张抽象的图纸是无法给人们指明方向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国际坚定不移地希望国家的自主权不受到损害。把国家从掮客、军国主义分子和金融集团的手中夺回来,让每个国家在民主与和平的环境中自由地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国际和世界无产阶级——他们将使刚刚成型的人类社会完全成熟起来,而且有利于国家本身。国际和祖国从此将联系在一起。国际是国家独立的最可靠保证;而只有在独立的国家里,国际才能建立起最强大、

最有力的组织。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国际主义越少，与祖国就越疏远；国际主义越多，与祖国就越亲近。爱国主义越少，与国际主义就越疏远；爱国主义越多，与国际主义就越亲近。

因此，对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无产者来说，积极参加人民的国防组织，丝毫没有矛盾。相反，他们面临的问题越困难，越棘手，他们就越需要以最大的努力开展活动，以便提高自己的威信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就越需要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使军队在危急关头更好地为无产阶级的崇高目标服务，为保卫国际和平和国家独立服务。他们积极参加新型军队的活动，这是壮大无产阶级力量和采取社会主义行动的法则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必须承认这一法则。出于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所作所为的厌恶，无产阶级有时似乎觉得共和国与他们无关；但是，一旦共和国确实面临威胁时，他们便会义愤填膺，立即行动起来；一旦在欧洲出现一个新的，哪怕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他们也会感到欣喜若狂。同样，不管无产阶级平时怎样牢骚满腹，怎样不满意国家的资本主义形式和资产阶级形式，怎样咒骂自己的祖国，一旦国家的独立确实遭到威胁时，他们便会奋起保卫国家的独立。无产阶级将推翻腐败的和冒险的政府，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捍卫国家的独立。一旦爆发危机，种种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措词相当激烈的奇谈怪论，都将在主张把国际和祖国紧密结合的工人阶级思想面前，不攻自破。要是共和国希望建立一支真正防御性的、有效的人民军队，她从现在起就可以借助工人阶级的这个完整的思想。

第四章

组织全民武装

饶勒斯的身上体现出现代法兰西，即在大革命中诞生的法兰西的智慧和思想。他对祖国无限崇敬和热爱。当代没有哪一位政治家能比他更加雄心勃勃，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法国在未来中的地位。但是，卑鄙无耻的反动势力竟敢攻击这位代表着法兰西民族的力量和荣誉，代表着人类的力量和荣誉的伟人。他们毒汁四溅，污蔑他是祖国的叛徒。饶勒斯很少进行个人之间的论战。他以自己的行动，以自己充满仁爱和活力的非凡的一生来回答这些无耻诽谤。他以善良的行动来回击敌人的阴谋活动。有人荒谬地指责饶勒斯——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套谰言——想使处于军事列强中间的法国解除武装。针对这种指责，饶勒斯提出一项法案，这就是以后出版的《新军队》。

军事学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军事著作。除了论述军事问题之外，该书还阐明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和社会的哲学问题。饶勒斯把自己的智慧、精力、心血、热忱和才智全部倾注在这部书里。人们很难明确说出，在这部第一流著作的作者身上最令人钦佩的是什么？是作者对极其复杂的难题中的每个技术细节的敏锐洞察力，还是高度的概括力和归纳的能力，还是对世间一切美好和高尚的东西的追求和向往？

饶勒斯在书的一开头就提出要消除国家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误会。

必须消除国家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误会，这对国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若不能获得工人阶级的全力支持，那它将犹如一块可怜的破布，一撕即破。法国无产阶级始终把捍卫国家的独立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受到民主主义者极其荒唐的诋毁。无产阶级有权利和有义务向国家提出自己的要求。

无产阶级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不要去干那种置法国和工人阶级于不幸的罪恶勾当，不要驱使法国工人同其它国家的工人弟兄进行非正义的战争。法国在海牙会议上主张仲裁政策，主张每个国家在冲突爆发之前，把争论提交海牙会议，由其进行仲裁。法国已在道义上作出这种保证，决不能出尔反尔。劳动人民希望国家不要轻率地中断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互助的关系，希望国家继续保持其优良的传统。他们尽力保卫法兰西的崇高理想，使之免受人们的一时冲动或卑劣手段的践踏，这样做既有利于无产阶级本身，又有利于国家。

无产阶级还有一个要求——他们有权和有义务向国家提出这一要求：国家必须抛弃一切阶级或党派的成见，根据国防本身的需要，组织军队。

我请求军官们冷静地、不带偏见地研究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研究社会党关于军事体制的见解。如果他们盲目地攻击他们所不了解的人，攻击与他们的习惯相抵触的思想体系，那对他们来说——我指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将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军队的军官通过德雷福斯事件，亲身感受到了这种误解的危险性。他们轻信个别与该事件有牵连的上司

的话,为了挽救军队的荣誉,竟然发展到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地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对这场悲剧作何感想。如果他们文过饰非,顽固地坚持错误,或者出于对这类亏心事的厌倦,只是在思想上采取回避的态度,却不去吸取应有的教训,那就只能错上加错!相反,如果他们拿出最大的勇气,敢于从最痛苦的经历和最致命的错误中记取教训,洗心革面,他们就必然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一个人必须思想开阔,不受任何框框的束缚。当国家的存亡面临威胁时,这些军官理应率领千百万无产者开赴战场。假如他们和无产者之间存在着思想隔阂,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误会,那将是多么巨大的不幸啊!

替国家争取权利并动员全国的力量真正地为这一权利服务,这是一个十分崇高的理想!饶勒斯希望把国家和军队结合起来,把军队和正义结合起来,把力量和权利结合起来。拿破仑认为,革命的定义就是武装起来的思想。饶勒斯想把拿破仑的这一观点付诸实施。他并不想解除法国的武装:他要武装正义和权利,使民主和革命的法兰西无敌于天下。为此,他从军事教育的革命化着手,要求摒弃等级观念和反动观念。

解决困难和消除危险的唯一办法,为了巩固国防而深入持久地进行军事教育的唯一办法,这就是破除对驻扎兵营的迷信,把兵营仅仅作为训练新兵的学校,就地编制部队,经常保持其满员,定期召集演习,进行严格和有效的训练。

在现行的兵役制下,对士兵和军官的教育均感不足,白白浪费青年人的大好时光和精力。这一制度成了建立生气勃勃的作战部队的障碍。凭什么理由这个制度居然能沿袭至今?这恐怕首先是因循守旧的结果。多少年以来,各个大国的军队一向驻扎在兵营里面,仿佛只有驻在兵营的军队才是常备军,而常备军则必须呆在兵营里。尽管时代已经发生变迁,尽

管建立了平等的义务兵役制，全民武装的原则已得到确认，尽管大批入伍的平民应该成为一支真正的防御力量，但是人们总是留恋过去，总想尽可能地保留旧军队的那一套，使现在的军队变成旧式军队的翻版。因此，人们不知不觉地把驻在兵营的那一小部分军队看作是军队的整体，把仅仅用于训练和培养军事人材的场所看成是军队的根本。这如同把脚手架误认为是支撑整个大厦的栋梁一样。凡是研究历史并且了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人都不会对习惯势力的这种反抗感到意外。旧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仍将起作用，而新思想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妥协才能最后战胜习惯势力。守旧者力图保持一支脱离人民的、长期在特定圈子里生活的职业军队，而革新者则因为政治民主的胜利和旧军队的军事失利，提出了全民武装的主张。三十年来，我国制定的一系列军事法令和由此而产生的军事体制均是这两种思想不断妥协的产物。今天，当我们想进行彻底改革的时候，我们便感到旧的习惯势力的最强烈的反抗。同时，军官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极力加以反对。许多人认为，实行全民武装之后，国民军中的军官首先应该是普通公民，这就远远不如统率百万正规军来得威风。现在，驻在兵营的现役军队受到特殊的照顾，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社会，有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行动，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习惯于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生活的人只承认某一家族或某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在他们看来，人民的民主是分文不值的破烂货。同样，深受我国旧军队传统影响的人只看到少数驻扎在兵营里的、完全不受他人约束的军队的力量。今天的政治和社会要求军队向全体人民开放，但这些人却顽固地主张军队必须保持其原来的脱离人民的特殊地位。他们完完全全地错了。建立在人民意志基础之上，并得到法律承认的政权是最有权

威性的政权。同样，由热爱独立的人民组成的，并随时准备捍卫国家独立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在这样的军队里，军官享有最大的威信，官兵关系最为融洽。

不合时宜的成见和自尊心，不能动摇人民自行捍卫民族生存的坚强决心。现在人民意识到，继续保持模棱两可的制度是危险的，迁就过去将妨碍新原则的发展。单纯、明确的新制度必将逐步代替混杂拼凑的旧制度。夸大常备军的作用和贬低一支真正的军队的价值，其结果只能断送法国的国防。

现在是真正拯救军队的时候了，否则它将毁于疲沓和懒散的寄生虫式的生活。

如同我在上面指出的那样，颠倒现役和预备役之间的关系——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后者处于屈从和被遗弃的地位——这起到了瓦解法国国防的恶劣作用，使法国丧失一半实力。由于军事制度中存在着这一弊病，法国在防务方面等于只有半个法国。

饶勒斯认为，现役和预备役并存的局面危及国家的“生存”，因此必须尽快结束。但是，他不仅不希望法国的国防遭到削弱，反而要求建立全面的、完整的和有效的国防体制。饶勒斯把军队和国家结合在一起，把民主军队的思想和武装正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他以同样的热情谈论军队和国家。他对军队和国家怀有同样深切的感情。饶勒斯热爱军队，这是因为他热爱法国。他敬仰法国，这是因为他把法国看成是权利和生命的化身。他希望法国强盛。

议员们在演说中都谈到了“全民武装”；所有的军官，甚至包括那些思想最保守的军官，没有不同意“全民武装”的原则。久而久之，人们便以为，临到危急的时候，人人都将手持武器，开赴前线。朗卢瓦将军以及其它一些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指出，预备役是法国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于是，人们便以为，一

一旦临战，十一级预备役将全部投入第一线，为保卫国土而战。这将是一支了不起的军队。预备役共有二百万人，年龄均在三十四岁以内，个个身强力壮，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这将不是一支人数有限的“尖子”部队，也不是乌合之众。他们是一支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和组织严密的部队。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参谋部的动员计划，十一级预备役中，只有前五级——甚至不到总数的一半——才被派往前线，而其它七级——均为二十七岁至三十四岁的壮年——却不能上前线杀敌。

这样，在动员的时候，最年轻的几级预备役将编入 144 个现役步兵团，使原有的兵力增加一倍，剩下的人将编入预备兵团。这些预备役步兵团实际上只是一些地方守备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守卫据点和交通线，或者是补充前线的伤亡和生病的士兵。麦西梅在 1906 年和 1907 年的两次报告中透露，政府把七级预备役弃置不用，即把一百万精兵弃置不用，使法国失去数量上的优势。他在 1906 年写道：“与一般人的看法相反，我们不认为应该取消预备役的年龄界限，以便把他们统统转入现役部队。实际上，年龄不同的预备役将被编入不同的部队。总动员时，二十五岁至二十七岁的人将参加现役兵团，而二十八岁至三十三岁的人将编入与地方守备部队类似的单位”。1907 年，他再次强调：“若把第二期召集时间减为十五天，预备役中的年长者将同较为年青的第五、六级一样，不参加第一线的大规模行动，只需集中在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但至今尚未很好利用的野外训练营里”。

现在，预备役截然一分为二。至少有一半人仅仅在名义上属于现役的预备队。他们在战时同现役军队毫无关系；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是徒有其名。他们只不过是地方守备军

的一种形式，或长期驻扎一地，或承担一部分后勤工作。法国的预备役太多了，能够保卫国家的公民太多了，以致不知道如何处置他们才好。他们非但不能发挥保卫国家的作用，反倒成了累赘。

只有正义的国家，才能实行全民武装。假如一个政府把预备役全部弃置不用，这说明该政府居心不良，正在阴谋发动武装侵略。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便是一例。他们日益依赖现役军队，并且逐步缩小预备役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初级阶段中的作用，即缩小全体人民的作用。他们这样做是合乎他们的逻辑的。

他们不顾民族的感情，公然违背已经萌芽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朗卢瓦将军对已婚公民简直是“关怀备至”。但这是贬低预备役作用的最好不过的借口。他在“关怀”的幌子下，把大多数人摒于军队之外，让一小部分经过精心挑选的职业军人来左右国家的命运。难怪朗卢瓦将军在文章末尾叫嚷：“坚决制裁破坏分子！”

那些从组织和思想两方面把国防破坏殆尽的人最为可恶。他们使军队白白丧失一百万兵力，使人民放弃维护和平与正义的权利。

今日法国的社会制度犹如大杂烩一样：既有民主政治的精神，又有寡头统治的因素；既继承侵略的传统，又表现出和平的意愿。与这种混杂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军事制度当然也只能是模棱两可的。因此，法国预备役的人数大大超过德国。预备役不但不受重视，而且遭人嫌弃，甚至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政府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动用其中的一半力量。

法国只有从和平与民主的政策出发，组织自己的军队，她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法国也只有奉

行和平与民主的政策，她才能恢复其应有的权利，才能毅然决然地当着全世界的面，宣布放弃武力报复的企图——为了保全面子，她现在只得继续空喊这一口号。如果法国在各种场合光明磊落地宣布放弃其进攻策略，如果法国向各国保证愿意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议，如果法国真诚地希望维持和平，那么，一旦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时，法国就能依靠全体公民的献身精神，击退敌人的强大进攻，并持久地展开各种形式的抵抗。

到那时候，一切敢于冒犯法国的人都将遭殃！但是，那些自称最爱国、最富有牺牲精神和最懂军事的人，却把一半以上的预备役弃置不用，使法国白白丧失一百万兵力，丧失全体人民的热情支持。这实在是法国的不幸！

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人把全国公民分成已婚和未婚的两类，这等于向敌人承认，法国无力进行真正的全民抗战，无力动员全体公民齐心协力地保卫自己的祖国。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人一方面哀叹，法国的人口日益减少，而德国的人口却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却不去发挥法国的唯一军事优势，即立即动员其全部预备役。法国的经济条件远比德国优越，因为法国拥有大量的黄金储备，拥有长期积累起来的资本，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高，工农业发达，而且比例得当。

在动员预备役方面，法国也占道义上的优势：一旦法国遭到明目张胆的侵略时，法国就有充分的政治和社会理由动员其预备役，而德国则不敢贸然把预备役投入最初的进攻。法国在战略上同样处于优势，因为战争是在受到进攻的法国本土上进行的，只要善于并且敢于选择有利于集中的地点，便可及时地集中人民的力量，而侵略者则师出无名，得不到本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很难动员预备役到异国领土上去打仗。我

敢断定，德国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是不敢冒此风险的。如果他们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他们必将遭到惨重的失败，而这一失败必将导致一场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

如果法国能从一开始就动员其全部的预备役，做到举国上下团结一致，那么法国将变得强大无比，最疯狂的敌人也不敢对她轻举妄动。对于法国来说，这一崇高的国防政策不仅能很快导致和平，而且将确保持久的和平，也就是说，这将导致人类所希望的最纯洁和最慷慨的革命。为了巩固国防和确保和平，我们坚决反对把百万精兵弃置不用的极其荒谬的制度。职业的爱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神不知鬼不觉地使国家白白丧失一百万兵力，而我们则希望把这支大军重新组织起来。对这个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人民却几乎一无所知，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公民中间，甚至在有识之士中间，有几个真正懂得什么叫“动员”的呢？议会内外，又有谁关心参谋部的国防计划和兵力集中的计划？

饶勒斯根据官方报告披露的情况指出，后七级预备役，约一百万人，被弃置不用。他认为，动员全部预备役是正义的保障。因为“只有正义的国家，才能实行全民武装”。人民不会参与犯罪活动，不可能成为不法歹徒。谁拒绝动员全部预备役，谁就一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饶勒斯希望给民主和革命的法兰西增加一百万兵力。

建立一支真正民主的军队，一支不是迷信现役军人而是依赖广大预备力量的国民军，这将是和平的可靠保障。假如一个国家自觉地把其全部预备役用于国防，那么任何敌人都不敢贸然对它发动进攻。“职业的爱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神不知鬼不觉地使国家白白丧失一百万兵力”。应该让全国都了解军事问题，因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麦西梅的报告以及国防部长最近的声明都公然要求取消一半预备役。但是，这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公开或私下提出责问的人寥寥无几。既然法国要求每个健壮的男子服役两年，既然战争艺术在于能否在关键地点集中优势兵力，既然军事首脑认为，战争的最初阶段关系整个战争的胜负，那么，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把一百六十万十级预备役与两级现役合并使用呢？这在实际战术中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让大家来讨论和研究吧！这类技术问题只有对那些毫无解决问题诚意的国家来说，才是无法解决的。

事实上，一般人对这类问题不感兴趣；军事当局或者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从本阶级的私利出发，墨守陈规，独断专行。

没有很好地在全国开展军事教育，一般居民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对国家的安全关心不够，不愿参与讨论和监督最有效的国防手段。军事多属秘密，所谓公开讨论，并非要向敌人公开作战计划或具体细则，而只是确定一般的战略原则，以便通过实行全民武装来加强国家的国防力量。一个国家的战略原则如同军事组织一样，与本国的政治、社会制度密不可分。因此，国家的战略原则如同其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一样，必须接受全体人民的审查。这里当然不是指军事行动的细节，而是指原则、准绳、方法和目的。只有当全国人民都关心国防时，国家的安全才有可靠的保证。

战略的种类繁多：有防御性战略，进攻性战略；有介于防御和进攻之间的、极其危险的战略；有政治寡头和职业军人的战略，即只依靠驻扎在兵营的现役军队或者依靠现役和少数预备役勉强结合的战略；有真正民主的和全民的战略，即从一开始就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凡此种种，究竟哪一种战

略最好，哪一种战略最劣，均需让全体人民了解、讨论和决定。但是，现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并没有人民参加，而是在背着人民，甚至在违反人民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人民已逐步习惯让军事专家们秘密地制定全国行动的原则和具体细节。参谋部正在按照制度的原则精神和过时的理论，忙于削减一百万国家的保卫者，不愿有效地使用全国的预备役。他们之所以这么干，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无法调动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迷信由少数人组成的军队。此外，他们懒惰成性，根本不愿为组织一支精锐部队而花费气力。

我们提交议会和全国讨论的军队改组的方案不但包括真正实行全民武装这一点——目前还只是一个极不成熟的初步设想——而且还包括一系列与此有关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这个方案必将打破思想普遍僵化的状况，必将在实行全民武装的同时，通过对军事问题的讨论，使人民养成思考的习惯。

饶勒斯是一个完全的、不折不扣的民主主义者。他希望能让全体人民担负起保卫国家的任务。他要求人民时刻想到军队问题，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而决不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饶勒斯厌恶陈规旧习，厌恶军事专家和职业军人们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对于饶勒斯来说，人民始终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一个富有批判性和求实精神的因素。必须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保卫自己。必须使人民自觉地服从纪律。要使人民自己保卫自己，这就需要步骤地组织民兵。饶勒斯严肃地、深刻地批判了民兵制度的反对者。

如果东部地区的民兵在自己的家里藏有一定数量的枪枝弹药，一旦临战，他们应征入伍和集中的时间就会缩短（至少

对步兵来说是这样)。这是瑞士人想出来的一条绝妙的办法。我并不想一下子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个办法，因为我不愿给那些“好心肠”的人提供把柄，说我在加快征兵速度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幌子下，企图武装怒吼的无产阶级来反对可怜的资产阶级。我不希望我们这个从国防角度来看很值得研究的主张遭到粗暴的否定。但是，说实在的，我不认为，如果每个公民家里藏有武器，就会导致人们想象中的天下大乱。在骚乱和罢工中，人们手中没有枪反倒要比有枪时更容易出乱子。在人们手中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号召开枪只不过是一种形象说法而已，对别人和对自己均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类号召固然是无害的，但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产阶级一旦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他们就根本不需要这么做。当人们手中有枪时，当人们只需从肩上取下枪，装上子弹，就能开火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时，人们便不敢轻易号召开枪，否则就会引起严重后果。一个人只有在发疯或绝对服从的情况下，才会开枪。士兵们向人群开火，可以说是在履行“公事”；而他们对这一类“公事”正越来越反感。一个人只有在失去人性和理智的情况下，才会下令开枪。有良知的政治家在领导运动时，必须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采取负责的态度，必须反对任何导致流血伤亡的暴力行动。任何一个工人或者罢工者的妻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投掷石块，但是若叫他们开枪，他们便会变得迟疑起来。士兵在开枪的时候，不但会感到害怕和气愤，而且还会有一种闯祸的感觉。如果工人不惜酿成流血事件，滥用他们手中本应用来保卫国家的枪枝，那么他们的各种要求以及他们的事业都会遭到最强烈的反对和谴责。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游戏，工人们是决不会这么干的。不但非无产阶级群众，而且连工人阶级内部反对暴力的人——不管他们是出于明智

或胆怯，还是出于忍让或理想主义——都会对使用武力的人进行可怕的报复，甚至包括肉体上的报复。不光革命的工人手里有武器，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半保守的工人也有武器。他们将汇合成一股愤怒的可怕的洪流。首先开枪的人最终将被屠杀的浪潮吞噬。这种可怕的场面足以使人们的头脑清醒，不敢轻举妄动。瑞士的社会党人和无产阶级从未想到动用武力。我曾问他们：“你们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难道不怕人民使用武力吗？”他们回答说：“我们从未想到使用武力，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干。首先开枪的人是绝无好下场的。”

近几年来，瑞士的民兵虽然仍把枪带回自己的家里，但是枪中并没有子弹。他们只有在射击俱乐部练习枪法时，才领取子弹。当地的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的死对头对我解释说，从公民那里收回子弹，这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不信任或者出于治安方面的考虑，而是因为公民自己要求政府这么做的，他们生怕儿童或精神病患者摆弄枪枝时发生误伤。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担心，如果把子弹留在公民家里，可能会给企图自杀的病人和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提供方便。这是为了减少社会新闻栏里的悲剧性消息，人民才要求政府统一保管弹药，而决不是为了防止社会骚乱的发生。尽管如此，很多瑞士人仍把练习后剩余的子弹带回家里，而且他们还能自由地从官商那里买到子弹。这是我在洛桑时亲眼目睹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认为，瑞士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农牧业国家，那里的人民秉性温和，所以劳资之间从未发生过激烈的阶级斗争。

情况早已改变。现在，瑞士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农业，它比法国更加发达。工业城镇和工人的人数明显地增加。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具有不同性格的

移民加入瑞士国籍，其中包括法国人、德国人以及热情奔放和爱动肝火的意大利人。南方发生骚乱之后，法国政府采取了限制或者取消分区募兵的政策。国防部长皮卡尔在答辩时承认：“我在瑞士时，确实感到那里的民主制度相当健全。不但户户藏有枪枝，而且人人尊重法律。这使我产生新的想法和希望。”国防部长佯装不知道，最近在瑞士的韦维市，当一家巧克力糖果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时，曾发生激烈的冲突。瑞士的每个省份都爆发过大规模的、激烈的罢工运动。士兵曾向人群开枪。但是，由于我在上面说过的那些原因，瑞士的工人和社会党人从未“从肩上取下枪枝”。苏黎世林荫大道两旁的豪华的商店里堆满了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日内瓦珠宝店里陈列着光彩夺目的金银首饰；伯尔尼银行里黄金堆积如山；然而，家中有枪的贫民终日彷徨落魄在迷人的林荫道上或污秽的小巷之内，他们却从未想到把子弹推上膛。

饶勒斯运用他一贯的做法，双手紧紧抓住反动派这头蠢牛的尖角：对人民的不信任和害怕人民的暴力行动，即害怕革命。统治阶级用心十分险恶。他们知道，最终只有依靠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他们才能进行统治，才能维护其统治。统治阶级时刻担心受蒙蔽、受剥削和受压迫的人民有朝一日将揭穿这个经过巧妙伪装的秘密，担心强大的人民力量将用革命暴力来推翻建立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基础上的制度。统治阶级和他们的政府一想到觉醒的人民将象力大无比的参孙^①一样，一抖双肩就可把社会不公正和贫困的大厦推倒，一想到人民将会拿出Ultima ration^②——革命，他们便害怕得浑身颤抖。

① 神话故事中的一位大力士。——译者注

② 拉丁文，意为：最后一手。——译者注

饶勒斯明白这一点。他知道，所谓职业的和冒险的爱国主义者为了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将不惜牺牲国家的安全。他作为一个清醒的社会主义者，坚信国家的命运是同社会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联的，但是他把国家置于一切之上。为了使他的政敌能够接受他所提出的、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改组军队的计划，饶勒斯尽量避免提及由于得到民兵制度的反对者的不公开支持而显得更加危险的这一基本观点。他摆出许多令人信服的新证据。他向人们详尽地介绍了瑞士的民兵制度。他指出，瑞士人民既具有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和作为一个不可征服的、自由独立的民族的自豪感，又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饶勒斯总是主动收集各种反对意见，并据理予以驳斥。他指出，不能根据公众集会上措词激烈的演说来判断一个国家的人民：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满可以在集会上慷慨陈词，替生活贫困的工人群众诉说他们心中的怨恨和不满；这好比一帖“止痛剂”，能起到安慰和出气的作用。但是，如果要这些领导人公开煽动工人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他们便会吞吞吐吐，顾虑重重。凡是了解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这类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饶勒斯十分了解人民的心理，“任何一个罢工者的妻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投掷石块，但是如果叫她开枪，她便会变得迟疑起来。”

瑞士的有产阶级摸透了本国工人阶级的心思，所以从未想到要把工人家中的枪枝收回来。有些民兵不愿意把子弹留在家里，因为他们希望减少报刊社会新闻栏里有关个人悲剧的消息，而决不是为了防止社会骚乱的发生。

有人反驳说，这是因为瑞士人民秉性温和，他们是“专门从事农牧业”的。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瑞士的工业比法国还要发达些。苏黎世、温特图尔和巴塞尔等工业城镇发展迅速，日新月异。瑞士的财富日益增多。富人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专门为他们开设

的商店比比皆是；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却过着悲惨的生活。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和其它国家一样，瑞士军队也向罢工的工人开枪。但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却从未想到“拿起放在家里的枪枝”。穷苦人默默地从“陈列着光彩夺目的金银首饰的日内瓦珠宝店”门口走过，从黄金堆积如山的伯尔尼银行门口走过。在他们中间也有法国血统的工人。家中藏有武器的人民并没有威胁“苏黎世林荫大道两旁的豪华商店中的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

饶勒斯在消除了特权阶级对民兵的疑虑之后，便着手解决如何组织民兵的技术性问题。他特别重视军官的教育问题，因为他觉得这是特权阶级反对民兵制度的另一个巨大的思想障碍。

饶勒斯作为一名社会党人，竟能对军队作出如此精辟的分析，实在令人惊叹不已。不过，我们不应忘记，饶勒斯本人也是一名战士，他是自由民主制度下捍卫权利、自由和民主的战士，是忠于自己的崇高职责和不惜牺牲生命来完成神圣使命的战士。职业的军阀集团是一帮心胸狭窄、极端自私的家伙，他们竭力抹杀人的个性，反对人们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只要求消极的，几乎是机械的服从。饶勒斯的民兵主义——请允许我使用这个新词——则以发扬人的个性作为理论基础，它要求人们自觉自愿地和坚定不移地献身于一个值得为之作出最大牺牲的伟大事业。他特别要求作为军队灵魂的军官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度的文化水平。

报告以极其强硬的语气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学识。国家确实应该根据现有的教育条件，要求全体军官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为此，国家应该创办各级学校，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所谓军官出身问题不应高于拯救祖国这一最高原则，这个问题与军人的崇高使命毫无关系！军人之所以光荣，这是因为军人应该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可以说，世界上没有比自觉地献身于祖国更加伟大的行动了。在千钧一发的危

急关头，军官的责任是保持冷静，镇定地进行指挥；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扬英雄主义和高度发挥理智的作用。假如一个军人终日沉湎于庸碌的生活，精神不振，意志衰退，那他怎么可以有忘我献身的精神呢？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军官们缺乏严峻的考验。在和平时期培养不畏艰难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唯一途径是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一个人在充满幻想和激情的时刻，应该鞭策自己发奋学习，力求上进，以便胜任肩负的工作。否则，在遇到考验的时候，他只能凭感情的冲动和虚荣心行事，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战斗。然而，我们现在却不要求我们的军官发挥他们的全部聪明才智，而以最低的文化程度为标准，只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学识”，从而埋没了他们的一部分才能。普通学校的教育，尤其是军事院校的教育往往不是在提高学生们的知识水平，而是起到相反的作用。

拯救祖国的崇高任务要求对军官进行严格的智力训练。为了使他们能够担当起保卫自由和权利的使命，“必须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扬英雄主义和高度发挥理智的作用。”必须尽可能地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

显然，只有抛弃反动的等级观念，这个目标才能达到。必须使军官和人民以及人民的革命智慧完全结合起来。饶勒斯希望军官们摆脱市侩习气和树立远大的社会理想。为此，他再三强调光荣的革命传统。

蒙泰涅只顾个人的前途，不敢思考人类的未来，“所以变得鼠目寸光，思想日趋僵化，慢慢地消声匿迹”。与此相反，拉伯雷能够高瞻远瞩，用希望和智慧的光芒照出问题的本质。蒙受奇耻大辱的奥什在狱中从拉伯雷的著作中得到了巨大的精神安慰。临死前，他对自己一生的不幸遭遇和丧失理性的人

类非但毫无怨言，反而内心充满着希望。奥什完全理解拉伯雷书中所说的一切，他从他的老师那里获得了无穷的力量。一个投身于伟大斗争的人从生活中得到深刻的启示，看到了精神生活中的巨大奥秘。人的精神力量和人的活动互相结合，互相补充，互相解释。拉伯雷的学说使奥什能够至死忠于革命的思想，而奥什的革命行动则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拉伯雷的学说。只要存在着军队，那么把军队同人民分割开来，这就是抹杀法兰西的智慧，就是对军队本身的犯罪。

一百十五年以来，凡是诋毁和镇压革命的政权都犯有这个罪行。它们阻碍一个新法兰西的健康发展，并且歪曲和贬低军队的价值。它们利用军队来实现个人的野心，使其成为一个为特权利益服务的残暴成性的特别阶层，成为一个脱离人民、不得人心和不堪一击的武装集团。一个世纪以来，军队既是反动派的宠儿又是他们的牺牲品。拿破仑手下的军队丧失了追求自由的革命精神——这一精神曾使它成为最伟大的军队——在获得一系列虚假的和孕育着危险的胜利之后，它使国家蒙受耻辱和遭到肢解。这时，利欲熏心的军官已对拿破仑感到厌倦，于是纷纷倒戈，投入旧君主制度的怀抱，军队变成了乌合之众。在残存的革命力量和拿破仑分子遭到迫害和清洗之后，军队变成保皇派和资产阶级互相勾结的工具。它被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即扼杀 1848 年建立的共和制。军队还为那些企图用政变来根除共和制的人效劳。它在帝国中继续保持其虚荣和特殊的地位，它并没有把它在克里米亚和意大利取得的虚假的胜利当作严重的教训来加以记取。它不能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必要的反省，也不能接受追求自由的优秀分子的思想。王朝末期，军队成了孤家寡人，它夹在四面楚歌、软弱无能的政府和惨遭镇压、充满敌意的工人阶级中

间。它无法从摇摇欲坠的帝国那里获得力量，也不能从对它充满不信任的民主阵营那里获得力量；它既缺乏改革的热情又毫无组织性。军队在没有准备、没有理论和没有方法的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战争考验。光凭一时的勇敢是无法挽救它覆灭的命运。第三共和时期，军队曾一度稍有起色。但是，军队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阶级地位使它在感情上依然同旧政党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又被共和政府，被资产阶级的软硬兼施的表面民主弄得晕头转向。几年来，军队被复仇的念头迷住了心窍，看不到自己地位不稳、精神生活空虚这一严重状况。当复仇的念头变得淡漠或完全消失时，它才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是处在封闭的真空中。在与人民严重脱离的情况下，军队的本身就成了中心和目的。它单独成为一个天地，有其特殊的法律和特殊的荣誉。资产阶级政府正在大肆鼓吹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企图以此来转移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视线，转移人民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力。政府在极力颂扬军队的同时，抽掉了军队的最根本的东西——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精神。

军队没有思想，没有理论，没有理想，只听到官方的一片空洞的赞扬声。它就象一个挂满胜利品、战旗和奖章的空架子。当最凶狠的反动政党仿效钻在木马肚内的希腊人，准备起用这个凶残的和思想空虚的军阀集团时，资产阶级共和派只好依靠临时的手段，依靠警察的力量来应付局面：这只能激怒军队中的旧党派和危害新生力量。现在，法国资产阶级军队既没有专制王朝时期的绝对服从纪律，又没有人民民主制度下的热情。因此，如果不用某种形式的社会革命和意识革命来改革目前的军事制度，那么军队只能是一个没有目标和灵魂的庞然大物。诚然，人们可以反驳说，尽管一百年来我国

的军事制度饱尝军队与民主政治脱离的苦头，但是军队中毕竟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材。我知道，军队中确实存在一批很有胆识的人。我知道，一些军官确实具有高尚正直的品质。维涅曾描述过这些军官在看到军队沦为替党派私利卖命的奴隶时的痛苦的心情。我知道，一些有觉悟的军官确实参加了圣西门运动以及共和党的宣传工作。我知道，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军官们的身上仍然闪烁着英雄主义和聪明才智。我也知道，三十年来，很多军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表现出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几年来一直在痛苦地探索新的道路，他们在极其荒谬的制度下无力地挣扎。他们好比被围困在一座孤城里，弹尽粮绝，处于完全绝望的境地，然而，这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

在饶勒斯看来，把军官同人民分开，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他指出，造成这一状况的罪魁祸首是反动派，因为他们把军队变成旧政党手中的反革命工具，变成“保皇派和资产阶级互相勾结的工具”。反动军队扼杀了1848年建立的共和制，残酷地镇压了共和制的缔造者——无产阶级。它发动了12月2日政变。军队已沦为反动派手中的工具，它无力进行改革。第三共和时期，军队变成一具“僵尸”，只能用“复仇的念头”来弥补“精神生活的空虚”。各届政府拚命奉承军队，但是，这根本不能使它获得新生。军队没有思想，没有理论，没有理想。就在这个时候，“最凶狠的反动政党仿效钻在木马肚内的希腊人，准备起用这个凶残的和思想空虚的军阀集团。”

饶勒斯看到，那些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军官内心感到十分痛苦。他完全承认，“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军官们的身上仍然闪烁着英雄主义和聪明才智。”但是，他们在以陈规旧习和集团私利为基础的极其荒谬的制度下无力地挣扎着。

饶勒斯希望结束军队和人民分离的状况：他希望军队国家化、人道化，从而使它接受当代争取解放的伟大思想。先进政党中的一些好心人指责饶勒斯倒向军国主义一边；但是，只要认真读一读饶勒斯的著作，人们便可发现，这类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恰好相反，饶勒斯决心同“这个凶残的和思想空虚的军阀集团”血战到底。为了捍卫崇高的理想，他只要求建立民主的武装。他希望建立一支为理想服务的合乎理想的军队。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饶勒斯要求对军官进行教育、教育、再教育。然而，这一教育不应该使军官脱离人民群众。可以这么说，军官在得到任命之前，必须首先被“派”到人民群众中间去。

我首先关心的是军官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同低级军官没有什么关系。目前，法国不同级别和不同军种的现役军官共有 31,000 人。其中 6,000 名军官不编入作战部队，如行政军官、军医、参谋军官等。如果把更多的行政事务工作委托民事部门和工业部门去办，那就可以减少军官的人数。这里，我只想笼统地谈谈军官问题。

从理论上说，总动员时，十一级预备役均须投入保卫国家的战斗，所以仅靠 31,000 名现役军官是不够的。

按照作战计划，预备役军官需有 18,000 名，其中 12,300 名步兵军官，1,300 名骑兵军官，3,500 名炮兵军官，900 名工兵军官，400 名铁道兵军官。现在，现役步兵军官为 14,000 名，预备役步兵军官的人数和现役步兵军官的人数基本相等。实际上，预备役步兵军官常常缺额，目前只有 5,000 人，还不到总数的一半。我不打算细谈这一问题。我只想说明，战时，军队一共需要大约 50,000 名军官。既然人数如此之多，所以他们就不可能全部都是职业军官。否则，国家的财政是负担不了的。此外，如果这些军官指挥的部队全是驻扎在兵营的常

备军，而部队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无事可干，军官们无疑也将过着悠闲的、寄生虫式的生活。这将削弱军队的士气。为了真正体现新军队的人民性，为了使这支军队对自己的原则产生信心，必须把士兵驻兵营的服役时间从两年时间缩短为六个月训练所必需的时间；必须组织地方部队和尽可能地就地募兵；必须使军官的任命和晋级带有若干民主色彩。但是，光靠这些措施还不够，还必须使绝大部分军官同士兵一样不脱离平民生活，即公众生活；必须使人民明白，平时他们可以照常生活和工作，而战时他们则将成为士兵或军官。尤其应该注意克服我国历史上那种放任自流的恶习。应该让优秀的职业军官专门研究日趋复杂的军事问题，研究和宣传最有效的作战方法以及对全体公民进行严格的军事教育。当然，这些军事专家本身也必须与民主武装力量和现代生活保持不断的联系，尊重民主和具有民主精神。法国大革命时代，军队混合编制，每团有三个营，其中一营为旧军，两营为志愿军。我认为，今天的国民军的军官也应采取混合编制。职业军官应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们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较多的军事专业知识，受过民主的高等军事教育。不脱离平民生活的民事军官至少应占三分之二；他们通过国民军的职业军官的课堂教育、示范和合作来丰富自己的军事知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民事军官分两种情况：他们当中的一半人是受过严格的普通教育的学生，经相当的军事训练之后，便可在很短时间内由军士提升为军官；另一半人是很有才干的军士，他们经过一定的训练之后，也可晋升为军官。因此，军官的来源有三类：职业军官、受过普通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民事军官以及优秀的军士。这三部分人的人数基本相同。根据法国现有的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这种做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的人材，以

便组成一支精干的军官队伍。

我对所谓出身一律，毫无兴趣。因为要求军官的出身一律，只能是虚假的幻影或危险的圈套。只要今天的社会基本维持现状，只要不对现有的占有制从根本上进行真正的革命改造，只要文化为大、中资产阶级所垄断，只要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仍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那么，所谓出身一律只能是一场骗局：它将很快被事物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现实所粉碎。其实，即使在面临着反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威胁的共产主义国家里，也不会强求军官出身一律。当然，在全体人民都有支配财产的权力的社会里，等级观念已经消失，人们完全可以按照科学的专业分工，把军队的一部分领导职责交给职业军官。但是，在今天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出身一律将意味什么呢？要确保出身一律，全国的军官候补生必须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同的文化程度和智力水平。让“体质情况不同”的人一起参加“赛跑”又有什么意义呢？一部分人“先天不足、体质虚弱”，没跑出几步，就气喘吁吁，再也跑不动了；而另一部分人“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肯定一路遥遥领先。两只充气后具有相同升浮力的气球升入空中，由于遇到的气流不同或者控制气球的人的胆量和技巧不同，结果一只升得高一些，另一只升得低一些。但是，在开始时，这两只气球的机会是均等的。如果两只气球因为充气程度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升浮力，你却硬说它们的机会是均等的，这纯系无稽之谈。

选拔军官时，保证出身一律的具体做法应该是这样的：所有的军官候补生首先必须在军队中服役当兵两年，并担任相同的军士职务；然后进入相同的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根据他们在校的考核成绩和当见习军官时的成绩，来决定他们的提升。这是瑞士人的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在法国，那些希

望军官出身一律的“民主人士”恐怕不愿提出如此严格的要求。他们只要求一部分军官候补生服役当兵；即使如此，他们对这部分人也不是一视同仁。1905年颁布的组织法规定：“凡军官候补生均须经过服役当兵之阶段。圣西尔军校和陆军技术学校的学生也不例外。”照此规定，法国军官似乎皆为士兵出身。我无意批评这个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相当不错的法律条文。我只想指出，虽然法律规定每个公民必须服役两年，但是军校的学生在当了一年兵之后，就处在比他人优越的地位。

饶勒斯要一支尽可能地保障民主的军队。为此，他要求“绝大部分军官同士兵一样不脱离平民生活，公众生活。”同时，他希望，人人都感到自己是一名士兵，“必须使人民明白，平时他们可以照常生活和工作，而战时他们则将成为士兵或军官。”他对军官的出身一律，丝毫不感兴趣。他认为军官的出身不必强求一律。军官的来源可以有三个：职业军官、不脱离公众生活的民事军官以及出类拔萃的军士。

饶勒斯不愿为了军队而牺牲民主制，但他也不愿为了机械的平等和起码的民主而放弃军队本身的技术要求。人的能力不可能绝对相等，指挥军队的军官也不可能绝对相同。出身一律完全是虚假的。善于辞令的饶勒斯极其形象地表达了他的想法：“如果两只气球因为充气程度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升浮力，你却硬说它们的机会是均等的，这纯系无稽之谈。”

教会成立初期，狂热的基督教徒对异教徒宣称：“我们的人遍及天下：在你们的法庭里，你们的军队里和你们的宫廷里，都有我们的人。唯独你们的寺庙是例外。”必须让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和雄心。在这种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军官怎么可能无视或不理解无产阶级呢？

其次，为了使军官较为容易地接触民主，应该废除军官学

校中的贵族式的和修道院式的制度。从今以后，普通大学的课程应包括军事这门学科。培养律师、化学家、工程师、医生或教师的大学也应该培养军官。各方面的理由都促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方面，关于大学的概念扩大了，更加系统化了。大学各专业的学生可以自由听讲，任其选择课程。原来各院系之间互不通气的情况现在已有所改变。各专业，特别是相近的专业开设了共同的课程。学生除了必须掌握专业知识之外，还应了解本专业与整个科学以及整个人类活动的关系。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已经并入、或起码已经附属于巴黎大学，它虽然依旧是一所培养师资的高等学府，但是那里的学生在学习教育学的同时，还学习普通课程。

军事科学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从现在起，在既培养分析能力又培养归纳能力，既传授专业知识又传授普通知识的大学里，将开设这门学科。另一方面，军官学校也已比过去开放一些。考入圣西尔军校和陆军技术学校的新生，在入学前，必须首先入伍当兵；这就是说，未来的军官必须接触士兵和平民的生活，接触由来自不同阶级的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国民军的民主制。缩短军官学校的学制，固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起码可以缩短学生的修道院式的生活。过去那种把学生禁锢在学校里单纯学习专业的制度在某些方面已经被打破。现在为什么不把军官学校的门窗全部敞开，以便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呢？为什么不填平人民和军队之间的鸿沟？为什么要继续维护军官的特殊地位？为什么不让未来的军官同普通大学的学生亲切、自由地进行丰富多彩的思想交流和学术交流呢？为什么不让普通大学的学生从准备担负国防重任的青年人那里得到新的精神食粮呢？现在，军官学校中存在着令人窒息和等级森严的纪律。学校委员会已经觉

察到这一点。这种纪律不利于培养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和民主军队所需要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军官。学校的教官以高人一等的长官自居,事事要求学生绝对服从。教官不是在传授知识,而是在发号施令。学生和教官之间不存在平等和自由讨论的余地。甚至在教学过程中,教官也只要求机械的、盲目的服从,给学生的思想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即使是那些从外面聘请来担任普通课程的“世俗”教员,也无法摆脱这种恶习。如果他们允许学生自由讨论,提出大胆的见解或疑问,那就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学生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和机械钟表一样,只有上了发条,才能行走,否则它就停止不动,这和根据阳光的投影自动指示时间的日晷完全不同。假如在普通大学里开设军事班,担任教学的军官便能逐渐习惯于学生大胆的和自由的讨论,军事班的学生也可象数学系、历史系或哲学系的学生一样,培养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以为,这样一来,学生再也无暇进行操练。实际上,只要合理安排时间,他们就完全可以把射击之类的军事训练和课堂学习兼顾起来。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一方面随巴黎大学文学系或其它系的学生一起听课,另一方面在本校学习当一名教师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军事班的学生也应该采用这种办法。然而,我并不希望加重学生的负担,以免他们生吞活剥、不求甚解,来不及消化学到的知识。未来的军官在校学习时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不应少于医科学生或法律系学生。我们认为,他们的学制,包括在新兵训练营的六个月时间在内,应该定为四年。四年后,当他们被分配到国民军各部门中去的时候,他们必须既精通专业技术、又具有今后进行研究和创新所必需的广博的学识。麦西梅发现,人们过分偏重军官在校的教育,而忽视了

他们毕业后的教育。他引用了某一将军的一句话：我们把燕麦全部喂给了幼马，而壮马却一点也没有。我们不希望把军官的智力教育仅仅局限于在大学的这么几年，他们应该在整个服役期间，坚持自学和进修，始终保持旺盛的求知欲。为了使他们在工作中不至于象其它人那样墨守陈规，为了使他们对今后的学习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基础教育应该是广泛的和扎实的，应该引起他们对科学和自由的向往，培养他们广阅博览的习惯。

大学军事班的学生在校期间应享有一定的待遇，他们的生活费用将由国家和我曾提到过的各类团体负担。学习努力、成绩优异的学生将受到晋级的奖励。这样，大批优秀青年就会踊跃报考大学军事班。每年，每所大学的军事班招收二十名学生，这同军部举办的尉官训练班相仿。巴黎、里昂、里尔、图卢兹、波尔多等地的主要大学每所将各有60名至80名这类学生。思想和行动的力量聚积在一起，必须燃烧起熊熊烈火！

饶勒斯的军事政策同其总政策一样，系统地运用了他的泛神论原则，即万物的渗透性：事物和人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真空。一切事物都被某种共同的物质联系在一起，事物与事物互相掺和，互相关联，互相渗透。一切事物寓于一切事物之中。无论宇宙还是人类，都不是由截然分割的和互不关联的部分组成的。事物的连续性是绝对的。不存在真空。宇宙是一个机体。我们在研究饶勒斯的哲学观时，已经看到上述思想。这里，我们还需指出，他的民主思想已渗透在他的宇宙观里。准确地说，在饶勒斯的思想深处，宇宙本身便是某种民主制，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互相依存和互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同样，在军队问题上，饶勒斯也坚决反对军事专门学校中的修

道院式的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不让学生接触外界的思想和事物。军官必须和人民融成一体，因此他们必须同全国知识界的精华一起生活。“军事科学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应该在普通大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未来的军官应该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通过专业学习，掌握国防知识。这样便可以消除等级观念的残余。“把军官学校的门窗全部敞开，以便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在目前的军官学校里，教官不是在传授知识，而是在发号施令。学生的思想变成机械一般，缺乏主动性、灵活性和生气。饶勒斯生动地指出这一僵硬制度的特点：“和机械钟表一样，只有上了发条，才能行走，否则，它就停止不动，这和根据阳光的投影自动指示时间的日晷完全不同。”

我们在深入研究真正的人民军队的组织条件时，遇到一个更为迫切的重大问题。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是否愿意保证军队的正常活动？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热情支持，一切军事机构等于虚设。如果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对军官的征募制一点也不热心，不注意把军队的指挥权置于自己的影响和思想控制之下，那么一切征募制度，不管人们把它设想得如何合乎民主精神和人民性，都不能发挥其效用。只有当人民积极参与军队的建设，这类征募制才会行之有效。假如人民采取敌视或袖手旁观的态度，军事制度方面的任何形式上的变动都会起到瓦解国防的作用，从而使法国无力抵御外来入侵，甚至导致重新建立军人寡头统治。在人民麻木不仁的情况下，唯独有产阶级掌握战争机器和镇压工具，他们以军队组织的表面民主化为幌子，继续保持他们的实力和现有的特权；这种军人寡头政治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为什么无产阶级不愿按照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以日益壮大的自身力量，来承担组织军队和保卫国家的重任呢？我觉得，反军国主义的宣传，甚至反爱国主义

的宣传往往含糊其辞，引起了不少混乱和误会。因此更加需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确信，通过对问题的正确分析，劳动人民将会明白，无产阶级参加新军队的建设，这对社会和他们自己，对全体人民、革命和国家都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们的宣传中既有一些必要的事实根据和大胆的有益的主张，又有一些轻率的和不正当的奇谈怪论。资产阶级报刊千方百计地企图利用这一点，以便制造更大的混乱。他们出自内讧或勾结的需要，矛盾百出地解释我们的宣传对群众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有时，它们故意扩大危险的一面，因为他们害怕社会党和激进党之间的接近，害怕一切民主力量在大胆争取社会进步的事业中的合作。这些教训试图说明，反爱国主义在工团主义中占了主导地位，逐步分散了全国的力量。它们对激进党人说：“难道你们将同破坏法国社会的政党携起手来吗？”有时，为了说服犹豫不决的政府对工团主义和社会党下毒手，它们又说：“不用害怕，这些人虚弱得很，他们的组织毫无力量。他们无法把他们的邪说灌输到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头脑中去。他们没有触动——更不用说掌握——人民的心灵。我们的士兵虽然在演习中疲惫不堪，但仍然保持旺盛的斗志，仍然愉快地服从长官的命令，这便是一个明证。”

对反动的、保守的资产阶级这种自相矛盾和荒唐可笑的说法，我们根本不用理睬。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们不必追究，无产阶级对军队的现有形式及其具体运用的抵触情绪，或者对社会反动派给国家的概念所规定的形式的抵触情绪，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必追究，无产阶级当中的某些人在盛怒之下，或者因为被一些遭到滥用的简单提法迷住了眼睛，从抵触、不满发展到否定包括防御性的人民军队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军队，否定包括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在内的一切形式

的国家。但是，根据世界现状以及法国目前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我们必须弄清楚，无产阶级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责任和利益在于对现有的军队进行必要的改造，使其成为民主的和人民的军队；还在于在明确的正义和和平的总原则的指引下，警惕地守卫正在逐步发生变革的祖国。即使从法国的安全出发，无产阶级也必须参加军队的改组工作，因为国家的安全是他们在国内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我曾经指出过，现在的军队已经奄奄一息，我国的国防软弱无力。法国工人阶级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在陈腐过时和矛盾百出的军事体制下，继续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使法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要么亲手创建一个崭新的防御体制，并成为这一体制的中坚力量。仅仅接受改组军队的一些提法是不够的，即使它们是积极的和明确的，应该采取认真和坚决的行动，使这些提法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如果工人不热心于军事教育，不参加体操和射击训练，不参加野外演习，以代替今天枯燥无味和令人窒息的教育，那么嘴上说民兵制度比兵营制度优越又有什么用呢？如果绝大部分来自无产阶级的十万名低级军官把保卫国家看成是一件令人厌恶的苦差事，那么即使有得到法律确认的三百万民兵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摆在法国和无产阶级面前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者法国继续维持其陈腐过时、摇摇欲坠和千疮百孔的军事形式，一切听天由命；或者工人阶级自觉自愿地组织一支生气勃勃的和广泛的新军队，并成为这支军队的中流砥柱。但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愿作后一种选择呢？

工人阶级和社会党人指责军队沦为资产阶级对内进行镇压和对外进行冒险的工具。不错，军队确实是工具，它没有自己的力量，没有主见，也没有自己的政策。至少在法国，军队

只是文官政府的奴仆。虽然军队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虽然它违反宪法，威胁或践踏自由，屠杀人民，但这一切不是为了谋取它的切身利益，它只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而已。

西班牙、土耳其和希腊的军队自发地进行有益或有害的革命。而法国的军队则是各种社会力量冲突的工具。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平民革命 (La révolution civile)，它对以后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雾月的掷弹手们是不为某一集团卖命的。波拿巴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这是因为各政党被长期无休止的争吵弄得精疲力尽，但军队始终游离在它们的争吵之外。波拿巴自称在军队之外，并且凌驾于军队之上。他的幕僚对他的发迹感到不安的程度至少不亚于忠于革命的革命者。可怕的“六月镇压”虽然是由卡芬雅克指挥的，但不是由军队自己策划的，也不是为了军队本身的利益。镇压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强军人集团在共和国中的实力。自私的、胆战心惊的和阴险毒辣的资产阶级一手炮制了“六月镇压”。他们几个月来一直在窥测时机，企图一举消灭社会主义。教会清楚地知道，只有当遭到血腥镇压的工人阶级厌弃共和派资产阶级时，它才能战胜民主共和制。因此，教会利用冲突事件，拼命推波助澜。不过，它在利用冲突的同时，又有点担心。蒙塔朗贝尔生怕将来的资产阶级秩序只靠物质力量维持，简单地靠刺刀生存的社会可能会认为精神力量，即宗教的力量和教会的说教是多余的。

可怕的“十二月政变”之所以发生，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农民盲目地崇拜拿破仑，同时也因为自私透顶的资产阶级扼杀了人民的力量和扑灭了共和的烈火。聚集在谋取王位者周围的野心勃勃和享乐成癖的将军们并不是这场政变的罪魁祸首。因此，与其说这是军人政变，还不如说是资产阶级保守的

社会政变。当然，军人只知道消极地服从；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士兵和普通军官完全听任几个鲁莽的将军的摆布；追求暴力和统治的本能在与人民相脱离的军队中迅速滋长——这一切无疑使得那位阴险的冒险家能够更容易地实现其野心。但是，军队的欲望或要求不是导致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同样，在公社时期，梯也尔和凡尔赛的国民议会决不是在军队的影响下才起来反对巴黎的共和派和工人群众的：当时军队只是一个穷途潦倒的可怜虫。由于军事上的失利，指挥官的无能和叛卖行为，军队已经名誉扫地，毫无威信，再也无法左右局势和发号施令了。巴赞纳的事业，更正确地说，他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计划，遭到了可耻的破产。梯也尔这个固执己见、心胸狭窄的老牌议员，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并打算继续充当军队的后台。凡尔赛国民议会本身并不是由军人集团控制的。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出于对专制独裁的憎恨和害怕，互相抱成一团。对于民主制的狂热信徒和神权的崇拜者来说，军队显然服从人民或上帝任命的文官政府。奥尔良议会制的干将们在这些对立的理想主义派别之间周旋。为了阻挡和扼杀民主，他们并不直接依靠武力，而主要依靠立宪会议，巧妙地进行抵制和从中作梗。在最后几天的战斗中，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共和思想的巴黎无产阶级，面对一批疯狂的、如痴如醉的士兵以及趾高气扬的和冷酷无情的军官。这时，爱好虚荣和暴戾的迪克罗对无产阶级大发雷霆，把他自己的无能和笨拙归罪于他在巴黎围困时期从未去组织和领导过的“巴黎小市民”。加利费手下的一名将军对无产阶级大肆炫耀武力，犯下了种种暴行。反动派在穿着军装的士兵和杀人不眨眼的将军的血腥支持下，取得了胜利。这一情景将永远留在无产阶级的心目中。但是，国民议会之所以反对公社，不是由

于受到军队的唆使或者为了谋求军队的利益。国民议会企图通过扼杀不断震撼整个法国的首都工人和共和民主制，来维护一部分人主张的传统的君主制或议会的君主制，维护另一部分人主张的资产阶级保守的共和制，使之甚至在人民的合法进攻下，也能世代存在下去。这不是军人集团的事情：这是特权阶级采取的一个血腥步骤。这场反动风暴过去以后，体现共和派意愿的普选制确立了；尽管保守党派为了在群众中制造混乱，高喊要制止社会祸害，但是他们已被民主运动远远抛在后面，再也不敢动用军队的力量来反对人民的合法力量。政府首脑麦克马洪元帅是军人出身。那些最疯狂的人，那些刚被击败的最喜欢独裁的人，当然还有一些将军和主教，要求麦克马洪发动军事政变。即使麦克马洪本人一度曾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他也不敢冒此风险。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已经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合法要求；因为所有的共和党人，从最温和的到最激进的共和党人，都一致反对这类肮脏的勾当；因为反动派中的一些政治头目受到议会传统的约束，讨厌采取武力；还因为军队并不毫无保留地支持那种靠政变上台的反革命政权。

饶勒斯主张由人民自己组织军队，主张军队应为人民服务。因此，他自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民对军队有何想法？”如果人民在军队中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如果人民对军队漠不关心，那么任何军队都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军队在人民的眼里只是为有产阶级服务的战争工具和镇压工具，那么情况也将会如此。

饶勒斯从反面论证上述思想。如同他在国家问题上的做法一样，饶勒斯按照理想的观点，论述军队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必追究，无产阶级对军队的现有形式及其具体运用的抵触情绪，或者对社会反动派给国家的概念所规定的形式的抵触情绪，将会发展到

什么程度。”我们必须知道，人民是否愿意“本着民主精神和人民性”去改组军队。人民必须在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法国和一个受人民武装有效保护的法国之间作出抉择。不应该让人民觉得服兵役是一件“令人厌恶的苦差使”，因为建立民主制度后，人民应该向三百万军队输送十万军士。

饶勒斯认为，指责军队沦为资产阶级对内进行镇压和对外进行冒险的工具的说法，具有一定的道理。军队是个工具。“它没有自己的力量，没有主见，也没有自己的政策。”但是，西班牙、土耳其和希腊的军队与法国的军队不同。这些军队自发地采取行动。它们单独进行革命。“法国的军队只是各种社会力量冲突的工具。”连波拿巴手下的掷弹手也不会为了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去卖命。“六月事件”不是军队策划的，也不是为了谋取军队本身的利益。它是“自私的资产阶级一手炮制的”。教会对过分提高军队地位的做法满腹狐疑，生怕教会的“精神力量”变成多余的。“十二月政变”是“资产阶级保守的社会政变”。“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士兵和军官完全听任几个鲁莽的将军的摆布。”那位阴险的冒险家利用了这一点。公社惨剧也是同样情况。当时的军队“只是一个穷途潦倒的可怜虫”。军队自己的威信扫地。梯也尔当上了军队的总后台。加利费手下的一名将军大肆炫耀武力，犯下了种种暴行，而迪克罗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束手无策。反动派在穿着军装的士兵和杀人不眨眼的将军的血腥支持下，取得了胜利。这一情景将永远留在具有共和思想的无产阶级的心中。有人请求麦克马洪发动政变，但他不敢违抗人民强烈的合法要求。

饶勒斯精心挑选这些例子，无非想说明：资本主义大国的军队是根据国家和社会结构行事的。军队并不具有大罗马帝国那种御用军的性质。但是，它如同国家政权一样，受已经确立的制度和秩序的支配。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警惕地捍卫着资本主义所有制。

它被利用来进行殖民主义的冒险活动。饶勒斯的中心思想是要改组军队，改变其性质和职能。为人民谋利益的国家必然依靠一支由人民自己组织的，并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军队的阶级职能将被它的民族职能取代。饶勒斯想把军队从反动派的手里夺回来，使保卫国家的神圣事业摆脱无耻的阶级利己主义。一支与人民融为一体的军队定将在争取人民幸福和保卫自由、独立的斗争中，所向披靡，百战百胜。它决不会做出祸国殃民的事情来。不能设想，人民的武装会起来反对人民的自由，会拱手断送国家的独立。饶勒斯在恢复军队的捍卫自由这一真正职能的同时，要使军队在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因为军队将成为人民的力量，成为独立和自由的象征，而人民将在自己的军队中互相结识，互相了解，亲如手足。

饶勒斯想通过改革来恢复军队和国家的声誉。

但是，这可能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很多野心勃勃和不学无术的人往往急于求成，把理想中的国家和军队同现实生活中的国家和未经改革的军队混淆起来。他们利用理想的光轮把自己打扮成替已经确立的秩序和现状服务的侍从。这样，饶勒斯提出的这个理想主义的和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政策，就有可能成为供低级趣味的人享用的一盘机会主义菜肴。饶勒斯采用的方法决不是要人们只顾眼前的现实，而是要他们攀登理想的光辉顶峰。如果别人曲解这一方法，饶勒斯本人则是没有责任的。为了实现饶勒斯提出的纲领，必须要有象饶勒斯这样的人。

饶勒斯希望他的思想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于是，他开始寻找能够担当改造军队这一任务的社会力量。他在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那里找到了这种力量。为此，他要求工人阶级加入自己的军队。

在法国，军队是一支处于从属地位的力量。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领导力量，但是，由于它的活动很容易脱离人

民意志的监督，所以往往成为执政者手里的压迫工具，并且久而久之成为一个闭关自守的行政机构；此外，它的行会思想会发展成军国主义。

军事制度是可以民主化的。如果无产阶级在民主制中施加自己的影响，着手改革军事制度，如果他们在焕然一新的军事制度中发挥积极作用，那么，他们就决不会被一个在力量方面比他们强大并且肆意歪曲他们要求的机构捆住手脚。他们不用害怕起来铲除不完全属于人民的、半职业性、半民主和半寡头统治的军队，代之以一支真正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军队，一支不会转而反对工人阶级的权利及其和平志愿的军队。他们不用害怕，应该尽可能地争取和行使军队的指挥权，以便保证人民军队永远发扬创建时期的精神。他们决不要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要承担在社会冲突中血腥镇压工人阶级的责任。首先——如果这种意见成立的话——无产者、社会党人、民主党人不应该只是在作为军官或军士时，才拒绝执行命令，而应该在作为普通士兵时，就这么做，因为当无产者举行罢工或革命时，士兵也是资产阶级的镇压工具；或者说，无产阶级在作为士兵的时候是最消极被动的。普通军官，例如中尉或军士，能够不那么严格地或不那么粗暴地执行上面的命令，能够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采取温和的谨慎办法来代替挑衅性的轻举妄动。与此相反，当士兵根据具体的命令介入激烈的暴力冲突时，他们只有两种抉择：或者违抗命令，拒不执行任务；或者被迫奉命行事，使用武力和进行杀戮。因此，如果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害怕被资产阶级政治利用，而拒绝向新军队输送干部，那么，按照逻辑推理，他们就应该反对普遍兵役制，让雇佣军、非洲兵团或资产阶级民团完全垄断军队，以便由他们去承担社会冲突中进行镇压的责任。但是，在任何国

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能和他们的思想都反对这种做法。各国的工人和社会党人都要求建立普遍兵役制。他们既不允许资产阶级利用金钱方面的特权逃避兵役,也不愿看到无产阶级象斯巴达的奴隶和古罗马的奴隶一样,被摈弃于军队之外,而资产阶级则象一座枪炮林立的堡垒,牢牢地控制着人数众多、被免除兵役和受人任意宰割的无产阶级。

他们要参加军队,甚至不惜在今天的军队中承担接受可怕命令的风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参加到军队中去的;他们知道,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掌握巨大的军事机器。现在穿上军装就意味着要为一个屈从于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特权国家服务。但是,他们同样知道,即使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指挥下佩带武器,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也是一种力量。他们知道,由工农群众带到军队中去的无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到一定时候将会发生作用。他们知道,尽管国家规定了种种法律限制,但它也不得不考虑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的力量。他们知道,劳动人民决不会听任别人的摆布。即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人民只能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但是这种暗中的反抗也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既然无产阶级已经大批进入资产阶级堡垒的心脏,在悲剧性的大动荡中,他们岂不能够更有准备地利用各种机会吗?因此,假如无产阶级在按照我所说的人民计划进行改革的军队中,不去担任和争取一切可能获得的职位,那简直是发疯!即使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可怕的责任,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也应该向新军队输送尽可能多的新干部。

饶勒斯的思想十分敏锐,他不肯轻易放过任何反对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来自哪里。他很重视在某些工人中间,在工团主义者、自由派和反军国主义者中间流行的那些看法。这部分人由于只看到

军队的武力镇压的职能，所以就一味攻击和全盘否定军队，拒绝同它发生任何联系。饶勒斯毫不迟疑地对他们进行驳斥。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他们的意见；他先用推理和引伸的方法，使这些意见具有最合理的形式和最充分的论据，然后再给予有力的批驳，以便基本上消除正直人心目中的疑虑。他对民主党人、社会党人和无产阶级说：“你们不愿意在军队中担任军官的职务，生怕承担血腥镇压的责任。要是这样的话，你们也应该拒绝当一名普通士兵。假如说军官还可以不那么严格和不那么粗暴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士兵们则不得不消极地和盲目地奉命行事。”饶勒斯对顾虑重重的社会党人说，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参加到军队里去的，但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只有在军队的内部才能影响整个军事制度。佩带武器对于人民来说是一种力量。因为如果被摒弃于军队之外，这就意味着处于奴隶的地位，而奴隶主是不敢把武器交给奴隶的。人民一旦武装起来，他们就可以“更有准备地利用一切斗争机会和事业成功的机会”。

如同参加国家的领导一样，无产阶级通过参加军队的领导，“大批进入资产阶级堡垒的心脏”。假如不利用机会明正言顺地参加到军队中去，那简直是发疯！

同对待其它问题一样，饶勒斯在这里也不是仅仅停留在批驳上。应该深入生活，应该采取行动。应该象人民所说的那样“自己动手”，不要怕同敌对的势力混杂在一起，不要怕因此而受到连累。事物中孕育着许许多多未来的种子。善良正直的人们只要沿着这些种子发育成长所经过的道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和敌对因素，做出有益的贡献。饶勒斯的哲学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看来，这些敌对因素归根结底总是少数。因此，一切美好的东西必将在生活中扎根，并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这需要时间和人们的努力。

理想定能实现,虽然道路是曲折的,坎坷不平的。

饶勒斯在致力于军队民主化和民主武装化的同时,不但胸怀远大的理想,而且从未忘记短期目标和日常行动。他已估计到武装冲突可能会发生。他希望法国做好应付一切事变的准备。法国的人口增长相当缓慢。为了不被另一个人口比她多的国家吞并,只有一个办法:充分和有效地利用预备力量。

法国在这类斗争中,预先就已经被击败了。只有把预备役迅速派往前线,依靠他们的力量和热情,法国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取得胜利。只有把全民武装的思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法国才能得救,才能获胜。假如她仿效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制度及其精神,假如她把现役军队看成是唯一的希望和力量,假如她把预备役看成是可有可无的配角和附属品,假如她被结盟和表面上看来似乎对她有利的局势迷住了眼睛,忘乎所以,从而抛弃和平的政策,假如她变得富有进攻性和侵略性,驱使几乎成了孤家寡人的现役军队入侵德国,那么,情况就有可能完全颠倒过来:受到威胁的德国在这一动乱中将重新组织1813年那样的国民军,她将再次使我们尝到她的预备力量在防御和进攻方面的厉害。总而言之,即使对于德国来说,过分迷信现役军队和断然与1813年国民军的传统决裂,这也是军事力量削弱的标志。这很可能说明,她已经感到需要退缩,已经对全体人民失去在危机时刻所必需的信任。然而,德国人民无疑是十分驯服的和遵守纪律的,尽管他们已经受到新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把帝国的军队关在密封罐里,不让它接触外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这决不是最好的战争准备,或者起码不是夺取胜利的最好办法。

如果一个国家善于采取与本国军事制度(即确实实行全民武装)相适应的策略,那么它在遭到突然袭击时,首先就会

动员其全部预备力量；要是谁想用人数有限的现役军队来进攻这样的国家，那就是以卵击石，就是最大的失策。法国不应该象德国那样，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局限于驻在兵营的现役军队，轻视预备役或者只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力量。她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意愿，也就是说根据建立全面的和平和健全的民主制的理想原则，发展自己的军事组织；她应该把全部预备力量变成一支伟大的、名副其实的现役军队。消极地抄袭德国的那一套，这对法兰西的独立和她的精神都将是巨大的灾难。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复仇方法是把法国的思想从德国军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然后，再利用权利的力量，进行其它非暴力的复仇。建立强大的和民主的民兵，把兵营变成培养人材的学校，并且使全国人民成为一支捍卫国家独立与和平的百战百胜的伟大军队，这就是法国在军事方面的真正解放。法国的解放仅在此一举。

饶勒斯是当代法兰西智慧的最杰出代表。这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天才。他深刻了解德国文化、英国文化、欧洲文化。这些国家的文化虽然同法国的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它们毕竟是外来的。在饶勒斯的身上，它们同占主导地位的法国文化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饶勒斯的总政策，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的策略和他的口才——他身上的一切都说明，他是一个伟大的法国人，具有高尚的和慷慨的法兰西民族所固有的气质。因此，他在制定改组军队的计划时，拒绝生搬硬套德国的方法和策略。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自己的智慧！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否认别国的智慧，他尊重和热爱一切智慧。他希望这一切智慧能为全人类的智慧服务；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坚实和永恒的基石和结晶。强行改变民族特性，这是极其荒谬和恶劣的行径。一个国家的人民应该按照自己的特性和智慧自由地活动，他们也应该让其它国家的人民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饶勒斯要求法国军队的组织者不要因为暂时取得胜利的国家迅速发展其军事力量而吓得不知所措。他希望法国的思想能从德国参谋部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以雄辩的口才，精辟的论述和渊博的知识来说服人们接受这样一个思想：“建立强大的和民主的民兵，把兵营变成培养人材的学校，并且使全国人民成为一支捍卫国家独立与和平的百战百胜的军队，这就是法国在军事方面的真正解放。”

饶勒斯提出的改组军队的方法并没有什么原则的新东西。大革命时期，这一方法曾经极其成功地使用过。饶勒斯十分熟悉这一时期中发生的一切，他掌握了丰富的军事史料。现举例如下：

假如某些国家的人民听任一度到手的自由被重新夺走或窃取，那么他们得到的惩罚就是过去的传统在人们头脑中遭到歪曲。自以为忠于传统的人实际上在糟塌传统。他们不顾铁一般的事实，拼命追求富有浪漫色彩的莫名其妙的理想主义。他们把1792年的志愿兵想象成完美无缺的英雄。他们从未想到，被古代自由之神的翅膀扫过的士兵也会犯过失，也会胡乱猜疑，提出蛮横的要求，甚至惊慌失措。他们把思想捧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于是，他们便向反对革命的可怜的学者挑战，因为后者居然发现并且罗列了一大堆尚未定型的组织的缺陷和并非十全十美的人类的弱点。可怜的空想家自以为在赞扬法国的智慧，实际上他们却抽掉了智慧的精华！但是，这些人的力量和荣誉在于他们在清醒地看到并且坦率地指出玷污新制度的混乱和错误的同时，并没有感到沮丧。他们之所以最终能够建立真正的秩序和拯救祖国，这不是因为他们用可耻的妥协来贬低和削弱思想的作用，而是因为他们加强思想的威力，使之消除混乱的因素。如果根据卡诺在1793年4月间写的书信，人们很容易对北方军队的士兵提出强有

力的控诉。泰纳在这些信件中,可以随便举出许多大革命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和雅各宾的荒唐做法所造成的恶果:道德败坏,目无法纪和腐化堕落的例子不胜枚举。国民公会准许士兵未经上级的同意便可结婚;于是,士兵们以此为借口,把兵营变成妓院,或者索性在“纯洁的农村姑娘”家里过夜;部队行军时,辎重车上装满了乌七八糟的东西,致使行军速度大大放慢;士兵经常因为兑换钞票而同酒店老板发生争吵;狂妄和爱慕虚荣的志愿兵不愿编入现有的连队,却喜欢组织什么“官比兵多三倍”的“自由兵团”;新兵在市场上贩卖他们的军装、枪枝和弹药。这些都是卡诺揭露的丑事,是那些被“淫妇弄得神魂颠倒”的人干出来的丑事。多么可耻啊!这简直是思想的明显堕落和希望的破灭!我们的“现实主义”哲学家本来是能够克服这些弊端的。神经脆弱的人只知道哀叹过去或者完全悲观失望!要是革命一度对自己产生动摇和怀疑,革命就不能胜利。尽管有些人灰心丧气,但革命依然勇敢地前进。面对这些令人厌恶的丑事,卡诺的信念却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当他看到士兵们在英勇地攻克了弗内斯城之后,为了庆祝胜利,开怀畅饮,喝得酩酊大醉,并且在城内大肆抢劫财物的时候,他只是感到愤慨,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曾再次求助于国民公会,但是他很快就纠正了这一错误。他要求无情地镇压一切进行抢劫、滥用暴力和违法乱纪的人。与此同时,他更希望恢复革命的荣誉感。他的坚定信念从未动摇过。因为他知道,在这些胡作非为的人的身上蕴藏着一股力量。他的信心是有充分根据的。他的希望是有道理的。这些看起来似乎是腐败透顶、不堪一击的北方士兵在五个月以后,却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和大无畏的精神,一举攻占了莫伯日兵营,而他们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当时竟光着脚!遗憾的是这支军队缺少几千把长刺

刀，否则，他们可以发动地道的“法国式进攻”。

饶勒斯不是那种无聊的人，他决不会盲目地推崇革命。他了解革命的弱点，甚至污点。他看到了这一切。他触及到了这一切。他为此而痛心疾首。但是，他在熔炉中首先看到的是冲向理想上空的熊熊烈火，尽管矿石中含有种种杂质。革命的行动能够振奋人们的精神，荡涤一切污泥浊水。饶勒斯高度重视这种行动的巨大威力。可以说，他对法国大革命怀有火一般的热情。他的智慧就是革命的智慧。他渴望行动，追求正义和真理，崇拜进步和民主；他热情奔放，而个人的私生活却洁如白玉；他以超人的精力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和活动——这一切体现了纯洁的革命精神和法国大革命的灵魂。饶勒斯和大革命具有相同的本质，心息相通，或者用他本人爱用的泛神论的哲学词汇来说，他和大革命具有本质相同的“属性”。他力图使这个唯一适合于伟大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军事制度与“法国的现实生活”相适应。

世界上的一切军事制度中，瑞士的军事制度无疑是最接近于人民民主军队的理想：它尽可能地缩短驻在兵营的服役时间，不但实行分区征募制，而且实行就地征募制，把广大身体健壮的公民组成地方部队，使军事生活和平民生活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尽管如此，我并不要求法国照抄瑞士的制度。为了适应法国的现状，必须对它进行重大的修改。

首先在经常性的军事教育方面，尤其在青少年的军事预备教育方面，法国应该制定出强有力的法律，因为法国人对军事教育还没有养成习惯。当全体公民的思想发生一定的变化，开始认识到义务兵役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的时候，就会慢慢习惯于军事教育。这一制度将克服等级观念和阶级观念所造成的一切弊病，抛弃用武力征服别国的企图，重新回到这一崇高目的上来：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保障社会主义的自由发展。

主长期受到压制,军事体制被歪曲得不成样子,以致人们不能自觉地认识新制度的作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改革将会引起人们对义务兵役制的高度重视和极大的兴趣。但是,目前则需要运用法律的力量来进行教育。尽管瑞士人在军事教育方面已有悠久的传统,尽管他们对此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他们的军事教育也不仅仅依赖于这些有利的条件。瑞士的法律规定(从1874年起):“所有青少年从十岁起直至小学毕业,都必须在地方政府的安排下,参加预备性军事操练。”人们知道,在瑞士,对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实行义务教育。体操教师在师范学校或新兵学校(即在兵营服役几个星期)受过专门的训练。瑞士的法律原则上还规定,青少年在小学毕业后直至服兵役之前,均须继续参加预备性军事操练;十八岁至二十岁的青年还应参加射击训练。然而,正如勒芒在一份详尽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这一规定并没有很好地实施。对十岁至十四岁的少年来说,军事操练是必修课;但是对超过十四岁而又未到服役年龄的青少年的军事教育,则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上述条文只是一个原则,具体的训练则完全依靠个人的自觉性。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和一部分热心军事教育的公民仍积极鼓励孩子们参加操练。我们的法律草案指出,军事预备教育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若有违反,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放任自流的做法会产生两个弊病。首先,由于孩子们缺乏明确的和高度的自觉性,所以如果训练完全是自觉自愿的,那就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其次,他们的热情往往容易被成人的政治考虑引入邪路。一些党派企图通过军事操练来博取一部分青少年的欢心,以便在他们长大后,把他们争取过来。有人向孩子们灌输不健康的思想或反动的沙文主义。为了使军事教育不危害青少年的成长,为了使它不至于成为毒

害孩子心灵的手段和制造分裂的新工具，人民应该自己担负起这项工作，对孩子们进行关于民主、民族独立与和平方面的教育。决不允许那些党派象做广告似的把军事操练变成华而不实的虚架子；操练应该是严肃的、有效的和简洁的。

饶勒斯的哲学思想包括一切方面，或者用一句行话来说，它是“综合性”的。饶勒斯喜欢深入观察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事物。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统一性，即互相关联的有益形式吸引着他，对他产生巨大的魅力，使他感到神往。他所希望建立的统一不是表面的、空间的、几何的统一，不是容积或者纯形式的统一，而是本质的统一。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那样，饶勒斯不但寻求无限的、高超境界的理想统一，即所谓的上界统一(*unité par en haut*)，而且还寻求基础的根本统一，本质的统一，即所谓的下界统一(*unité par en bas*)。

饶勒斯的极其广泛的哲学思想并不妨碍他专心一致、深入细致地研究事物的具体细节。他收集了许许多多事实来为他的论点服务，他用心地研究并利用这些事实。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他是立法议会中最有才华的人。他的改组军队的计划是一部长达七百页的巨著。书后附有一项提交议会讨论，但遭到委员会否决的法律草案。这一计划涉及到有关军事组织的每个细节。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能向读者介绍其中最精彩的一些段落。

这样，学生从十岁起就能兼学军事，并同所在地区的地方部队发生一定的关系；待他们长大以后，便可正式编入这些部队。由于我们尽可能地实行就地征募制，由于军事组织应该动员当地人民的力量，所以人们从小就能意识到与担负军事教育和作战任务的军事单位保持联系的必要性。不管在公立学校还是在私立学校，学生在毕业前，都应参加操练。为此，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必须配备一定的师资力量。小学以上，

就不再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所有孩子从十三岁起，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不管他们来自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也不管他们是否继续上学，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按不同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分别参加操练、行军、射击等项训练。因为训练是在每月的某个星期天进行的，所以人人都必须参加。青少年们在体操教师以及与他们挂钩的地方部队的教官和各区推选的军事进修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训练。我在下面还将具体谈到军事进修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能。集训的地点就设在本区或离居民点不远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得无故缺席。不督促自己孩子参加训练的家长将受到经济制裁。犯有严重错误，对训练漫不经心或者动机明显不良的青少年将受到加倍的处罚，因为他们不但影响自己参加训练，而且妨碍整个国家进行这类保卫国防和维护和平所必需的教育。他们在兵营受训的时间将因此而延长，以弥补过去的损失；而且还将正式宣布他们不能在国家机关中担任公职。

除了采取上述严厉措施之外，国家应该善于安排有趣味的、丰富多采的训练，组织各项比赛，奖励行军、赛跑和射击的优胜者，以便激发青少年的好胜心，提高他们的兴趣和推动各类活动的开展。国家还应该教育青年必须具有勇敢精神和强壮的体魄，不断告诉他们，进行体力和灵巧方面的训练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和完成全人类的正义和自由的崇高事业。这样，我国的青少年就能把军事训练看成是盛大的节日和最有趣味的活动。

瑞士人对这类预备教育早已养成习惯，而我们这里的情况则不同。在瑞士，军事组织的民主性和人民性具有悠久的传统。人们在新近由许盖出版的德塞的游记中可以看到，甚至在瑞士的偏僻的小山村里，居民也经常练习射击，并且举行

激烈的比赛。早在革命以前，早在民主制度建立前，以瑞士人就在全各地举行射击比赛。可以这么说，新的民主制度只是把民主精神带到了这些古老的风俗习惯中去。历史上，瑞士各邦或各城市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为了有效地维护本地区的独立，瑞士人逐步建立了一套训练制度；此外，他们常把本国的军队以高价“出租”给其它军事强国，为了保持军队的“商品价格”，他们十分重视军队的素质。现在，瑞士建立了民主制，从此变得更加集中，更加自由，但她仍继续沿用过去的那些军事制度。世世代代以来，瑞士的儿童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与此相反，法国由原来的封建割据变成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民兵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奴役性，是一种宫廷徭役。

在乡村广场的榆树荫底下进行操练的人都是强迫来的，他们将被迫参加远征。大革命只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起义；帝国时代发生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件在国家和军队之间造成了很深的裂缝；征募制和兵营制使军队同外界生活完全隔绝。在这种情况下，军事生活的习惯怎么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牢牢地扎下根呢？因此，国家必须用法律形式规定一个制度，使人们养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习惯。在这方面，法国的思想条件要比瑞士好，因为法国可以用瑞士人不太了解的革命理想主义来推动公民的军事教育。

即使不对青少年进行军事预备教育，在兵营的服役时间——我已指出过这一点——也没有必要规定为两年。无论在法国还是在瑞士，兵营只能是训练新兵的学校。但是，我们要求年满二十岁的法国公民作出比瑞士人更大的努力。我们要求他们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六个月，而不是三个月或两个月。由于法国人不象瑞士人那样已经习惯于军事活动，所以我们需要制定法律，迫使人们作出更大的努力，起码一直到军

事预备教育在法国成为新风尚为止。这类新兵学校可根据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气候条件，挑选一年中最适宜于进行训练和学习军事的季节开学。它可设在兵营里，也可设在野外训练营或活动营房里。它们的宗旨是传授实际作战知识，进行对作战真正有用的个人或集体训练。但是，这类新兵学校仅仅是一所学校而已。它们不是军事组织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想说，它只负责进行初步的短期训练。圣西尔军校和军事技术学校的士官生不单独编成一个营，他们在毕业后将分配到军队的各个团中去。同样，新兵学校的士兵也不是一支常备部队，他们将编入他们所在地区的地方部队，即他们从小接受军训时就已报名登记过的地方部队。

用这样的方法训练出来的士兵组成的地方部队是真正的现役军队，他们的年龄均在 21 岁至 34 岁之间。这是一支整齐划一的军队。在十三年现役期内，他们将参加八次训练和演习。小股部队的演习就地或在较小的区域内举行；大部分的演习在野外训练营或荒山野地里举行。两种演习交替进行。大规模演习的时间为 21 天，而小规模演习的时间为 11 天。

饶勒斯对兵营制并没有恶感。他只是认为，这一制度毫无用处，而任何无效劳动都是一种浪费。不过，在国防方面的浪费就是对国家的犯罪。因为浪费防御力量，就是削弱整个国防。饶勒斯要求兵营只是一所“新兵学校”。同时，他要求年满 20 岁的法国公民作出比瑞士人更大的努力。他觉得，如果象瑞士那样，士兵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只有二、三个月，那是不够的，应该延长为“六个月”。鉴于这样一个事实：法国人不象瑞士人那样已经习惯于军事活动，因此需要制定法律，迫使人们作出更大的努力。毕业后，他们同圣西尔军校和军事技术学校的士官生一样，将被分配到各个团里去。他们的年龄均在 21 岁至 34 岁之间，由他们组成的地方部

队是真正的现役军队。

饶勒斯决不允许国家的资源有半点浪费。他要把全国的力量组成一个无坚不摧、战无不克的巨大整体，一支为永世不衰的民族、永恒的权利和不可消灭的正义服务的铁军。用最小的代价组织最强大的国防力量，这就是饶勒斯在军事方面的目标。作为民主主义者，作为和平的捍卫者，作为社会党人，作为热爱自己祖国的卓有见识的法国人，饶勒斯知道，一个国家的防御力量不仅在于它的武器装备，而主要在于它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因此，无谓地削减生产力，哪怕只削减一点，都将危害国家的军事力量。饶勒斯之所以反对三年兵役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制度浪费国家的力量。

但是，不但需要受过良好训练的士兵，而且还需要干部。饶勒斯着重研究了这个问题与军事组织密切相关的问题。

如何给这支庞大的部队配备干部呢？如何给这支由各阶级中 20 岁至 35 岁的青年组成的、庞大的和“精锐的”现役部队配备经验丰富的军士以及出类拔萃的军官呢？这支军队的干部显然不可能全都是“专业人员”。在今天的军事组织中，退伍的军士和预备役军官被要求担任前线部队的指挥。如果常年保持一大批负责军事教育和军队指挥的专职干部，这将过多地消耗国家的财力和人力——我指的是消耗有技术能力的和具备担任领导职务条件的优秀人材。这非但不能增加下级职业军官的人数，而且随着在兵营服役时间的缩短，驻在兵营的军官和驻防部队的军官在军事组织中的作用将逐步缩小。接受军事教育的青少年不应脱离他们的平民生活，故负责这类教育的大部分教官也不应脱离平民生活。常备军官和军士应是一批造诣很深的专家，专门负责新兵的训练，干部的进修以及军事科学的经常性研究和宣传。

他们是军队中的教练，负责示范和推广不断更新的作战方法。但是，我认为，至少在目前还不能把我国的常备军官的人数削减到象瑞士那么少。因为法国需要发动广大的群众，而若要把这么多的群众科学地组织起来，这就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管理问题和技术问题，因此必须拥有数量较多的专业人员，专心研究和操纵这架巨大的“机器”。何况法国人在历史上一贯不太熟悉军事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它方面一样，往往采取消极态度。他们把军事问题完全交给职业军官负责，就象他们把宗教问题完全交给神父负责，把法律的制定及其监督完全交给政府和议会负责，把公共事业完全交给官员们负责一样。现在只能逐步地激发他们内心深处蕴藏着的热情。这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在我国目前的军事制度下，军队的指挥权几乎全部集中在职业军官手中；而在瑞士，常备军官的职能仅仅限于训练新兵，因此他们的人数很少。为了更好地培养军队干部，我提出一个把这两种制度结合起来的折衷办法。在瑞士，教官是一支专门的队伍，他们有自己的的一套等级制度。这一制度是根据法律第 105 条和 1907 年 11 月 3 日公民投票通过的联邦法律确立的。新法律中的有关条款保留了原来的内容。“教官团的任务是指导新兵的训练和在专门学校里培训干部。”

饶勒斯认为，任何一个问题，只要与其它一系列有关的或相近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就立刻具有普遍的和广泛的意义。因此，军事组织与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新军队》只是整个社会改革计划或者社会主义改革计划的第一个章节。但是，这一早已向公众答应过的计划竟然遭到敌人的肆无忌惮的嘲讽！反动派的罪恶行径阻挠了这个宏伟计划的实现。当我们仔细研究饶勒斯的著作时，我们便不难发现，他的《新军队》以及他在积极从事活动的光荣

的三十年中所说的一切、所写的一切和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同一个思想为指导的。这就是：为了实现自由和社会主义，建立民主制和进行民主制的教育。饶勒斯希望法国人民克服“消极情绪”。他不希望他们把有关军事组织的问题完全交给职业军官负责。他要把军队的组织变成人民自己的事情。在政治和立法方面，他追求同一目标：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是如此：生产应由生产者自己领导和监督，并为生产者自己造福。

饶勒斯的军事改革法案以及他在立法和社会方面的其它著作都向我们表明，他是一个十分稳健的人，善于采用过渡的办法。如同自然界一样，人类历史上决不会产生与整个历史现象毫无联系的“飞跃”。即使象火山爆发和地壳剧烈变动那样的革命也是同必然导致它们发生的全部条件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想象，要是饶勒斯在政治、社会和道德改革方面也采用他在军事改革中所采用的方法，那么他一定会提出极其绚丽多彩的思想和建议。

饶勒斯比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更加致力于国家的真正复兴。他希望建立一个昌盛、美好、伟大、正义、繁荣、人道和强大的法兰西：第一流的精神强国和物质强国。饶勒斯是一位伟大的法国人，他有能力建立一个伟大的新法兰西。

饶勒斯——一个除了仁爱不知有其它的人——之所以对反动派怀有刻骨的仇恨，这是因为他看到反动派正在疯狂地阻挠事物的发展，阻挠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

本书已经接近结尾，我现在再重复一遍我在开始时说过的话：法国民主制度的巨大不幸在于它的优柔寡断，在于它不能根据原则逻辑，大胆地改革军事制度。现在，军队的情绪波动，军官们感到现有的军事制度弊病百出，他们正在进行探索。只要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加以引导，这些倾向便能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学说。我在这里所指的决不是博纳尔将军。他那

酸溜溜的、极其反动的悲观论调足以使军队的心完全变凉，起到瓦解国防的作用。他反对两年兵役制，不相信人数众多的军队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他似乎正在等待灾难的来临，以便证明这样的军队是毫无用处的。他蔑视预备役。他认为，我们的现役军队，按其现有的形式，是无法抵御德国军队的进攻的。他从死板的教条出发，断言战争的第一仗是决定一切的，仿佛他事先已经掌握了今后在现代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的全部奥秘。他向为了捍卫自由和生活继续英勇抵抗的人民宣布，他们的抵抗注定遭到无法挽回的失败；他的话好比一块又硬又重的墓石，压在他们的心上。他说：“一支强大的军队，只要旗开得胜，便可大胆放手地采取一切行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事情对它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首战败北的军队则相反，它必定士气低落，不可能再采取任何有力的行动，即使人数很多，也无济于事，而且反倒成了累赘，终将导致全军覆灭。如果一个国家初战失利，那么，不管继续打下去还是求和，其结果都将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战争拖延得愈久，胜利者提出的条件就愈苛刻。这里，我并不想抹杀法国军队在1870年—1871年战争的第二阶段中的英勇业绩。只要能保持荣誉，这就保住了一切。战败者的作战热情‘毕竟’能使战胜者肃然起敬，从而有利于维护今后的和平。但是，我们应该从现实出发，承认第一战役的决定性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转败为胜的希望几乎等于零。”博纳尔将军有什么权利说这种话呢？他有什么权利对拥有三百万大军的人民说，意志的力量无法挽回在头一仗中遭到的重大挫折？这一宿命论的战略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战争中，怎么可以说，人们一开始就能预卜将来的结局，人们的抵抗力在一瞬间就会化为乌有？

我清楚地知道，这种令人沮丧的预言不但是针对我们讲的，而且也是针对我们的敌人讲的。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主要是针对我国人民讲的，因为我们军队的将领不了解人民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而这一力量恰恰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年轻军官应该具有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然而我们却对他们进行如此莫名其妙的教育！更有甚者，博纳尔在指出第一战役的决定性作用之后，竟然认为我们的军队在最初的战斗中肯定会被打败。他只想依靠非洲军团，似乎没有这些黑人军团，我们的现役军队，也就是说我们的全部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这就是那位著名理论家的观点。这就是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军事思想同共和思想以及社会思想相脱离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是一种悲观、颓废的反应。

《新军队》包含了一系列哲学、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观点，这些观点使饶勒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完整和明确。我们将根据叙述时的需要，在有关的章节中向读者一一加以介绍，而这一章则专门谈他的军事思想。

饶勒斯在《新军队》的结束语里归纳了该书的主要思想。我们把这一节中精彩的段落几乎原封不动地抄录在下面，以飨读者。我们还是用饶勒斯自己的话来使大家了解和喜爱饶勒斯吧！

我希望我的建议将有助于推动思想的发展。这个系统的改革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与现代精神和当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军事制度；我希望这一计划将有助于军队里的人彻底摆脱陈规旧习的桎梏，使他们片面的和零乱的思想系统化。为了使改革能够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为了使它能够在人们的思想中引起有益的和必要的震动，我希望完整地实现这一计划。当然，我并不是说不需要任何准备。我将尽力协助完成那些过渡性的改革。分区征募制应该恢复，甚至可以更具体地细分

区域，以便尽可能地把组织军队同组织一般的公民生活结合起来。驻在兵营的军事教育应该更加生动活泼，不受任何拘束。各兵种应该利用各种地形举行联合训练。野外训练营的数目应该增加二倍或三倍。十四级现役和预备役应该通过演习尽可能地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应该抛弃一切因循守旧的思想，不抱成见地和实事求是地确定每个作战单位的人数，使之与指挥官的实际指挥能力相适应。例如，现在各连的人数过多，作战时，队形散开后，占地面积过大，因此每个连队应缩减为 150 人。这样，指挥官可以随时掌握本连队的动向。应该考虑现代战争的具体需要，而不要拘泥于过时的传统；据我所知，这正是许多军官所要求的。应该使连队指挥官的指挥意图更容易被士兵理解和接受。在各类演习中，指挥官必须有明确的计划；就象苏沃洛夫所说的那样，部队的一切行动都应向士兵解释清楚，并为他们所理解。军官学校应该尽可能地了解现代文化知识的动向。应该把参谋部的军官从繁重的、常常是毫无用处的行政事务堆中解放出来，使他们确实能够从事军事科学，军事艺术的研究，成为全军的思想中枢，成为推动军队发展的中坚力量。高级军官的挂名闲职应该取消，人人必须努力工作，并切实担负起责任。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预备役军官的地位；担任公职或其它领导职务的公民必须具备军事学业的文凭。应该大力发展青年的体育教育，但不要让他们机械地和过早地学习某些军事动作，应该搞一些适合于他们体力、人人都能参加的操练，以提高整个民族的健康水平。是的，我们应该努力实现上述各项措施。我并不轻视人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尝试。但是，如果能够完整地实现全部改革，那就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首先，从财政预算来看，要想真正深入地发展国防教育，只有精减军事机构。

瑞士全国的人口约为三百四十万，她的军事预算为四千一百万法郎。若按这个比例计算，我国的军事预算应低于五亿法郎。然而，目前军费开支竟高达八亿七千二百万。我知道，在我们的改革计划中，新兵学校的学制比较长，而且我们将保持相当数量的职业军官。即使如此，我们在五亿法郎的基础上再增加二亿，即提高到七亿法郎，那也比现在的八亿七千二百万节约将近二亿法郎。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目。再重复一遍，只要继续实行寄生虫式的驻在兵营的服役制，只要军队的军官全部都是职业军官，这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经费来对青少年进行体育教育以及对从新兵学校出来的成年人进行军事教育。我们将保留一小部分优秀的军官，作为军事训练的骨干力量，他们将按月领取薪饷。我们在提高预备役军官的待遇的同时，将把目前花在干部身上的一部分钱用于生动活泼的公民军事教育。当然，现有的军官将被派往新的单位，但他们仍可保持其原来的军阶。必须大刀阔斧地削减专职干部的人数。

实行全面改革不仅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而且还出于思想方面的原因。只要驻在兵营的服役制依旧保持其现有的形式和特殊显眼的地位，法国人就不会重视兵营以外的训练，军事首脑们也不会把这类训练放在眼里。除此之外，驻在兵营的服役制把军事教育搞得面目全非。例如，它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强迫青少年过早地参加真正的军队生活和军事操练，从而把青少年的军事教育引入歧途。我不想在这场关于操练方法的辩论中表态。皮迪埃医生的观点可能过于偏激。他似乎不应该摒弃一切杂技式的训练，尽管这些训练往往超过一般人的体力，使人体的肌肉在某一时刻过分紧张。不过，体育训练确实应该全面兼顾，循序渐进，根据各人的身体素质，区别

对待。

毋庸置疑，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和科学的方法来增强体质，切忌疲劳过度或不顾生理条件的做法。有一种训练旨在培养人的力量和灵巧，我们称之为基础训练；另有一种训练专门培养人的冲劲和勇猛，即爆发力。应该由亲身参加训练的教师和医生来确定这两种训练的比例关系。

不管这场关于训练方法的激烈争论最终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训练都象初临考场一样紧张，那就不对了。训练的目的应该是让每个人的身体都能够均匀和健康地发育，从而既能适应平民生活又能适应士兵生活，千万不可一下子就与专门的军事项目不切实际地和过分紧密地结合起来。射击和识别地形的远足固然可以使年青人学会行军、辨认方向和确定方位的本领，掌握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但是，体育训练的范围应更加广泛，上述训练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负责指挥由全国各省市青年组成的地方部队的军官，应该尽早关心青年的军事教育，同学校的教师、医生以及受过良好训练的教练一起制定学生的训练计划，并且监督这一计划的实施。不过，他们必须摆脱兵营制的精神枷锁，不再用机械的、迂腐的和片面的军国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和国防；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最后，我认为，促使我们采取全面行动，迅速和系统地实行改革的根本原因是：只有当灵活、自由和生动的新制度确实保障人人都能在体育和德育方面健康地成长，从而更有力、更充分地保卫国家独立的时候，只有当这一制度使人民对他们所向往的和平树立起坚定信念和得到新的保证的时候，人民才会对军事改革发生兴趣。如果把动员军队变成动员全国人民，当政者就不敢轻易地进行冒险。一旦法国这样

做了，一旦她比其它国家先走了一步——法国完全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地带这个头，因为这样做决不会削弱其力量，相反只会使她变得更加强大——其它国家，特别是德国，就一定会开始注意组织和动员与民主共和法国的人民相同的本国群众，而不管这些国家现在出于什么样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把现役军队看成是最基本的形式和最主要的希望。我暂且不知道，德国在开始时是否会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但是她最终必将会感到严重不安，被迫——用法尔肯豪斯的话来说——深入挖掘其军队来源，也就是说，深入动员各阶层人民。壮大保卫国家安全的力量，这就能阻止好战的军国主义的发展，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德国。欧洲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正义与和平的崇高愿望将帮助法国工人阶级认识我们提出的这一制度的意义、好处和必要性。建立这样的制度是一切善良正直的公民，一切善良正直的法国人迫切希望实现的极其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将以满腔的热忱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此而奋斗。

如同我在本章的开头指出过的那样，饶勒斯希望把人民同军队结合起来，把人民变成武装的人民，也就是说，变成以捍卫和平与自由为唯一宗旨的武装的人民。他建议其它国家也采取类似的军事组织形式。因为他正确地认为，用民主方法组织军队，这是和平的保障。随着饶勒斯的这一制度的建立，“欧洲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正义与和平的崇高愿望将帮助法国工人阶级认识我们提出的这一制度的意义、好处和必要性。建立这样的制度是一切善良正直的公民、一切善良正直的法国人迫切希望实现的极其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将以满腔的热忱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此而奋斗。”

加上着重号的这最后一句话清楚地表明，对于饶勒斯来说，

《新军队》只是极其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中的一部分。

人们已经知道议会对《新军队》采取了什么态度。饶勒斯的认识高于统治阶级的认识。同一切伟大的先驱者，一切揭示未来世界的真理的人一样，饶勒斯被认为是一个空想主义者。要是他认为，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会立即实现或者考虑他的想法，那他倒确实是一个空想主义者。饶勒斯希望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而 *Les beati possidentes*，幸运的有产者则需要一支阶级的军队，一个统治的工具。军队是当前社会的一个“器官”，每个器官在其发育过程中，都必须服从对称的法则，与整个机体的结构和生命活动相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只允许按其面貌建立起来的军队存在。

饶勒斯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一贯忠实于革命发展的方法，始终接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努力宣传他的新思想。只有当条件成熟时，只有当这些新思想进入新的社会结构中去的时候，它们才能变成现实：新的社会必将有一支新型的军队。

饶勒斯必须克服一个危险。他在致力于改组军队的时候，弄不好就有可能陷入战争理想主义 (*idéalisme guerrier*)。《战争与和平》的作者蒲鲁东就是一个例子。他最后同反动的军国主义的精神领袖约瑟夫·德梅斯特尔一样，极力鼓吹战争。他居然在人类的互相残杀中，或者说在惨无人道的残杀中，发现了一种“天性”。

饶勒斯为人热情奔放，但他一向十分警惕反动和野蛮的理想主义，因为这种理想主义把被迫拿起武器和采用破坏手段进行正当自卫说成是一种美德，一个令人神往和值得赞颂的目标。社会主义就是 *l' homo homini deus*——人与人之间象神一样。战争就是 *l' homo homini lupus*——人与人之间象狼一样——把人变成了嗜血成性的野兽。因此，战争和社会主义是势不两立的仇敌。前者将扼杀后者。在残酷和恐怖战争中，社会主义必将

夭折。无产阶级非但不能联合起来，反而不同程度地互相残杀。世界和各国的生命活动将猝然中止。到处都是兽性般的暴行，到处都充满了仇恨和疯狂。再也听不到理智和正义的声音。

饶勒斯知道这一点。他认为，任何一场战争，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除非是为了进行正当的自卫——都将是一种犯罪行为。人们有权利和有义务保卫自己，免受一切攻击。但是，人们并不寻求冲突。人民的鲜血太宝贵了，决不能轻易地抛洒。在一个内心充满仁爱的社会主义者看来，人民好比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不愿看到一部分人遭到另一部分人的屠杀，他甚至不愿看到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统治。社会主义者不要战争；他的敌人硬把他拖入战争。

不幸，赞美为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而采取的一切必要手段，这竟是人的本性。军队是一种防御手段。在饶勒斯的思想里，战争也不是其它别的东西。一个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和平的政府是“一个罪恶的政府，应属于打倒之列”。饶勒斯是法兰西最高尚、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这些寓意深刻的话成了敌人攻击的目标，但是敌人的谩骂反倒使这些话对于评价他的一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战争一旦爆发，军队就成了拯救国家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去讨论军队是否有必要存在，而是极力维护它。不过，人们往往把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很容易屈服于既成事实，片面地颂扬军队和战争，并全盘接受由此而产生的一整套思想。

饶勒斯决不是这样的人。尽管他生前的某些讲话引起了不少争议和批评，但是他那和平战士的一生，他为了使世界免遭浩劫和耻辱——人类文明目前正在经受这样的灾难——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他为此而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不朽业绩——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不，饶勒斯决不是军国主义者。饶勒斯所追求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和平与世界大同，人类和各国人民的进步与幸福。

饶勒斯力求了解一切，力求对人和事物采取公正的态度。阿尔芒·卡雷尔这位伟大但又十分不幸的民主主义者在其著作中曾引用过饶勒斯的一些军事思想。他写道：“很难使人们信服，特别是很难使经历过多次战争的我们这一代人信服，战争艺术是最能磨练思想的艺术。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它之所以是一门极其了不起的艺术，这是因为它要求人们既具有一定的品格又具有一定的精神，它把人身上的一切都调动起来，都揭示出来。”

社会主义者情愿要和平的艺术，因为它也要求“人身上的一切”，但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毁灭人类的一切。

饶勒斯和茹尔·盖得或改良的社会主义价值

人们常常把饶勒斯看成是改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领袖。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确切。他厌恶一切毫无积极成果的行动。人们把“对一切事物持否定态度的人”称作怪物，而饶勒斯就最怕这类怪物。饶勒斯秉性温和，富有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十分讨厌敌视的态度和因敌视而采取的否定态度。虽然他有时在辩论中也讲过“憎恨的创造力”这一类话，但他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憎恨，即憎恨那些阻碍积极的创造性活动的绊脚石。他是个精力充沛的创造者，他愉快而热情地工作着，永远不抱怨什么，他是个严肃的工作者，他将他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了他的永无止境的工作中，他有真正的工作和创业的欲望，他热爱生活，他总是力求使自己充满朝气。可是日理万机的劳动是在怎样地消耗着他的生命啊。

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饶勒斯不满足于抨击旧制度的残余和现实生活中的贫困。他要一个生气勃勃的共和国和改良的社会主义，他不断地创新。

但是，各项改革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彻底改造社会的几个阶段，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他之所以热衷于改革，这不仅因为改革能减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病痛，更主要的是

因为改革是美好未来的萌芽。他认为，改革不仅是“止痛剂”，而且是在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做组织准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他的一切社会主义活动都贯穿着这个主张改革的、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思想。在社会党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或影响下，改革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如果我们倒背双手，消极地等待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或者只用反复的宣传来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我们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所有制的社会化和建立全人类的福利。只有不断地创建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建造未来社会的大厦，需要靠日常的努力，靠一砖一瓦的砌造。社会革命每时每刻都在进行。

饶勒斯的关于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必然遭到茹尔·盖得的反对。因为盖得把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党人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看成是社会主义活动的基本内容。

1904年，饶勒斯对他同盖得之间的争论作了一个粗略的介绍。从1898年起一直到饶勒斯去世，这场争论始终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舆论界起相当大的影响。

饶勒斯在谈到法国各政党开始主张社会改革的新动向时，他特别注意法国工人党和该党领导人的态度。他说：

茹尔·盖得和他的工人党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一点，但他羞羞答答地不敢全部予以承认。他的思想混乱不清，矛盾百出。他知道，光靠武力和起义来争取社会解放是不够的。民主和普选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工人阶级必须把现有的权力机构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必须进入议会和各级政府中去。一旦发动总攻击时，他们就可在内部把这些机构妥善地移交给革命。起初，盖得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反对一

切议会活动和竞选活动,反对无产阶级同政府发生任何联系。现在,他转为反对无政府主义。他强烈谴责那些拒绝向政府转达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的人,把他们说成是“爱耍花枪的小丑”。他责问道:身受企业主剥削的工人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美德,难道就不应该向企业主提出自己的要求吗?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因此必须对国家实行政治上的包围,如同组织起来的工人通过组织工会、举行罢工和集体提出要求等途径在经济方面对资产阶级实行包围一样。

但是,在这段时期里,盖得从未放弃在将来使用革命力量的想法。从他在1885年11月17日的《人民呼声报》上发表文章起,他的这种思想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他从来不指望通过有组织的和有思想准备的普选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虽然他不再象原先那样把使用武力看成是唯一的途径,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即使在激烈的竞选中,他仍用一些令人费解的华丽词藻把合法活动和暴力行动混为一谈。例如,他在选举中要求分裂的革命者重新团结起来,以使用“共同的候选人和共同的武器”对付阶级敌人。但是,进行竞选宣传和争取议会中的席位,这些都是次要的和暂时的措施,为的是确保革命的胜利,为的是在资本主义营垒内部保存我们的人材和立脚点。

饶勒斯措词婉转地,但毫不妥协地指出,盖得的各个不同时期的思想是互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是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之一。针对克列孟梭的激进政策,饶勒斯着重说明了“盖得主义”的主要特征。

克列孟梭之所以还有一定的影响,那是因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对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还没有足够的和统一的认识。

一方面他们提出改革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虽然没有把改革

完全看成是一个“陷阱”，但至少认为改革只是一付“止痛剂”。无容置疑，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可能派比盖得的伙伴们更加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保尔·布鲁斯要求把最大的资本主义垄断企业改变为公用事业，这将为无产阶级稳妥地从事合法活动开辟道路。布鲁斯认为，无产阶级从现在起就可以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生产进度以及劳动和交换的组织施加自己的影响，因此，他承认，无产阶级思想不是绝对不可能渗透到具有阶级性的国家和地方政府中去的。不管社会主义各派之间如何对立，就整体而言，如果社会党人只想依靠暴力来赢得无产阶级的突然的和彻底的解放，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深刻地理解改良政策呢？

盖得的思想尤其令人困惑。他一面在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宣布改革纲领，一面又竭力贬低每一项改革的意义。

盖得在1886年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就是说，只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少数人占有——这些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宪法或者法律赋予那些从事日益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的一切权利只可能是一纸空文。多搞几项改革只不过是多增加一些骗人的点缀而已。”

“这是指各省的免费医疗吗？有病的先生们，你们高高兴兴地去看病吧！多亏里昂的那些‘进步人士’，你们的医疗费将由纳税人支付。纳税人将向男女病人提供一切，……谁知道提供什么？恐怕是在需要时，提供一口棺材吧！里昂的工人党议员真会恶作剧。”

这篇文章刊登在1885年11月12日的《人民呼声报》上。十年之后，身为议员的盖得要求设立鲁贝市一级的药房。不知他是否还记得上面那段尖刻的话？他恰恰也想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工人们的“药费”。老板先生们，你们高高兴兴地接受

这个要求吧！

这是指关于工伤抚恤金和义务保险的法律吗？盖得曾说过，企业家们在保险公司保险之后，根本无视工厂的安全。事实并非如此。保险公司要根据车间生产组织的好坏，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的的大小，来规定保险金额，所以企业主一向很重视如何减少事故的发生。

这是指工人的养老金吗？盖得不仅反对养老金从工人平时的工资中扣除，而且反对由企业主捐助，其理由是，企业主捐献的钱最终还将从工人那里扣除。盖得在1886年写道：“众所周知，雇主的救济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如果由工厂主捐献，实际上就是让工厂的工人来支付，因为扣除工人工资的办法不是为傻瓜发明的。”盖得的话并没有使瓦扬就此罢休。瓦扬在一份关于社会保险的提案中规定，企业主必须交纳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如果盖得的话是对的，那么这些话也同样适用于税收。要么向工人征税，但这将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要么向企业主征税，这就象企业主直接捐款一样，到头来还是在工人头上分摊。照这么看来，工人养老金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由工人、企业主或国家出钱全都行不通。由于同样的原因，任何同失业作斗争的社会组织更是难以建立。即便能够建立这样的组织，它们的作用也将是微乎其微的。盖得接着说：“巴黎劳动人民在1848年7月赢得的工作权利早已不再是两个世界中的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了。今天，由于国际这个大学校的教育和培养，由于各国成立了以集体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政党，劳动人民所要求的，他们期望从一个与其它政治组织明显不同的政党那里所能得到的，不仅仅是希望他们的劳动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好处，而是希望获得全部劳动果实和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

“这就是说，他们不愿再充当为别人采蜜的蜜蜂，替主人拉犁的牛马和提供羊毛的绵羊。羊毛、花蜜和农作物收成应统统由他们自己享受。”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被当作会活动的工具——这并非是童话故事——他们流血流汗，受尽苦难，为的是填满别人的肚子。如今他们要求用他们生产的产品来填满自己的肚子。”

“不论是帝制还是共和制，如果不能保证劳动人民在目前的条件下从事生产，也就是说，如果劳动人民在养肥不劳动的人的同时，自己只能得到为维持生存和繁殖所必需的一点东西，那么，这样的制度不可能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制度。”

“即使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即使劳动阶级仅仅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当牛做马，以便养家活口，俾斯麦主义和目前经济制度中的其它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保证人人有工作可做。”

“今天，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大部分人只能出卖自己的体力，故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之下，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使劳动力的数量不超过对劳动力的需要，能使剩余的劳动力也有事可做。”

“只要生产取决于少数人的利益，只要生产工具和原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任何人都无法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由于生产过剩，产品式样过时，设备更新或某一工业部门的搬迁，失业现象就会加剧。”

“除非把现有的资本、生产工具和原料归还集体所有，除非用社会所有制和社会生产取代私人所有制和私人生产，否则，无论失业问题还是贫困问题，都无法解决。”

我不想在这里挑起争论。一切社会党人都认为有必要建立集体所有制和组织集体生产。但是，社会的失业救济难道

因此就是不可能的和徒劳的吗？减轻失业的后果难道也是不可能的吗？难道现在不能号召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对生产进行某种程度的调节，就象卡特尔和托拉斯从企业主和资本家的角度调节生产那样？瓦扬在社会保险和救济委员会上曾经指出，社会失业救济是最紧迫和最重要的事情。德国社会党人还要求增加工伤事故抚恤金、养老金和残废补助金。他们都没有受盖得的极度悲观的情绪的影响。他们不认为，在组织方面、理论方面、工人互相声援方面以至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盖得对公用事业也持同样的看法：

“有个名叫路易·勃朗的人曾建议现代国家在组织劳动时应该拥有类似的经济权力。对此我们并不表示异议。但是路易·勃朗主义——就算有过这么一个主义——很快就破产了，尽管当时该主义的发明者还活在人间，而且他从凡尔赛政府那里已经获得了‘专利权’。如果说一年来几个小丑（这是盖得给布鲁斯及其同伙们起的‘雅号’）在公用事业的名义下，重新捡起了主张把私人工业改变为国家工业的倒霉观点，他们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甚至在那些从未读过他们的文章的盲目追随者中间也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指导当代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巴拉圭的这些高明的耶稣会教士搞的新制度也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若想把矿山、铁路、炼铁厂、纱厂、织布厂、炼油厂和其它生产资料统统收归国有，就应该不局限于邮电、烟草和其它已经由政府经营的部门的经验，否则，只会使工业生产部门退居第二位。”

“如同希洛人醉得人事不知的样子足以使拉齐尼亚青年讨厌酗酒一样，国家雇员的那付卑躬屈膝、贫穷寒酸的样子也

足以使头脑最迟钝的人摒弃所谓靠比比皆是的官僚机构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

“由国家掌握生产和由国家雇佣工人，这并不意味砸碎资本主义秩序——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相反，这意味赞美和强化资本主义。这是把原来个体的、无政府状态的和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由此产生的混乱正使它逐步走向灭亡——改变为集体的、统一的和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它将变得更加厉害，更加难以被摧毁。”

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多说什么，否则会引起一场无休止的争论。盖得忘记了，如果掌握生产的国家处于民主制度的监督之下，那么，不管资本家对国家施加什么影响，国家并不象资本家本身那样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其它影响也会渗透到国家中去。如果国家果真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为什么盖得和工人党还在他们的纲领中要求国家出面保护受企业主残酷剥削的工人呢？为什么他们要求国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劳动时间和最低工资标准呢？直接向资本家提出这些要求或许更加简便些，因为分散的资本主义比统一的资本主义更容易作出让步。不过，我并不想多争辩。事实上，这场争论已经结束，因为整个社会党的政策都强调必须把各国的许多工矿企业改变为全国的或地方的公用事业。我只想指出，犹如攻击医疗、工伤事故、退休和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险一样，盖得在1885年拚命攻击企图把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家或地方所有的一切做法。盖得指责说，合作社，甚至消费合作社也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危害：

“各城市中的工人毫无疑问可以组织起来，由他们自己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并从目前的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额中获得好处：合作社按成本价格把消费品出售给合作社的

成员，或者按市场的流通价格出售，然后把其中的差额部分或节余部分分给每个成员或作为公共资金。”

“即使这个办法确实可行，即使单单面包业就能获得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的利润（我在这里照抄《时代报》提供的数字），但也不能因此断定，工人阶级从中一定能得到‘明显的好处’。事实远非如此。对于那些比精打细算的企业主看得更远的人来说，这个‘提供廉价商品的工具’只能是‘制造赤贫的工具’。”

“《时代报》承认，消费合作社是‘针对零售商的’；它们想‘从零售商那里抢走顾客’，这就是说，一段时间以后，诸如面包铺、肉铺和杂货铺一类的零售商店均将倒闭。”

“这些无生意可做的零售商，这些破产的——被迫关门的——店铺老板，在象舍莱尔这样勤奋的人的眼里，简直是‘多余的中间人’和‘寄生虫’。他们的破产根本无关大局。但是，在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资料之后，只要允许他们继续生存下去，他们为了活命就只好去当‘工人’，只好加入劳动大军的行列。他们的人数有五十万之多，而现在失业的劳动者已经高达数十万。这场新的不祥的竞争将导致失业人数的激增和工人工资的大幅度下降。”

“参加合作社的工人不但需要出钱购买消费品，而且，由于他们剥夺了零售商的资本，被迫进入工厂做工的零售商会把他们从工厂中挤走，或者由于劳动力在市场上过剩，工人不得不削价出售自己的劳动力。”

“此外，合作社还会带来另一种性质的但同样十分严重的危害：这类经营单位将遏止和埋没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人们是否想过，这种经营管理将使最优秀、最聪明、最有才华的无产者白白浪费多少时间、精力、智慧和忘我的热情？对于劳动

者和他们的事业来说,这种无形的损失要比在1871年5月流血事件中的损失更加难以弥补。这将使谁感到高兴呢?——资本主义制度的得益者和支持者。因为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将从此陷入合作社的鸡毛蒜皮的事务堆中,他们再也不会提出什么要求了。”

“谁都知道——谁都没有权利不知道这一点——雇佣制度中的劳动报酬是根据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进行调整的。如果生活费用昂贵,工资就不可能不相应地提高;否则,为资本家先生们创造利润的劳动力就会因为缺乏生存和繁殖所必需的条件而逐步消亡。如果生活费用便宜,那么工资便会下降。消费合作社一旦从几个人扩大到整个劳动阶级,在工人生活费用降低的同时,合作社将迫使雇主尽可能地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以便降低产品的成本。”

“情况确实如此。即使工人不组织合作社,在德卡斯维尔企业主建立的合作社也多如牛毛,它们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便按成本价格向工人出售商品。”

“无容置疑,合作化是‘有利可图’的,不过,这是对那些个体的或集体的名副其实的企业主而言。合作化使他们的利润成倍增加。”

“当然,个别消费合作社在某些情况和在某些人的管理下也可能给工人带来某些裨益,这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弗拉芒的社会主义从消费合作社中得到的好处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围绕根特的‘符吕’面包合作社,形成一个出色的共产主义运动。民主党报刊笨拙地或不怀好意地把这个运动同我们的工人党对立起来。”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在安塞尔和万贝韦

伦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合作社的目的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进行宣传。廉价的面包只是作为组织和宣传的手段。合作社的利润全部用于办一份战斗性的报纸。”

“按这种想法办起来的合作社便可成为无产阶级打击敌人的真正的武器。”

人们提出许多毫无意义的或者只是暂时有一点道理的对意见。我甚至不想重提那个过时的铁的纪律。但是，如果被合作社搞垮的小商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如果他们参加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这难道必然会导致旷日持久的危机和极度的贫困吗？

无产阶级摆脱商业的中间剥削之后，手中将有更多的钱，他们可以消费更多的产品，这将促进生产的发展，也就是说，这将增加就业的人数，最终消灭失业现象。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将随之提高。如果无产阶级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花在管理合作社上面，这难道会使无产阶级大伤元气，甚至一蹶不振吗？假如是这样的话，岂不等于说，无产阶级不能通过实践来增强自己的才干吗？

况且，合作社不是仅仅消耗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精力，它还培养和增强无产阶级的才干。工人阶级通过独立经营合作社，必将提高自己的自信心，而这种自信心是发挥他们才能的首要条件。人类和自然界中的各种器官是根据需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智力将随着思维作用的扩大而增强。

我现在只想指出一点：虽然从表面上看来，盖得只想纠正合作社的宗旨，但实际上，他根本就反对安塞尔以及后来的工人党在法国北部在里尔、鲁贝、阿尔芒蒂埃尔、奥布利纳等地建立合作社。

如果工人的工资果真象盖得说的那样是受铁的规律支配

的，即生活费用下降必将减少工人的工资；如果必然引起工资下降和失业现象加剧的合作社只可能是“制造赤贫的工具”；那么，操纵这一工具的社会党又该如何改造合作社这个怪物呢？难道只需把合作社的利润全部用于办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造成工人工资下降和使大批劳动力失业的合作社就能变成受人齐声称颂的组织吗？把利润用于宣传的合作社确实会给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劳工兄弟本身带来危害。但是这类合作社对整个无产阶级事业是有利的。合作社将使参加合作社或没有参加合作社的无产者的工资减少；企业主将以合作社内部生活费用低廉为借口，来削减那些不是合作社的受益者的工资；合作社将使失业持续下去，使生活日益贫困。关于这一切，无产者都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坚决支持办一份无产阶级的战斗报纸，甘愿让自己和整个阶级过这种极度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采用什么方式，不管作出多大牺牲，必须迅速筹齐宣传所需的资金，从而加速革命的到来。既然这些无产者具有如此高的觉悟，表现出如此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要求他们向党和党的机关报提供必要的经费呢？为什么偏让本来可以采取不太艰苦的方法赢得解放的无产阶级去忍受这种毫无意义的艰难生活呢？

或许因为无产阶级尚处在半觉醒状态，为了使他们同意作出必要的牺牲，为了让他们筹集宣传所需的资金，首先应该把他们组织在合作社的周围，用降低面包价格这个立刻见效的办法使他们“上钩”。这个办法固然不错，但如果这仅仅是一种骗人的诱饵呢？如果正象盖得所说的那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无产阶级发现他们得到的并不是原来所希望的欢乐和舒适，而是工资下降和失业加剧，那将是一个多么令人憎恶

的大骗局啊！劝他们加入合作社就象引诱他们跌入陷阱一样。事先什么情况也不告诉他们，硬把一个极度贫困的生活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而且据说这是为了在没有他们参加和不让他们知道争取解放的秘诀的情况下，开辟通往解放的道路。以无知作为引导人们思想的动力，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方法！

光靠欺骗，也就是说，光靠绝对的盲从来争取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奇特的方法！无产阶级在这辆驶向未来的大车上，只不过是一个在沉重的负荷下盲目转动的和吱吱作响的轮子。

不，这决不是安塞尔所说的合作社。如果他把合作社看成是为争取解放的社会主义政治宣传提供经费的一个途径，那是因为合作社首先能够改善无产阶级的物质条件，因为它能够保证无产阶级从中得到诸如提高工资这一类的好处。合作社不是骗人的诱饵：它能满足人们的眼前利益和保障他们的长远利益。

然而，盖得却指责合作社是“制造赤贫的工具”。尽管后来他不再攻击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但这也帮不了他的忙。他指责和歪曲社会主义合作社和其它一切形式的合作社。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合作社不但和其它形式的合作社一样，是“制造赤贫的工具”，而且是蓄意欺骗工人的工具，所以他实际上比别人更痛恨社会主义合作社。

于是，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任何形式的公用事业和任何形式的合作社都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在目前的社会里能够着手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组织起来，争取各种权利的保障，能够建立为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的初步的生产形式。现在还不存在任何类似布朗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最高形式发展的日益复杂的组织形式和社会保险形式。这是

十足的悲观论调和否定一切的态度。这是要人们完全消极地或者想入非非地等待革命的突然爆发。但是，工人党在制定政策时却提出一个关于改革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人们现在就能从国家那里争取到一些权益。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自相矛盾的态度，就象一方面主张进行普选的合法行动，另一方面却要求采取争取解放的暴力行动一样。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饶勒斯的观点和茹尔·盖得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多么深的鸿沟。这位工人党的创始人，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竟不顾言语措辞和应有的节制，在1885年蛮横地说：“多搞几项改革只不过是多增加一些骗人的点缀。”他挖苦地把那些主张免费医疗或“在需要时免费提供一口棺材”的人称为爱搞恶作剧的人。与此相反，饶勒斯承认，无产阶级从现在起就可以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生产进度以及劳动和交换的组织施加自己的影响。”

对于茹尔·盖得来说，国家和地方政府是有阶级性的，它们是为无产阶级的敌人服务的。国家尤其如此，它是一个堡垒，不能靠一块砖一块砖地拆除——即不能靠一项一项改革来拆除——，而应该一举攻克它。他认为国家是“无法渗透的”；饶勒斯不相信这个结论，他对于国家持另一种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可以从各个方面“渗透”到国家中去。饶勒斯巧妙地指出，十年以后，同一个茹尔·盖得以鲁贝市议员的身份要求建立市一级的药房。该市在工人党的领袖获得胜利之后，便成了“社会主义的麦加圣地。”

他们是如何对待工人养老金问题的呢？盖得最关心那些缩小改革作用的反应。他善于用冠冕堂皇的话来打动和赢得人民群众的心，他作为一个鼓动家决不会就此停步不前；他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贬低改革的意义和揭露其中的各种弊病。不，盖得需要证明，改

革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比这还坏，改革是一个陷阱，是阻碍彻底解放的绊脚石，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觉。他不断提醒无产阶级应对此保持“警惕”。盖得不但要攻占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堡垒，而且作为颇有气魄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还想攻占工人阶级的头脑和心脏。决不应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据合法的席位！决不应该采取包围的办法，决不应该通过某种策略或者采用劝说的办法实行部分的渗透。应该开展激烈的和殊死的斗争，最后攻占这个堡垒。茹尔·盖得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由成为政权的绝对主人的无产阶级实现集体化。在这个伟大的目标面前，一切改革都相形见绌：应该谴责、鄙弃和痛斥这些改革，并且在理论上与它们一刀两断；只有这样，才可能防止有人通过“后门”偷偷地把改革的主张塞进最低纲领和“当前要求”中去。

饶勒斯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他在不忘记“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的同时，致力于改革。他承认，资产阶级的改良中存在着缺陷和弊病。但是，他认为，过份地指责这些缺点是毫无意义和徒劳的，甚至是有害的。改革是进行革命的十分有效的工具。因此他觉得，假如人们系统地诋毁这个社会革命所必需的工具，这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其结果是背离原来的目标。

饶勒斯总是力求完全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所以他需要周密细微和恰如其分地进行思考。他坚持采取公正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不单单是因为饶勒斯需要争取和对付另一种类型的听众，即议会议员和受过教育的民主主义者。这些听众要求很高，他们随时准备展开辩论和反驳。盖得的听众和饶勒斯的听众固然不同（其实，盖得也常常在议会里或向知识分子发表演说），但是这种不同只能部分地说明他们俩人采取截然不同的做法的原因。事实上，饶勒斯在向人民群众作宣传时，在公众集会上和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同样十分注意讲话的分寸，同样采取公正和实事求是的态

度。盖得认为，饶勒斯这个人对工人阶级来说太复杂了，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工人阶级只接受简单明确的真理，只接受毫不含糊的和绝对正确的真理。盖得本人的做法更多地象教会的那套做法，即把人民当作天真的孩子，靠圣绩和启示来加以引导。

饶勒斯则不同，他是当代的政治家，十分了解事物的巨大复杂性。他把遇到的难题分门别类地“串”起来，然后逐步加以解决。

下面举几个例子。1886年，盖得不同意让企业主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工人退休金的主张，他认为，“雇主的捐助纯系虚假”。1910年，统一社会党里只有他一人投票反对关于工人退休金的提案，因为1910年的法律规定，工人必须交纳一部分钱作为退休金。他认为，让工人出钱，实际上是“减少工人的工资”。至于国家捐款，这纯系“虚假”的。除了上述三项捐款之外，工人退休金的来源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税收（例如，财产继承税）。但是如果用税收来支付工人的退休金——盖得在这一点上看得很准——将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应。归根结底，盖得想把集体主义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方法。他担心如果让改良派从改革中得到哪怕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好处，这也会在追求简单明了的真理的工人中间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为了防止有人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低工资的社会主义”或“小恩小惠的社会主义”来反对全面的社会革命，盖得出自宣传的目的，自觉地走向另一个极端：他用革命来反对社会改革，用社会主义的“最后”任务和最终目标——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日常工作和争取每日面包的有效斗争。

饶勒斯总是设法把互相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他希望改革能够引起革命，希望经常不断的改良“运动”导致“最终目标”的实现。

尽管饶勒斯十分钦佩伯恩斯坦的“积极的”批判态度，但他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中的老牌机会主义的信条：“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对于饶勒斯来说，没有明确“目标”的运动是毫无意义的。他坚决反对那种既系统地否定“改良运动”，又系统地否定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态度。

在公用事业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布鲁斯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管理公用事业的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专门负责市政改革的制度。针对他们的乌托邦式的空想，茹尔·盖得指出，“如同希洛人醉得人事不知的样子足以使拉齐尼亚青年讨厌酗酒一样，国家雇员的那付卑躬屈膝、贫穷寒酸的样子也足以使头脑最迟钝的人摒弃所谓靠比比皆是的官僚机构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他还说：“由国家掌握生产和由国家雇佣工人，这并不意味着砸碎资本主义秩序——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相反，这意味着赞美和强化资本主义。”

事情很明显，盖得出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在故意夸大……国家雇员要比私人工厂中的工人富裕得多。国家借口说，他们的情况比较优裕和比较有保障，因此剥夺了他们参加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很多人都争着想到政府机构中去任职。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茹尔·盖得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把本来可以统一的各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尖锐地对立起来。

饶勒斯反驳盖得说：“国家并不象资本家那样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他用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问题已获解决，“因为整个社会党的政策都强调必须把各国的许多工矿企业改变为全国的或地方的公用事业。”其实，饶勒斯不愿看到别人把他个人对改革的看法——主张企业地方化就是其中的一个观点——同各国社会党的纲领，同法国工人党自己提出的迫切要求的纲领，明显地对立起来。不过，应该替盖得说句公道话，他的这种反对改革的不妥协

性——然而却是断断续续地表现出来的——更多地起着教育作用；他之所以这样不妥协，这是因为他反对改良主义用机会主义的手法吞噬社会主义。盖得判处改良主义的死刑，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饶勒斯也看到了社会主义确实有被改良主义吞噬的危险，但是他力求把社会主义同改良主义结合起来。

饶勒斯认为，盖得的国际政策同样缺乏连贯性，同样是——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感情冲动的产物。饶勒斯极其生动地描绘了盖得的国际政策：

他的对外政策同样是软弱无力和含糊不清的。不错，他是一个态度鲜明的国际主义者。他早就激烈地反对戴鲁莱德和“爱国主义者”的沙文主义。他指出，这种走江湖式的招摇撞骗会给公众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危害。但是，盖得的国际主义又是和平的国际主义，不是旨在扩大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自由权利、从而壮大他们自身的力量的国际主义，也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能够集中今天消耗在战争或者维持和平上面的一切精力和财力，以便对所有制进行必要改革的国际主义。他不认为，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民主制度的进步最终会给工人带来解放。他希望发生强烈的震动，使革命力量从地层的深处迸发出来。因此，对于他来说，灾难越大，好处就越多。然而，再大的灾难也莫过于各大国之间的流血冲突。这些国家的人民对社会上将要爆发的战争已经感到忐忑不安。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各国政府机构将被互相残杀的战争破坏殆尽，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就此可以毫无阻挡地迸发出来，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中的工人国际就此可以摆脱资本主义和政府的束缚。

如果俄国和英国之间一旦发生冲突，结果两败俱伤，这将是一场多么大的灾难，或者说，这将给革命带来多么大的好

处！俄国是专制主义的堡垒，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堡垒。这两个国家都是压在世界无产阶级身上的大山，推迟了革命的进程。

俄国不仅是因为它有凶悍的哥萨克骑兵，所以才对西方的共和自由和立宪自由构成威胁。俄国咄咄逼人的态度使西部邻国德国神经高度紧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德国帝国主义得以用保卫日尔曼独立作为大搞军国主义的借口。德国无产阶级因此而不敢向德意志帝国发动进攻，生怕内部冲突会引起沙皇俄国的干涉，进而使德国沦为另一个波兰。英国对世界无产阶级来说也是一个祸害。由于英国无产阶级从对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掠夺中分得一些好处，因此他们的思想僵化，十分保守，他们至多只愿意搞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沙皇制度的垮台将解放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资本主义的垮台则将使英国无产阶级迅速地投身到世界革命运动中去。因此，盖得为1885年俄国和英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冲突拍手叫好，称赞它是一场“富有成果的战斗”：

“欧洲各国政府不惧怕这场日益迫近的大规模冲突，只怕西方社会主义得到发展的机会。这一冲突并不是笼罩在革命上空的乌云，不管这两个‘文明’国家中谁一败涂地。如果两败俱伤那就更有利于革命。”

“如果俄国在中亚地区遭到惨败，沙皇制度就会覆灭。某一位沙皇的下台并不会导致整个制度的垮台，然而，这个制度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一旦被摧毁，沙皇帝国必将灭亡。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过于胆小，迟迟不敢动手，迄今为止他们只是放一些空炮而已。现在，他们突然成立了一个立宪制的、议会制的和西方化的政府。彼得堡的这场政治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使德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德国社会主义民主从此可以摆脱莫

斯科的可怕威胁，不用担心在威廉军队的背后还会出现亚历山大的军队。工人们可以在铁血帝国的废墟上举行盛大的革命舞会，庆祝1789年式的胜利。沙皇政府的报刊被迫承认，在遭到彻底失败之前，俄国的后退必将动摇整个旧世界。”

“战争万岁！最后一丝和平希望已经破灭……决定命运的时刻即将到来。几天，最迟几个星期之后，莫斯科的军国主义和英国的财阀之间将爆发冲突。正当欧洲的资本主义——用《时代报》上的话来说——对战争阴云的日益扩大感到惊恐不安的时候，正当保皇派的《太阳报》、机会主义的《法兰西共和报》和激进党人的《正义报》声嘶力竭地叫嚷‘大难临头’的时候，我们却拍手欢迎这两大保守势力之间的决斗，我们同英吉利海峡那一边的社会党机关报《联邦报》一起高呼：但愿不是冲突的一方，而是冲突的双方都完蛋！”

盖得确实象个预言家。他在预卜未来时说：“如果俄国在中亚地区遭到惨败，沙皇制度就会覆灭。某一位沙皇的下台并不会导致整个制度的垮台，然而，这个制度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一旦被摧毁，沙皇帝国必将灭亡。”简直可以这么说，盖得在1885年就已经预见到1905年发生的事了。因为俄国革命象影子一样紧跟在沙皇政府在满洲里的失败之后爆发了。在这一点上，盖得比饶勒斯更加符合人们所说的由坏事变成好事的历史辩证法，因为饶勒斯天生厌恶不择手段地挑起流血事件的做法。饶勒斯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泛神论者。他认为，这个充满血腥味的、冷酷无情的宿命观点只会起扼杀人类和理智的双重作用；他不承认，战争和革命都是命中注定的。饶勒斯对革命和灾难性的流血冲突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感到深恶痛绝。他把盖得关于战争是“革命之母”的观点斥为“毫无意义的和可怕的梦呓”。他相信理智和规劝的威力。从某种意义上说，饶勒斯比盖得更加革命。因为他不是要求理智服从

于历史的需要和历史的命运，而是要求历史本身服从于理智的法则。他希望建立一个人道的、通情达理的和美好的人类社会。他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人们根本不可能使事物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正如他不认为无产阶级思想是“无法渗透”到国家中去的一样，他也不认为理智是无法渗透到历史进程中去的。他既不相信革命的历史必要性，也不相信战争的历史必要性。他一生的活动都是为了阻止这类灾难的发生。对于他来说，社会改革恰恰是用和平发展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饶勒斯是一个敢于违抗“上帝”的普罗米修斯，他敢于同严酷的、血淋淋的历史法则对抗。他敢于违抗在政治和社会灾难方面的铁的法则，因为他认为，这些灾难必将毁灭人的个性和良知。饶勒斯向盲目的、残忍的和无法控制的疯狂本性开战。他象萨宾的妇女^①一样，用自己的身体横在交战的士兵中间。他因此而得到的最高奖赏是一颗致命的子弹，这些丧心病狂的凶手无法理解他那明智的呼吁和充满仁爱的宽广胸怀……。

^① 相传上中世纪时期，罗马人和萨宾人之间发生战争，萨宾的妇女为了制止战争，便用自己的身子把双方的军队隔开。——译者注

社会党人参加政权的问题

饶勒斯向国际社会主义提出了社会党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参加政权的问题。对于他来说，政策只是实现伟大的和崇高的社会理想的手段。他看到社会主义正在蓬勃发展，正在成为一支国家和国际的力量。他想使社会党获得一个斗争工具：政权。但是，由于社会主义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夺取全部政权，饶勒斯便要求社会党和工人阶级先夺取一部分政权。这就产生了参加政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法国和其它国家的社会党内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甚至导致法国社会党的暂时分裂。

饶勒斯强烈主张参加政权。在这个问题上，他依然忠实于他的革命发展的思想。他说，作为民主先锋的工人阶级无疑应该获得全部政权。但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得到，如果猛然割断历史，这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无产阶级必须逐步地夺取政权。他喜欢用1848年的革命作为例子：在那次革命中，路易·勃朗和工人出身的阿尔贝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第一次在共和政府中担任部长的职务。他还举出一个具体的细节：当时，人们在三色国旗上加了一条红带子。参加政权就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上添上一条红色的带子，然后再慢慢扩大这块红色的印记，直至染红整个共和国。

除了历史的连续性之外,还有工人阶级本身发展的连续性。同样也不能突然割断这一连续性。饶勒斯模范地自觉遵守社会党的纪律,他不愿象他的老朋友米勒兰、布里安和维维安尼那样,为了谋取私利,才到政府中去担任一官半职。他不是单纯地为了追求权力或者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是为了社会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才主张参加政权的。他耐心地等待社会党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将派出自己的代言人,即有资格的领导人,同资产阶级各政党的代表一起参加政府。

震撼整个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以后,这个问题才得以正式提出来。我亲眼看到,饶勒斯当时有点迟疑不决。他知道,象茹尔·盖得的法国工人党和爱德华·瓦扬的革命社会党这类老牌社会主义组织肯定是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政权的。他为正在实现中的各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联合分外感到担忧:参加政权的问题可能会在各派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分歧。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参加政权的做法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原来的意义,因为身为社会党人的部长将不能代表社会党和工人阶级,这样,他的权威性也将相应受到影响。

1899年,盖得在雅皮大厅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娓娓动听的演说,极力反对参加政权。饶勒斯在同他的一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中,阐明了参加政权的理由。他们的这次争论发生在里尔市。

饶勒斯先从阶级斗争的定义谈起:

公民们,在我看来,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关于阶级斗争的原则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存在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即生产资料私有制把人分成两类,分成利益必然尖锐对立的两大集团。一部分人掌握生产资料,可以随心所欲地欺压别人;另一部分人只有劳动力,而且他们只有通过恰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料,才能使自己的劳

动力变得有用,因此他们只好听任资产阶级的摆布。

两个阶级、两个利益集团之间不断发生斗争,因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资本家则希望减少他们的工资;工人要求自由,而资本家则企图使他们永远处于从属的地位。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第一层意思。造成这一情况的具体条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即私人所有制。请注意,这里指的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因此,这个问题涉及到人类最基本的东西,涉及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由于社会分成无产者和有产者而造成的冲突,决不是表面上的冲突,它触及到社会和生活的最深处。

但是,公民们,仅仅利益冲突还不足以引起阶级斗争。如果劳动者没有意识到建立另外一个社会的可能性,如果他们只看到自己所处的从属的和毫无保障的地位,而没有看到建立一个更公正的新社会的可能性,如果他们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永远是必要的,从而,他们的思想被这一必要性束缚住了,那么,他们就会放弃改造不合理制度的念头,就会觉得,这项任务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因此,若要真正开展阶级斗争,若要动员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开战,光有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够的,必须使工人依照历史发展的规律,产生建立新社会的愿望。在新社会中,社会所有制将取代垄断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从而使有组织的劳动者参加劳动管理和劳动果实的分配。

应该使现在的利益集团认识到,它们组成了两个相互对立和相互斗争的社会:一个是目前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社会,另一个是存在于无产者头脑中的未来社会。

在今天的社会里,这两种社会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

必要因素。

导致阶级斗争的第三个条件是，如果存在着一个严守中立的和置身在利益冲突之外的第三势力，如果它能够出面调停，能够给无产阶级带来解放，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集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社会，那么，无产阶级便毋须起来捍卫自己的事业。

你们知道，基督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主张的。他们中间有些人虽然承认两元论和利益的对立，但他们对人民说：“你们不必起来斗争，不必成立什么组织，因为上天仁慈的力量，宗教的力量将会使一个公正和友爱的社会降临人间。”

如果劳动者听信这些话，他们便会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超然的力量上面，那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此外，如果资产阶级出于某种正义感，同意让劳动者获得解放，那也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

男女公民们，你们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整个“空想社会主义”时期中，社会主义者确实以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要靠上面恩赐。

英国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希望依靠聚集在维也纳开会的各神圣同盟的列强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伟大的傅利叶则朝思暮想有人会慷慨解囊，捐助一笔资金，好让他建立第一个美好的社会；他幻想把这样的社会作为典范，逐步加以扩大和完善，最终给人类带来解放和欢乐。

后来，路易·勃朗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认为资产阶级能够解放无产者，只要资产阶级发扬1793年的精神^①。他在其《十年的历史》一书的末尾，居然乞求资产阶级保护无产

① 指1793年推翻吉伦特派统治，建立雅各宾派专政。——译者注

阶级。

如果无产阶级可以从上帝或资产阶级这类保护人那里获得解放，如果无产阶级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依靠别人的力量亦可获得解放，那就不会有什么阶级斗争。

一旦无产阶级从“六月经验”^①中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组织，才可能有解放的希望，这时，阶级斗争便开始了。

总而言之，产生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首先是，社会分成互相对立的两部分——有产者和无产者；然后，无产阶级必须对未来社会和集体主义有一定的认识，必须怀着他们应该而且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信念进行阶级斗争。

基本利益的深刻对立，对本阶级利益的认识和策略方面的独立性，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确切含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对此表示异议。饶勒斯以他惯有的直率和大胆，试图把参加政权的策略同他本人的，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结合起来。

公民们，这就是我对阶级斗争的看法。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的分歧。但是，我要说，单凭这样的分析和认识，你们仍不可能预先制定日常斗争的具体策略和方法。

不错，按照阶级斗争的定义，你们必须使无产者意识到，他们在今天的社会中处于从属的地位。不错，按照这一定义，你们必须向他们解释新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不错，按照这一定义，你们必须组织工会、成立政治团体、建立工人合作社和发展阶级组织力量。

^① 指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译者注

但是,光凭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你们仍无法确定,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参加选举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参加;你们无法确定,无产阶级是否能够或者应该对资产阶级的派别斗争发生兴趣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或者应该这么做;你们也无法确定,你们是否应该接受或者拒绝选举中的联盟。

阶级斗争的总原则给你们指出了总的方向;但是,你们不可能从中找到日常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仅仅知道总的风向,你还不能确定森林中每棵树和每片叶子的摆动情况。

同样道理,如果你只知道将军们的总的作战计划,你也不能确定每支作战部队的进攻或防守、前进或后撤的具体部署。

你们应该研究无产阶级在每个具体情况下的利益。这只是一个策略问题。

如果你们和我们的敌人一样认为,社会党始终应该是一个在野党,那么,你们就不可能接受阶级斗争的原则。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混乱和危险的。

社会党无疑是一个不断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党,我们的行动、思想、宣传和投票表决都应该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制度服务。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因为社会党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死敌而对资产阶级政党和历届资产阶级政府不作任何区别。

全部问题恰恰在于,社会党在作为少数派参加政府之后,能否继续反对现制度和多数派的基本趋向。问题在于,最终是社会主义掌握政府还是政府控制和支配社会主义。饶勒斯感到,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于是,他巧妙地把话题一转,谈起他确有把握的那个问题,即如何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差异的问题。饶勒斯赞同包括法国社会党在内的各国社会党的做法——区别对待

各资产阶级政党。

是啊！今天的社会分成资本家和无产者。但是，社会上同时还存在着旧势力卷土重来的危险性，存在着野蛮的封建主义和至高无上的宗教势力卷土重来的危险性，因此，当共和自由、思想自由和意识自由受到威胁时，当散布民族仇恨和挑起世代宗教战争的旧偏见重新复活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与不愿倒退的资产阶级政党携手前进。

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重新回到这些最基本的原理上来。这些原理本应当成为社会党人的共同财富和行动准则。马克思本人曾明确地说过：“我们革命的社会党人同无产阶级一起反对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绅士和神父。”

如果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不把最顽固、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同那些至少愿意维护残存的或初步的自由权利的资产阶级区别开来，那就是严重失职，那就是违背本阶级的传统和利益。同样，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尤其是社会党议员，也不应该对历届资产阶级政府不作任何区别。

我不需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人民根据革命常识已经把梅利纳内阁同布尔茹瓦内阁区别开来了，已经把今天的政府同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窥测方向的民族主义大杂烩区别开来了。

人们可以看到，饶勒斯巧妙地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驳斥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肯放弃他们错误的策略和观点，这严重地损害了他们在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形象，使人感到指责他们企图“为反动派效劳”的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德雷福斯事件是培根所说的检验这一策略的“典型事例”。

德雷福斯本人是资产阶级，他的政敌也是资产阶级。但是，后

者是一手炮制德雷福斯事件和党派纠纷的反动派。饶勒斯用对待这一事件的态度来说明他的策略。

有时候，制止资产阶级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过分堕落，对于无产阶级是有裨益的。因此，当资产阶级各派别在军队犯罪问题上发生你们所知道的争吵时，当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针对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造谣和诽谤，要求伸张正义和倾听真理的呼声时，无产阶级不应该保持中立，他们有责任站在遭到践踏的真理一边，站在发出正义呼声的人类一边。

盖得曾在旺提埃大厅说过：“让那些欣赏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去纠正这个社会的错误吧！让那些欣赏资本主义太阳的人去抹掉太阳上面的黑子吧！”

好吧，请允许我对他说，如果资产阶级亲手对某一个人犯下了罪行，而无产阶级的干预本来是可以阻止他们犯罪的，那么，不光资产阶级应该对此负责，而且无产阶级也应对此负责。无产阶级在刽子手行凶时没有出面加以制止，他们便成了刽子手的帮凶。这不再是遮挡没落的资本主义太阳的黑子，而是有损于初升的社会主义太阳光辉的污点。我们不希望看到类似的耻辱玷污无产阶级的形象。

对阶级斗争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人们可以只考虑无产阶级直接的、眼前的和可以捉摸的利益：改善劳动物质条件和提高 Standard of Life^①。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对此作出自己的一定贡献。尤其在象法国这样一个建立了普选制的国家里，任何一个政党，甚至反动的党派，都可以为争取无产阶级的眼前和日常利益而斗争。但这不是我们社会党的主张。社会党不仅要捍卫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眼前的物质利益，而且主要应该捍卫工

① 英文，生活水准。——译者注

人阶级的总的和经常性的利益，即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利益。它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它要把受剥削的工人阶级提高为先进的阶级和革命的阶级。一旦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崇高和伟大的历史作用时，他们就能担负起争取更明确的和更崇高的利益的历史使命。按照这个观点，无产阶级是社会的总的和经常性的利益的天生捍卫者，无产阶级不再游离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之外，而是置身于社会之中，为了社会和依赖于社会而生存。于是，无产阶级便成为杰出的进步力量，肩负着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他们是社会进步的可靠保障。这时，无产阶级可以说：“Humanitas sum et nihil humani mihi alienum puto。”^① 他们可以宣告崭新的人类社会的诞生。

这也是饶勒斯对德雷福斯事件的观点。他以他的杰出的口才阐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不希望“无产阶级成为刽子手的帮凶”或者成为反动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帮凶。无产阶级的上述作用太令人神往了，以致茹尔·盖得一度也被迷惑住了。开会时，饶勒斯当着盖得的面叙述说：

必须使法国社会党和欧洲所有的社会党了解这一怪现象：德雷德斯事件刚发生不久，革命社会党人比谁都起劲地鼓动和怂恿我投入战斗。

同志们，应该让你们知道，在上届社会党议员团里，这个问题是如何提出的。

当问题初次提出来时，当我们正在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时，社会党议员团大致分成两派。

一派是议员团中的温和派（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他们）。他们是米勒兰、维维安尼、儒安迪和拉维等人。他们说：“这是一

^① 拉丁文，意为：“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译者注

个危险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插手。”

另一派可称为议员团中的革命左翼。我和盖得、瓦扬等人属于这一派。我们认为：“这是一场战斗，我们必须参加。”

是啊，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盖得是何等欣赏左拉的那封信。温和派的同志们说：“左拉根本不是社会党人。不管怎么说，他是资产阶级分子。难道要让社会党跟在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后面转吗？”

这时候，盖得站起来，走过去把议员们正在开会的大厅的窗户打开，仿佛室内的空气已被这些话弄得混浊不堪似的。他边走边说：“左拉的信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行动！”

后来，我在他的话和我自己的信念的激励下，开始替左拉案件辩护；我到高级军官们的会议上——人们虽然尚未深入调查，但已经开始怀疑他们的罪行——作证；作证之后，我回到议会时，盖得对我说了一句使我终生难忘的话：“饶勒斯，我爱你，因为你的行动始终是受你的思想支配的。”

由于总参谋部的那些暴戾的家伙采取落井下石的做法，盖得怀着沉重的心情对我说：“对于这样一个不知廉耻和堕落的人类，我们往后该怎么办？当我们开始兴建我们的大厦时，可能为时已晚了，因为作为‘建筑材料’的人已经腐烂。”

在盖得讲了这番话之后，过了几个月，即在七月份，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为什么又想叫无产阶级退出这场战斗呢？

我曾反复寻觅其中的奥妙。是不是因为革命派认为，我们参加战斗的时间太长了，过多地消耗了我们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

但是，请允许我向他们提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同这类谎言

和迫害斗争到底的话，在决定性的时刻，人们的革命热情又从何而来呢？

就我而言，我将继续斗争下去，直至把毒蛇的毒牙拔掉为止。必须彻底追查谣言的制造者、撒谎者、刽子手和卖国贼；用真理的利剑逼他们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

请注意，就在要我们退出战斗的七月声明发表后的几个星期，我一鼓作气地弄到一份亨利的供词。

幸亏我们没有理睬撤退的信号，这才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革命得以在揭露高级军官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样做决不是浪费时间。随着军队的罪行逐步被揭发，随着你们逐步认清军国主义的伪善面目和诡计多端的手法，军队的威信便一落千丈。要知道，军队之所以危险，不仅因为它是资本的武装卫士，而且还因为它用虚构的伟大业绩，用忠诚和自我牺牲这类鬼话来欺骗人民。

人们一旦看到，这个被推崇备至和了不起的偶像，这个要求大家世代代为其贪得无厌的野心做出牺牲的偶像，只不过是一块腐烂透顶的朽木，只不过是一个由无耻之徒、卖国贼、谣言专家和阴谋家组成的集团，那么军队这个偶像也就彻底完蛋了。而这对社会革命则毫无害处。

我认为，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便可双倍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由于无产阶级对自己、对文明和对人类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由于无产阶级把阶级行动提高到新的水平，不再象路易·勃朗说的那样，把资产阶级当作庇护人，而在这场危机中成为资产阶级本身无力维护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捍卫者；由于无产阶级在这场社会悲剧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这一切原因，一个社会党人直接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便成了完全可能的事情。

我想强调饶勒斯的最后一段话。支持德雷福斯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导致一位著名的社会党人进入了政府，虽然这个运动由于受到一些与运动本身无关的考虑的干扰，一度偏离了方向。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和如何采取饶勒斯提出的“参加”的策略。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加利费内阁时期，人们曾反对军队残酷镇压马提尼克和夏龙的罢工工人。饶勒斯不想为这一事情辩护，而只想做一些解释。

现在，我想就马提尼克和夏龙的不幸事件说几句话。我愿提醒那些对我们大为恼火的人：他们莫名其妙地把问题搞得混乱不堪。

如果我们支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某一届政府，乃至支持一个有社会党人参加的政府，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天真地以为，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都能主持正义和尊重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产生不公正的土壤，只有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不公正现象。

我们同样也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更凶狠，更恶劣和更残暴的敌人；我们支持某一内阁，不是因为这个内阁本身有多好，而是为了防止别人组成一个更坏的、从而危及我们利益的新内阁。

因此，把受到我们支持的内阁所犯的 error 或者罪行统统归咎于我们，这是极其不公平的。我们支持这个内阁，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罪恶发生。

什么！里尔市市长德洛利公民，富尔米市市长——富尔米居然发生枪杀事件！——所有这些选举产生的市长，所有这些城市的负责人将同瓦尔德克—卢梭坐在一起讨论；休假回来以后，议员们继续开会，对政府的总政策提出质询，不但讨论马提尼克和夏龙的问题，而且讨论西比多和莫尔加利横

遭驱逐一事。全体议员，包括今天在座的泽瓦埃斯以及瓦扬，都对政府投信任票。他们这样做是必然的。他们不愿卖身投靠反动的民族主义和教会势力，这是符合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的。

在驳斥了有人因为政府干涉工人罢工而对担任部长的“社会党人”提出指责之后，饶勒斯仍把参加内阁政府看成是议会斗争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力图证明这一做法是必要的和有利的。然而，议会斗争形式也曾遭到反对，被认为有害于社会党人的应有的坚定性。但社会党人并未予以理睬，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也是如此。饶勒斯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了如指掌，故从中找到了有力的论据。

公民们，三十年来，社会党在世界上取得很大进展。它参加了许多事情，参加了许多原先没有参加过的机构。今天，我们围绕着社会党是否应该派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争论不休。但是，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社会党必须参与议会的工作。

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在社会党的卅年历史中，那些主张社会党人进入议会的人曾经象我们今天这样受到过责难。

我请你们好好读一下我们的战友、伟大的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公民在1869年写的文章，他的逝世曾使全世界社会党人深感悲痛。

1869年，即德国建立普选制二周年，李卜克内西为北德意志联邦议会编写了一本小册子，试图说明社会党人在议会里能够而且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他不但对议会的改良行动不抱希望，而且他认为单纯地把议会作为宣传的讲坛是毫无益处的。他说：

“我们的演讲对立法不会发生任何直接的影响，我们不能靠演说来改变议会。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在议会里直捅出来，而应该通过其它更好的途径。”

“那么，议会演讲究竟有什么实际好处呢？一点也没有。空发议论只是蠢人们的自我陶醉。”

“空谈是毫无意义的。”

“相反，它只会带来坏处：牺牲原则，把政治斗争变成议员之间的口角和争吵。企图使人民相信俾斯麦的议会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这简直是愚蠢的，或者是叛卖行为。”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869年对议员在议会中的宣传活动的看法。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看法与今天反对社会党人参加内阁的观点如出一辙，只不过题目不同罢了。

几年之后，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李卜克内西不但是帝国议会中的一名战士，而且成为萨克森邦议会的议员。每个议员在正式进入邦议会之前，都必须宣誓效忠帝国的和资产阶级的宪法：“我在上帝面前起誓……”

你们看，公民们，我们的成见将会造成何等巨大的误会。我刚才说，凡要进入邦议会，首先必须宣誓效忠萨克森国王。现在，我把李卜克内西的誓言抄录给诸位；有些性急的同志恐怕将因此而毫无顾忌地称我为教权主义者。

请注意，这是李卜克内西的原话：

“我在上帝面前起誓，我将始终不渝地忠实于宪法，按自己的良心提出建议和进行表决，为国王和国家的不可分割的和至高无上的利益效劳。愿上帝保佑我。”

同志们，那时候，有些自以为纯洁和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曾指责李卜克内西不该为了当议员而说出这种话。杰出的革命家李卜克内西义正辞严地驳斥道：“如果当权者只要用一纸

空洞的誓言就能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那我们只好永远受他们的愚弄。”

如果把一位社会党人部长在表决时与其它内阁成员一起进行表面上的合作，说成是一种罪过的话，那么试问，这类我认为是履行“内阁手续”的做法难道对法国社会党人来说，要比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在上帝面前宣誓效忠皇上具有更大的屈辱性吗？

请问，我们难道应该在这些繁文缛节面前裹足不前吗？当我们的事业需要我们派一个自己人打进资产阶级政府堡垒内部的时候，我们难道应该犹豫不决吗？

盖得对饶勒斯的论述有什么反应呢？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打算大段地引用盖得的原话；他象往常一样，激昂慷慨地逐条批驳饶勒斯的观点。

他对你们说：德雷福斯事件以及我同一些社会党人一起发动的支持德雷福斯的运动，最终使一名社会党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与其它成员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是事实，饶勒斯公民。可是，这个事实的本身就足以谴责社会党人在您吹嘘的这个运动中所采取的一切形式的合作。

不错，开始时需要采取这种歪曲的手法，需要让一部分无产阶级放弃他们的阶级立场，以便在一定的時候把一名社会党人参加内阁说成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其实，这位社会党人在内阁中根本无足轻重，他只是一名俘虏，一名人质，只是足智多谋的瓦尔德克—卢梭在反对派阵营中找到的一块用来掩护自己的盾牌；这将使在野的社会党无话可说，使劳动人民不但不能向瓦尔德克—卢梭开火，而且也无法向加利费开火，因为在劳动人民和加利费之间有米勒兰挡着。

你们断言，你们在支持德雷福斯的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是

正确的，因为这一运动最终使米勒兰进入了瓦尔德克—卢梭—加利费内阁。而我则认为，恰恰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必须最严厉地谴责这场运动。只要社会党在部分背离阶级立场方面跨出第一步，只要它在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盟方面跨出第一步，那么它就有沿着这条裂缝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为了替某一事件伸张正义，为了替某一个人恢复名誉，社会党竟和敌对阶级同流合污，竟同这个阶级一起组阁。

阶级斗争最后却导致阶级合作，这一新的合作形式使一个政府既包括一个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党人，又包括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为唯一目标的大多数派。有人竟把这种形式的“合作社”吹捧为无产阶级的胜利，作为显示社会主义力量的标志向我们兜售。正象拉法格所说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对的。因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支力量，已经对资产阶级构成一种威胁，因为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企图打入无产阶级组织的内部，从事分裂和破坏活动。但是，这决不是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而是资产阶级政权夺走了一名社会党人及其追随者。

于是，同志们，我们看到了我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工人阶级本来应该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如同他们应该进行自己的革命一样；然而他们现在却要为他们主人的共和国站岗放哨，被迫维护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

我曾认为，高度文明的社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它的建立则取决于肩负着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重任的无产阶级，因此应该把人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这方面来；我曾认为，我们应该随时准备摧毁现有的秩序，以便建立新的秩序。

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1789年的大资产阶级似乎应

以十八世纪所进行的改革为幌子，竭力维护旧制度。我曾认为，当时的大资产阶级是反对旧制度的，他们把好的和坏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全部铲除了；我曾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亚于他们，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为人类造福的阶级，将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他们将不光解放几个人，而是解放所有的人。他们只应该按照本阶级的利益行事，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同全人类的总利益和最终利益吻合的！

有人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提出的新政策想把无产阶级单独地组织在一起，然后再把这支现成的“部队”交给资产阶级的某个“参谋部”指挥。正当雇佣工人随着其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而在政治上日益崛起的时候，正当资产阶级因为遭到工人的唾弃而感到绝望的时候，有人却对我们说：一旦资产阶级干出见不得人的事情或者他们的声誉受到威胁时，我们的责任始终应该是全力营救他们。

但是，同志们，即使你们日日夜夜地干，恐怕也难以把资产阶级身上的污点全部洗刷掉。而且你们根本不可能擦掉那些永远擦不掉的污点。你们可以象珀涅罗珀^①那样不停地干，但是其结果只会延长已经把你们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统治阶级的寿命，只会使今天的社会永久化。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合作了十八个月，但这个社会依然象在梅利纳、杜毕伊和佩里埃时代一样，沉重地压在你们的身上。

假如不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假如不以社会所有制，即你们自己的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那么，今天的社会没有、也不可能会有任何变化。

① 珀涅罗珀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赛的妻子。在奥德赛外出的二十多年间，有无数求婚者向她求婚。她想出一条妙计，说让她织完一匹布后可以改嫁。她白天织布，到了晚上把白天所织的全部拆掉，以此来拖延时间。——译者注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向法国工人灌输的这个思想应该仍然是已被争取过来的人的唯一主导思想，而且还应该在至今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的人中间广泛宣传。我们的唯一任务是“招兵买马”，扩大我们的攻击部队，因为在推翻国家政权的大决战中，这支部队将象攻打封建主义的巴士底监狱那样，攻打资产阶级的“巴士底”。如果我们象乞丐那样，乞求只可能是画饼充饥式的所谓改革——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的利益，或许会抛出某些改革，以迎合人们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会倒霉！我们是革命的政党，而且我们只可能是革命的政党，因为我们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

如果我们背离这场斗争，同志们，那就是背叛、那就是临阵逃脱，那就是替今天的资产阶级效劳。正如米勒兰在朗斯说过的那样，资产阶级知道，雇佣制度不是永恒不变的；也正如德夏内尔在波尔多随声附和地说的那样，雇佣制度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是，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一最后的奴役形式的日期说成是要比圣经上说的人死后进入天国的日子不知遥远多少倍。你们不要上这种区区诺言的当，你们心里太清楚了，你们的力量太强大了。

然而，饶勒斯却走得更远。他企图把社会党人利用普选这个斗争方法进行竞选活动与某一社会党人以部长的身份参加受执政的资产阶级操纵的内阁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既然你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能把卡雷特和德洛利分别选进鲁贝和里尔市政府，你们就应该允许米勒兰从资产阶级那里——而你们恰恰必须同这个阶级斗争到最后胜利——分得一点权力。另外，饶勒斯还援引了李卜克内西的话，企图说明，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似乎也反对社会党人进入资产阶级

议会,但是,就在这一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起被选入北德意志联邦议会。饶勒斯提醒你们,李卜克内西本人曾说过:“如果我们不能逾越宣誓这个障碍,我们就不是革命者。”

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若想进入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就必须获得有组织的工人同志的支持,必须利用社会民主党打开的缺口;这样选举产生的议员是本阶级的忠实代理人。诚然,在进入萨克森邦议会时需要进行宣誓,但这类宣誓同甘必大向帝国宣誓一样地可笑,它丝毫不会妨碍你作为一个反对分子,作为人民的一门火炮进入议会……你们是不是敢断定,米勒兰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去年,米勒兰似乎是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打开了政府的缺口。其实,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执政的资产阶级让他进入政府,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否则,他们是不会这么干的。即使没有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也照样可以组阁,甚至可以组织一个比迄今为止已存在了十八个月的政府更加坚定地捍卫共和制的内阁。你们提到了没有社会党人参加的布尔茹瓦内阁。我们认为,布尔茹瓦内阁在共和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现在的内阁更多一些。例如,当时通过的关于继承权的法律并未受到一个有社会党人参加的政府的器重,而且该政府已经抛弃了原先的一部分改革的主张。

同志们,一旦社会党,一旦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从与资产阶级分享政权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和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便将不复存在,无产阶级将永远不可能获得解放,劳动者将变成老样子,也就是说,象二十二年前他们在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号召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那样,他们只是一个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转的、驯服的阶级,只是一个毫无存在价值

的、没有前途的政党。

不管社会党对参加政权的问题持什么态度，茹尔·盖得的论述反映了他本人特有的思想，其意义是无法估量的。盖得强调指出：“1789年的大资产阶级……把旧制度中的好的和坏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全部铲除了。”盖得要求在革命性方面和在造福于人类方面都不亚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只按照本阶级的利益行事，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同全人类的总利益和最终利益相吻合的。”

这里又有两种观点、两种策略、两种方法。盖得只看到无产阶级，他主张，无产阶级作为这样一个阶级必须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故一切均应从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出发。饶勒斯则关心人类社会的整个进程，他希望，作为社会一个组成部分和先锋队的工人阶级投身到这一进程中去。工人阶级没有权利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在盖得看来，无产阶级从事自己的事业，在自身的范围内进行斗争，这就是履行社会的职责，履行全部的社会职责。饶勒斯则要求无产阶级在保持其本色的同时，参加一切领域的斗争。饶勒斯认为，根据以“革命发展”和历史连续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据时间和空间，根据形势发展的趋势和一切阶级目前在某些利益方面的一致性，社会党人参加政权是必要的。

但是，饶勒斯在替自己的观点和策略辩解时，很注意维护社会党的团结。他把个人的观点置于全党的观点之下。他说：

公民们、朋友们，我浪费了你们的许多宝贵时间。但是我仍想在盖得发言之前，补充说明一点。否则，我的讲话将是不完整的，我将因此而感到内疚。我想说，不管产生什么分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进行什么争论，我们社会党人最终仍将会走到一起来的。

我们再次聚会在一起，不是为了争吵和辩论，而是为了在党组织内部进行同志式的真诚讨论，共同寻求最符合社会党

利益的行动方式。有人对党说：“你们应该单独行事，不要参加政府的活动，应该同资产阶级政府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

而我则要说，一切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这是因为新社会在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它的根须就已通过一切缝隙全部地扎入了旧社会的土壤之中。

有一天，考茨基以嘲讽的口吻说：“你们是不是以为，把部长的职位一一拿到手，这就是夺得了国家的政权？这好比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徒以为只要把教廷枢机主教团中的红衣主教的职位一一夺过来，他们就能征服全世界。”

请考茨基不要见怪。异教徒之所以有力量，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独立的宗教思想的大规模反抗之所以有力量，以及后来的改革派之所以有力量，这正是因为他们夺取了旧教会的一部分权力，这正是因为十六世纪的教徒们一度搞不清，红衣主教、主教和教士究竟是忠于教皇的，还是跟路德走的。

教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它清楚地看到，这种渗透是一种威胁，所以为了拯救宗教而建立的耶稣会提出的口号是：向一切地方渗透和决不要被渗透。

多少世纪以来，由于教会一直把新社会的影响拒之门外，所以它才得以生存下来。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却做不到这一点，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它已经让你们渗透到市政府中去了。

现在，人们在议论资产阶级内阁中的社会党部长的职责是什么，而你们选举出来的市议员难道就不担负任何职责吗？

难道市议员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吗？要知道，产生政府的普选制是受资产阶级法律的支配和约束的。

假如我想在辩论中获胜的话，我满可以象你们的一些朋友那样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我同样可以说，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领取救济金的人或者流落街头的工人，即最贫穷的无产者，是无权参加你们所能接受的市政府选举的；我同样可以说，身为市长，社会党人也必须执行许多资产阶级法律条文；我同样可以说，如果你们那里发生暴力行动，市长就不得不动用治安部队，不然，人们会说，社会党怂恿抢劫和杀人。

饶勒斯在理论上坚决主张社会党人参加政权，但他绝不愿为自己谋取一官半职。这种态度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的纯洁的动机和宽广的胸怀。他支持一个总的原则，但反对任何导致社会党分裂的行动，反对使用政客手腕。

第七章

饶勒斯的社会主义观

饶勒斯被认为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本人从未想否认该词的积极意义。他具有伟大和高尚的品格,崇高的情操,心田里充满着激情,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而且十分重视思想的作用。这些都说明,饶勒斯确实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但是,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把饶勒斯的极其复杂的思想,片面地、狭隘地归结为某一流派,这是不公正的。饶勒斯憎恶任何思想枷锁,因为它们使人变得目光短浅,思想僵化。他讨厌一成不变的公式,热衷于广泛地调和各种对立面。

在认识论中,所谓唯心主义者是指那些否定世界存在的人。然而,如同我们指出过的那样,饶勒斯确认感性世界的实在性。在史学领域里,唯心主义者是指那些只根据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的思想和观点,来推论历史事件的人。然而,饶勒斯是一个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泛神论者,反对个人随心所欲地解释人类的命运。

饶勒斯始终忠实于他的一贯原则,即力求事物的统一。他希望把唯心观同社会主义唯物观结合起来。

在同保尔·拉法格就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进行公开辩论时,饶勒斯极力想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妨碍对历史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他可能比某些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更

加了解马克思，因为他直接掌握大量的材料。他不同意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种种曲解；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每个思维现象统统归结为物质分子的简单结合”。

这不是有人说的那种精神唯物主义，即人的每项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肉体的要求和个人的福利。如果你们还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是如何对待英国的功利主义的，如果你们还记得马克思曾用鄙弃和轻蔑的口吻谈到耶利米、边沁这类功利主义理论家——他们鼓吹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地寻求个人利益——你们便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不但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决定的。他在这里指出了社会力量、集体力量、历史力量对个人行为所起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大于个人自私的动机。马克思指出了历史中最基本的东西：经济关系，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某种经济社会的形式，那末社会也就具有相应的性质、相应的生活观和相应的道德观，社会活动也就具有相应的总趋势。马克思还认为，人类的发展不是依据抽象的正义和权利的思想。人类之所以处于运动状态，这是因为生产经济关系在某一历史时期形成的社会制度是不稳定的，必然发生变化，被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一种经济制度取代另一种经济制度，例如奴隶制取代原始生番制，这必然引起政治观、道德观、审美观、科学观和宗教观的相应变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密切、最深刻的因素是经济利益的组织方式。

因此，正义的思想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思想，大脑皮层只能反映生产经济关系；这就是经济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由来。

与唯物主义相对应的唯心主义虽然名目繁多，但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主张这么一种观点：人类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发展方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认识和预感。

早在历史经验产生以前，早在建立这个和那个经济制度以前，人类就对正义和权利有一定的认识。在文明社会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始终在追求这个早已存在的理想。人类的发展不是生产方式的机械和自动的变革，而是受到这一理论明显或不明显的作用。

于是，思想本身变成了指导运动和行动的原则，人的思想不是由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活动仅仅把人类的理想逐步体现在现实生活和历史长河之中。

饶勒斯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庸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因为这些人把马克思的伟大和缜密的社会生活观贬低为某种为了填饱肚皮的社会主义，把错综复杂的生活仅仅归结为物质利益。“马克思指出了社会力量、集体力量、历史力量对个人行为所起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大于个人自私的动机。”饶勒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含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门社会哲学、集体主义哲学，它不是以孤立和自私的个人为出发点，而是以社会组织为出发点。此外，马克思既不象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那样泛泛地研究社会，也不象泰纳那样使个人完全从属于周围的环境。马克思所研究的是历史上特定的、明确划分的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特别是他发现了其中奥秘的资本主义社会。

饶勒斯正确地解释说，马克思不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依据抽象的正义和权利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密切的因素是“经济利益的组织方式”，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更确切的语言来说，是“生产方式”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比个人的物质利益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

个人的物质利益是极其简单明白的：追求更多的财富和实力，从而得到更多的活动手段和更多的享受。但是，生产方式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为了了解生产方式，就必须了解整个“社会力量”的体系，了解历史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了解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政治。

没有比历史唯物观更为复杂的东西了。饶勒斯正确和全面地阐明了这一学说的深刻含义。

历史唯物观和历史唯心观看起来似乎是互相排斥的。但饶勒斯并不这么认为。他指出，“现在人们的头脑里，这两者已经结合在一起，融为一体”。事实上，“现在没有一个唯心主义者认为，事先不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革，便可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另一方面，经济唯物主义者也常常引用正义和权利的思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正义和权利的最高体现”。马克思固然“嘲讽那些一味鼓吹正义思想的人”，但是饶勒斯仍认为可以把历史唯物观和历史唯心观统一起来。他发现，“四个世纪以来，从文艺复兴到现在，整个历史贯穿着矛盾对立的统一和结合”。他把这种力求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做法看成是“整个哲学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标志和特点”。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遇到了一个似乎无法解决的矛盾：顽固的基督精神和复苏的古代精神。古代精神比主张逆来顺受的宗教要好：它崇拜和信奉自然界，而基督精神则谴责和否定自然界。

于是，中世纪留给思想家一笔互相矛盾的精神遗产，他们必须调和和统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似乎更加剧了这一对立。数学和机械学的研究使自然界失去了她的“美的声誉”以及“天定的内在生活的表象”，只剩下一大堆因果关系。笛卡儿把自己禁锢

在意识的范围内(Cogito, ergo sum)^①,以为这样便可以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他又回到有神论那里去了”。后来,他“从信奉上天变为利用基督精神创立积极的实验科学和演绎科学”。

莱布尼茨也想把人和自然结合起来。他指出,任何事物,乃至纯物质力量,例如这张桌子或者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都具有与精神类似的地方;物理定律和化学反应包含着愿望、美感以及某些确切的与和谐的数学关系。这就是宇宙决定论和宇宙自由论的统一。

莱布尼茨一方面断定,世界上任何运动都和其它运动无限地连系在一起。

我的声音在空气中传播是早先发生的一系列运动的结果;而它又将引起无数反应,它将不知不觉地振动这堵墙,通过墙再振动外面的空气,再以我们无法觉察的形式传播开来,任何东西都不能使这一运动停止下来。因此,我们每做一个动作,每移动一粒砂子,都将改变宇宙的平衡。事物之间,运动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普遍的、无穷无尽的。这里不存在任何强制性的力量。当一个球体撞击另一个球体时,另一个球体就产生运动。但是,这一运动的产生是由球体内部结构的弹力规律所决定的;表面上,它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的,实际上它是由于内部原因造成的;事物绝对的连续性和自发性。

斯宾诺莎也同样主张自然界和上帝,客观存在和意识,力量和权利之间的统一。

你们大家都知道,康德认为哲学就是人们在思想上遇到的各种矛盾的综合和归纳。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时间

① 拉丁文:“我思,故我在。”——译者注

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一系列原因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一切事物是否都应服从普遍的和不可动摇的必要性？还是人有一定的活动自由？

人们在这些对立的命题之间，在这些肯定和否定之间寻找答案。

康德的哲学力图解决这些矛盾，即这些基本的对立观点。

至于黑格尔，他提出了完成这一漫长工作的方法。他说，真理寓于矛盾之中：如果你只肯定一个论断，而不同时提出另一个与此相反的论断，那么你就错了，你就是受到狭隘的和可笑的逻辑学的愚弄。在自然界和现实生活里，对立面是互相渗透的；例如，有限和无限是互相渗透的。这个盘子是有限的，它的面积是有限的，但是我可以画在盘面上画出无穷无尽的图案来。因此，假如你说这个盘子是有限的，你只说对一部分；你错了，因为盘子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

这里，再次体现了饶勒斯的基本思想：万物的统一性和渗透性。如果把理性的东西同实在的东西割裂开来，或者“把实在的东西同理性的东西割裂开来”，这都是错误的。有人认为，理想在其实现的过程中日益缩小；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一切理性的东西必然要回到生活中去”。“没有一种理性认识不是现实的反映，也没有一个客观现实不能归结为某种思想和得到理性的解释。”

我们想重复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Alles, was existiert, ist vernuenftig*）。饶勒斯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

我认为没有必要提醒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马克思曾是黑格尔的精神弟子。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的导言中也公开承认这一点（马克思在垂暮之年，又回到他的早期观点；这促使恩格斯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深入研究黑格尔）。马克

思确认阶级的对立，确认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处于交战状态，这便是黑格尔的对立观的绝妙的运用。这一阶级对立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于制造战争和分裂的这个制度，所以它同时又为和平融洽的新社会的建立创造条件。马克思喜欢引用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原话：“和平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战争只是和平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今天的冲突则是明天媾和的开端。”

饶勒斯赞同反映现代思想特点的“对立同一性”。他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看到了这一同一性。马克思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呢？迄今为止，人类被历史的尚未觉悟的力量推动着。人类不能自觉地向前进：虽然人类活动着，而经济的发展则推动它前进。“人类好比是在船上昏睡的旅客，他不参加划船，只是随波逐流；他至少不知道航向。偶而醒来时，他便发觉周围的景色变了。”

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人类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实现，阶级对立一旦消失，人类社会一旦按照公认的需要掌握大型生产资料，人类就将摆脱世代不觉悟的状态，不再盲目地被事物所左右，将进入一个不受事态约束，能主动调节事物发展进程的崭新的时代。但是，在充满光明和具有高度觉悟的新时代到来之前，人类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不觉悟和蒙昧的时期。

假如在历史的洪荒时代，人类就想有意识地调节事物发展的进程，这只会阻碍事物的发展，白白浪费未来的资源。过早地进行有意识的活动，这反倒会使人丧失将来进行有意识活动的手段。假如在婴儿的生理器官和智力尚未发育健全之前，就要求他思考问题和从事有意识的活动，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必将是一个头脑迟钝的白痴。

饶勒斯考虑“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是否能够和应该进一步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把经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结合起来。”

饶勒斯不愿机械地和人为地进行这种结合。但他也不愿把唯物观同唯心观完全割裂开来。他主张，“两者应该互相渗透，就象人的大脑的机械运动和意识的自发性互相渗透一样。”

我认为，大脑的任何运动都是明显或不明显地与某一意识相适应的；而任何意识也都是与大脑运动相适应的。假如我们打开脑颅，观察其中互相制约、互相关联的极其细腻的活动，我们便可通过生理现象看到思想、观念和意愿等心理活动。这对矛盾是在我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通过生命来加以解决的。

我们现在的思想是由我们过去的思想决定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现在的思想同时又是由将来才能实现的愿望和目的引起的。因此，“我现在的思想既是由过去一系列的思想决定的，又是由将来的思想引起的。”

大脑的生理活动和机械活动则不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现在只是由过去决定的。

人们会说，我们大脑活动的方式和我们的观念、思想和自觉发展的方式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矛盾。

尽管两种方式，两种观点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它们已经结合和统一了。我们每一个思想都与某一大脑运动相适应，而大脑的每一个运动都至少与某一初步的思想相适应。

历史也是如此。人们可以“用单纯的经济发展”来解释历史现象，但也可以用“人对更高生活形式的经常性要求”来解释。为此，饶勒斯不得不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进一步的说明：

马克思说：“人的头脑不会自发地产生权利思想，否则这

种思想将是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人类的全部生活，甚至包括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在内，只是经济现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

我同意这一观点。是的，在人类的精神、道德、宗教生活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头脑里只有经济现象的反映。但是，既然同时存在着人的头脑，那么在头脑中必定有事先形成的观念。

人类是长期生理演变的结果，而这一演变要早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是由低级动物演变而成的，在人类祖先的头脑里就已经产生原始的要求和倾向。

这些倾向是什么呢？这就是审美观和道德观方面的“无私的感觉”。低级动物的视觉和听觉很不发达。随着感官日益向高级阶段发展，“动物对宇宙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生存斗争的形式”。这就产生了欲望和快感，产生了追求绚丽的色彩和悦耳的音调的倾向。“动物把宇宙看成是主宰一切的国王”。

除了审美能力之外，猿人还能“从个性中找出共性，从千差万别的个体中找出世代遗传的相似之处”。总之，猿人已具有推理的能力。

猿人发现了周围同类。同情的本能在他身上苏醒了。他觉察和揣测到其它同类的欢乐和痛苦。“从生命开始之日起，人除了赤裸裸的私利之外，还具有同情心。这是人类和睦相处的基础”。

最后，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可称为统一的精神。人生来就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因为形而上学的实质是寻求一切事物和一切规律的完全统一。随着“互相寄寓的思想”不断深化，反映思想的“词汇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样便产生了语言。

饶勒斯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即后来的发展只是经济现象在大脑中的反映。但是，他要求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大脑的基本力量通

过美感、同情心和对统一性的需要，作用于经济生活。

我再次提请你们注意，我并未把智力同经济力量简单地并列在一起；我无意把我们的朋友加布里埃尔·德维尔在几个月前费了很大气力才分清的各种历史因素重新搅混。不，我不想这么做。不过，我认为，经济现象在反映到人的大脑里时，不可能不引起我刚才分析的原始本能的活动。我不能同意马克思关于宗教、政治、道德观念只是经济现象的反映的说法，因为在人的身上，思想和经济环境是互相渗透的，不可能把经济生活同精神生活截然分开。若要使两者处于隶属关系，那就必须首先把它们分开。但是，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把人一劈两半，分为肌体和意识两部分；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历史上的人类一劈两半，分为理想生活和经济生活两部分。古希腊哲学家部分地论证了我的这个观点。

希腊人把经济现象和自然现象结合在同一个思想里。赫拉克利特所用的Kosmos(宇宙)一词，既指通过对立调和形式的世界秩序，又指通过派别调和形式的区域性秩序。“希腊思想家一眼就从混沌的社会中抓住了世界秩序。”

尔后，饶勒斯试图用目的论来批判似乎在否定事物的终结和事物的发展的历史唯物观。

光指出一种生产形式代替另一种生产形式是不够的；光指出奴隶制代替原始生番制，农奴制代替奴隶制，雇佣制代替农奴制以及集体制或共产制代替雇佣制，这是不够的。光指出这一点是不行的，必须进一步表态。这里究竟有没有发展和进步？如果有的话，那么衡量人类发展形式的决定性思想又是什么？倘若有人认为这种发展的观点过于形而上学，那么试问，为什么历史不按照另一种方式发展，而偏偏按照现在的方式发展：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从一个经济阶段到另

一个经济阶段，从原始生番制到奴隶制，从奴隶制到农奴制，从农奴制到雇佣制，又从雇佣制到社会主义制？什么力量——我不承认天命，因我始终坚持积极的历史唯物观——推动历史朝着这样的方向，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发展？

假如你象饶勒斯那样承认“人具有人的作用”，即承认人的基本力量的作用：美感、同情心和智慧，你就会觉得道理很简单。生产经济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矛盾和对抗是必然的。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指出了硬把人当作毫无生气的工具的专横制度的脆弱性，因为“谁都不愿沦为毫无生气的机器”（黑格尔）。饶勒斯始终忠于唯心的、人道的和客观的方法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由人的本性产生的矛盾上面，而不象马克思那样把注意力集中在由互相斗争的社会力量的性质产生的矛盾上面。作为动物的人反对机器人。人身上的力量自动地抵制盲目的机械力量对人的贬低。原始生番制本身具有矛盾，因为吃人是和人的同情本能水火不相容的。奴隶制对这一基本本能的伤害则要轻一些。农奴制和雇佣制也是如此。因此，一切历史运动都来源于“人和对人的使用这对基本矛盾。”按照饶勒斯的思想，历史的基本矛盾是有生命的人和遭到非人道压迫的、被当作机器的人之间的矛盾。

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反对这种关于社会发展过程的新观点，因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有其独到之处。马克思在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时指出，无产者是机器的“附属品”，是用于创造最大剩余价值的机器人。他引用亚里斯多德的话说，古代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

马克思并不否定人及其全部机能。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笼统和深奥莫测，对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作用不大。饶勒斯所说的人的机能是确定无疑的。人一直在有效地发挥

其机能的作用。但是，这些固有的机能并不能解释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的历史。为什么原始生番制被奴隶制取代，奴隶制被农奴制取代，农奴制又被雇佣制取代？人们可以说，这是美感、同情心以及智慧的积聚和发展造成的。但这一积聚又该如何解释呢？特别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历史演变过程又该如何解释呢？

饶勒斯把历史学和社会学包括在一个哲学体系中，这无疑是正确的。应该全面地考虑问题，不能放过任何细小的真理。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人的一切作用。我们应该研究人的机能的性质、用途、影响和发展。

但是，马克思的方法无疑能够更为有效地解释社会发生的变革。饶勒斯赞同并且在其历史著作中杰出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借助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和经济现象中的一系列具体的力量。这些力量揭开了许多历史“谜底”，为我们提供了预测未来的可靠手段，而且常常成为我们的行动准则。

饶勒斯对事物一向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他承认，马克思没有否定人的因素，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一因素。饶勒斯说：

马克思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不是也把理想、进步和权利的概念包括在他的历史观里吗？他不仅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而且还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将不再有使人类饱受痛苦的阶级对立。他宣布，人类将第一次获得广阔的和自由的生活天地，全体劳动人民将既具有工人的敏捷头脑，又具有农民的强壮体魄，人类将幸福地生活，巍峨地屹立在获得新生的大地上。

这不是等于承认，正义这个词在历史唯物观中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吗？这样，我向你们提出的调和的观点不是也能为你所接受吗？

其实，饶勒斯满可以用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下面是章程中的一段话：

“1866年9月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宣布，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之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①

饶勒斯把这一调和精神贯彻在实际行动中。他把改良行动和革命行动，议会活动和工会活动结合起来。总之，他把发展和革命结合起来。饶勒斯希望建立完整、全面、普遍和人道的社会主义。

饶勒斯的调和的观点受到法国工人党，即通常所说的“盖得派”的抵制和反对。在社会主义者尚未实现联合之前，这种反对尤为激烈。饶勒斯不喜欢进行辩论。他讨厌一切不是积极的和创造性的行动。但是，在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内阁执政期间，他不得不为主张与共和党人合作的策略辩护。他用很有分寸的措词阐明了这一策略的主导思想，并且利用里尔市的选举结果来批驳“盖得派”提出的策略。

毋庸置疑，法国工人党在里尔市和北方地区深深陷入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关于社会的发展，党内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策略。在里尔市，法国工人党在很短时间内交替采用两种策略。由于这两者是无法调和的，结果它们互相抵消，并使工人党本身处于瘫痪状态。

一方面，法国工人党从最狭隘的定义出发，解释阶级斗争。这样的解释曾遭到了马克思毫不含糊的批驳。该党轻易地宣布，除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之外，其它一切社会力量都是反动的一帮。他们故意抹杀各阶级之间的差异和各政党之间的

^① 见沙尔·拉波波尔的《历史知识小谈》，《社会主义百科》第一卷。

差异。法国工人党在反动派、温和派和激进社会党人之间划等号，把他们统统缝在一个口袋里。他们断言，工人根本不需要把僧侣同民主主义者的极左派区别开来。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某些关于社会进步的提法颇能笼络人心，所以应该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这就是法国工人党在里尔市第一轮竞选中采取的观点和策略。

但是，法国工人党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和策略。北方工人中参加法国工人党的社会主义者尽管在表面上装出毫不妥协地坚持阶级立场的样子，实际上他们是坚定的共和派、民主派和反僧侣派。他们懂得，至少法国的共和制是得到法国人民支持的，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条件。他们也感到，共和制是社会主义的开始，是集体主义的政治形式。他们是民主派：他们强烈主张政治权利的平等，赞同普选制和要求人民在各市、各委员会和议会中享有自主权。他们要求剥夺教会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特权，取消教会每年的俸禄。他们要求把教会势力从一切公用事业部门、教育部门和社会救济部门中清除出去，使教会变成一个私人性质的协会，直至随着人们文化知识的丰富，世俗公共教育的影响的扩大和被压迫者社会地位的提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身上的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逐步枯竭为止。

因为他们是共和派、民主派和反僧侣派，所以他们同那些维护共和制、主张发扬民主和反对教会特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他们必然把支持共和制、民主和自由考试的政党同反对这些东西的政党区别开来。这就是法国工人党的第二种观点。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这一观点：由于激进党人的支持，他们在里尔市政府选举中最终获得了胜利。第二轮竞选时，他们打出共和的旗号，把在第一轮竞选

中处于少数地位的激进党人的选票争取了过来。法国工人在波尔多市大讲“共和派的团结”。他们又在里尔市的第二轮选举中求助于真正的共和党人。这种团结意味什么呢？他们凭什么权利求助于共和党人呢？

饶勒斯指出，那种认为“一切社会力量只是反动的一帮”的观点曾遭到马克思的毫不含糊的批驳。事实确实如此。这一观点经常在拉萨尔的头脑里作祟，它对拉萨尔的继承人施韦泽的思想所起的影响尤其明显。倍倍尔指责施韦泽替反动派和俾斯麦效劳，这决不是没有道理的。与此相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有时应该支持“他们的敌人的敌人”，支持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马克思在一封《关于德国社会党人团结的信》中驳斥了拉萨尔的观点。

饶勒斯知道，作为“盖得主义”的主力军的北方无产阶级是坚定的共和派和民主派。如同德洛里在图卢兹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他们一贯支持共和党人和反对反动派。饶勒斯指出，北方社会主义者采取的策略同茹尔·盖得的思想确实是矛盾的，后者把共和党人和反动派混为一谈。

假如共和党人和反动派果真是一丘之貉，社会党人就应该采取相应的策略。

试问，法国工人党根据什么原则，在第二轮竞选时求助于激进共和党人？法国工人党曾经说过，混在敌人阵营里的激进共和党人是很难辨认的。那末，工人党现在又是如何把激进共和党区分出来的呢？为了把激进共和党人纠集在自己的周围，法国工人党打出什么样的旗号呢？他们对激进共和党人说：“你们是共和派和民主派，我们也是共和派和民主派，因此你们应该投票支持我们。”但是，激进党人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只有在消除阶级对立之后，才会投票支持社会党人。他

们只有在脱离反动营垒之后才会这样做。他们只有在确认投票支持共和党人或社会党人要比支持非共和党人或资产阶级更为有利的时候，才会这样做。因此，向他们发出呼吁的社会主义者设想，资产阶级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设想，至少在一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身上，阶级对立的情绪最终将被团结起来的共和与民主力量克服，而不管这种情绪原先是多么强烈。要么法国工人党在第二轮竞选时发出的呼吁是毫无意义的，要么这一呼吁包含了上述意思。这同第一轮竞选中的那种毫不妥协的态度截然相反。

不过，对于饶勒斯来说，竞选是一个次要问题。他所关心的是一个比竞选不知要严重多少倍的问题：改革。

工人阶级希望改革。我这里指的是迫在眉睫的改革。工人阶级之所以需要改革，这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为了不至于被重担压垮，为了更坚定地朝着未来前进。他们需要救济法，需要保护他们的劳动力，需要法律把每日劳动时间限定在人道的范围之内，需要把工厂雇佣童工的年龄提高，使儿童得到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他们需要让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劳动拥有更大的监督权。他们需要加强工会的合法社会地位，使工会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权利。他们需要建立各种社会保险制度——疾病保险，老年保险，伤残保险，失业保险。他们需要作为一个阶级在经济力量和占有制方面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假如在铁路、矿山等资本主义部门实行国有化，工会以及大型行会组织就可以同国家一起管理和监督新的公共事业部门，这将给工人阶级带来莫大好处。假如工人阶级通过其工会正式参加到大工业和大商业掌握的六千家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中去，这将给工人阶级带来莫大好处。假如工会组织在每一个企业中合法地拥有一定数量的股票，这也将给工人阶级带

来莫大好处。无产阶级将慢慢地渗入到资本主义的肝脏，新社会将以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发展”的势不可挡的力量从旧社会里脱胎而出。

法国工人党不是不懂得改革的意义，尽管该党的领导人茹尔·盖得有时在激烈的舌战中脱口说出一些反对改革的尖刻的话。盖得的法国工人党是当时法国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它要求并且接受一切改革，甚至包括那些“小改小革”。但是，工人党——在这方面，它无疑是对的——不同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用改良来代替一切纯社会主义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换句话说，它“赞成改革，但反对改良主义”。

相反，饶勒斯则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思想从各方面向资本主义社会渗透的办法，冲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桎梏。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饶勒斯的关于万物的统一性、连续性和渗透性的基本思想。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延伸。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充分的改革，这就能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工人阶级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赞同目前处于少数地位的社会党所提出的各项改革，社会主义就能逐步地建立起来。”

十九世纪末年，饶勒斯极力反对布朗基主义的革命观。由于他精通马克思的著作，故很容易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那里找到关于革命发展的观点的论述。

人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在1850年前夕曾同维利希—沙佩尔的德国革命派别进行过斗争。这些人企图按照布朗基的那一套，采取注定要失败的暴动和阴谋活动。马克思对他们说：“正当我们把德国工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德国无产阶级的畸形状态上来的时候，你们却极力阿谀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行会偏见，这样做无疑更得人心。正象民主党人把‘人民’这个词变成神圣的东西一样，

你们现在也把‘无产阶级’这个词变成神圣的东西。你们和他们一样用革命的词句代替革命发展。

马克思还指责那些念念不忘 1848 年革命运动所取得的部分胜利并想继续那么干的革命者：“少数派（指维利希—沙佩尔式的革命者——作者注）提出教条主义的观点代替批判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的解释代替唯物主义的解释。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们说：‘不但为了改变现存关系，而且为了改变你们自己，使你们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不得不再经历 15 年、20 年、50 年的内战以及同其它国家的战争。’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觉。’”

以上那些话是马克思在 1850 年说的。社会主义新学派的创始人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反对任何革命冒险，反对任何过早地动员尚未觉悟和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进行起义的做法。马克思天才地一眼就看到了全部社会现象。他等待事物的推动力和人的革命主动性互相结合。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应该先于革命，以便使革命获得最大效果。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发展显然不是要用发展代替革命，以致使革命变得毫无意义。不，他只想使革命变得更为有效。他要求在正常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因为只有依靠事物的发展，才能保证革命取得成功。暴力革命固然重要，但它只能是发展的结果。

饶勒斯无意中夸大了马克思的意思，他把马克思说成是单纯的发展论者。但是，饶勒斯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反对一味主张“动刀动枪”的唯起义论者，这显然是正确的。他说：

总而言之，西欧各国的民主发展方式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压迫势力进行武装干涉的障碍。这些国家的民主制的建立不是采取突然爆发的形式。社会主义取代民主制也不应采取那

种形式。使英国在 1860 年至 1885 年基本建立普选制的法律与革命一样深刻。但是,除了有识之士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一法律的确切意义。它好比一支默默绽开的花朵。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国家生活和政府活动中所起的新作用也相当于一场平静的革命;这是又一场 risorgimento^①。法国无产阶级在各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同样如此。沙皇政府可以阻挠和削弱这样的运动。它可以施展精明、圆滑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手腕来保护自己。但是它再也不能阻挡各国人民要求民主的潮流,再也不能阻挡民主国家中工人阶级队伍的蓬勃发展。

马克思认为,在欧洲工人阶级真正能够进行统治之前,就应该铲除这个障碍。尽管它还没有被彻底粉碎,但已经被削弱或绕开了。克里米亚战争削弱了这个障碍,使俄国贵族阶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而使意大利民族在四年之后,即从 1859 年起,开始复兴。历史巧妙地打消了沙皇政府的满腹狐疑,使德国民主制得以在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下开始萌芽。这样,障碍就被绕开了。此外,俄国工人阶级和自由派的日益壮大,使这一障碍就地受到破坏。最后,由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它们在欧洲各国的兴起并未引起战争危机——这一障碍完全被撇在一边,再也不能起什么作用了。

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继承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它完全符合饶勒斯本人的思想和哲学观。因此,尽管饶勒斯在思想上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但他仍不失为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比“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名正言顺的代表更加注重现实,因为这些人只知道照搬马克思的话,往往并不理解其中的

① 意大利文,文艺复兴。——译者注

真实和深刻的含义。

饶勒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根据历史的经验，反对布朗基关于制造革命的“少数实干家”的理论：

这些叫做革命的重大的社会现象不可能或者不再可能是少数人的事。少数革命者，不管他们多么聪明和热情，不可能单独地完成革命，至少在现代社会里是这样。他们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历史上可能曾出现过这样的时期和国家——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大多数人处于消极和软弱的地位，而某些个人或集团则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摆布大多数人。但是，自从现代国家诞生以来，自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来，几乎每个人都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几乎每个人对现在和将来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爱好和观点。因此，在现代欧洲各国，许多年来，每个人都是力量、思想和行动的中心。由于处在古代社会联系逐渐消失的变革时期，人的力量是相等的，故势必实行由大多数人决定事情的这一法则。只有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要求或者同意进行重大变革时，社会才有可能采取新的形式。

1788年的革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爆发和取得成果，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或者说几乎全国所有的人都要求革命。与城乡中属于第三等级的人相比，特权者、高级僧侣和贵族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只是沧海中的一粟：他们只有二十万人，而属于第三等级的人则有二千四百万，比例为1:100。况且，僧侣阶级和贵族阶级内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有些特权，就连特权阶级自己都不想去维护。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和权利产生了怀疑，只好听天由命。朝廷为了摆脱困境，被迫召开它所害怕的三级会议。

我在《社会革命》一文中（《社会主义百科》第四卷——作者注），曾从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出发，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是由大多数人创造的。“少数实干家”是有用的，也是必需的，但他们应该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应该获得大多数人的公开或不公开的支持。少数人也能够出其不意地获胜。但是少数人搞的革命迟早会被大多数人断送。这就是靠少数人进行的1793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公社革命失败的原因。饶勒斯十分正确地指出，“7月14日”革命和“8月10日”起义^①虽然在表面上是依靠少数人的力量进行的，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少数人的意志强加给整个国家”。整个法兰西都为7月14日的胜利欢呼。整个法兰西都赞同8月10日的决定。使用武力是为了“有力地捍卫大多数人”。共和制在1792年取得的胜利是“符合一般人的意愿的”。

饶勒斯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

可以完全肯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不能只靠少数勇敢分子的努力或他们的出其不意的行动，而应依靠绝大多数公民的鲜明的和一致的意愿。如果不顾大多数公民的要求，只想凭运气或靠事情的偶然性行事，那就等于放弃改造社会秩序的努力。

为了证明他的论断，饶勒斯引用了李卜克内西的一段很有份量的讲话，这些话清楚地反映了饶勒斯本人的思想。

我们不应该问：你是不是雇佣工人？而应该问：你是不是社会主义者？

光靠雇佣工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胜利的。只有当全体

^① 1792年8月10日，法国人民在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号召下举行起义。立法议会被迫废黜路易十六，解散议会，宣布按普选原则选举国民公会。——译者注

劳动人民以及全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精华都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才有成功的把握。

为什么我们现在遭受我们的朋友们所遭受的那种迫害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受到如此粗暴的待遇呢？

因为我们的力量太弱小。

我们的力量为什么弱小呢？

因为人民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社会主义的学说。

既然我们的力量尚很弱小，我们怎么可以把那些由于偶然的原因暂不属于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千上万的人拒之于门外，从而更加削弱我们的力量呢？如果谁干出这种蠢事，那就是对党的背叛。

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不能缩小，只能扩大。我们必须日益扩大社会主义的圈子，甚至应该把我们对手中的大部分人变为我们的朋友，或者起码应该解除他们的武装，使他们不能用来伤害我们。

在平时，这一群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的人在政治杠杆上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一旦发生动乱，他们就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目标和性质，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从而使他们无法变成“咬人的疯狗”。

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予以支持的每项法律措施必须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证明社会主义是能够为人们的共同利益服务的，以便消除对我们的常有的偏见。饶勒斯在评论李卜克内西的这段话时说：

这里，李卜克内西试想了一个立法时期。在这期间，社会党人应该表现出——如果可以这么说——巨大的谅解，使得头脑最糊涂的人也明白，社会党是一个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的政党；社会党人应该使一切有识之士，一切最有觉悟的人以及

整个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慢慢熟悉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想，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和放心地跟着社会党走到底。为此，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作为对口头宣传的一种补充。

饶勒斯用李卜克内西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来加以概括：“社会民主党是全体人民的政党，但不包括二十万大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和神父。”

这么说可能会引起误解。社会党不只是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党派。它是以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然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同全国大多数人的永久性利益一致的。无产阶级同样是民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权利，无产阶级自己则无法生存下去，也无法建立自己的组织。此外，无产阶级还是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最坚决的战士，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因为他们不占有任何财产，同现在的社会不发生任何有机的联系。

把社会主义变成众人的事情，这是正确的，这对人们的眼前和长远利益都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是，倘若把这一观点立即运用于所有的问题，那便会引起混乱，无产阶级精神就会因此而衰退，小资产阶级精神将乘虚而入，而小资产阶级精神恰恰是时运不佳的小所有者所处的极不稳定的经济地位的反映。小资产阶级虽然不喜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营私舞弊的现象，但假如这一社会针对大资本在国内外进行的激烈竞争，采取一些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保护主义措施，或者向有巨额收入的人征收较高的所得税，以部分地满足小资产阶级的私利，那么，小资产阶级便会安于这样的社会。

饶勒斯极力主张社会党吸收一切反对寡头所有制的人，既吸收无产阶级，又吸收小资产阶级。他希望通过事物本身的发展和

强有力的宣传来打开小资产阶级的狭窄的眼界。小资产阶级老是担心两件事：一怕丧失表面上的经济独立，二怕跟着革命无产阶级一起倒霉。

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缩小”了社会党的干部队伍，而饶勒斯则希望扩大这一队伍。但是，假如我们无限地扩大我们的干部队伍，我们将有丧失我们的中坚力量或依靠力量的危险——革命的无产阶级，我们将可能重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覆辙。

如果饶勒斯有时引用马克思或李卜克内西的话，这不是为了使他提出的关于发展和改革的策略具有某种革命权威性，不是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毫不妥协的人。饶勒斯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最讨厌那种伪装的人。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引用这些精辟的话，决不是为了使提出的社会党政策具有某种革命权威性。假如我们大家在党内不能畅所欲言，那我们的社会党就太可悲、太糟糕了。

不，当我们同无产阶级一起光明正大地寻求一条最宽广、最灿烂和最平坦的捷径时，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权威和保护。

老实说，李卜克内西的这些崇高的和切实可行的想法，由于受到许多不同的或者完全对立的观点的反对和诋毁，故没有发挥其积极的和主要的作用。我认为，现在是进行认真思考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把李卜克内西的思想变为我们政策和思想的精髓和基础，而不应该把它们作为漂亮的装饰品。我认为，假如社会党能把这些伟大的思想贯彻到向共产主义这个明确目标稳步前进的具体纲领中去，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一般性的空洞提法；假如社会党既能高瞻远瞩，又能脚踏实地地工作，既有高昂的斗志，又热爱和平，既坚定地反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又能有步骤地去推翻这一制度并对人采取和解的态度；那么，真正的社会革命将提前半个世纪到来。这将是一

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人们内心要求的革命，而决不是停留在空洞言辞上的革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将不同于充满仇恨和血腥味的资产阶级革命。

饶勒斯显然已经感觉到，主张包括受到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过去遗留下来的政治和宗教残余势力的苦楚的——不管他们受苦的程度如何——一切政党和一切个人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将导致混乱的危险。

为了反对这一危险性，饶勒斯依靠三件东西：进行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宣传；组织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党，尽管它们之间有时也进行合作；同纯粹的工人组织建立密切的同盟关系。

饶勒斯总是用最精辟、最透彻的语言来阐明社会主义的理想，消除了人们头脑中的种种糊涂观点。他关于最终目标的一段极其精彩的论述便是一个例子。尽管该文章发表在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社会党的日报上，但丝毫没有平庸的粗俗的味道。现特地转抄如下：

向所有的人说明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性质，以便澄清由我们的敌人和我们自己造成的种种误解，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成功的首要条件。

社会主义思想是明确的和崇高的。我们看到，现存的所有制形式把今天的社会分成了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为了生存，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他们的才能，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交纳某种形式的押金。社会上有很多人，很多公民不占有任何财产。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谋生。但是，为了从事劳动，他们需要昂贵的工具、原料和资金。然而他们手中并没有这一切，于是只好甘受另一个掌握了生产资料、土地、矿山、机器、原料和资金的阶级的支配。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自然就利用手中的这一切，强迫无产阶级交纳大笔押金。但是，资产

阶级并不满足于收回原来的贷款以及工具的折旧费，他们年复一年地大肆敲诈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田租、地租、城市中的房租、公债、股票证券、工业盈利和商业盈利等。

因此，在今天的社会里，无产阶级的劳动不是全部归他们自己所有。由于在我们这个以紧张繁重的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经济活动是人的基本职能，由于劳动是人的特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无产阶级的本身也不是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一部分活动，也就是说一部分存在，转让给了另外一个阶级。人的权利在他们的身上是不完全的 和毫无意义的。在他们的全部生命活动中，处处是这种权利的限制和人身身的转让。他们除了每天在工厂、矿山和工地上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创造利润外，还得为全家所住的简陋和拥挤不堪的房子交纳租金。同时，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向他们征收税赋。从他们的已经打过两次折扣的工资中再扣除一部分钱。国家拿了这笔钱不光是为了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而且还为了支付替资产阶级服务的庞大的行政费用，或者为了维持一支庞大的、毫无益处的军队。由于缺乏资金和时间，无产者只好用经过层层克扣后剩下的工资向零售商购买生活必需品；这样，他们将受到多如牛毛的中间商的盘剥。他们或者向大商店和大市场购买商品，那么，除了负担商品生产和批发的直接费用之外，他们还要付给大商业资本家10—20%的利润。在封建时代，大路上布满关卡，行人几乎每走一步，都要交纳通行税。同样，资本在无产阶级的生活道路上，也处处设置那种封建关卡。无产者在劳动、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要受到资产阶级的敲诈勒索。

无产阶级不但在生活上受到剥削，而且被剥夺了自由。为了保证劳动者享有真正的自由，必须让他们参加生产的管理，

让他们参加车间的经济管理，就象他们通过普选参加市政管理一样。但是，无产阶级在资本组织生产的过程中，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他们无权决定应该做哪一项工作和如何使用现有的能力。由无产阶级创造的资本事先根本不征求无产阶级的意见，往往背着无产阶级就决定兴建或关闭某一企业。无产阶级只是替资本主义制度干活的小工，只需执行由资本独自制定的计划。资本想兴建什么工程，就让无产阶级在资本选派的人的领导下，去完成该项工程。劳动者既无权参与制定生产目标，又无权参与调节生产的权威性领导机构。这就是说，劳动具有双重的奴役性，因为无产阶级必须按照并不符合他们意愿的目的和使用并不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方法，来从事生产。剥削工人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制度践踏了劳动者的自由。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他们的人格被贬低。

饶勒斯不断阐述、解释和论证我们的最终目标：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他一向很注意不要滑到伯恩斯坦之流的谬论上去：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饶勒斯的社会主义观的特点首先是他的唯心主义推论。饶勒斯不是根据经济发展来推断社会主义的。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思想的体现：权利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内容，或者说它的目标是属于经济范畴的；而社会主义的形式，或者说它的灵魂是属于精神范畴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获得正常成果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建立起来的全面民主，就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人权和公民权。

由于饶勒斯运用这种方法推断出社会主义，故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了解并经常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对立和互相斗争的阶级是产生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在其内部为社会革命

准备了技术条件,物质条件,生产力以及人的条件,即有觉悟的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他们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社会革命是从资本主义“工厂”中制造出来的。饶勒斯则想通过立法议会实现这一革命。

饶勒斯并不否认最终目标。但他想通过以普选制和立法权为主要武器的民主“运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作为对议会的一种压力,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说,饶勒斯是个道道地地的合法论者和演变论者。他同意阶级策略,但只把它作为临时的手段。他说:只有国家才能向一切人提供自由发展的手段。孤立的、有限的和临时性的组织能够在一段时间里,保护数目有限的个人。只有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才能保障所有人的权利——不但是现在活着的人,而且是子孙万代的权利(1901年)。饶勒斯并不要求把个人自由奉献给国家这个偶像。他说:“对我们来说,社会权利,国家权利只是所有人的权利的‘轨迹’。”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对人类权利的侵犯,而社会主义则是人类的真正的复兴。不要以为,使用“正义”一词是幼稚可笑的;也不要以为,正义是十足形而上学的和可以任意解释的一种观念;更不要以为,暴君们能用这块极其普通的绯红色的料子替自己缝一件袍子。“不,正义这个词具有越来越明确和广泛的含义。”人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正义对于饶勒斯已经不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事实。但是,“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建立起社会主义之后,人类才能是尽善尽美的。”

可以说,人类社会事先已经绘制出来。社会主义只需完成和实现这一社会。这是柏拉图或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是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典型代表。但他也谈到,一种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便能变成物质力量。不过,马克思指的是被一定阶级所掌握的具体的思想:被工人阶级所掌握的社会主义思想。而饶勒斯则不愿割断思想的连续性。他从旧思想那里借用

“正义”一词，力求通过社会主义实现正义的思想。这再次说明，饶勒斯主要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在 1901 年写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体现人权宣言的全部含义，才能实现人类的全部权利。”

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人权宣言只不过是革命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表现。革命的存在先于思想。对于饶勒斯来说，思想先于存在，“先知先觉”的柏拉图就是一个例子。“生活丝毫没有抹杀过去：它使过去服从于自己。革命不是决裂，而是征服。”（1901年）

因此，共产主义的根须已伸入资产阶级的革命权利，已伸入关于人权和生存权利的宣言。但是，假如没有无产阶级从外部给予的强大的作用力，关于权利和人道的思想的内在逻辑将永远处于休眠状态。无产阶级从革命一开始就参加进来了。他们根本不理睬马拉一伙的荒谬的阶级劝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攻打巴士底？”无产阶级照直前进，发动攻击；他们在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起着决定胜负的作用。为了拯救革命，他们开赴边境，与国内外的敌人同时作战。他们成为一支必不可少的力量；他们在接连不断的战斗中得到了奖赏：他们花了三年时间，即从 1789 年到 1792 年，把一个半民主、半资产阶级制度改变成单纯的民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无产阶级的行动有时处于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在发挥自己力量的过程中，产生了自信心。正如巴贝夫所说的那样，当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后，无产阶级就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为全体人民谋福利。

这样，由于无产阶级的行动，共产主义不再是哲学家们的空洞理论，而是一个政党，一支活生生的力量。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在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诞生了：权利思想和新兴无产阶级的行动。因此，社会主义不再是抽象的遐想，它从炽热沸腾的现代生活中喷薄而出。

饶勒斯主义并不否定为正义斗争的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这是饶勒斯与他主张改良社会主义的老朋友(米勒兰、维维安尼和布里安)所不同的地方。饶勒斯没有摒弃无产阶级,他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和乌托邦式的学说。社会主义处于运动状态,它在整个现实生活中向前发展。它是一支生气勃勃的伟大力量,同生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不久就能主宰生活。与局部、零碎地实现正义和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反,社会主义将全面地和决定性地实现人权。针对资本主义支离破碎地、狭隘地和杂乱无章地组织财富生产,社会主义提出同心协力共同创造财富的思想,主张通过大家团结一致的努力更好地发挥每一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辛辣地嘲讽和一针见血地剖析了资产阶级在课税剥削和垄断剥削中集中暴露出来的那种冷漠无情的傲慢和利己主义。社会主义以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和阶级组织来反对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

饶勒斯认为,激进党人试图以一个含混不清的竞选口号:“维护个人所有制”,来回答急待解决的巨大问题,这简直是他们在智力方面的耻辱。尤其使饶勒斯感到恼火的是,激进党人并不理解他们自己提出的,并且已经写入人权宣言的一般原则。饶勒斯觉得,与其说人权宣言符合激进党人的资产阶级性质,倒不如说激进党人背叛了资产阶级的原则。这是唯心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

饶勒斯在其一系列杰出的论文中,轻而易举地论证了“个人所有制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后来,沙尔·佩居伊把这些文章收集在《社会主义行动》一书里(1901年出版)。

所有制的形式和财产的主人经常变换。国家特别擅长破坏财

产所有权。它不但利用，而且滥用这一权利。奴隶制是一种个人所有制形式，它被另一种所有制形式——农奴制所代替。接着，农奴制也消灭了。现在的所有制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但它被一整套课税制度弄得残缺不全，苛捐杂税把个人财产部分或全部地侵吞了。

资产阶级革命把所有制当作可以任意揉捏的面团。饶勒斯淋漓尽致地勾划出资产阶级革命史中的社会部分：

萨尼亚克在他的巨著《法国革命的民法》中写道：“革命党人在加强了所有制之后，却又在削弱它。个人完全有权任意支配自己的财产，这是人们的终身权利，但是它不应该危及家庭和社会。个人之上存在着天然形成的和人为组织的集团——家庭和国家。它们的利益不容侵犯，故立法者必须制定出有利于家庭和国家的财产转让法。”

督政期间制定的民法使人感到，它在继承权的问题上，有点缩手缩脚。制宪议会，立法议会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时，米拉波、佩蒂翁和特龙歇曾提出相当大胆的建议，但是最后均未被采纳。国民公会当时的立法机构，因此我在《社会主义史》一书中专门写了《国民公会》这一卷，详尽地叙述和批判性地剖析了这一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公会仅仅把大革命中各届议会提出的原则变成法律条文，而这些法律条文不光缩小了个人的所有权：它们几乎完全取消了这一权利。

现在，如果家庭中有一个孩子，父亲便有权支配一半财产；如果有二个孩子，他可支配三分之一的财产；如果有三个孩子，那他只能支配四分之一的财产。父亲可以把他有支配的那部分财产分给其中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可比其它的兄弟姐妹得到更多的财产。但是，国民公会在1793年3

月 7 日颁布的法令中规定：“任何人都无权处理自己的财产，不管他是否去世或健在，也不管他是否已经立下字据和遗嘱。他的子女必须分得数目相同的财产。”父亲不能偏袒某一个儿子，祖父不能偏袒某一个孙子。这样一来，直接处理财产的权利被完全取消了。对于子女来说，长辈的个人意愿丝毫不能影响财产的分配。长辈不但不能出于偏心，把自己有权支配的那部分财产单独留给某一个孩子，而且他也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可以支配，因为根据国民公会 1793 年颁布的法律，一个人若有子女的话，他有权支配的不是全部财产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而只能是十分之一。

由此可见，饶勒斯的唯心主义对经济现实有极其深刻的了解。不过，指出他的方法的主要特征，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饶勒斯在努力调和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同时，使自己成为一个把现实服从于思想的伟大的唯心主义者。

结 束 语

当我写完这本书时，不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饶勒斯的思想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在他的伟大和富有成果的事业中，闪耀着一个异彩夺目的思想：各国之间的和平是现代社会和有机发展的基础。饶勒斯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向着社会主义民主和平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为了和平而主张和平，因为在他看来，和平是人类文明中最基本的东西，它尤其能保证社会在不发生无谓的暴力冲突的情况下，正常地向前发展。饶勒斯认为，外部的和平势必同内部的和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国际上的和平发展势必同国内的和平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全面的和平发展的思想是饶勒斯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饶勒斯虽然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但唯心主义——现实服从于思想——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

唯心主义有其危险的朋友：实用主义或新神秘主义；它也有其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然科学。实用主义用反对一切定义和一切理性分析的唯心主义直观来同理性论抗衡；而自然科学则把唯心主义比作为夸夸其谈的言语主义。比埃尔·德尔贝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教授。最近他不是宣称，“神明”的柏拉图是一个犯下唯心主义弥天大罪的“大恶棍”吗？（见《科学与现实》一书，第110页。——作者注）

唯心主义既不应受到实验主义的这种愤怒的指责，也不配受

到实用主义的高度的赞扬。人们在一般情况下很容易把两种必须严加区别的唯心主义混为一谈：行动的唯心主义和推理、认识或者是空想的唯心主义。思想是行动的首要条件。人的行动是受目的，也就是说受思想支配的。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来说，思想则变成理想，即“最终目的”。思想越明确，它所具有的行动力量就越大。思想便成为真正的思想力。思想越切合社会现实，它就越能——用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被群众所掌握”，就越能避免把现实理想化。因此，行动的唯心主义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它是切合实际的预见，是对行动后果的先知。思想是行动的灵魂，是具有指导作用的精神，推动前进的动机，照亮道路的明灯，吸引能量的磁铁，指明方向的罗盘；它是千里眼和加快运动速度的兴奋剂。一句话，思想是力量的聚积器。

思想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实际生活。科学活动也需要思想。假设就是通过试验实现的思想，它是科学的必不可少的开拓者和向导。如同现代国家一样，倘若没有“信贷”，理性——甚至是以实验为依据的理性——是无法存在的。

行动以某一思想，或者说某一假设为指导，这便是从未来那里借得“信贷”。当然这不是没有危险的。人们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往往要承担风险，故需要拿出勇气。

总而言之，行动的唯心主义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饶勒斯一生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具有无法估量的历史意义。这是行动的唯心主义的胜利。人不是一架会推理的机器。人是有生命的，他能够活动。动机、利益、思想和兴趣爱好使人处于运动状态。社会主义要实现一种积极的和高尚的道德观：它不允许对一度占上风的不公正现象熟视无睹，不允许在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殊死搏斗中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尽管饶勒斯并不愿意在这场斗

争中炫耀自己,但是,他根据唯心主义的一贯原则,始终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他的意见可能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也全然不顾。社会主义必须具有饶勒斯的这种革命唯心主义特色,要不它就永远无法实现!国际社会主义之所以陷入目前的严重危机,其中一个原因是,国际社会主义忘记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和诺言,面对野蛮、疯狂的帝国主义势力,步步后退。社会主义复兴、发展和存在的必要条件是重新回到积极的唯心主义上面来。

饶勒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作为积极唯心主义、革命唯心主义的大师而流芳百世。

推理的和空想的唯心主义则是另一码事,它把思想,也就是把愿望当作现实。当客观现实不能证实其理论时,象黑格尔这样的理性论的唯心主义者便说:“让事实见鬼去吧!”我们在认识事实时,不能任意胡来:我们的责任应该是说出事实的真相。我们的认识必须以客观现实为依据。这时,认识的作用是“被动的”或接收性的。它只能收集和忠实反映事实的全部真相和一切事物的真相。但是,当我们在行动中对某一事实——例如某一罪行——产生厌恶和反感时,我们则采取不姑息的态度。唯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权说:“让这一事实见鬼去吧!”然而,在表示反对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这一犯罪的事实。在认识的范畴里,必须尽可能地保持客观性,保持完全和绝对的客观性。

人们知道,社会主义在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之前,曾经历过一段空想社会主义阶段。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一些只知道推理和遐想的唯心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计划、幻想当作现实。继圣西门和马克思之后,现代社会主义进入了科学社会主义阶段,它根据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的历史发展进程确定社会主义理想。

饶勒斯不折不扣地接受了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但是他那热情奔放和倔强的性格使他有时过分地乐观。尽管他具

有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尽管他正确地提出了极为有用的行动的原则，但这种乐观主义的特点毕竟是粉饰现实。饶勒斯往往单凭自己的认识和热情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他渴望进步，渴望看到法兰西以及全人类的政治和社会复兴。他把每一进步，哪怕是最微小的进步，都看成是思想、权利和正义的反映。他往往故意夸大这些进步的重要性，以便推动今后的发展……

饶勒斯已经看到战争这一可怕的怪物正在步步逼近。他研究对付战争的办法。但是他始终不愿相信这一点。因为他英明地预见到战争必将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尤其已经预见到，战争必将破坏社会和平和有机发展的基础，而他正是这一发展的最坚定、最热忱的倡导者和捍卫者。

饶勒斯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反动政客和军阀集团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血腥战争，把世界推入万丈深渊，使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丝希望化为乌有。对于一切在内外政策方面丧失起码的民主自由权利的国家来说，革命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这场旨在消灭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革命将首先导致欧洲的民主化——这正是饶勒斯在其光荣的一生中努力奋斗的目标。

(1915年)

封面
目录
正文